

Über

**SOZIALISMUS,
KOMMUNISMUS und
ANARCHISMUS**

von
Karl Diehl

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及無政府主義

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及

無政府主義

卡爾第爾著

余祥森譯

新生命書局

義主府政無及義主產共義主會社

實價二元八角



新
生
命
書
局

中華民國十九年八月卅日出版

著者 KARL DIEHL

譯者 余祥森

發行所 新生命書局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寶善里

電話一九七六四

上海華豐印刷所印

第十三講 法國社會主義

四 自地方自治政府 (Komune) 至一八九五年

六月血戰中，卡末嘎 (Covington) 將軍既與法國無產者以重大、決定的敗績之後，法國社會主義的與共產主義的運動遂告息影。及一八七〇至七一年地方暴動方復引起一種社會革命的運動，這次運動却表明舊日社會主義各黨絕未損其勢力，并且還在支配一大幫徒黨。

這次巴黎地方暴動雖往往被認為馬克斯與國際社會主義所操縱的暴動，其實，他也是一種專門法國式社會革命的運動，并且指示給你們看，法國社會主義呈有多少陰影。

巴黎地方革命不是自法國蒲魯東派舉發，也不是自倫敦中央機關舉發。這次暴動適如二月革命，缺少一致的觀念、組織與究竟方針。在第二次帝國之下，猶如在六月政府之下，所有各派中有不滿意的人與新進的人聚合為組合與會派；一等到法國因為戰爭的事變發生政體變易時候，一切這些不滿意的分子都信時機已到，可以用武力從速實現他們的計劃。

這地方自治政府在一八七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在二十萬以上的羣衆之前受了莊嚴的宣告，其實他絕不是一種具有統一的組織與堅定的綱要的政府。中央委員會的分子實屬於一切各黨派；地方政府的遷就的行動蓋即由於這種複雜的結合關係。

地方自治會議 (Kommunerat) 的八十六個議員中可以分出五個派別。

(一) 地方自治主義派 (即聯邦主義派) (Kommunalistisch, föderalistisch)。——這派的徒黨根本上所要求的政治改革是意使地方獲得較多的自由。他們要提出的抗議是：反對自拿破崙 (Napoleon) 一世以來逐漸增加的中央集權，反對國家政府任命知事，並反對地方自治政府受了相似的摧殘。這派固然早已很受蒲魯東學說的影響；其實完全站在這信條的基礎上面的，另有一派，所以可以依其名字而稱這派為：

(二) 蒲魯東派（即虛無主義派）。——在他們看來，地方自治政府不但得履行聯邦的要求，並且得本虛無主義，以履行社會改革的方策；交換銀行與無代價的信用貸借的理想應再設法使之實現。

(三) 無政府主義派（本共產主義的無政府主義的意向）。——受巴庫甫指導的這派也要利用這機會以實施他們的急進的理想。他們藉里昂地方自治政府（一八七〇年九月）給予巴黎地方政府以一個流血的前例。

(四) 布郎魁派。——這派適與上述一派同為徹底的社會革命的黨派，並且在地方會議中同有數多的代表。他們盲從舊日暴動者布郎魁的旗幟，布郎魁的策略有一次受了恩格爾很真切的解說道：「從他的政治的活動看來，他根本上是『行爲的男子』，他相信一幫受了良好組織的少數人如在恰好的時機中嘗試一種革命的行動，可以藉幾樁真正的成功以吸引民衆，以造成一種富有勝利的革命。」

(五) 馬克斯派。——他方暴動受了這方面促進的力量實在很少，並且不在暴動開始之時，直到這運動不復堪以阻止，已經達到相當高度之後，國際派方才正式參加進去。

其次，就地方會議的八十六個議員中，只有十七個屬於國際派，這十七個中只有幾個是馬克斯派，其餘如貝斯雷（Beaury）等却是蒲魯東派。一八七〇年九月七日國際派法國通訊祕書度達（Du-

point) 曾發一道命令，要求不藉暴動以驅使中等階級來作團結，却欲利用環境所賦予的自由把工人階級的一切力量加以組織。

國際派方面首先正式相戒不用革命的暴動。馬克斯在國際協會幹部對於一八七〇年至七一年普法戰爭發表的第二次請願書中有云：「當敵人幾在巴黎叩關時候，凡設法推翻新政府的似都是一種絕望的趨行。法國工人得盡其國民的義務，但他們不應竟受一七九二年的種種國家的回憶所支配，猶之法國農人也不應竟受第一次帝國的種種國家的回憶所欺騙。他們不應重述過去，却應建設未來。希望他們靜氣決心，利用共和國自由所賦予的手段，以根本上實現他們本階級的組織。」

國際派直到三月二十五日方始勉強替巴黎地方自治政府說話，但還謹守一八四八年共產黨宣言的口號：「到處援助各種革命的運動以反抗現存社會的與政治的狀況」。自那日起，由國際派巴黎支部聯合會署名的告工人書方才出現，其中要求工人起來參加地方自治政府；這宣言也露出受了蕭魯東思想的影響；其中有說：「這是說：自由、平等、團結實要求安定的秩序建設在改組工作的新基礎上，這乃是第一條件……地方政府之獨立不啻是保障契約中關於自由討論取消階級對立與保證社會平等的那條條文。」

地方自治政府依和平而中庸的聲調，而發正式的布令，與其政治的、及經濟的行政方策，都顯然表明當時的人實兢兢業業的不依工人階級的片面利益，以指導運動，却求適應小市民的立場。

年長的議長貝斯雷在他的開會辭——這開會辭顯然表現蒲魯東理論的影響——中，有說：

「由於地方政府之完全自由，可知共和國將成立於我國。現今的共和國再不是我們大革命時代那樣的。一七九三年的共和國是一個軍人，他欲在國內外作戰，所以使用祖國的一切力量，以培植和平。但是我們的未來却是和平與工作；他定可以助我們報復，使我們的社會復蘇，從這樣看來，法蘭西共和國還可以造成弱者的支柱、工人的保護者、全世界被壓迫者的希望、與世界共和國的基石。然則地方政府的自由却就是共和國自身的自由。各個社會的組合將復得他的完全獨立與完全行動自由；地方政府將從事關於地方的、區域政府將從事關於區域的、全國政府將從事關於國家的事。」

地方自治政府告法國王公的宣言書，也表現此種地方主義的傾向；他是要求王公等起來促進法國各地方與巴黎間的自由的聯合。

在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九日地方自治政府告法國民衆的宣言書中，有提出作爲以後政治活動的目的：地方團體之絕對的自由實延及法蘭西全土，又保障他的各種權限之完全，又予全法國以充分試驗

他們的才幹與他們的技能，如予一般人以個人自由的擔保、予公民以意識自由的擔保、予工人以工作自由的擔保等等。」

其中關於應進行的經濟的改革，有說道：「巴黎政府保留……創設適當的機關的權利，從事推廣教育、生產、交通及信用等等。」

地方自治政府於此也是跟着蒲魯東走，蓋地方自治政府也主張保留私有權；在告鄉村工人的宣言書中明明有云：巴黎政府自行……創設適當的機關，以推廣教育、生產、交通等。

地方自治政府還主張保留私有權，這也是他跟從蒲魯東的明證。在他的告農人書中顯然有說：「巴黎最需要的是——請你們聽着——野外的工人、清苦的記者、納重稅的小資本家、水夫、佃戶、村農；你們播種插秧、流汗、爲的是把你們的生產中最精粹的部分送到那些無所事事的人們的手裏；最後巴黎所需要的是：村農的土地、工人的工具、一般人的工作。」其餘的社會主義的方策也表現其受有蒲魯東理論的影響，其中應加以陳述的是：地方自治政府任命的各種委員會中，有一種是擔任工作、產業及交換的委員會。——地方自治政府的發一道取消一切當舖的命令，因爲當舖是私人榨取工人的機關，並且與工人所享關於他們的工具及信用等權利，相衝突。

蒲魯東所宣傳的對於私有權之尊重，尤其被貝斯雷在他評論法蘭西銀行時候，所服膺。

貝斯雷認政府發給一百萬佛郎的信用貸款，已經滿意，他次則主張保護銀行；他以為：攻擊銀行，似是一種愚行，因為「銀行原是國家的財產，沒有銀行，便沒有商業，沒有幸福。」在馬克斯派看來，這一類的進行却是一樁不可解的錯誤。恩格爾說：「最難以了解的是人家還在法蘭西銀行門前鞠着躬，以表示那種神聖的敬畏。這是當時一種極難了解的錯誤。如果法蘭西銀行握在地方自治政府手裏——這樣一來比一萬個質押者還有價值。」

法國馬克斯主義派拉法格 (Lafargue) 也有相同的批評：「一八七一年的聯合者竟成了巴黎的主人翁，他們最出色的，莫過於深對資本主義的私有權表示敬意。當時地方自治政府理應占領了法蘭西銀行，不應派衛兵站在銀行門前，使資本家先生的寶藏依然不受侵犯。」

他在別地方，直說地方自治政府不含社會主義的性質：「地方自治政府受了馬克斯與恩格爾主持的國際派幹部所保護；他由是才得一種社會主義的性質，其實他在其短時期的生命中從未含有過這種性質。地方自治政府的逃亡者現在真個自認為社會主義的代表；其實他們絕對的不知道什麼社會主義。」

馬克斯也言明當時多少外來的分子破壞地方自治政府的「階級性質」。他在幹部對於地方自治政府的報告書中有云：

「在每次革命中，除了他的真正的代表之外，總雜着其他色彩的人物。有幾個是與前幾次革命發生過關係，而今尙在遺留的人；他們不明瞭現在的運動，却藉他們的著名的膽量與品性，或則只藉傳統，以對於民衆發生巨大的影響。又有幾個不外是狂喊者，他們歷年只是常常重述其反對現政府的言論，却竊自稱爲最純潔的革命黨員。及三月十八日以後，這些人物又復出現，并且在某某場合中竟占了領導的地位。他們的權力所及的地方，便在阻礙工人階級的實際活動，適與他們從前阻礙前次革命的發展完全一樣。他們是一種不可避免的壞東西；人家隨時把他們剷除去；只是這時日却不假與地方自治政府。」

地方自治政府的另一社會主義的命令當然不合蒲魯東主義的意旨，却也不合馬克斯主義的意旨。就是命令對於所有者所放棄的一切手工工場與工廠，施以一種統計，并對牠們施以一種精確的財產記錄；這些工廠應由在裏面工作的工人所組織的團體再來經營。政府應設立一種裁判的法庭，以規定給予工廠主的賠償額。

以國家的津貼費來組成工人生產組合的這種計劃確不合蒲魯東的社會主義的改革，而恩格爾却以為：蒲魯東派雖對於地方自治政府的經濟命令負有責任，他們雖曾提議一種組織；但這組織却不免生出與蒲魯東派相反的結果，這正是歷史的諷刺使之然。其實恩格爾太重視了這命令的意味。

依恩格爾的陳述，只有兩種分子在地方自治政府中占勢力，即蒲魯東派與布郎魁派；前者對於地方自治政府的經濟方案，後者對於地方自治政府的政治方案負有責任。蒲魯東派却不自知他們所幹的，適與他們的師父的學說相反。——事實上除了蒲魯東派與布郎魁派之外，還有一大批其他分子在這裏做代表，他們對於命令之發佈已生有影響；並且有幾個方案是尊重蒲魯東派的意旨而發佈的，又有幾個方案，例如關於生產合作社的，却依他派的意旨而發佈的。

有時馬克斯派方面也斷定：地方自治政府是蒲魯東的理論藉之以作值得注意的最後之拾頭機會；恩格爾竟目地方自治政府是蒲魯東派社會主義之墳墓，並且繼續說道：「這派現在已退出法國的工人界；在這裏面支配的——無論在可能論者，與在馬克斯主義者方面——決是馬克斯的理論。」拉法格也相似的說，地方自治政府把蒲魯東的虛無主義賜死了，適與六月暴動把空想的社會主義葬送了，同出一轍。

我們把法國工人運動的發展加以瀏覽，便見得馬克斯主義實不能說他占有現在這樣——如在德國支配一切的地位，也不能說他勝利的侵入法國境內。法國的工人運動不像德國社會民主黨是馬克斯主義的；他却分爲許多派別；只有一派法國社會主義在革斯德（Guesde）與拉法格指導之下，方是合於馬克斯主義的意旨，其他派別却服從其他領袖，并且這些領袖在原則上所根據的學說，又在馬克斯學說之外。——在德國，社會主義黨雖然發生意見參差，如佛爾馬（V. Vollmar）的態度之離異，但所關也不外策略的問題，以及個別的黨綱問題等。——但這些對於這些個別的問題發生異議的分子，即對於基本問題却也歸於一致；他們一切都是馬克斯主義者，并且站在共產黨宣言的基礎上面。法國方面的情形却不相同，到現在還可以窺見那裏的工人運動完全含有各個基本派別。

除開集產主義派（即馬克斯派）之外，在社會主義各派中，沒有可說真正是蒲魯東派的。蒲魯東的勢力却在於：他對於共產主義的批評阻礙了極端的社會主義之侵入，其次則他的觀念中有幾點還被現在存留的各派所採用。

蒲魯東學說所具這種間接的效力，却也被策特琴（Klara Zetkin）斷定了：「蒲魯東的勢力還在發生極深極廣的影響，他的小市民的空想最有造於小市民的生產法及小市民的徹底精神。」

互相岐異的各派中對於下列幾點實施有一種與馬克斯主義相反的意见：（一）在社會哲學中不採唯物史觀，而堅持唯心論的立場，即爲正義故，而提出社會主義的要求；（二）關於經濟的究竟目的，不主張對生產手段行集產主義，而提議較適合「個人主義的自由衝動」的改革；（三）關於政治的策略，不主張階級鬥爭，而認工人階級與其他階級之協同進行爲可能的。

我現在如對你們陳說法國工人運動直到現在的發展，你們將見得馬克斯主義在法國所占的勢力之薄弱，適與他在德國的正相反對。

在一八七二年中，可算爲地方自治政府以後工人運動中第一次新生機的是：多數工團之團結。他是先依協會的形式，假「工團總會」(Cercle de l'union syndicale ouvrière) 的名稱，於一八七二年五月二十八日試行成立的。這團體是以「公共的契約來規定雇主及雇員的利益」；這是該協會的目的。及政府禁止這種團體時候，於是工會依下述的形式團結起來，即創立一種以互爲基礎的信用公司以供各工團 (Syndikalkammer) 及各聯合合作社 (Kooperativgenossenschaft) 之用。這種團體的立場自始就是虛無主義的，因他也不收利息，也不派股利。

工會所作較大的正式示威運動是始於一八七六年十月二日至十日的工人大會。這是一種純粹的工

人大會，并無什麼政治家與理論家參雜其中。除了公論家巴貝累 (Barbet) 與得斯摩郎 (Desmoulin) 之外，參加這大會的只有工人代表。由工團與其他工會派來參加這大會的代表計有三百六十人，他們實代表一、一〇〇、〇〇〇工人。於是推舉工人生產合作社為救濟社會困况的最重要的手段。當時有腓囊斯 (Finance) 者，他批評這種合作社，是以蒲魯東學說為根據的，并且宣稱即由最優秀的工人來組成合作社，也不外造就有產者，且其意向也只圖他們的利益而已。雖然腓囊斯這樣反對，但大會終於接受贊成合作社的一個議決案。

第二次這樣的大會舉行於里昂地方，時期為一八七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八日。這次大會的基本規定與其基本傾向固然就是第一次大會的，但很奇怪的出现一批主張集產主義的少數人，他們反對工人只作合作社的活動。他們的發言者度皮耳 (Dupire) 認為唯一救濟手段的是：工具與土地變成「羣衆公有的而且不可出售的所有物」(les propriétés collectives et inaliénables de la masse)，另有一個代表名沙貝耳 (Chabert) 却以為：「集產主義是屬未來的」(le collectivisme c'est l'avenir)。但大多數仍信守第一次大會的議決案。於是又在公然反對國家的助力與集產主義。

集產主義派在里昂固然還居少數，但他在第二次馬賽 (Marseille) 大會 (一八七九年) 却占絕對

的大多數。這次大會不復純爲工人大會，却是社會主義者的大會，許多非工人也參加着。在一八七七年創立平等 (L'Égalité) 雜誌的那位革斯得 (Jules Guesde) 對於這次大會的意向之變動，實生強烈的影響。他與布魯塞 (Brousse) 及拉法格 (Lafargue) 同受馬克斯理論的影響。因此在巴黎地方自治政府之後馬克斯主義的潮流又復浸入於法國工人運動中，他的巨大的勢力顯然在馬賽大會的討論中表現出來。

舊時的合作社派至是完全進而爲急進的社會主義派。大會自稱爲「法蘭西社會主義的工人大會」(Congrès ouvrier Socialiste de France) 并且以七十三票對二十三票接受下列的議案：「大會因思：如果每個人的本體完全滿足了他的需要，完全發展了他的能力，社會問題方才可以得了解決；所以大會說明，私有權是人的物質的與精神的需要受了不平等的滿足之因，并且不能予人的能力以發展的機會。大會并要求集土地、礦山、機器、交通手段、建築物、資本財產爲公有，以利人的社會。」大會復議決，工人應組成爲政治的階級，作爲「工黨」(Parti ouvrier)。這名稱也被正式採用了。——語句上好似德國社會主義黨之組織，顯然拒絕與其他黨派或階級作任何之妥協。這新黨直到第二年一八八〇年巴黎區大會上方得他的正式的黨綱，這黨綱是受馬克斯的協贊而成的。恩格爾稱他是「一篇傑

出的動人的證據，能用幾句話使羣衆了解」。馬克斯對此的影響可以顯然在黨綱的序言中看出來：

「法國社會主義的工人，因想到欲占領社會只好由工人階級或且無產者先組織成特殊的政治階級，然後再事革命的行動，并且進行這一類的組織得用無產者所有的一切手段，連同普通選舉權在內，所以他們議決提出下列關於選舉的要求作為組織與奮鬥的手段，蓋他們實視資本家階級在政治上與經濟上的特權之沒收與一切生產手段之集合為其努力的目的。此後繼以一種政治的黨綱，這黨綱尤其要求其撤消集會自由中一切限制并主張完全的地方自治。其中有十條是要求成年人的八小時工作日、法定的最低工資、并撤廢一切間接稅。該黨在一八八四年魯貝（Roubaix）大會上關於他們對於革命的態度所作的表示是完全合於馬克斯的意旨：「社會革命是不容預測的；牠並非一種自然的現象；牠並非因為各關係方面忍無可忍的才發生的；牠是近代社會促成的各種運動所生不可避免的結果。」因此，所求於黨的任务是：「普及教育、招募軍隊，以備乘不免總要發生的革命的機會來起事。」

這新創的工黨（Parti ouvrier）在政治上尙是遠不足以一致代表法國無產者的地位，這在該黨創立後不久即已表現出來。第一次的分裂已見於一八八〇年哈佛（Harve）地方舉行的大會席上。工黨黨員中原屬於舊時組合派的，從始對於急進的社會主義的黨綱即採反對態度。現在竟從黨中分離出

來，在哈佛自開一個聯合大會，於是該黨的大多數人遂在另一大廳內開其特別大會。上述的工團派在良內 (Lyonnais) 與巴柏累 (Barberet) 領導之下還開大會於巴黎 (一八八一年) 於波第奧 (Bodeaux) (一八八二年)，此後遂失了其聲望。

除了這工團派之外，法國工人運動中還生出別派，都是與工黨對立的。第一是無政府主義者。當時有一幫無政府主義者其先所以參加這工黨的創立，其後所以又同合作社派脫退出來，其原因都不外爲着該黨的革命性黨綱。其次則無政府主義者與馬克斯主義間所有內在的對立太廣大了，所以持久的合作是不可能的。無政府主義者如哥提耳 (Emile Gautier)，卡飛洛 (Caffiero) 及馬拉退斯塔 (Malatesta) 劇烈的攻擊工黨的政治的活動，而目他爲反動的。工黨方面，則有革斯德 (Guastde) 與其黨羽痛詆火藥、火油、炸藥等之無效果。因爲這些對立的關係，無政府主義遂漸漸由該黨中脫退出來。——另有一反對派則由一八八〇年遇赦回來的巴黎地方自治政府亡命客中一部分人組織起來。其中有幾個加入於工黨，例如馬龍 (Malon)、約夫郎 (Joffrin) 及阿雷芒涅 (Alemanne) 諸人；其他較溫和的却認工黨的進行太急進。龍革 (Longuet)、朱耳德 (Jourde) 及其他諸人皆屬於這一派。他們創立共和國社會主義者聯合會 (Alliance socialiste republicaine)，他的綱領出現於一八八〇年十

月二十六日。他們宣言：「人得向願意結合的人們宣傳，以求實施實際的改革。我們所注意的在一八八一年，不在於二〇〇年。」該聯合會所認為應加力取的目的（於此顯然可見他們和馬克斯主義之相反）是：以科學做基礎，以理智做指導者，藉自由以達到社會正義的勝利。一八八一年選舉時候，聯合會的與工黨的候選者在各選舉區內嘗互相攻擊。不久這聯合會解散了；他們的會員半投入工黨，半則歸入所謂急進派。

另有一派與工黨對立的是布郎魁派。這派中最有勢力的人自地方自治政府失敗之後都逃往倫敦，在那裏創立「地方革命黨」（La commune Révolutionnaire）。他們還像從前那樣堅持他們的武力革命的策略，並且從這立場批評國際派，以及法國無產者的溫和的進行。——當時馬克斯主義者革斯德（Guesde）自地方自治政府失敗之後，即改其態度，而寄同情於最初溫和的合作社派的德國工人運動。這布郎魁派却劇烈的攻擊這種「反動的」進行。他們在一八七六年出版的小冊子工團與其大會（*Les Syndicats et leur Congrès*）中，尤其反對一八七六年巴黎第一次工人大會。在這篇由味郎（*Vallant*）及其友人所著的作品中，其對於這大會的會員有說道：「他們所以異於人的是懷恨革命，這種共同的懷恨實把他們如膠如漆的團結起來，姑無論他們的利益相異到什麼地步；他們在工人界

中是救世軍，在有產階級中又是支柱，姑無論他們對中等階級的各黨所說的是什麼。」

一八八一年六月二十四日這布郎魁派遂在味郎、巴律耳 (Bardier)、栖未溫 (Sylvain) 諸人領導之下組織起來，稱曰中央革命黨委員會 (Comité révolutionnaire central)。一八九八年以後，他們稱曰革命社會主義黨 (Parti socialiste révolutionnaire)。

無政府主義者與布郎魁主義者在其革命的策略上固趨一致，但是因為原則上的對立又把他們分離起來，所以他們在其餘諸點上，却互相敵視。尤其：布郎魁主義者是社會主義者，他們不能承認我們在上文所述的無政府主義的究竟目的，就是聯邦主義反集中主義的經濟制度。但就是無政府主義者的暗殺策略也不是合於布郎魁主義的。有個布郎魁主義者，名叫勾米厄耳 (Chaumière)，曾把這對立說得很準確：「我們喜歡由民衆在白日舉行的革命，如六月十四日的革命、八月十日的革命、我們却憤恨拋炸彈的祕密專制主義，我們也反對用他的代理者——兵士及禁衛軍——來拋擊我們的那開明專制主義。」

在布郎魁主義裏面發生一種變動，這種變動自布郎魁死後（一八八一年）尤其可見，並且自該派的領導權落入味郎手裏之後，尤其愈顯明的呈現出來。舊日革命的策略固然還在介紹，但是由於片面

從事政治革命的政黨逐漸為經濟革命的政黨。布郎魁派愈其傾向於經濟問題的研究。他們便愈接近於馬克斯主義，但却不完全同化於馬克斯主義者。布郎魁主義者對於馬克斯主義及其他社會主義派無寧採用多少中立的態度。就他們堅持革命的原則，而不是改革派的這一層來說，則他們比之一切社會主義派却是極其寬和的。他們主張加組合的與政治的運動以分明的界別，各種運動應各依其法協同工作以達社會主義的目的。於是漸漸形成一種新布郎魁主義，他却與舊布郎魁主義者的政治革命黨綱相對立，亦贊成新社會主義的經濟的究竟目的。我現在就該黨的短篇歷史中舉出幾句話作為描寫這新布郎魁主義與其領袖味郎之用。這篇歷史是味郎親手給與舍爾雅克 (Seihac) 作為他的作品世界社會主義者 (Le monde socialiste) 的材料之用：「因為我們還在承認政治的活動為社會主義黨的第一任務，所以我們并不革除這些黨中任何一黨，又因為我們視組織為活動中最重要的條件，所以我們要求無產者把他的產業合作社 (Syndicate) 改組起來，結合起來，供作完全經濟的活動之用，我們同時要求社會主義黨不受各種經濟的組織所牽制，而組織起來，供作純粹政治的活動之用。」——在他的革命原則的見解中，顯然呈現馬克斯的影響：「我再不相信那些人所謂：革命可依自由的意志而為之的話。……革命不外是政治的與社會的恐慌，他們把社會組織中老舊了的分子除去，他們藉新進化的作用教

事物的與道德的進步所集積下來的新分子起來活動。……實際上，我們愈其前進，人類的意志與社會主義黨的有組織的力量在最後決定點時候，將也愈占勢力，但是只限於這二者確與歷史的進展、社會的進化合為一致，才可以發生這種作用。這歷史的進展，即社會的進化，人家固然容易加以促進，却不能制止他或且改變他。」

工黨不特在黨外揀着敵對的黨派；並且即在黨內不久也表現極大的對立。一八八一年選舉不利於社會主義者之結果——社會主義者全體所得之票數為五萬張——却被工黨的幾個領袖推斷為由於該黨的黨綱過於遵奉獨斷主義的馬克斯主義。有人要求採取一種偏重機會主義的，實際政策的態度并移其主力以事立刻可行的社會改革，使工人於此深悉其利益。這派的主要發言者是馬龍與布魯塞（Brousse）。馬龍在社會主義者評論（Revue Socialiste）中宣言：「我們充滿了空言學與無力的獨斷主義；其實我們得侵入形勢的核心裏去，并且，不啻依我們那樣只望觀察事物的或然性，當觀察他們的實現性。」有幾句話可視為這新派的綱要，這是出自這次從前為無政府主義者的布魯塞的口中；連「可能論者」（Possibilisten）這名稱也是出此，我現在由一八八一年十一月十九日的雜誌無產者（Proletaire）中摘錄這幾句話：「我們很希望把歷來所習用的一切都廢除掉；牠們僅僅達到一種虛幻的目的，而且

把那幻想的目的分成多數的謹嚴部分、分成許多種類；我們有幾種希望，極想把牠們可能化，省得我們疲於斟酌，省得像藍鬍子故事，我們老懸挂在烏托邦的高塔上，而且永無摸觸牠們的機緣；這就是可能論者的政策。」此外關於該黨的策略，也有種種差異。——革斯德實謹守馬克斯主義的原則，要求該黨與其黨綱得一個嚴格集中的絕對主義的形態，而這可能論者却要求各地方支部應有較大的自治權。社會主義的綱要在各點上應視地方的情形而有他的特殊的形態。這些對立已在一八八一年累涅（Rennes）大會席上呈現出來，但在那裏還被涵蓋過去。但在一八八二年亞坦（Bretagne）大會席上却至顯然決裂。革斯德派脫離了可能論者，而在洛登（Roanne）舉行特別大會。他們宣言：「我們破壞了可能論者的大會，蓋欲挽救馬賽（Marseille）和哈佛（Havre）大會所授與工會以沒收財產的綱領。」這新黨先自稱革命社會主義的工人黨（Parti ouvrier socialiste révolutionnaire），自一八八三年之後，却稱社會主義的工人聯合會（Fédération des travailleurs socialistes）他們堅持國際派綱領的大要。至於特別綱要之製成，却委之於各選舉區。——布魯塞竟謂，要達到集合生產手段的目的，最妙莫過於把重要的經營逐漸加以國有化與共產化。他把這理論在一篇共有的所有權與公共的服務（la Propriété collective et le service public）（一八八三年）中詳說出來。依此而論，尤其關係

的是：用地方的社會政策漸替社會主義的施設鋤平土地。革斯德却在一篇反駁文字公共的服務與社會主義 (Service publics et socialisme) (一八八三年) 中痛詆這種策略，而斷定這種國有政策結果只增進國權與有產者的勢力。

論理，社會主義各派中所生這條裂隙，至少可以在國際工人大會中，涵蓋過去；可是這事在一八八九年巴黎大會席上即已不克成功。雖然對於可能論者如何可使參加大會的種種變通辦法加以長久的討論，但終不能歸於一致。德國方面派來的一個演說者宣言：工會 (Trade unions) 與職工會不是社會主義的，我們既不得不與非社會主義的協會，如叔爾策得李次 (Schulze-Delitzsch) 協會等分離，那末我們便也得任憑其他，即法國人，作此相似的脫離。當時事實上舉行兩個大會。一個是馬克斯派與布郎魁派，一個是由可能論者與職工會開催的。馬龍在一八八九年八月十五日的社會主義者評論中有寫道：「在這次莊嚴的機會中，彼脫離法國社會主義的敵黨，如其能忘却他們的感情作用及其競爭心，則此一幕多麼偉觀咧！」

但即在可能論者一派中復生一種裂痕。他的種種對立可用布魯塞及阿勒芒 (Allmann) 的名稱表示出來，——阿勒芒意謂布魯塞太過於與有產者謀妥協，而太少推行真正利於無產者的政策。他痛

斥可能論者的議員道：「這些議員不想教革命的宣傳發生道德的權威，却認與有產者政黨謀理解，為較有效力。他們却不聽見多少有勢力的團體在作愈其嚴厲的怨懟；因為這些團體并不希望在共同的居室之下取得勢力，却只望滿足無產者的要求。」歸結一句話，他實罵可能論者太不成為工人的政黨。阿勒芒却認總罷工為最重要的鬥爭手段。於是在沙忒耶洛(Chateaufort)席上，遂生決裂。阿勒芒、克雷芒(Clement)及斐耶(Faller)被這黨革除了，他們組織一新組，稱為革命社會主義工黨(Parti ouvrier socialiste révolutionnaire)。但通例稱這可能論派分出的兩組為布魯塞派與阿勒芒派。

但即在阿勒芒派中也生糾紛。斐耶及其幾個同志，因不同意阿勒芒的策略，遂脫離該黨，一八九七年和布郎魁派合組為革命共產主義者同盟(Alliance Communiste révolutionnaire)。這同盟的規則中有云：「我們結合起來，以求有效的援助無產者的經濟的與職工會的組織并求促進無產者的政治的活動；我們決心，引導民衆進入革命的途徑，這途徑必定保他們最快的棄却代議制的政府，採用直接的政府以取得自由與權利；我們決心引用社會主義的共和國以促進資本主義的統治之傾覆與工人階級之解放，我們從此將共同繼續我們的努力。」這些派別之外還有一組，在人類上甚且極堪注目，就是所謂獨立的社會主義者那一組。這是由那些固然主張各種背景的社會主義，但不願受何黨派圈套所拘束

的政治家所組成的。例如朱雷 (Jaurès) 與米耶郎 (Millerand) 都是屬於這一組。他們的機關報是：小共和國 (Petite République)

上述法國工黨固然稱為馬克斯主義的；其實這名稱不能視為合於嚴格的意義。這工黨絕不是像德國社會民主黨那樣的政黨；反之，這黨固然是依馬克斯主義的意旨而創立的，但因漸漸關顧法國的特殊經濟狀況與政治狀況，所以他推行的一種策略却與馬克斯主義的原則不能合拍。馬克斯主義者所以責備可能論者的，就是因為他們採取機會主義的態度；他們對於社會改革派的運動的援助，他們之容許有產政黨及其妥協之傾向，一切這些現象現在竟也逐漸出現於工黨方面了。吾人尤其可藉原始的黨綱之屢次補充，尤其可藉地方綱要、海上綱要、農業綱要等之加入，把這點證明出來。地方綱要（由一八九一年里昂大會接受）要求地方設立學校店舖，以分配食料與衣服於學童，並求替城市工人，規定最低工資與八小時工作日，並於都市設立工作交易所等。——海上綱要由一八九五年洛米力 (Lorient) 大會接受）要求替船舶工人規定最低工資、最小工作日，設立漁業專門學校等。——至於農業綱要尤其饒有意志；因為他決然與馬克斯主義的理論相衝突。這農業綱要是製成於一八九二年馬賽大會席上，而完全脫稿於一八九四年南特 (Nantes) 大會席上。在工黨的基本綱要中，却依真正馬克斯

主義的本旨，宣言無論農業、以及工業中小資產必趨於滅亡。在革斯德及拉法格對於這綱要所作的解釋中有云：「跟着農業的機械主義而出現的只有給大農場站立的地位，這大農場就是由從前許多小田地集合而成的。於是地產中發生一種集中作用，這種作用實促成而且要求土地之社會的占有；至於在經營公司的手中的地產愈其成爲一種共有、不可分的產業，這更是完全不必論的。」其下又說道：「這集中作用是商工農各業的法則，以股東所有權來實現集產的，這方法是促進集中作用的。這二者就是集產形態所含物質的原素，而造成這原素的却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之發展。」雖然這解釋文中這一段及其他段都明明白白的說明小經營即在農業中已不可挽救的陷於滅亡之境，又因爲技術發達的緣故，所以不免對大經營表示讓步；但是在農業綱要中却提出一些要求，求達保存小農人地產的目的。屬於這些要求的是：第四條；即由地方把地產分配與無產的家庭，并禁止其利用工人。又第八條：由地方借國家的助力購買農業的機器，無代價的交與小產業者使用。——拉法格在他的農業綱要註解中曾替這些規定作有一種解釋。他指明事實上法國的農業實與工業相反，他大半還是由自營經濟的有產者來經營。縱使這種狀況歸於消滅，然而社會主義却不負有促進其消滅的任務，他的任務無寧是使自營經濟的所有者對於國庫、高利貸者與大地主，得保其一坏之士。他在南特大會席上嘗宣言：「社會主義

黨，并不想制止農業的所有者安然占領其用血汗耕作的一塊土地，他將把他們身上所負的稅減輕，把他們從吞沒他們的高利貸者那裏解放出來，再把抵押債務除了，並對於他們的工作予以種種援助。再
把信用、機器、種子及飼料供給他們并准他們用天產品抵他們的債。」朱雷 (James) 在一八九四年
法國工黨年鑑中嘗試把農業綱要與馬克斯信條間的矛盾加以下述的說明：「他們（指那些認其間顯有
一種矛盾的人們）忘却的是：如果我們欲再把全部生產手段給予民衆，其結果將永遠的徹底的使那些
工作的人們事實上占領其工作生產品。農業的所有者事實上却靠着他的工作爲生，却不定是榨取者或
且被榨取者。所以小農人的所有權在社會主義組織的制度之下，將依舊保持他的位置，其時工作的結
果都是屬於工作的人們。」——朱雷用這樣解釋却不能抹除這矛盾；因爲這幾句話如何能與馬克斯顯
明的宣言（見資本論第二冊，第三四一頁）相吻合呢？馬克斯說：「碎地所有權依其性質而論實不能
使工作發展爲社會的生產力、不能使工作成爲社會的形式、不能使資本集中於社會、不能使牧畜進於
大規模的地位、不能使科學受了逐漸進步的應用。高利貸與稅制不免到處虐待這種所有權。投於地價
的資本不免把耕作的資本吸收了。生產手段之無盡的破碎、生產者自身之孤立、人力之無限的浪費、
生產條件之逐漸的惡化、生產手段之昂貴，這就是碎地所有權的一個必然的法則。」——工黨的農業

綱要可以作如是解釋：姑無論農業中絕未有馬克斯所斷定那程度的大經營傾向，就是在碎地的國家，即在法國境內，事實上的發展適與這假定的傾向相反，所以只有兩條路走得通的：即馬克斯主義黨如自始即不放棄其在法國大部分完全成功的希望，他就得使馬克斯主義的綱要迎合法國的特殊狀況。因為該黨走上這第二條路，所以他無論如何總是援助較大的選舉之成功。一八九三年之議會選舉即可證此。其時工黨的議員獲選了六人。社會主義者中統共選出了五十人，其餘分配於中央革命黨委員會（Comité révolutionnaire）、革命社會主義工黨（Parti ouvrier socialiste révolutionnaire）及獨立派。——到了社會主義者的人數這樣激增之後，少不了還有種種努力，求使這樣歧異的分子多少作一結合。關於這種結合的嘗試，我將在次講中報告出來。

第十四講 法國社會主義

五 自一八九三年至世界大戰

法國社會主義中第一次結合運動也就是表現在一八九三年選舉之後。社會主義的議員遂在議會內團結起來，成爲「社會主義者集團」(Groupe socialiste)。但是這議會團結不成爲一致的議會黨。反之，各黨的獨立性完全受了保持；因此不外造成了一種表面的團結，於事實上究無所補。我們由於此一事可以知該黨實無實際的團結可言，即合成這團的各社會主義黨不只具有據我們所知的那樣異樣性格。還有各個人直接由該國中脫離出來；例如法國社會主義工人同盟(Fédération des travailleurs

socialiste de France) 中之拉微 (Lavy) 及阿勒芒派；因為他們不贊成這種沒有明白黨綱的結合。他方面還加入有完全不是社會主義者的議員；例如幾個老部郎派 (Boulangisten)，與幾個所謂急進社會主義者 (Radikalsocialisten)；他們的全部社會主義在於多少對於「巨額財政」(Nante finance) 表示反對而已。所謂這急進社會主義者與「社會主義」相去之遠，可以由聯合的急進派與急進社會主義者在一九〇一年巴黎大會中所發的宣言看出來：「吾人得依保護國家以及農、工業生產的利益所要求的程度把若干專利與公共的服務交與國家。……從這點看來，使我們脫離集產的社會主義者的，就是我們熱烈的信從私有權的原則；我們也不願着手，也不願預備壓抑這原則。」

這結合的議會團所缺少的綱要，約定後來由米耶郎 (Millerand) 提出。他應草一種妥協綱要，藉此以結合一切不則分立的派別。及一八九六年地方選舉使社會主義的議員大形加增時候，這件事遂藉一八九六年五月三十日的宴會而受慶賀。此時這位原屬獨立派的米耶郎，即在幾乎一切各派社會主義者之前，發表他所作的綱要，這綱要被稱為聖芒德綱要 (Programme de St. Mandé)。他很巧妙的把馬克斯主義的、與社會改革論者的及國家社會主義的思想聯合起來，并且把社會主義的黨綱的要旨歸納為三點：「國家應取干與的態度，把堪以國有的生產手段及交易手段由資本家的所有變為國有；藉

普通選舉權以奪取政權；國際間工人應謀互相了解。」該綱要復用這幾句話作結：「社會主義者如結合起來，已足以處於不敗的地步。」其實當時的及現在的法國社會主義尙去這種結合甚遠。這已在以後的法國社會主義運動經過中表現出來；因為以後的法國社會主義運動還在表現其新糾紛與分裂。

德賴·佛斯事件 (Dreyfus Affaire) 實與新糾紛與新結合的嘗試以動機。政黨方面對於這次全部的爭端應否認爲民間事件而置之不理，抑或應對之表示態度，社會主義各黨間的意見對此實不一致。法國工黨方面有向其他社會主義黨提議設立一個監視委員會 (Comité de vigilance)，依革斯德所說，該委員會之設蓋欲給予全國以一個統一的社會主義黨的印象，并不以應付偶然事變的決心。」這個在一八九八年十月創立的委員會宣言：他不准軍隊的暴動觸及共和國的自由，也不願把街道交與反動派占領。這個監視委員會在數星期後被解散了，而代以社會主義者同盟委員會 (Comité d'entente socialiste)。這委員會只成爲各社會主義黨的一個表面的代表機關；參加在裏面的有布郎魁派、革斯德派、阿勒芒派、布魯塞派及獨立派。此五派之外，如還有肯對該同盟的原則負責的工會與合作社，也可以予以收容，這同盟的原則就是：「工人應謀國際的了解，工人應有政治的及經濟的組織，成爲工人政黨，以奪取政權，并社會主義化生產手段及交易手段。」這個統一委員會所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那個

成爲各社會主義黨長期爭執焦點的問題——即米耶郎事件。蓋原屬於獨立派的社會主義者米耶郎進入瓦爾德克·盧梭 (Waldock-Rousseau) 內閣被任爲商部部長。這事件益加糾紛，蓋列席在該內閣中的，尙有那位著名的前巴黎地方自治政府的奮鬥者加宜斐 (Gallier)。於是關於社會主義者可否自由進入中等階級的內閣的問題，發生劇烈的爭論；連同盟委員會也無法加以處理。該委員會遂以八一票，對六三四票接受革斯德的提案，即：「階級鬥爭實禁止社會主義者進入中等階級的內閣」。屬於多數者是革斯德派、布郎魁派及阿勒芒派，屬於少數者是布魯塞派、獨立派及自治聯邦的主張者。在社會主義者統一的問題中通過了一議案；即每年舉行一次普通大會并設立一個總委員會，各黨應按其人數各派若干代表參加其中。該委員會應多少實行控制各該黨的報紙與議員。其餘却應保持各黨的獨立性。該大會，遂受熱烈的歡呼，在馬賽市的鐘聲之下，宣告閉會。但在數星期後，又復發生劇烈的糾紛；所關的又是社會主義者對於入閣問題的態度。這兩個對立派現在被稱爲擁關派與反關派。社會主義各黨的中心於是發生劇烈的怨言。他們反對米耶郎的政策；尤其革斯德派不倦地指出現政府仇視無產者利益的態度。米耶郎事件竟爲一九〇〇年巴黎國際社會主義者大會，以及法國各社會主義黨所組織的同盟委員會第二次大會的討論中心點。在國際大會席上尤其法國社會主義者方面關於這問題的對

立，顯然表現出來，尤其代表反開派立場的是革斯德，他宣言：「國際黨無論參有意大利人的米耶郎、德意志人的米耶郎、抑或英吉利人的米耶郎，都是不可能的。」結果人家同意於考茨基的讓步提案：即社會主義者之入於中等階級的內閣只能視為「臨時的與例外的探查實力手段」(expédient force transitive et exceptionnel)。

在國際大會席上這些對立雖因這個有伸展餘地的議決案而得多少緩和，但在法國本國第二次大會席上却嚴厲的表現出來：革斯德遂因之而宣告脫會。即里昂的法國社會主義者第三次大會也是討論米耶郎事件。雖然里昂知事在他的開會辭中顯然希望大會大眾同心一德地注意到目的與理想，但大會的經過却證明一種完全的反照。革斯德派自始即已拒絕參加；大會中有一派要求米耶郎脫黨，另有一派主張他固然可在黨內，但他不復受黨的直接的管束。因為要求脫黨的嚴厲的議案否決了，布郎魁派、共產主義者同盟會分子、與幾個自主聯邦論者都離去議場，并與革斯德派合開一個反對大會。由是法國社會主義者間復引起新的破裂。一方面，則法國工黨(革斯德派)、革命社會主義黨(布郎魁派)、共產主義同盟會(斐耶派)及幾個自主聯邦論者合組法蘭西社會主義黨(Parti socialiste de France)。他方面，則社會主義工人聯盟(布魯塞派)、革命社會主義工黨(阿勒芒派)獨立派及幾

個自主聯邦論者合組法國社會主義黨 (Parti socialiste française)。這兩黨現在又復分道揚鑣，各有各的黨綱并且在選舉中各提出各的候選人。法國社會主義黨的首領是朱雷與白里安 (Briand)。他的黨綱在一九〇二年吐耳(Tours)大會席上確定了。他是表明這個有統治的社會主義黨含有社會改革論、國家社會主義、機會主義等性質。

根據這黨綱的社會主義是由民主政治的運動中產生出來，他應就經濟的方面完成民主政治。其究竟目的固然是集產主義的所有權；但是工人得利用共和國的自由權所給與的一切可能性，并繼續從事改革，以求接近這目的。於是社會主義顯然稱爲合於共和國的，而共和國之保護也被稱爲社會主義黨的任務。共和國應逐漸教育工人，使他們擔任未來的社會的大任務。於是發表一種顯然與革斯德派及布郎魁派正反對的宣言道：「有組織的無產者在民主政治中實可以運用合法的活動。如果他們只信任『革命』」一個字而怠忽了這合法的活動所具偉大的力量，那就極其不幸了。」於是總罷工被推爲鬭爭手段。須在工人階級的教育漸有進步的假定之下，這一類的策略方有完全的價值。——這個爲一九〇二年選舉而製定的黨綱所含的許多要求，蓋即本布魯塞派所希望「公務」(service public) 國化的意旨。在革斯德與味郎的領導下的法蘭西社會主義黨却於一九〇一年在伊甫里 (Ivry) 地方完成他的黨

綱。他簡簡單單的包含馬克斯的基本思想，并且反對那一黨的「中等階級」的政策。有人斥該黨綱爲空想，革斯德却答道：「否！所謂空相是期望李樹生梨子，期望有產者在那些仰瞻有產者的利益的人們手下，會翻然改變過來。」

當一九〇二年選舉時候，這兩個社會主義黨共得被選議員五十二人，其中三十八人屬法國社會主義黨，十二人屬法蘭西社會主義黨。——及受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國際社會主義者大會所議決的合併的議案壓抑之後，這兩黨才重新合併。其合併的宣言說：「爲欲在攻擊資本主義的鬥爭中賦予工人階級以全部力量故，只准一國之內對於中等階級的政黨，只有一個社會主義黨，猶之只有一個無產階級。所以一切同志與一切社會主義的組織都負有這使命者的義務，竭盡一切力量，根據國際大會所規定的原則，以促成黨的統一；爲無產階級的利益計，這統一是很必要的；至於以前持續的分裂所引起那些極其不幸的結果，應由一切同志與一切社會主義的組織，對於無產階級負責。」連朱雷也用宣言接受這議案，他說：「我同意於這議案，我們一向常爲合併而工作。我們與國際社會主義者間目下的不和，不外是暫時的。合併可以實現於法國，而工人却不必放棄其本國政治的與歷史的條件所詔示與他們的那種策略。」一九〇五年復活節時候，即根據這約章，出現法國社會主義黨與法蘭西社會

主義黨間的合併。這合併的兩黨在一九〇五年六月所接受的宣言中申明社會主義黨是一種階級政黨；牠並非改革論者，乃是階級鬭爭派與革命派。又申明被選在議會中的黨員應成爲一個集團以對抗一切中等階級的政黨。這社會主義集團應拒絕政府採用維持有產者的一切手段，所以不得同意於達到軍事目的的款目，不得同意於殖民地的經營，即對於預算案也得予以拒絕。——及正式的成黨時候——一九〇五年復活節——該黨取名社會主義黨，即國際工人法國支部 (Parti socialiste section française de l'internationale ouvrière)；黨的領導權，應歸於每年舉行的一次大會，日常事務應由全國黨部 (conseil national) 來處理。在黨務報告中對於黨紀及方法的一切問題，應舉行自由的討論。法蘭西社會主義黨中一幫黨員却不願參加這次合併。他們自組一派，就是所謂獨立的社會主義者。

一九〇六年選舉時候，這合併黨 (Parti unifié) 的黨員五十三個，獨立社會主義者二十二個被選了。一九一〇年被選的有七十六個合併的社會主義者，二十一個獨立社會主義者。但如謂社會主義分子在議會中表面上看來，有重大的增加，不啻就是表明該黨的實力與他所本統一的、合於目的的階級鬭爭政黨意旨而取得的利益在作巨大的加增；那就錯誤了。其實在的情形適相反。在這合併黨的七十六個議員中，只有二十個，即四分之一，是馬克斯派，或正確些說是羅素德派。在觀察該黨黨綱時候

已經說過，所謂道馬克斯主義黨遠非根據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意旨而活動。他們被迫作不斷的讓步與妥協，并且無論好歹，都得推行機會主義的政策。這種政策正足以表明其餘大多數法國社會主義者的特性。朱雷與其徒黨所主張的那個親於改革論派的黨綱蓋認這策略為必要。這些擁閹派與反閹派，改革論者與革命論者在合併黨中所作這樣非常沉散的結合到底能否久遠支持得住，實在極其疑問。這合併黨雖然很倨傲地宣言他將一致對抗中等階級的一切政黨，然而他自身却未甚保持這宣言，這可於一九一〇年選舉中看出來。各派社會主義者不特和所謂急進社會主義者——他們至少在某某點上是與這派社會主義者相結托——作選舉同盟，并且有許多社會主義者的選舉只好藉着和反動派結合的同盟以抵於成功，依布勒通 (Breton) 所說（見一九一〇年社會主義月報第二冊），「藉着和反動派結合的那些令人憤懣的同盟。」

法國社會主義直到現在雖經過所謂合併，却依然表現其破碎及糾紛的狀態，加之在近代，在議會政治的社會主義黨之外有一大部分的工人運動，明知故意完全避開這政治議會的活動，并且不在此中推行其私有的目的與傾向，因此其破碎及糾紛的狀態益形加劇。——我現在要報告所謂這工團主義的

運動。

在近代中，自革命的工團主義 (Syndicalismus) 出現後，遂成立一種特殊的社會主義派，吾人也許用「純粹工人社會主義」(reiner Arbeitersozialismus) 稱他，最為切當。這運動發生在法國，並且在意大利也有多少信徒；在其餘各國內却只得了較小的勢力。這革命的工團主義在法國却在短時間內，發展為工人運動中一種重要的勢力，並且的確予政治議會的社會主義運動以重大的打擊。這主義至今還沒有系統的理论，供作其全部運動的基礎之用，不然我也可以拿來作為對你們解釋其性質之用。他乃是一種新的運動，其中有許多尚在醞釀與發展中，其全部尚是未完成的；這也是我們不能忘記的。根本上這一派是職業工會的策略中一新形式，是工人團體中一種實際的進行，還未至什麼學理或且什麼新宇宙觀的地步；這工團主義運動的信徒正在申明過：他們并不信各種信條，不信各種黨的理论；他們進行的狀況蓋繫於時間的與空間的環境，並且他們不能提出什麼普通的法則。——然而時時總有幾個工團主義的理論的代表、著作家與工會領袖，依文字以宣傳這新理論。大半是由其本黨中脫退的從前的馬克斯主義者、布郎魁主義者或且無政府主義者。今試對諸位舉出幾個革命的工團主義代表：法人中有：拉加得厄 (Lagarde) 、索勒爾 (Sorel) 、貝耳 (Berth) 、格里斐耶 (Griffuelhes) ；意大

利人中有：拉布里奧拉（Labriola）；俄人中有：克里策夫斯岐（Krischevsky）；德人中有：米赫爾茲（Robert Mielke）。今欲作你們以關於革命的工團主義的性質的一個概念，所以先要設法簡簡潔潔的說明這派的基本思想，再給你們以工團主義的作品中重要的文句，最後簡述法國職工會運動，以表明這運動裏面如何生出革命的工團主義。

革命的工團主義尤其嚴厲的反對政治議會的各種活動。自社會主義想藉選舉票以底於實現之後，他就不免平淡化與平民化。議會的活動往往變為與彼等所視保持現有制度為有利的政黨及階級作讓步與妥協。政治議會的工作往往至於助長國家思想，因為即假定社會主義黨在政治上的權力足以擁護政權；然亦不免又得建設一種國家，固然是社會主義的國家。然則不外新的國體代替舊的而已。到底藉議會的活動能否使社會主義者得到勝利，都是極其疑問，因為社會主義黨固然最後藉選舉票的助力占得大多數，然而工人絕不因此而得這樣經濟的與精神的力量，以實現社會主義。即使借政治家的助力，由他們把階級鬭爭大書特書在旗幟上，然而無產者并不因此而達到解放的目的。社會主義往往看無產者為公民，不認他為生產者。在法國有多數閣員由社會主義者的行伍中出身，這也不是偶然的事。社會主義者所採各種議會政治的活動結果導他們至於墮作閣員的地位，由是至於和有產者混在一

起，并且保持現有的階級統治。——社會主義像德國那裏，如設法避開對有產者作讓步，他就是被判為完全無力者。

革命的工團主義要求工人自身從事直接的活動，以代替政治家所作間接的活動。這派所編的小叢書先名社會主義者運動文庫 (*Bibliothèque du mouvement socialiste*) 最近則稱無產者運動文庫 (*Bibliothèque du mouvement prolétarien*)，這實足以代表這派的特徵。此名稱蓋即表明：這派把一切黨派的型式都除了，單要一種無產者的運動。他以為：要實現國際協會所定的那定理（即工人的解放，只能算為工人自身的事業的定理；）只好由純粹的工人起來作（職）工會的運動。——這種新式的工會策略却與德國的工會之實驗絲毫沒有關係；因為德國工會只成為某政黨的附屬品。他和英國的工會也沒有絲毫關係；因為英國的工會對於一切政黨保持其中立態度。這種策略却是不受各個現存的政黨所牽制，藉工人自己的力量以推行的一種政策。這是真正藉自己的力量；因為革命的工團主義尤其要推行革命的政策。所謂革命的，不像宿命論那樣期待在來的革命，也不用暗殺與暴動的方法；所謂革命的，是持續的擾亂、損害及惱怒給工者與統治的國權。這革命的工團主義所尤其認為這類手段的是：非買同盟、破壞機具 (*Sabotage*)、怠工 (*Causerie Politique*)、局部罷工，最後還有主要手

段，爲居於全部工團主義政策之中心點，卽是總罷工。全國各地方，所有工作之完全停頓可以陷全國的經濟生活於停滯之境，并且必定引起中等階級制定制度之荒蕪。因爲總罷工往往受了軍隊勢力的攻擊，所以此外更有一種作戰手段：卽反對軍隊的宣傳。然則所謂「直接的活動」就是：把社會主義的活動的重心點由議會中移置在工人的工場中。工人不應要求立法權之參與，這種要求不外又造成監護制，至好也不外造成任何一種形式的國家社會主義；工人應藉其職業所賦予的手段自謀解放。關於此點有一個例可看：如果八小時工作日應該實行了，却不須期望藉議會的遲緩的活動以求最後達到一種法定的八小時工作日；工人却可以簡簡單單的在做了八小時工作之後，離開他們的工場。這種工作社會主義，藉着工人之獨立的進行，藉着他們之不倚賴於各種各式政治家，所以也能夠單獨賦予工人以必需的熟練與教育；這二者給你們將來在社會主義的社會中活動，也是很必要的。——依吾人所知，這裏實是集合馬克斯主義、布郎魁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種種思想而成的一種奇怪的混合物，然而却不能把革命的工團主義歸納在這些派中之一派。——該派往往被稱爲無政府主義的，這是一種錯誤；無政府主義者自身却也從其立場出發，徹底的攻擊這新派，因爲依我們在論無政府主義的講演中之所見，對於國家之反對、對於議會的活動之拒絕雖也都是真正無政府主義的思想；但是該派與無政府主

義所有重大的差別却不能加以忽視。無政府尤其要根據一般的人道的考慮，解放全人類，而工團主義却瞭然於胸中，主張工人的階級鬥爭。其次，工團主義由於經濟的綱要而與無政府主義相差異。無政府主義者之偏愛小小的自營經濟的所有者，他們之寄同情於反集中的、聯邦的經濟形式，這些一切皆為工團主義所不知。關於未來的經濟制度之形成，他却與馬克斯主義有大相似之點。他主張，未來的經濟制度應直接托於資本主義的組織，所以大經營的技術上特長完全被該派承認了。在馬克斯主義與工團主義中間固然有這樣多少的關係，但是這派却也有許多反馬克斯主義的，尤其關於階級鬥爭的理論；蓋依我們所見，工團主義所拒絕的是工人階級之政治的組織，而馬克斯却以為正可以在這條途徑上，實現其階級鬥爭的理論。至於馬克斯主義者方面所認為革命的策略也是與工團主義以其直接的活動與總罷工為其革命的策略的，正相反對。在革命的動作之主張上，工團主義者固然極與布郎魁主義者接近，但是他們因視工團的活動優於布郎魁主義的純粹暗殺策略，所以也與布郎魁主義者不同。

我們試聽革命的工團主義代表的言論：拉加德厄 (Lagardelle) (見1908, 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

文庫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中) die syndikalistische Bewegung

in Frankreich 第一三七頁)關於做生產者的與做公民的工人之異點，曾有下列的表示：「公民不能完全信賴政治的一切事件；選舉者所討論的問題實落在他的日常生活之外；他的日常生活之經過，絕不能替他對於議會所討論相隔甚遠的問題，及政治家所作的行為作預備的判決。他每過四年在選舉中，才破例討論這些問題。因此乃知彼等職業政治家所以不勞而握統治權，蓋有由也。他們藉着誘惑的詐僞，藉着詞令的空論，已足以感動羣衆，羣衆也無能力來捉摸這空論。」

「經濟的社會裏面的情形却是相反。他們的機關并不外設，却只在他們本界之內，并且與社會混在一塊兒，所以就是社會自己的工具。工團(Syndikat，即產業合作社)絕不像政治的國家之具有他的超越的權限，他的命令權與強制權。他并不超昇在工人階級之上成爲一種不成形體的贅疣，他却是工人自身的一部分，就是有組織的部分。工團中有經驗的工人，與未加入工團的工人階級間，絕沒有間隔，他們却日日在工場及生活中互相接觸。工團所研究的問題却正是職業的問題，工團只限於在其範圍內主張工人的利益時候，才實施道德的權力。生產者是主動的，國民是被動的。」這人在一九〇七年南錫(Nancy)的社會主義者大會席上(見“Le socialiste et la Confédération du trail,” Paris 1908, 第三十一頁)又宣言道：「間接的議會的與立法的活動只弛緩人的工作、消沈人的意志、

并且反刺激人的最低劣的本能，至於工團主義的直接的活動却鼓舞個人的潛在力，制止他的劣傾向，而致那熱誠的能力、那奮鬥的興味、侵取的慾念怒長起來，這些於是激厲個人，并且導他上昇。」

革命的工團主義之反對信條，已很好的在拉布里奧拉 (Labriola) 的論文（見 *Syndicalisme et Socialisme Paris, 1908*, 第十八頁）中表現出來：「在工團主義裏面，沒有餘地給人家爭論所有物集中、繁榮與貧困、恐慌等問題。我們只認得資本家的工廠所在的地方，工團主義的工場便也可以出現，無主人的工場便也可以出現；但是我們於此更有附帶的條件，即：如果工人階級在道德上與精神上足以接受這種從來由有產階級執行的職務，在物質上又足以推翻那種保護資本家的工廠而又自稱為國家的權力組織，然後這理想才可以實現。」

關於改革的與革命的工團主義之不同，則格里斐耶 (Griffuelhes)（見 *'L'Action syndicalisme'*, Paris, 1908, 第十二頁）有說道：工人問題被我們革命的工團主義者作如下的觀察：「我們應攻擊企業家，由那裏出發，剝奪他們的利益，以謀逐漸的改良，於是我們便可逐漸取消搾取狀態。在改革的工團主義者（我們是與他們對立的）方面所見的工人問題是：結合起來，期與企業家謀了解，其目的蓋欲企業家覺得有予他們以多少輕減之必要，但却不願觸及企業家的特權。後述這一種進行却引我們

離去我們所欲達的目的。」

貝耳 (Edouard Berth) (*Les nouveaux Aspects du Socialisme*, Paris 1908, 第四頁) 用下列幾句話拒絕某政黨或國家來監護工人：「革命的工團主義是徹底與所有中等階級的理想決裂，從前革斯德主義與馬克斯主義固然同充實着科學，但其在工人運動方面却只表現其由這種理想中造成其最後的形態。工人階級得了工團主義，不啻自創他的理想。工人階級的榮譽不在於仿照有產階級的作用，蓋有產階級自取古代貴族階級而代之後，只知仿貴族階級而爲之。工人階級的理想并不是開發一種榮華文化 (*Salonkultur*)，却是開發生產者的文化。工人階級的職務并不是求爲國家，也不是極力模仿國家，却是極力避開學成國家那樣。在貴族未屈服於王制之前，造成貴族的力量與偉大的，是戰爭與戰士的道德；現在起來代替戰爭的却是工作；與戰士的道德同其高尚的又是工人道德；新社會的精英就是由這裏面吸取其力量與偉大。最後國家將撞着一種力量而崩壞下去，并且不是由於過去的怪物之復蘇，乃由於新的社會的能媒之爆動，這能媒就是藉近世大工業而發展出來的。」

我們現在要觀察革命的工團主義的這等觀念如何侵入於法國工團運動。我們早已表明過：自巴黎地方自治政府之後，工會的運動先不外一種純粹專門團體的，并無政治的綱要，其創立也只供以代表

工會固有的利益，并且提出的，不外溫和的經濟的要求。我們又見過：這「溫和」的專門團體在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七八年之時代中實支配工人運動，隨後乃漸失其指導權，并且自一八七九年以後，占上風的是政治的而且急進的那一派。——當一八七九年馬賽地方工人大會席上通過了一種社會主義的綱要時候，這些「溫和的」工會即由社會主義派中脫離出來，他們還開兩次大會於巴黎（一八八一年）及波多（Bordeaux）（一八八二年）；此後完全失其價值。及社會主義黨占了上風之後，他就設法利用這些工團的運動以達他的目的。他以為工團只能成為社會主義黨的一個附庸。及一八八四年的法律把結社的禁令取消了，而工會又可以獲得法人的權利之後，工團的運動自身又復興旺起來。在一八八六年里昂大會席上創立了一個全國工團聯合會，給予新創立的職工團體，以一中心點。這聯合會完全隸屬於革斯德黨，這已在頭二次大會中表現出來，這工團聯合會大會，正式叫做法國工團全國聯合會（Fédération nationale des syndicats ouvriers de la France）通例與工黨的大會在同時期、同地方內舉行，并且在各點上與革斯德主義的思想完全一致。有一個在一八九〇年里爾（Lille）大會席上由法國工黨接受的議決案因適應這工團聯合會與工黨間的這種關係，曾表示道：「大會期望一切黨員都加入於工團聯合會，在那裏設法傳播社會思想，替本黨的綱要與政策收羅信徒。」正是這個問題後來

成爲政黨（革斯德）與工團主義黨間極劇烈的爭端之動機。白里安（後爲內閣總理）於一八九二年在馬賽大會席上曾發表贊成總罷工的長篇演說辭，其中有說道：「要設法應用這原則，則工黨的組織尙不充足；得先問及一切工團，然後才可使這原則底於實用。」大會於是通過一種贊成總罷工的議案，并要求工團與工人交易所的聯合會，在工人階級內替這原則作宣傳。——上述所謂工人交易所（Arbeitsvereine）乃是同地方的工團所作地方的結合。在法國許多都市內創立的那些工人交易所遂成了該地方工團運動的中心點。自一八八七年創立了最初的工人交易所於巴黎以來，其數極其加增；及一九〇八年已有一百四十二所，共有工人四五〇、〇〇〇人。這些工人交易所所在各城市內成爲一種重要的工會的活動中心點，他們不願意走工團聯合會的途徑，即不願與革斯德黨結合。存在於一八九二年的十四個工人交易所於是年亞吞（Etienné）大會席上創立一個團體，取名工人交易所聯合會（Fédération des boures du travail）。在規定章程時候，顯然把工人交易所不受制於政府及各城市的上級黨部的意旨表示出來。一八九五年七月工人交易所聯合會與工團聯合會舉行一次聯合大會。這次大會實由於感受政府封閉巴黎工人交易所的印象而成。於是議決一個反對政府採取這種方策的抗議案，通過兩聯合會原則上的結合。革斯德黨不願有這樣的結合，因爲他們的確很怕因此而削弱他們對於工團運動

的勢力。及是年在南特舉行的工團聯合會大會席上，總罷工的問題最後遂引起決裂。這總罷工又被革
斯德黨方面劇烈的攻擊他們斷定贊成總罷工的人所作的舉動，好似舉行一次旅行，却先想不到旅行
目的地的人；這在有產階級看來，並不是一把達摩克勒（Damoklesschwert）的劍，却是一把律師的
劍（暗指律師白里安），有產階級對此實微笑着。——因為會中大多數遵守總罷工的理論，於是這少
數者革斯德派遂自退出。從此之後，結合又告取消。這兩聯合會又各行其是。一八九五年少數派集會
於特喇（Troyes），通過拒絕總罷工的議案。這就是他們的最後的活動。其後完全融合在工團內。現
在工人交易所聯合會成爲信奉總罷工理論的一切工團之中樞。佩猶提耳（Pelouier）尤其對於總罷工
理論發生煽動的作用，并且一般的替革命的工團主義所有的理論作有非常巧捷的宣傳。在一八九五年
李摩日（Limoges）大會中，彼信奉總罷工的工團造成一種新的總組織，就是工人總聯盟（Confédé-
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這個普遍的工人同盟實包羅一切工團，即包羅工人交易所，以及那些孤
立的工團與各工團聯盟。這個工人總聯盟的章程第一條規定：凡屬於該聯盟的分子，應脫離一切政治
黨派。第二條則規定其目的，即：「在經濟的基礎上，爲求完全解放故，應把站在奮鬥戰線上的工人
牢牢的團結起來。」其意蓋欲使一切地方的工團聯合會，與全國的工團聯合會作成一種在政治上守中

立、在政治上守獨立的團結。——工人總聯盟的活動其初成立幾年中，不外是一種極其薄弱的，因為其始在一切工團問題中握着領袖權的是工人交易所聯合會。這樣情形直延到一九〇一年——工人交易所中那位能幹的首領佩猶提耳即死於是年。自那時候起，工人總聯盟始逐漸抬頭；他一向是根本的模仿工人交易所聯合會所推行的政策與策略；但自一九〇一及一九〇二年以來，却採了一個較自立、較有力的態度。他尤其藉他對於政府，尤其對瓦爾得克·盧梭內閣的社會政策所作強毅的反抗，在工人界中取得重大的同情。這工人總聯盟於此很愛他們創立的工團主義中央機關報人民之聲（*La Voix du Peuple*）之援助。該報開辦時候，即發出黨綱的宣言：「工人的工團將愈明瞭他們在社會的奮鬥中應占優勢。他們知道，除却確定其日常生活之外，還負有預備未來的任務。他們知道，團體的組織是未來世界的樞樞。他們知道，欲得一種定則的、均衡的社會，使一切個人在裏面依對方的諧和而發展起來，就不外根據團體的結合之基礎而已。這種見解之廣大實賦與工團以生機，而推展其運動範圍，他們由是屢對一切問題表示態度，時時不忘其有效的活動，不久那一句斷言說：他們成爲全部社會運動，將不得視爲過言了。」

自工人總聯盟得勢之後，由是與工人交易所聯合會謀結合的努力，以及促成統一的、有力的工團

主義運動之努力也隨而加增。經過困難的磋商與嘗試之後，結果在一九〇二年蒙特佩耶(Montpellier)席上竟成立了結合。當時議決工人交易所聯合會與工人總聯盟作徹底的之融合。章程第一條規定聯盟的直接目的如下：工資工人團結起來，以保護他們的道德的與物質的利益。——其究竟目的是社會主義的：即工資工人界與企業界同歸於消滅。該聯盟應脫離政治黨派而獨立。

拉加得厄(Lagarde)把現在團結的工團主義的社會主義之性質作如是的解釋：「我們不要信條的綱要；因為這種綱要所糾纏的斷言多少都是可議的，他所具嚴整的形式直把各種活動的精神夷滅了。一般的表述已足以同時表現目的與手段。其餘，應由行為在這可以伸縮的限界內，自行活動。行為在實驗中，遇着特定的人生問題，將會規定其特別的策略。工團主義單願進去、單願受教的學校是經驗。工人階級奮鬥的經驗將啟示他們以他們自己的力量，以資本主義的反抗力與其結構，以各種方法的效用。」（見本人前著第一二九頁。）

工人總聯盟的組織是一種聯邦的；工團是他的基礎，上面建立着工團聯合會；并且是一種全國工團聯合會，他把全法國同職業的工團聯合起來，其次就是地方工團聯盟與工人交易所；他們把同地方各職業的工團聯合起來。現在聯合會之聯合會——就是工人總聯盟——又把這些一切聯合起來。他由

兩支部合成，一是工人交易所聯合會，一是工人與職工的聯合會。

在一九〇四年部耳耳(Bourges)大會席上，已顯然見得在工團主義運動之內，所謂革命的工團主義派實戰勝改革的工團主義派。這兩派直到現在還是很占勢力，固然革命的工團主義派占着上風；但在投票及議決案件時候，改革派的運動也不可侮。因此與企業家作和平的了解，如工率契約、工作委員會、救濟基金等等皆為最有裨於工人利益。并且這些也絕不是一種國家社會主義的或共產社會主義的政策。他們與英國的工會(Trade Unions)有多少相似。——佛里耳的那幾句話，(見法蘭西社會民主黨撞着一次危機麼？一篇，見社會主義月刊 1907，第180-186頁)最足以表明他們的政治的與經濟的見解：「民主政治是你們的政治解放的範圍；你們得做先鋒的民主政治者，以吸引羣衆，不當來反抗他們。經濟的解放雖不能完全給你們以主權，都會助你們取得民衆。如果民衆歡迎你們的經濟的解決法，你們就得指示給他們看：即國家如何變為民主政治，他們權威與宗主的效能如何變為公役與分工的效能！我們負的義務是啟發工人，教他重視那種不受各種政治的監護的工團重視消費合作社，以形成一種力量來控制生活上必需品的價格和品質；我們得用我們的生氣來吹噓保險機關，不應視保險機關為中等階級的發明品，致使工人背去社會主義。我們得要求各種職業的工人利用其工團以與企業家

締結共同條約。歸結一句話，我們得想努力於生活，不當想形成信條。」——尤其鐵路工人、印書工、機械工人、紡織工等是屬於這改革派。這改革派的工團於一九〇九年曾創立一個工團主義聯合會委員會 (Comité d' Union syndicate)，其意蓋欲於工團運動中，與無政府主義者作對立。

革命的工團主義所推行的却是相反的策略：他們實主張直接的與革命的動作。一九〇四年都耳日大會曾本此意接受了這議決案：即「大會因思工人只應靠自己的力量以改善工作條件，因思八小時工作日的煽動實促進徹底的完全的解放的事業，所以委托一般工團從事一種增長加强的煽動，務使工人在一九〇六年五月一日自動停止其八小時以外的工作。」一九一六年亞芒 (Enriens) 大會在某議決案中曾宣言：「工團主義在每日的奮鬥之中，蓋求工人的努力之團結，種種立刻的改善之實現，以提高他們的生活，如工作時間之減少、工資之提高等等。但這種任務只算工團主義綱要之一面：工團主義的綱要實預備完全解放工人團體，而實現這種解決，只好出於沒收資本家的財產之一途。他認總罷工為達這目的的手段，他以為現在取防禦態度的工團，將來如作為生產與分配的支持者，便成為社會改組的基礎。」

此外還有「反對軍隊」的煽動法以補充總罷工的宣傳。工團主義者曾發行一種給兵士讀的讀本，本

數達幾萬，其中要求兵士，在太平中，即行逃亡。

這許多次大會的投票，證明革命派在工團主義內占着上風。但投票法之影響於議決，也是不可忽視的。蓋依其投票法，每個團體不論團員人數多少，皆有一權。藥店學徒的工團只有四十個團員，也有一個代表與一權，猶之鐵路工人聯合會共有五萬人也不過這樣。因為改革派工團有極多的會員，所以在投票時候很吃虧。

工團主義的工團運動，在外面上雖有一切這些「結合」其實革命派與改革派間的對立絕未曾消滅。法國工人報紙是充滿着這兩派間不斷爭執的登載。工人總聯盟（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依一九〇六年的統計，共含有六十四個全國工業團體，一百三十五個工人交易所；集合在這中央的組織之下的工人數目約五〇〇、〇〇〇人。數多的奮鬥罷工已證明革命的工團主義的煽動種子實落於膏腴的土地之上，至於官吏與教員也曾設法參加這種運動，這個事實也證明這派的發達與努力。

法國社會黨常有種種努力，求收這種在人數上也極其可觀的運動——一九〇九年有三五四個工團，九四四、七六一個團員——為己用，直到最近為止，工黨（Parti ouvrier）方面，會有與他接近與結合的嘗試。——里爾（Lille）地方紡織工人協會實立於革斯德派勢力之下，他在一九〇六年工團主

義者亞芒大會席上曾提出一個動議，即：「希望大會議決，使聯盟委員會順應形勢，令常任或且暫時委員與社會主義黨的幹部趨於一致，以便容易施行主要的、法定的工作改革。」這動議却被拒絕，而且會中宣言道：「工團主義如要得其最高的效用，便當直接用經濟的鬥爭，反抗企業界。聯盟的各種團體，就其性質看來，是工團主義的集團，所以不應顧及什麼黨，什麼派，他們可以本其完全的自由，附於這些黨派，或且和這些黨派共同從事，以求社會的改革。」這裏所謂「黨」的這個字，實指議會中的社會主義者，所謂「派」的這個字實指無政府主義者。——在一九〇六年李摩日 (Limoges) 地方社會主義者大會上也提出相當的動議，即：「得設法，使工人工團中的活動與他們在政治上的活動能適應形勢、互相了解、互相結合。」這個動議却被拒絕了；至於朱雷所提那個應許工團主義的運動以完全自由的動議反被通過了。——最近在南極 (Nancy) 地方社會主義者大會席上又有「結合」願望；蓋革斯德很熱心的主張兩種組織之合作。然而結合的運動即在此處也被拒絕了。

現在我的法國社會主義運動的陳述已到終結的時期了，所以對於法國的運動是否適合馬克斯的社會主義綱要而發展的這個問題，我却可以表示意見。我相信凡是客觀的觀察莫不認定法國社會主義運

動實不適合馬克斯的社會主義綱要。第一、法國社會主義黨比之德國社會主義黨單在人數上之弱點已是很顯露：登記黨員的人數在一九〇九年僅達五一、〇〇〇人。我們又見得法國社會主義運動多麼散碎，並且與那種本馬克斯的意旨而組成統一的階級鬥爭政黨相去很遠。我們也覺得法國社會主義運動，並不與這種形成物謀接近，法國那裏各社會主義黨雖然作其表面的結合，然其內部的不一致至少一如其舊。改革者與革命者間深深的對立依然存在，並且依我們最後所見，在社會主義的政治運動之外，還形成了一種「反議會」的運動，故意與政黨代表相對立。即在政治的社會主義黨之內的馬克斯派在地位、人數與勢力各點上都遜於反馬克斯主義的各潮流。——所以得解釋法國社會主義何以這樣分裂、馬克斯主義何以在法國不占主要的地位。馬克斯的學說何以在法國只有如是薄弱的勢力，其大部分原因實在於法國的經濟結構。我將示你們以幾種數目，以明法國小經營在現在還那樣占着優勢。第一、法國比之英德二國，是一個遠為巨大的農業國：法國的農民在一九〇一年遠占全人口百分之六〇。二；就全體五、七〇三、〇〇〇農業的經營中有四、八四三、〇〇〇是屬於擁有十公畝以上的產業階級，然則是屬於小經營；在農業中活動的百人中有五四。一個是獨立經營的。在一國內有這樣多的小獨立的所有者與小獨立的经营，這又何怪被認定中、小經營毫無救藥的定歸沒落的那一種學說，在

那裏不得多數信徒呢。因此，依我們所見，馬克斯派在法國也不免對於手工工人、農人作種種讓步，然而却不因此而收其所希望的效果。——但是妨礙馬克斯主義侵入的不單是客觀的經濟的狀況；全部歷史的傳說也在那裏發生抵抗馬克斯抬頭的作用。法國人民太受種種革命的回憶與種種革命的觀念所支配，所以不能於冷靜的進化的理論範圍內尋譯其趣味。馬克斯主義也沒有足以使人興奮的觀念。法國人所不願蔑視的計劃，他都沒有。在大革命中發達過的一切許多黨派，直到現在還遺留他們的痕跡。法人之強烈的政治傾向實極其促進這黨與派的組成。所以無怪乎，現在組成了這樣多的分黨、與小分黨，而且目下還在新造着。更有不可以忘却的是：法國那裏盛行的那種自由風氣對於近代馬克斯的權威性實取拒絕的態度，斐囊斯（Finance）在一八七九年馬賽大會席上所說那幾句話實很切當：「酷愛自由的法人永遠不會屈服於主張絕對的取消個人的獨立性，并且主張多數人強暴統治的那些集產主義的制度。」——由於這種着了根的自由個人主義的基本情緒生出那些讓與個人自決的社會制度直到現在還得了那樣多的信徒。所以現在法國內還是無政府主義運動與半無政府主義運動極占勢力，他們還屢想用所謂虛無主義的或且其他合作社的創設，以解決「社會問題」。反過面來看，也是對抗的潮流在法國傳播甚廣。這潮流是要求以國家與國家的助力來造成一切的福利。有人以為，國家的同若干國家

社會主義的設施，已足以消除一切痛苦；所以發生多少傾向於布郎克那一派的，以及我們上述其他社會主義者的思想與制度。但是無論其多屬於自由主義派或且多屬於國家社會主義派，他們一切都是共同熱烈的傾向於共和國。并且有人說，給與人民以政治上自由的共和國也可以實施社會改革；這種觀念是除不盡的。由是社會主義者雖有各種派別，然而在一點上却認為有一致之必要，即尤當保持共和國以對抗一切僧侶主義或且君主主義方面來加壓的危險。——這些思想又是反馬克斯主義的，因為馬克斯主義者視國體為一種旁禡的事，因為他所認為有關係的是打倒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而這制度在一切所有國體內都有。尤其認共和國有保持必要的社會主義者很想和其他政派共同進行，只要他們也想保持共和國自由的保障。——由於這全部思想歷程，遂使法國社會主義者往往不傾向於馬克斯主義所要求的階級鬥爭政策，而傾向於民主政治的改革政策。我們在法國社會主義中所見那種很強烈的國家色彩也是與此有關；這國家色彩又與馬克斯主義的國際觀念難以洽合。

由革斯德與拉法格輸入到法國的馬克斯主義的思想，因此直到今日在法國尚是一種外來的植物。——反之，像朱雷那樣的人，用他的熾烈的雄辯，以人道與人格等理想做宣傳，而對於法國的運動却有較大的影響。現在法國社會主義者的真正領袖是他，并不是革斯德。他之傾向於民主政治的改革政

策，他之對於有產階級的讓步與妥協，已足以表明大多數法國社會主義者去德國社會民主黨所取不寬容、不妥協的態度實在很遠。許多法國閣員由社會主義者的行伍中出身，這樁事實給明瞭法國社會主義運動的人看來，並不是可驚異的。這種聯合於積極的民主政治的政策的傾向蓋出於溫和的法國社會主義運動之本性。至於改革派的見解也見於議會以外的工團運動中，我在上文已經詳說過了。至謂，這工團主義者中，革命的與急進的那一派，將持久的占着上風，這却也不可信。

如果我現在把朱雷所說的或段話引述給你們聽，使你們較明瞭這位極得人望的法國社會主義者，那末也許於了解德國社會主義與法國社會主義的根本不同，很有益處。朱雷在論私有權的論文中曾說一切社會運動都得以正義為根據的思想。他在那裏說：「自有史以來，人類才初次要求他的人權，他的全部權利。工人、無產者、下等階級，他覺得自己是人，他所要求的即他做人所應有的；即生存的權利、工作的權利，他的能力方面的發展之權利，他的自由意志與他的理智常常的活動的權利。民主政治的生活實觸動而且磨厲了他的人格感覺，而大工業却賦予有組織的無產者以權力的意識。工人在這二者的雙重作用之下，才受了人的待遇，并且要到處愈其受着人的待遇。現在社會如親手干涉現存的所有權制度，他方能够賦予無產者以工作的權利、生活的權利，才能夠把無產者由被動的工資制

度，提進於合作主義的自治。要保障真正的私有權，得喚醒社會的所有權；真正的私有權是個人所私有，而且所應有的。」（第一八四頁）

朱雷會和好幾個協編者發行他的十二冊巨著社會主義者史（*Histoire socialiste*），在最後那一篇「十九世紀社會結局」（*Le bilan social du XIX siècle*）中實釐列他的學說概觀。這裏面，還載有他對於社會主義的未來發展的言論：「社會主義的所有權觀念將起而代急進主義的，并且他將把這觀念徹底的底於實現。他快要通過的壁門，實在是開着。這就是法國革命所具最極端、最邏輯、最民主政治的格式，這格式經過一世紀無力的徬徨、與迷夢，經過半誤半錯的革命之後，結果已進入於事實的世界之中。革命的天才在其奮鬥的熱烈興奮之中，所先見先試的，現在已成爲定常而堅定的見解了。吾人可稱社會主義爲火山的頂巔，他由一系列谷口與峯帶之中，跳了出來，結果確立在最高的水平線上。這頂巔確立了後，現在擴爲廣大的高原，他可以載起一座新大都市。一切奮鬥過、吃苦過與希望過的人們，自一世紀以來都不會空費其力。他們的犧牲不是空的、他們的希望并不欺騙他們，現在無產者所以可引這種革命的民主政治之勝利爲欣喜之事，實不只因爲他可以抱希望、可以預備一種更爲決實的勝利，并且因爲確定革命勝利的人，却就是這幫實力尙是薄弱的無產者。這無產者又就是強迫有產者

和舊政府的種種僭偽斷絕關係的人，這無產者也就是剝奪有產者的特權，以建設一個大政治的民主政治的人，這大政治的民主政治又將造成社會的民主政治。——在這全世紀中，如果沒有工人，共和論者又能成就什麼呢？我們可以在政治的民主政治所準備或且所實現的一切鬥爭階段中看出這種民主政治。我并且相信，把這些階級表述出來，正是我來作結的這本歷史作品所立的功績之一。」他由是用了下列幾句作這本作品的結論：「創立民主政治而且把牠超絕化起來；這是工人的功績。這工作已經過了很紛亂的一世紀了。統治共和國，使牠建立在社會主義之上，這是來日的大工作。」——朱雷還有認國家與國家的要素在社會主義運動中實占有價值的話；因為他例如嘗說：「我們先既要求人類的自由，自然當認國家的團體為有用，這是無足怪的。只有國家能解放一切個人，只有國家能給人人以自由發展的手段。各個小而暫的團體只能一時保護個人的小組。能夠毫無例外的確定一切個人的權利——不只現存人的，而且未來人的權利——的，只有一個普遍的，常在的組織。」

「這普遍的，常在的組織，在行星的某部分上面，包括一切個人，他的事業與他的思想影響及於後代的人，這組織就是國家。我們所以依靠着國家，就因為要確定個人權利的全部性與萬能性。凡是人都不能片刻離開權利範圍而立。不應使一個人陷於成爲他人的劫奪品或且工具的危險。不應把一

個人的政治手段劫奪了去，他可以自由的工作，對於任何人都受奴隸的牽制。各個人的權利在國家內，無論今日、明日，每日都得有他的報酬。我們如把資本家階級的所有物讓渡給國家的團體，其作用并非要把國家做成一個偶像，把個人的自由犧牲給他。反之，不外使他造成一個基礎。給個人作一切活動，享一切權利。社會的、國家的權利在我們看來，不外是一切個人權利的總和、總概念。社會的所有權不外是供給人使用的手段。」（第一六一至六二頁）

他的觀念和馬克斯主義的信條相去之遠，可於當法國議會爭論未來國家時候，他所表示深切的言論中看得清楚，我現在結論中還欲就這篇言論中摘取一段給諸位看：「……我們用什麼來創立社會主義，這不單是，不尤其是社會主義實現較正義的目的，這乃是社會主義發揮并且完成人類一切從前文化工作的事實。正因為人類，尤其現代的人類已取得了一些光明，與一些自由，所以他們就藉這光明與這自由而求達到較正義的境界。因為科學與技術會造成大機械的設備，把人類力量集合團結起來，所以工人才悟到一種社會組織的可能，人類在裏面可以和洽的合作着。因為方才內務總長提起的那些人權，已受宣傳與證實，並且已被規定在憲法裏面了，所以無產者保持着實現經濟方面的人權，并從奴隸制中解放工蜂（指工人）的希望，這奴隸制已藉法國大革命所宣布的法律而被打倒了。然

則當我們只向人類的進步着想，并且只能本着進化的真義，向他着想時候，你却去攻擊我們，說我們否認進步。否，因為我們現在說：果實熟了，收穫的時日到了，所以我們不蔑視人類之樹的花朵，也不摧殘他的根苗。你，總長先生，是科學家，却很奇怪的不信進化的觀念。我不知道世間還有更視進化觀念為罕異的歷史哲學，過於你方才提出來用以攻擊我們的那一種。依你所說，基督教似已完全破產了，他似乎不外假其他的形式只助人重新實現古代的所有暴政。你方才用譏諷的論調所列舉的那幾個一八四八年左右的理想家，如雷魯 (Leroux)、布郎克 (Louis Blanc)、蒲魯東及佛里耳諸人，依你所說，似乎在歷史與現實界中都不會遺留有痕跡。

「其實他們的學說到現在還支配我們的思想、我們的感情、我們的解說。」

第十五講 英國社會主義

一 英國社會主義之開端

形成無產者運動的前提條件在英國實早於在法國：因為改革產業生活的那些大發明都是出自英國，並且在那裏首先受了大規模的應用。

你們曉得由於近世工業機器的發明（一七六四年至七五年之紡織機器；一七八〇年之鍊鐵法；一七八五年至九〇年之機械的織床；一七九〇之蒸氣機；一七九九年之製紙機），於是生產法中起了革命。一方面大批無產的工人，他方面少數大給工者起來代替從前獨立手工工頭與家庭工業者。

由是工業的與商業的生活亦隨之而形成重大的發展。在一七八〇至一八〇〇年間，英國境內的木棉輸入已達十倍，木棉品的輸出已達五十倍。一個兒童可以服侍兩架織床，並且在同一時間內可以比從前最能幹的手織工多出二三倍的产品。耶尼紡機 (Jenne-Spinnemaschine) 由一個工人推動，其出產量至少可以比從前紡車在同一時間內所能出產的多過六倍。

當時工人們絕未受立法對於榨取所加的保障。一五六二年的學徒法在一八一四年被取消了。依一五六二年的法律，工作時間被限至若干點數，夜工被禁止了，工資是由治安裁判官及市當局規定，學徒的數目也被限制了。到了現在竟把一切這些法律的限制廢除了，蓋信守當時盛行的那信條，即工作是貧人的唯一的所有物，如果藉法制的方策限制工作的出售，那末，這種對於工作的干涉不啻是干涉貧人的權利。這種工作契約的自由所予工人以惡劣的結果，可以顯然在許多根本的研究之中看出來，蓋英國政府與議會早已從事這種研究了。

現在只舉出幾個證據：一八五一年議會研究委員會宣稱據證人所言，結果在最重要的工廠中工作的兒童所工作的鐘點等於成人的。許多在七歲以下，在八歲以下者更多，在九歲以下者却為數最多。

有兩本作品專門描寫英國社會的發展，一是叔爾策·給味尼次 (Schulze Gavernitz) 的社會平和論

(Zum sozialen Leben) 。 一是諾斯提次 (Nostitz) 的英國工人階級的發展 (Die Entwicklung des Arbeiterslandes in England) 。 你們可以在這二作品裏面看出當時盛行關於婦人女子的工作、夜工作、成人的過度工作的種種狀況。

現在我只要指出一個問題，這是在當時尤為公衆所討論而且引起許多糾紛的問題，就是手工作大被機器工作所替代的問題。當時許多工業裏面的手工作皆改為機器工作，這在大多數從事工作的工人方面看來不啻是破壞他們的狀況。不特因為機器輸入之後，工人力量的需要視從前為減；即年少、未學的工人也可以起來代替成年熟練的工人。例如印布廠內採用了一架機器，其結果熟練的工人之工作幾乎完全歸於無用。兒童的工作起來代替男子的工作的範圍占了很廣。此外尚有一層：從手工場工作到工廠工作，這就不啻是說許多工人失却了從前在自己小經濟內所得靠背。從前舍工業的活動之外還有農業的，現在這個也取消了，遇着景况飄搖時候，工人便陷於失業的危險。

一八三九年出了一本關於織工狀況的報告 (即 Reports from Assistant Hand-Loom Weavers Commissioner, Accounts and Papers 1839) 。 其中專門提出何以大陸上的織工狀況比英國的為佳的理由：「大陸上織工所處良好的狀況顯然與英國織工的苦况適相結托。在奧國及瑞士，做工作的一

如英國一樣，是鄉下人。這織業乃是一種副業。固然工資很低，但人們却足以爲生，因爲他們的家政實具有兩條支柱。反之英國織工却陷於一切狀況的飄搖之中，而這些狀況又由於外國市場或信用困難等變動而生。如果時代不好，他們受的苦遠過於大陸織工；因爲後者還有他的農產品做後盾。他們固然有的工資，比一向夢想的還多些，但這不足以彌補不良時代中所受的損失。」

阿多爾夫·赫爾德(Adolf Held)對於手工作變爲機器工作之陷工人於被壓迫狀況，也有報告道：「在織工業中，因爲工廠工業之逐漸侵入，遂發生一種持久而重大的恐慌。……事實上機器的織床就是苦況的主因或且是他的關鍵動機。外國織工的競爭固然也有關係，但苦況的第一原因自然是手織工業之過富工作力。所謂過富却就是一切因機器失了飯的、與希望在工廠工作的工作力共同擠在手織業中的一種結果。工作市場的狀況因了機器之逐漸推廣也引起了種種推移，這種推移的結果最後也輻輳在手織業裏面，而謀最苦最貧的生存的羣衆，因不能在新進步中討生活，遂聚集在手織業內。」(第五九七頁。)

工人因眼見自己不得工人保護律的保護，毫無援助的陷於苦況之內，由是採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反對機器之輸入。即工會(我在下文還要說及)之成立也和機器工作引用很有關係。是以布梭塔諾

(Brentano) 在他的英國工會史中關於梳毛工會之成立有下文的報告：

「關於這種持久性的工會之消息，實出於羊毛業內採用機器而且採用很盛的那時候；最初是見於一七九四年議會委員會的一種報告。當時給工者在引用機器以前，嘗向他地方招致一批梳毛工人。及機器引用之後，這批工人遂忽然被拋在空中。當時其他工業裏面的工人也許早被學徒所替代了（後來還是這樣）；因為當時梳毛工在向下議院的訴願書中早已怨及機器之使用與學徒律之破壞了。」

「委員會在報告這訴願書的時候，已指明這梳毛工業已組織一個俱樂部了。……我以為這俱樂部無疑是一種工會，其目的是保護工人以防止他們因機器之採用而受之損害。」（見該書第一冊，第九十四頁）

當時工人視各種機器為仇敵。在一八四四年時候，有一個很有勢力的盜工工會的首領尙能道出工廠工人受苦的原因：「機器實司其咎，蓋機器實驅使他們入地窖，拘困他們在牢獄，這是比巴黎牢獄還不如的牢獄。機器把他們逐出故鄉，教他們在外國糊口，而外國又在拒絕他們糊口。在我看來，一切想把人類工作力的需要縮小起來的改良都是最能置勞動階級於死地的咒語。我認用一切法律的手段防止這位客人（指機器）侵入任一盜業工場中，是盜工的最神聖的義務。」

皮爾爵士 (Sir Robert Peel) 對於機器引用之結果有說：「我們的工廠的機器雖因了英國發明家的大貢獻而得這樣完成，然而這貢獻在國民方面却不成為一種善行，反成為極其苦楚的咀咒。」

當時民衆對於蒸氣機器的意見，已很妙的在米德 (Edward P. Mead, in Birmingham) 的一首詩中表現出來，恩格爾曾譯這首詩如下：

「今有叱叱一怒王，

不是詩人意中像，

彼乃白奴之暴君，

所謂蒸氣即此王。

彼有昂藏一鐵臂，

莫道此王只一臂，

臂中挾有高鈞力，

一舉毀傷億萬人。」

許多工人團體嘗向議會提出請願書，要求再用「舊時」工業制度。文中顯然攻擊技術上種種新成功。但工人團體嘗設法用武力攻擊機器與工廠以洩其反對此制度的忿懣，他們的這舉動比上述一類之

議決案與請願書更遠為常見，或則破壞工廠或且機器，或則直接攻擊在機器旁工作、或在某種工資率之下工作的工人。

在那時候工會的武力攻擊固為常見，然而正與禁止組織工會的情形很有關係。他們大半是秘密團體，所以自其性質看來，實偏於採用武力方策。

及一七七六年孫麥塞特 (Somerset) 地方的羊毛紡織工請願禁用紡績機之後，一七七七年工人遂把一切紡績機打毀了，計毀去的逾二十紡緯。

一七一〇年時候，已經有織襪工對着織襪框起革命，并且搗毀約一百架織襪機器，把牠們拋出窗外并抓住反抗的給工者及學徒等亂打。及一七七九年議會中提出一種法律草案以改良織襪工的狀況，而該草案又被否決之後，於是成羣結隊的工人擁往諾定安 (Nottingham)，搗毀那個運動否決該議案的工廠主，及其他工廠主的織襪框，拖來拋出窗外，焚毀一座房屋，并破壞雇主的許多所有物。當時搗毀了的織襪框何止三百架。

最惱人的擾亂却見於羊毛工業中。英國工業區——西約克郡 (West Yorkshire)，諾定安 (Nottingham)，及萊塞斯忒 (Leicester) 與其周範，并德比郡 (Derbyshire) 內數地方——依士忒芬

(Stetten) (見第一冊，第二八九頁)之報告，在一七二一年至一八一五年間成爲極劇烈的工人煽動與傾軋之場，這都是爲反對資本家採用新機器而發的。紛亂開始於一八一一年諾定安地方，因爲生產之增加與繼之而起的失業及貧困適與省工的機器之採用同時出現於該城內範圍甚廣的羊毛織織廠中。同時該城與該區的第二主要工業——花邊製造——也陷於恐慌狀態，並且最近完全由於採用機器而改了形態。結果這種失望竟爆發而爲機器破壞狂的流行病。成羣結隊的工人密集在夜間，攻入工廠內，搗毀所見的一切機器。

諾定安的人常用一個假定的，或且也許實在的首領盧德(Ned Ludd)的名字，稱這暴行者爲盧德黨；這全部敵視機器的運動，在一八一一年及一八一四年之間，由工人舉行的，叫做「盧德黨暴動」。在諾定安，加增了的警察與市民自衛團都不能壓抑這暴動；從表面看來，到了七師團兵移駐該城之後，方復了安寧狀況。在四封爵地，尤其在約克郡西南部內，工人反對機器的騷動一直延至一八一五年，甚有延至更後數年。」

當時有人設法用嚴厲制止破壞機器的法律以平定這種暴動。在一七二七年時候，早已發布一種法律，處破壞織機者以死刑。

一七八二年更加以一種普通的法律，制止破壞紡績工業的產品或且工具。

一八一一年引用了一種法律，處破壞織機機床的人以十四年的徒刑。及次年春又發布了一種法律，處惡意的破壞織機工業內的一切機器、原料及產品的人以死刑。

但是一切這些法律都無效果；工人對於機器的破壞狂愈趨於軼軌行動。

一八二〇年左右攻擊的目標係對蒸氣紡床。一八二二年有一架蒸氣紡床由瓦布立克 (Warbrick) 君秘密製造，但織工聽這消息，遂包圍工廠，勢將推翻工廠，破壞那些可恨的機器；牠們於是取下來了，并且運去了，但流氓在半路襲擊牠們，并搗毀為粉碎。在此數年內，這反抗還未平鎮。一八二五年創立了一個工會，爆發了一次罷工，遷延至二十二星期之久。當時該區內織工計二萬人，每星期得工資十乃至十二先令。但給工者依然一樣強硬，這事至一八二六年遂陷於恐慌之境。

一八二六年在布拉克本 (Blackburn) 紡織業中爆發一種嚴重的暴動，其勢延及曼徹斯忒 (Manchester)。及千餘架蒸氣織機床搗壞了之後，軍隊始來壓平了牠。

馬替尼奧 (Martineau) (見第二冊，第二五頁) 述道：「四月裏那一星期中郎卡郡 (Lancashire) 那裏，實是一個悲慘的場所。『民衆從這一城市到那一城市、從這一工廠到那一工廠。他們由麵包

店與旅館中偷取生活品，把石塊擲擊兵士，并且寧願給兵士殺死，不願放棄這種兒戲，因為他們相信他們的生命、他們的生存都是關係於破壞紡床。他們既把紡紗切斷了便由窗口跳出，以避兵士的追擊。」

從星期一早晨至星期六晚間，計搗毀了一千架紡床，其價格達三十萬金鎊。

及一八二四年議會研究關於禁止輸出機器，與禁止組織工會的那種法律發生效力的時候，曾把法庭對於實行破壞機器的工人團體所下的一批判決書報告出來。

當時工人與工人團體固然抱着悲觀論來觀察產業裏的資本主義紀元；但當時盛行的國民經濟學派方面却用樂觀論觀察這種發展。當時古典國民經濟學往往教人道：國民經濟，在自由競爭與自由主義經濟立法的統治之下，必定隨着資本之加增，而增進一般的福利。

李嘉圖甚至承認這定理，并且在他原則論(Principles)第三版中顯然說明自機器引用之後，也許有損於工人階級。但他宣稱這種損害為暫時的；機器之引用，終久會引起於工人階級有利的結果。

古典國民經濟學自亞丹·斯密至李嘉圖為止，固然主張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但他們却不只顧全資本家與企業家的利益，而主張拜金主義的政策。他們却信正惟這種經濟政策也有利於工人階級。他

們以爲，自行會的及封建的桎梏解除之後，工人才能夠參與文化的事業。斯密與理嘉圖并不缺少國民經濟上那種「倫理」的見解；反之，他們正在根據他們的倫理的觀念，而以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相推薦。尤其理嘉圖的社會哲學觀念完全出於邊沁（Bentham）。他與邊沁都認最多數人的真幸福爲各種政府的真正目的。邊沁以爲凡人莫不先求自己的利益，他就是由這件心理學上的事實出發，而請隨自己的意向儘量促進這種努力也就是立法的目的。有人問他，如果各人探求他自己的利益，他人的福利豈不因此而受損害。他却引人類的洞察力來答覆這問題。他以爲人都覺得最能確定他自己幸福的爲關顧他鄰居的幸福。所以政治家與道德家得使人愈其了解真正的道德，即知道測量自己的利益，這樣的測量更加以巧捷的限制同時可以增進自己的和公衆的利益。所以立法者得許各個人以儘量的自由與放任；因爲各人對於有益於己的事知道最精。有人反駁道：不一定人人對於行爲之利害不一定都有洞察力；而邊沁却答道：「也許是這樣，但立法者所知較詳，這却是實在的。」

然則理嘉圖并不爲資本與資本家的利益故而要求自由競爭，却因爲他從這樂天論出發，即因爲他相信無限制的競爭最有益於人人。理嘉圖就是本這國民經濟的自然學說而說道：「凡自由競爭存在的地方，各個人與全體的利益并不衝突。」他又有一次說道：個人所求自己的利益適與全社會的利益相

吻合；這不外把邊沁的原則：「失却自由，不啻破壞幸福」重新加以改製而已。

古典國民經濟學所以主張工作契約的自由，并非有意把這自由毫無保障的犧牲給資本家階級的利益，却因為他欲撤廢古時束縛的限制，替工人鋤平其達到更大福利境界的途徑。由於這個理由，斯密所以主張撤廢學徒法律，因為這法律是妨礙工人的自由行動。斯密與理嘉圖又堅強的主張撤廢結社的禁令，這足以證明他們親近於工人。理嘉圖在議會中攻擊舊時工資調節律時候，也是從斯密所從的立場出發，即因為這種官署的工資規定正於工人的利益為有害。從古典國民經濟學的立場出發，工人契約的自由正是一種親近工人的假定說。猶之他們所設完全實施自由競爭制度的要求也是由於這理論出發；即因為這經濟制度是以促進一切工人階級的利益。依理嘉圖的收入分配論，在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之下的各種工人可得其適當的工資。

理嘉圖固然主張物品的價值根據於製造物品的工作，但他却視資本所有與自由競爭為各種經濟制度中持久的支柱，并且他如是的陳說：一切物品的價值固然最後關係於物品製造者的工作，然而資本利息與企業利潤也都是不可少的收入折扣，因為如果資本家沒有支取利息與利潤的利益，恐怕他絕不肯實行他的不可少的動作。他只認一切地主的收入為真正不勞而得的收入。他不承認地租為一切地主

的一般收入，却只認牠爲一種特別收入，這是特種的、在膏腴與地勢上占了便宜的地塊所生的收入。如果利用儘量自由主義的商業政策，務使占便宜的地主取得地租的特權由於賤價穀物之自由的輸入，而受了極力的限制，那末由於私人的土地所有與資本所有而引起的一切損害可以就此避免。就是工人的狀況也可以較佳，因爲理嘉圖所定的工資鐵則——即工人平均所得的工資只足以供給他生活上所必需的——並不視作絕對不可逾越的限制。反之，工人如果養成慎重結婚與生子的習慣，他們自己便有改良他們狀況的把握了。所以自由主義的經濟學的口號這樣的表示：用極端的自由，達到人民享受福利，直到工作受了正當報酬的目的。

在十九世紀開頭，英國方面已經有幾個社會主義的著作家出來反對這自由個人主義的學說，如哈爾 (Hall)、格雷 (Gray)、布雷 (Bray)、托謨孫 (Thompson)、和治斯琴 (Hoksgin)、歐文 諸人。他們不承認工作契約的自由可以保障工人階級的福利，不承認在自由競爭與私人所有的統治下的收入分配爲正當的。反之他們教人道：利息、地租與利潤都是不勞所得，這都是不正當的向工人收入中支取出來的。這種支取便是不合得的剩餘價值。——在這去馬克斯以前很久的時代中固然已形成了那種理論，——即所謂地租、利息與利潤都是未給酬的工作的剩餘價值的理論，——但要認這種學說爲馬

克斯剩餘價值論的先驅，却未免說得太過。孟革 (Avton Menger) 在他的作品：完全工作收入的權利 (Das Recht auf den vollen Arbeitertag) 中有說：馬克斯完全受從前英國社會主義的、尤其托謨孫的影響。我們姑把馬克斯拿來雜在他的言論裏面的許多數學的方程式，置而不論——方程式與其解釋問題無寧是隱蔽問題——，但他的全部剩餘價值論：即剩餘價值的概念，剩餘價值的關係，與關於剩餘價值高度的見解等，根本上出自托謨孫的作品裏。——他論哈爾的作品時候，又有相似的言論，而說這些作品對於現在社會運動很有大影響，孟革的這等表示以及其他的表示，蓋含有過於推崇那時代的社會主義者，並且出於誤解：

(一) 馬克斯的剩餘價值論與托孫的以及他的英國同志的，實是根本不同。托謨孫引仲理嘉圖的價值論，故自其中引出同樣的結論。他以為：因為工人單獨創造了剩餘價值，所以利息與地租都是不合得的利得，都是向工作收入中挖取的不正當的收入，因此得創立一種新社會制度的組織，替工人保障其完全的工作收入。馬克斯的進行却反過來，他固然聽信理嘉圖的價值論，却只想用客觀的證據，證明地租、利息與利潤都是源於未受酬的工作。但他是從合理的社會哲學的立場出發，所以從未會由這剩餘價值中刺取其利用法；至於從任何一個正義的立場出發，而要求設立一個新社會制度的這

種思想，他也完全不懷着。

(二) 托謨孫與其他英國社會主義者對於剩餘價值論所成就的，在國民經濟學上看來，并未曾想到深處、說到當處。馬克斯正惟以科學的國民經濟的發揮剩餘價值論，所以他走的境界遠在他的前驅者之上，所以不能把他看做托謨孫與其他英國著作家的剽竊者。在上述幾位英國社會主義者那裏，由於不明瞭的正義感覺發生出來的東西，在馬克斯方面都是一種根據於極其謹嚴的國民經濟學研究而得的理論。

我們現在如轉而觀察所謂英國社會主義者，那末我們却要在其中那個極有勢力、極有價值的，即要在歐文那裏，多說幾句；至於其餘的英國作家却只加以短簡的稱引。

英國醫生佐治·哈爾 (George Hall 1745-1825) 在其 1805 年出版的作品 文化對於羣衆之影響 (Die Wirkung der Zivilisation auf die Massen) 中曾嚴厲地批評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工人生產企業家所以消費的一切東西，却抵不過他們的工資，抵不過他們所創造的收入八分之一。哈爾把文明國內這種事實的狀況這樣的描寫出來：「全人類中幾個少數人由是能够取得一切想得出的娛樂——無論肉體的、抑或精神的，都是他們的本性所能接受的——，但却是以人類中大多數人爲犧牲；這些人由

是失却生活上的必需與舒適；其中大部人却被誅滅了！剩下的人在肉體上與精神上都受了大多數的野蠻殘暴的狀況的壓迫。」（見該書第四十八頁）——哈爾的實際的提案歸結在國有土地，在廢除竊長制、廢除奢侈品的工業；因為「貧人的工作此後只該用以製造必需的使用品」。

這裏還要提起和治斯琴 (Hogskin) 這人，因為從他的社會理想看來，他固然可歸於無政府主義者（因他期望未來的福利在於人類不受法律的壓迫而謀共同生活），但我們在他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批評中，却見有若干文句，後來在科學的社會主義內得了較深切的解說。尤當注意的是他的一八二五年出版的那本反對資本要求的工作 (Labour against the Claims of capital)。他贊成理嘉圖的價值論，所以也稱地租與利息為剩餘價值；他也像理嘉圖那樣，相信只有工作創作價值。他以為：資本是不生產的；流通的資本不外是工作，不外是各種社會的工作之混合的作用。——因為資本是不生產的，所以資本所有者只以利用工人為利，他本人并無何等勞績，只向他人的工作中，刺取利得。他宣稱：「資本家所以具有贍養與使用其他工人的能力，蓋感謝着他對於幾個人的工作的支配權，却不感謝着他擁有許多物品……。」人家可以說「有一種唯一的事物，是存積起來，事前預備好的，這就是工作的技能」。工人由於技巧而取得的一切利益却被資本家的所有權剝奪了，并且給資本家強行占領

了。所以他在他的通俗政治經濟學 (Popular Political Economy 1827) 中有說：「在現在的社會狀況之下，工人無由獲得資本，由是各種集積在增進利潤的數量，在廢除一切那種足使工人享受舒適生活的工具。……今如假定工作是生產一切，并且是生產資本的，那末如認工作所製造與所運用的工具為生產力，便是一種悖理的言論。……人家又把工資或且工人的生活品質算為資本的一部分。……可是工資并不像工具那樣的促進工作。……付給各種工資的，是工作，不是資本。」

在社會主義理論史上比上述二位著作家，擁有較大勢力的是威廉·托謨孫 (William Thompson)。他是一個以慈善事業著名的地主 (一七八三年至一八三三年)，他的巨著在一八二四年用對於財富分配原則之研究，以求特別促進人類的幸福 (Untersuchung über die Grund sätze der Verteilung des Reichthums zu besonderer Beförderung menschlichen Glücks) 的標題發表了。托謨孫也是從李嘉圖的價值論出發：「沒有工作，便也沒有財富。工作就是財富的指標，所以富有以異於他物。自然的作用不能算為財產的對象。在生產一切娛樂品或且需用品時候，姑無論牠們是否成為財富的對象，而自然對牠們所施的力量都是平等的、普遍的。工作是財產的唯一之母。」(見該書第三十頁) 工作似也是相對的最好的價值標尺：「因此，工作在人類社會時常變易的狀態之下雖然不足以供準確的

計量財產對象的相當價值，但就我們所能得的一種標尺以計量所需要的對象是否為財產的這一層來說，他却最為中緊的……（見該書第四十八頁）。

在私人所有權的統治之下，工人所創造的價值，一部分被奪取了。托謨孫在他的剩餘價值論中曾把這件事詳說出來：「工人為取得他的生產的前提條件，即為取得土地、住宅、衣服、工具、食料、原料故，不得不拿出來的唯一對象又是他的工作之一部。但是預備生產用的物品所有者——即是資本家，因為墊付工人這些物品的關係而向工人要求的那一部分的工作是很大，所以工人的工作生產品中大部分往往不能給工人使用，却被那種只把那些物品集積下來，借與真正動作的生產者一用，由是藉此以參與生產的人們，所消費了。這等坐享生產品的所有者因此不特與真正生產者中最勤懇而靈巧的人，享受同等的享樂，并且各按其集積（姑無論其用何法集積）的數量，而就工作製造下來的財富對象中所取的成分，比之真正的生產者用千辛萬苦所能取得的，約合十倍、百倍、乃至千倍。」

由是在企業家與工人階級間形成階級對立。托謨孫說：「現在事物的制度是以武力為根據，因此人類中只有一階級擁有生產的力量，其他一階級則擁有物理的手段，以運用這生產力。在這制度存在的期間內，資本家將仍用他們手中的手段，把工人的工作和幸福化為他們自己的最大的利益，全部人

類的幸福將仍給資本家的剩餘利得犧牲了，在各資本家看來這剩餘利得還是很小咧。如果仍讓社會裏面有兩種仇視的利益、即一方面讓擁有工作的工人，他方面讓擁有對付工作的手段的人站着，如果還用武力維持這種不自然的區分制度，那末可以製成的人類生產品中也許有十分之九將仍不見天日，並且在可以達到的人類幸福中也許有百分之九九還被犧牲了。」

在上述幾段中固然多少現出剩餘價值論的萌芽，後來馬克斯由是更深進一層把他表述出來，但是托謨孫對於未來社會制度問題的態度却與馬克斯根本不同。

托謨孫要創立一種合理的制度使工人享受完全的工作的收入，因此以造成人類最幸福的狀況。他以為應先創立一個正義的境界，藉此以保障大部分民衆的幸福。托謨孫爲了這新社會制度，曾提出三條基本定理：

- (一) 就工作的傾向與久暫來說，工作應該是自由而隨意的。
- (二) 工作的一切生產品應該保定給他們的生產者。
- (三) 這些生產品的一切交換法應該是自由而隨意的。

由是分配的自然律得起來代替資本主義制度的不自然律。——托謨孫為欲實現這理想，由是提出一種共產主義的社會組織，就是仿照從前歐文已經道過的那種團體形式。托謨孫是向例主張自由與隨意的人，現在却要求一種共產主義的組織，這當然是一種矛盾，他由是想這樣的解決這矛盾，即凡關於團體的加入與脫退應為隨意的；不得以之強制着人。

在這裏，約翰·格雷 (John Gray) 很有關係，因為好像蒲魯東與歐文，也想用一種新的金錢制度來消除社會的劣况。他所草的銀行計劃和我下文所述的歐文工作交換銀行頗有多少相似之點。格雷在著完他的作品時候，完全不知道有歐文的計劃。他的第一種作品：人生幸福論 (Vom menschlichen Glück) ——出版於一八二五年——根本上是批評的作品。其中指出資本主義制度的許多弊害。格雷認工作為一切所有物所與唯一正當的基礎。所謂所有者或占有者都是靠着他人的工作吃飯。大多數人由地租或且錢息中刺取收入，這却就是犧牲工作者利益而取的不勞所得。因為一切貧困都是由於生產階級不得其工作的產品，所以得創立一種新社會制度，使人人在那裏各得合於其工作貢獻的所有物。『當使有用的工人能自己使用自己製造的所有物，并把他自己不用的那部分工作生產品，換取與這個同等價值的其他東西——其中只有一部分可以提出來以供支付管理、指導、監視以及分配上所必

需的之用。」地租也像利息與利潤那樣都得取消了；因為土地被視作衆人的公產，土地的耕種也被視爲與其他各種工作同等的。——又因爲繼續的競爭實抑平一切物價，却不能造成一種定規的生產，所以競爭也得取消——，但這篇作品中當然還沒有說到引用共產主義的話。格雷對於這積極的解決法，在他的社會制度(Social system)(一八三一年出版)中方才說出。格雷在這作品中稱現在的交換制度，爲社會的主要罪惡，他以爲：不完全的交換制度不只是許多同等重要的罪惡之一；他是全社會的罪惡、全社會的病根、傾覆全社會的礁石。錢幣是不合用，因爲他們自身不過代表一種價值；金錢應給一切要換取東西的人看來，宛如一把秤，一磅重量的那樣便宜、那樣習慣、那樣易取。

他以爲，解決這問題的：是使人人能用極微的時間與勞力，把任何一種流通的同等價值的商品，換取固定價值的物品。金錢只好作爲一張簽據，證明：人人會以特種價值增益國家的福利。他說：「金錢不外是一種收據、一種證據，用以證明：持據者或則會以定值增益國富，或則他已從貢獻給他的任何一人處，取得上述價值的權利。收據的效用在使持據者復得其因此而給的價值，姑無論他用以圖他的滿足抑或復得某種品物。」

格雷爲欲創造這種新金錢，由是提議設立一個「中央商業聯合會」(Zentral-handels-Assoziation)。

用這機關可把物品的生產、流通與分配加以完全統一的組織。一切土地或且資本的所有者應為該商業聯合會的會員；無產者應儘速加入進去。商業聯合會指導一切農、工、商業；一切製成的商品堆存在國家貨倉內。貨倉很多。他們由是用商品分配給散處全國的商店。某種商品堆存在國家貨倉較多量時候，那末用以製造該商品的資本一部分應改作製造他商品之用。

商業聯合會，應依物品的種類與數目以指導一切物品的生產，所以他應設立一種國家銀行，發行紙幣給與他的會員；每個會員在國家銀行內開有一戶；會員所造的商品的價格，應由聯合會來規定，并根據其製造費與管理費、工資、損失等項下應加的成數；銀行的紙幣應為向國家貨倉內支取任何商品的票據。

布累 (J. T. Bray) 却在蒲魯東以前已稱資本家的利得為向工人的工資中竊取而得的，并且在他的一八三九年出版的工作的不當與工作的救濟 (Labour's wrong and labour's remedy) 中有說：「資本家似乎用以換取工人的工作而付給的物品，并非由於資本家的工作，更非由於他的財富中產生出來，乃是最初即藉工人的工作而取得的；并且這些商品因為這不平等交換的欺人制度，更每日落於資本家之手。工人與資本家間的全部關係是一種顯明的欺詐，……在千萬種狀態之下，他簡直不外是一

種無恥的（雖然法律上受了允許的）劫掠行爲，資本家與所有者就是用這劫掠行爲，向生產階級逐其榨取。

布累也像蒲魯東那樣說出資本家截取的一種工作曰：「在現在的制度之下，每個工人給與雇主至少六日工作，而所得不外等於四日乃至五日的代價。」

布累在另一地方又宣稱：「只工作單獨創造價值，因為工作是購買的金錢，我們的飲、食、穿都是用這金錢來付賬。人人對於他的榮譽的工作所能給予的一切，確有權利。然則他如取得他的工作的果實，實未侵犯他人的權利……但使有人要侵占一切工作用在上面的田地，如果有人要求一部分土地——，那他就是在做不正當行爲，并且違反一般的權利平等。」世無理智或且正義的原則能許人奪取千百人的工作結果。然而這侵占的制度却被推行，而受了容忍。……自初創以至於今日。——這就是目下的社會制度的手續——一切他的權力、他的富有、他的名譽都是寄託於詐欺與法律上允許的劫掠。……「在交換的平等制之下，却不至使一階級奪取他階級的工作產品，像現在資本家奪取勞動階級每日積勞所得的那樣，這種准許一階級在奢侈懶惰中過生活并壓迫他階級作不停的工作的交換制度實含有不平等。」——他主張用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

上述這幾位社會主義者在社會主義的歷史和理論上亦有價值，但其對於社會運動却未有實際的影響，至於歐文却不只是理論者，而且是實際改革家，所以是個生有極大極強的影響的社會主義者。次講的任務就是在描寫他的價值。

第十六講 英國社會主義

一 歐文勞動急進主義與英國工會及合作社運動

沒有一個英國社會主義者會像歐文發生那樣深的作用。連上講所述的著作家中有幾個極受歐文的影響，尤其是托謨孫 (Thomson) 與格累 (Gray)。歐文嘗把他理論上教人的、與他人在他以前教過的，一切藉實際的試驗化爲現實。我們從前在論共產主義國家的那幾章裏，業已知道他是共產主義團體的創始者。歐文蓋一生堅信人類的福利只好藉了共產主義的社會組織才得保障。但如片面的稱歐文爲共產主義代表，那就錯了。人可說：發生在英國那裏，互十九世紀的一切大改革論直接或間接的都

是源於歐文的誘掖。工人保護法運動、合作社業務、工會業務等都是以他爲其最熱心的促進者，即那英國大社會主義運動——所謂勞動急進主義（Chartism）——在某某點上也直受歐文的影響。

我們認歐文（Robert Owen）爲一個罕有的而且極其聳人視聽的人物。歐文是個真正良好的「自爲男子」（Self made man）。他是一個做零賣兼辦郵務的兒子，一七七一年生於英國某小鎮內，在十歲裏就不免在一家商店裏找飯吃，其後在他的實驗的途徑上逐步高陞，最後進至的程度竟使他成爲英國最初、最大的大產業家之一，並且擁有一批以百萬計的大財產。在最初、最有力的社會主義促進者中竟有一個相當成了功的雇主，這可說是一種極堪注意的現象。他在新拉那克（New Lanark）以一個木棉紡廠主的資格立了大功績，因爲他用合於目的的種種工作制度與人道施設把五百人的工人由於其貧困的狀況中擢登道德上與精神上都得改善的一個高階級。歐洲各地的王侯與政治家都喜歡觀察這新拉那克的模範區，因此歐文在一八二五年時候已算爲英國最有功績、最有名望的工廠主之一。

歐文的社會主義的活動之多面性已在赫勒涅·西門（Helene Simon）的那本傑作中很深切的說了出來。你們在那裏可以較詳細的窺見歐文所以爲工人保護法運動的熱心主張者。你們可以在那裏讀見他以雇主的資格，竟在一八一五年的格拉斯哥工廠主大會中替這種立法說出：「因爲我對於木棉工業

的興趣是這樣深，我對於祖國政治權力擴張的估量是這樣高，所以我敢把我歷年經驗中所得關於現狀的工業所加於工人的困苦的知識爲根據，毫不躊躇的說道：寧可我們國家的木棉工業，甚且他的政治上優勢歸於淪亡，不願他犧牲了一切生活價值的支持者，以圖自保：在這裏——他說了下去——只有一個救濟的手段：議會制定的法律得禁止十二歲以下的兒童工作，得規定一種共計十二小時，而間以一小時半休息的工作日，代替現在盛行那種共計十四小時，但只有一小時休息的日作日，他還當規定經過某時期之後，凡男童在未能讀、寫、算以前，不得進入工廠，凡女童除上述各科之外在未學縫紉以前，也不得進入工廠。賦予這些工人兒童的教授應由他們所生長、與以後所活動的地方來擔任。」——他手裏握着相當的法律草案大綱，他以爲「接受這大綱實有益於木棉工業、於國家、於人類的事業。」（見該書九二至九三頁）——你們在那裏還可以較詳的窺見他替合作社業務作的活動與一八二八年他在經濟論者雜誌裏發表的那篇關於說明貧困原因的論文。他要把消費合作社來代替中間商人的利得附加，所以坡忒（Beatrice Potter）在其合作社業務史中稱他爲「消費合作社之精神的父親」。他即對於工會也生有大影響，并且還想把工會來實現他的社會主義的理想。

我尤其欲把歐文的交換銀行加以詳述，因爲這交換銀行是一種實驗的嘗試，就是要使唯獨工作創

作價值的理論實際得個把工作爲價值標尺，就是化爲金錢的結論。

歐文在設立他的銀行時候所根據的理論的原則，簡述如下：

人人皆有工作力與要求物品的慾望。市場充滿了各種物品，但極大的貧困還在支配着，因爲人家無錢來購這些物品。自金錢出現以來，社會引用了一種人爲的交換品，其結果適使人類中某一階級發了財，其他階級則陷於貧困，又迫工人採用工資制度，這制度又視市場的動搖爲轉移。成爲任何一種奴隸制度。其實金錢並不是價值的真正標準，他也永遠不能成爲這種標準；要排除貧困，要使國內富源自由發展，得設法更改價值標準。

工作是一切福利與國富的真源。所以原則上一切價值的自然標準是人的工作，現在正該把這實驗的原則實行起來。所以得把存在每件商品裏面的工作量作爲商品價值的標準，并用他來比較一切其他商品。

「凡能創造新財富的，當然可稱爲創造新財富的財富。」這是歐文所認爲最重要而且唯一真正的原則。人類工作能製成種種物量，這些物量足以長保人人處於富裕的狀態之中。工人可以向這種由他創造的財富中，求取相當的參與權；并且各種團體感覺最有興味的正是要求他來參與。要規定這參與

權却只有用種種規則，使價值的標準（即是：工作）也成爲價值的實際標準。

歐文因欲實現這理論的原則，幷欲把工作作爲真正的價值標準，由是創立一種工作交換銀行。一八三二年九月這工作交換銀行（Labour Exchange Bank）遂開設在倫敦布累新路（Bray's Inn Road）。

把這工作交換銀行的營業與運命說得最明白的是歐文的雜誌恐慌（The Crisis）。該雜誌自第二卷一八三三年四月二十二日那一號起，會加有一個標題道：「全國工會聯合會與公正的工作交換公報」（and National-Cooperative Trades Union and Equitable Labour Exchange Gazette）。

羅伯·歐文的兒子羅伯·對爾·歐文（Robert Dale Owen）在恐慌的某號中會很簡單的把工作銀行的目的說了出來。計劃是如下：「開設一個倉庫以分配財富；是爲一切生產品可以實行交換的一個地方。至於交換如何可以實行呢？其法極簡。——生產者把他希望賣出的東西存積起來，消費者把他希望取得的東西自加選擇；這兩種東西的正確價值，應由從中無關係的徵稅委員來斷定。出產者立刻獲得一張票據（representative）以抵他的工作，他用這張票據可以就銀行的一切其他存積品中取得同等價值的物品。——」

我們要藉一個例以略明銀行的機關作用：有一個鞋匠製好一雙靴子；原料值二先令，他因此所費的工作凡十小時。他就帶了這雙靴子到銀行，申明他因此花了多少本錢與多少工作；由是爲了這雙靴子，給他以票據，上面載明幾多工作小時。并且此時每一工作小時給他十張票據，以抵他所作的工作，至於原料的計算約六d等於一工作小時，即二先令等於四工作小時，所以他一共每小時可得十四張票據。但其中留有一種極其重要的限制。銀行雇有徵稅者，他們應檢驗生產者的商品與他的報告；徵稅者如認這生產品不應等於所作的十工作小時，他們便可以對這商品給與較低的價值。——這鞋匠得了十四張票據，他便可以就銀行存積品中選取其所需的，例如一頂帽子、或且一把洋傘、或且一些生活品等等。依歐文的見解，一切生產者與消費者可以不用金錢的媒介與中間商人而買賣他們的商品。他們應就每先令中取出一d，即是其百分之八。三三給與銀行作爲酬勞之用。

銀行開設的結果，其始很可觀。民衆對於這機關大有興味，依恐慌裏面的報告，在開設頭幾月中，即自九月三日至十二月二十九日，存積的商品已達四四五、五〇一工作小時，交換的已達三七六、一六六工作小時。——不下三百家的商店宣言他們接受工作票據一如現金，并且有幾家劇場用工作券做計算標準。波司 (Booth) 甚且以爲這種辦法對於不生產業的階級也發生一種道德的大作用，波氏

寫道：「有人告訴我們說當時不工作的階級間起了一種可驚的恐怖。向來是社會上無用分子的人，多已決心設法從事生產的工作。」對爾·歐文自告人道，他在一星期內曾製成一雙鞋子，並且他的兄弟中有兩人也達到了這個速率；有一位先生不啻把他所感覺的欣喜表白出來，因這位先生曾學成了高尚的裁縫手藝，並且自覺初次成爲有用階級中一分子。

這銀行的大效果却延住不久；在開張後不久，民衆的興味便已減退，民衆中有一半因出於好奇心，才和該銀行訂結種種業務。存積的商品的數目，尤其交換的商品的數目愈形縮少，種種怨言起自銀行的雇客方面。生產者怨的是：徵稅者在估計用在商品上的工作時間時候往往失其公允。——拿着交換券的人往往在銀行的存積品中尋不到他們所需的東西。這是那種交換銀行的最大弱點：無用的東西堆積在銀行內，有用的却很快地賣完了。人家拿火爐蓋子、鑄框、火筍子、以及其他類似的東西來換取衣服、肉類、以及其他相似的東西。如果交換銀行欲對接收物品取審慎的態度，即他如只接收後述這一類的品物，那他就不啻違反他最重要的社會經濟的目的，即不能輕減困難的銷售。不特絕對無用的物品苦累着銀行，即是那些因爲民衆的嗜好與時尚之變遷，以及不復受了愛重的物品也在壓抑銀行。這種根於交換銀行的本性的劣况更因交換銀行的生產者與雇主的態度而愈加甚；生產者在生產時

候不復關顧民衆的慾望，却只努力儘量利用交換銀行；他們所生產的尤其是那些用資本可以較少，用工作可以較多的物品。例如一個裁縫匠買了一塊布，這塊布也可以做一雙腳綁，也可以做四件背心，他却喜歡拿來做四件背心，因為他製此，以視製造腳綁在同樣的投資之下，可以多得工作券。

教我們發生巨大興味的是在觀看這銀行也漸漸見被迫，復用金銀（固然只限於局部的）以救濟上述的劣況，又因為銀行的存積品中極缺原料，於是發布新規定，由銀行發行一種預約，以吸收現款。就用這現款來購買質地最佳的原料，分發給會員以製造商品。惟須把新製的商品交給銀行；對於他們用在商品上面的工作應以工作券相酬。銀行只能這樣的賣却這些製就的商品，即以現款抵償其中所含的原料；以工作券抵償用在上面的工作。

由是交換銀行所抱的原則，即生產者消費者間可以不用金錢而作買賣的原則，已經打破了。該銀行雖然用了這種以及相似的對策，他還不能自存；在交換時候，這工作券不當原價六d用，只當4d用。雖然用極大的努力，而雇客的數目總漸減少，在恐慌的一八三四年五月三十一日那一號中有通告：此後不發工作券；給與持券者的東西只限於銀行的存貨之內。

由是這位曾把工業界裏的大經驗與知識、大筆款項以及他的全部辦事能力與拳拳不倦的勤奮用在

這種嘗試的人竟告失敗。論這種嘗試，正如波司所說，蓋欲實現保羅的格言：「你們倘不工作，便也不該得食。」

歐文交換銀行實際上之失敗尙引起一種一般的理論的趣味。即社會主義的工作價值論（尤其最初童真的見解）與以此爲根據的工作金錢之錯誤於此已顯然被斷爲不合理了。

吾人在社會主義組織的社會內對於化工作爲價值標準的問題，也許可得一種方法。如果由團體提倡，替團體打算，製造必需品，再把來分給各個人，那末在這社會制度內要確定每種生產品內含多少工作小時，固然相當難算，但總是可能的，並且還可以把工作小時當作價值標準看。

但這種價值規定，如在個人主義的經濟制度內便是絕對不可能。如果生產是由各個企業家執行，各個企業家爲了消費者而製造商品，消費者又隨其所好購買商品，那末商品價值的標準，絕不是用在商品上的客觀的費用數量，却是商品的利用率與使用力，或則謂爲使用價值。第一關係的是商品的優良、可愛、可用等等。

歐文的共產主義的與社會主義的實驗固然老不成功，但他的效用在英國社會政策方面，却收了非常的功效。他在社會的慈善事業上的種種提倡大半都實行了，並且英國境內所以很早起了一種強毅的

工人保護政策，也是受了他的提倡的不少助力。

英國在十九世紀第一期中，不特具有有價值的社會主義的理論者與煽動者，并且，依我的上述，他在所謂勞動急進主義（Chartism）中更表現一種强有力的社會革命運動。

勞動急進派固以選舉改革之要求為運動的中心點，甚且要求把選舉權擴充給全部人民，但是這種政治的改革却不外是經濟改革的基礎。政治的權力是手段；社會的福利是目的——這就是勞動急進派的口號。

勞動急進派運動在一八三九年北明罕的流血暴動中實達到他的最高點，這派運動的幾個領袖實把社會主義的究竟目的看在眼里；他們蓋欲把工人由資本的統治中解放出來。例如該派首領中有一人，就是斯忒芬斯（Stephens）有一次在國民大會中曾說明勞動急進主義的性質如下：「諸位朋友，勞動急進主義并不是求得選舉權的政治問題，勞動急進主義是一種刀叉的問題，勞動急進主義叫做：好住宅、好飲食、好度日、短工作時間。」又有一個首領有一次，却說：「我們認識人家對待我們的不當，我們覺得那種奴隸制度，我們尚無力從裏面解放出來。我們的解放只好靠着這種認識廣傳於各國勞動階級間，因為這樣一來可使我們認識我們在社會中實際所處的地位，可使我們覺得我們——就是財富

的生產者——對於財富的享具有第一的要求權。」

但是這些表示絕不能表明全體的勞動急進派運動，這運動可算爲勞動急進主義中一種極有力的潮流。

這勞動急進主義沒有一致的綱要與堅定的究竟目的。他的中心點是在政治上要求普通選舉權。這種政治的成功却被作爲獲得政治的目的之用。在這些經濟的目的中，又可窺見歐文的思想：即當用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把人民由貧困的奴隸制度中解脫出來。歐文自身固然從未會寄同情於勞動急進派運動；他以爲這種運動太爲政治的，並且以武力相訴也不得他的贊同。如果勞動急進主義者肯把他的改革綱要寫在他們的旗幟上，也許他會期望這種運動的成功。歐文派是本共產主義的意旨要求徹底的改革，而許多勞動急進主義却只求廢除多少劣況；尤其十小時法律與一八三四年新發布的貧人法之廢除都是出自勞動急進派中的要求。——我們也不能認此爲純粹的階級運動；因爲普通選舉權的要求在人民的許多其他階級中竟得了同意，並且在中等階級的廣大範圍中也見有勞動急進主義者。

即關於如何可以達到目的的手段之選擇，也從未見有一致。由羅味特 (William Lovett) 領導的一部分勞動急進主義者要用和平的，合法的手段達到目的，奧布恩 (O'Brien) 與奧昆涅 (O'Connor)

所屬的那極端派却認武力的進行爲必要。

這勞動急進派運動在一八四八年竟告絕跡。暴動被壓平了，對於勞動急進主義者的目的所生的興味差不多完全消滅了。在勞動急進主義運動中出現的主要要求有幾項也達到了：新的貧人法實際上運用的程度比之該法律的字句所規定的，也遠爲寬大——十小時法的奮鬥在一八四八年歸結也是利於工人，因爲皮爾(Robert Peel)已實施他的工場法(Factory act)。——由是勞動急進主義運動失却了一些信徒——即失却了那些只把這些期望與目的放在眼裏的人們。

但不只勞動急進主義運動消滅了——在長時間內，英國人對於社會主義的興味差不多也完全銷滅了。英國工人蓋跟着新的目的與理論走。

在小小的市鎮洛赤對爾(Rochdale)屬於蘭卡斯特(Lancaster)內街上的青年在一八四四年十二月某日晚
上曾享了好幾小時的快樂時間：他們歡騰笑謔的觀看小巷裏、小店裏陳列着少少分量的麵包、糖、麥粉之類。

但這些些小微細的事項却就是現在昂然而立的英國工人合作社事業之開端！

老弱而貧困的織工在當時創設第一個消費協會以改良他們的狀況。但這種開端是多麼幼稚！該會共有會員二十八人，該店大概只在星期六與星期日晚上幾點鐘內開着。一個會員任發賣者，又一個任記賬者，第三個叫做管錢者；他應保管所集二十八磅的資本。

嚴格說起來，不能說洛赤對爾的消費協會是最初的。其先在英國已有零星散處的消費協會；但他們辦理的原則是將利得就會員中，各依參加的成分分配起來。洛赤對爾這般工人所作真正的革新，就是在於：他們絕不像第一期的消費協會把純益各依營業參加的成分來分配，他們乃是依收入而分配的，因此他們的作用實開後來消費合作社發展之先河。發賣照市價，又因為利得是依會員購買總額的多少而分配給他們，所以會員持久的與消費協會相結托。由於這些微末的開端，成立現在盛行的合作社業務，因為這業務的關係，到了十九世紀末，有二百萬以上的英國工人遂成爲六百萬馬克以上的資本所有者，成爲大商店、大工廠、大磨房的所有者等。

上文我已斷定政治的工人運動在英國是渺乎其小，但是經濟的工人運動，就是以達得狹窄的經濟目的爲任務的那種運動在那裏却愈其強盛的發展起來。

工人尤其可以用兩種方法改良他們的物質的狀況：一是輕減他們的支出經濟，一是增加他們的收

入。

合作社業務尤其用達第一目的，工會業務尤其用達第二目的。英國工人合作社業務的基石只有消費協會這一塊，在他上面，與以他為基礎的，才出現一系列極有效果而且有益的協會組織。

由於消費協會，成立了所謂大商業合作社。消費協會是替工人減除小零賣商，而大商業合作社却也把消費者由大中間商中解放出來。大商業合作社能使消費合作社把大商業都握在手裏。消費協會是零星散處的被迫而向其住在區內的商人購貨。自他們結合在大商業合作社之後，他們便能夠或直接的向生產者或大商行購貨。由是他們能夠把大批購買的一切便宜歸給極小的消費合作社，並能夠以最低價購買名貴而道地的商品。

此類大商業合作社有兩種：一種是英格蘭的，一種是蘇格蘭的；其中結合着九百合作社，共有社員八〇〇、〇〇〇人。他們有五隻汽船專門介紹海外交通，在漢堡、哥本哈根、及紐約方面有殖民地以達購貨的目的。在曼徹斯忒有大商店，消費協會可以在那裏覓取一切所有商品的樣本，并行定購一切。他們在倫敦有一個茶棧，貿易額達七百萬馬克。

所謂消費者生產合作社 (Konsumten produktgenossenschaft) 可算是合作社業務中最接近的階

級：所謂狹義的工人生產合作社就是工人的合作社，其目的是用自己本錢、冒自己危險，從事一種企業。真正的工人生產合作社所以欲自資本主義的企業家的統治中解放出來的方法，即在他們自集其企業上必需的資本，自行生產，并把利得自行分配起來。

與這種真正的或且純粹的生產合作社相反的還有一種，工人在那裏以消費者的資格集合起來以達生產的目的。蓋使工人在他們的消費協會內通常對於麥粉、麵包，衣服等具有特定的銷路，那就很可以集合為這種消費協會，并創設生產部門，協會的生產就是由這些部門來擔任。

這種消費者生產合作社與真正的生產合作社間所差別的就在於該合作社只替確實知道的銷路而生產。

大消費協會的會長實確知他們雇客的需要，於是他們在每年的集會上，漸與消費協會的工廠部的部長等發生密切的接觸。英國消費協會有許多這一類的生產部門，例如在來塞斯忒 (Leicester) 有一個靴子工廠，在曼徹斯忒附近有一個糖餅工廠，在約克郡有一個棉紡廠，在德安 (Durham) 有一個絲織廠。消費協會的百分之二十的麥粉用量是在這些生產部門內製造出來的。

一切合作社業務的不幸之子在英國，以及在各地，都是真正的或且純粹的生產合作社。一般的合

作社業務都很輝燦、茂盛的發展起來，獨道上文所述的真正的或且純粹的生產合作社所收的效果是很可悲。

你們得用很大的慎重與批評以觀察關於英國生產合作社的統計。一切其他所有的結合，例如尤其上述的消費者生產合作社都被算為生產組合；因為人家對於生產合作社實生了錯誤的想像。

波忒 (Beatrice Potter) 的英國合作社業務實是一本把這種運動陳說很清楚的書，你們如其讀了這本書，便見得那裏實很明顯的把真正的生產合作社和這類的其他應有盡有的形成物分別出來。你們在那裏將見得不能依合作社聯合會的統計而謂有一〇六的生產合作社，却只能說在這一一〇六個之中有大部分是小匠首同工資工人結合的合作社有幾個小企業家集合起來，蓋欲向非合作社社員的工作中儘量榨取其利潤。這一類在合作社統計所載的一切生產合作社中實占半數。此外更有許多生產合作社事實上是在資本家的合作社，工人對此只有利得的參加權。

嚴格說起來，如把一切這些不屬於其中的合作社，直截了當的剷除去。那末在英國剩下的真正的生產合作社還不過一打。

無數生產合作社被創立了，在短時間內又復消滅了。尤其在前世紀四五十年左右，因為社會民主

黨、歐文派、勞動急進派、基督社會等的思想之影響而創立了多數的生產合作社。一切設在倫敦以及英國南區內的合作社都是由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創立或且援助的，他們在數年之內或且散為無影無跡，或則降為小匠首用以刺取利潤的企業。在一八五二年創立的鞋匠合作社，在頭幾個月內即已消滅，還有諾森伯蘭、德安等處機器工人、鐵工人、煤工人所組的鐵料購買處機器工廠，與其他相似的企業，結果都吃了大虧，因此工會內部對於此類的嘗試發生了很大的不信任。

生產合作社失敗的原因如下：

私人企業在個人主義的經濟制度下已經難以興盛、難以支持久遠，所以工人生產合作社更須完全和特殊的困難作戰。工人往往很少有充分的知識與必需的商業教育，以操縱這一類的企業，除此之外更有一層困難，即此等結合的會員差不多陷於種種之爭執與糾紛，由於他們自己間的不和而妨礙他們的企業的發達。

除了這種生產合作社不計外，英國那裏的工人合作社却奏有極大的功績。他們不只在會員的儲蓄與利得成分的數目上，與在會員的較廉、較易的取貨便利上，收了經濟的效果。超乎上述的活動範圍之外，更有許多有利於工人的施設，也是由合作社舉行。例如消費協會的純益中百分之二·五，是用

以達教育的目的。洛赤對爾的工人於一八四九年設立一個圖書館，一八六七年有一個火的及生命的保險公司是由合作社舉辦的。

英國合作社業務發展到什麼地步，可以用幾個統計的記載來表示：

一九〇八年合作社的數目達一五六〇，社員達二、五一六、〇〇〇人。參加資本達三千三百萬鎊，交易額達一萬零八百萬鎊，純益盈餘達一千一百萬鎊。——不列顛合作社運動的經濟中央機關：就是蘇格蘭與英格蘭境內的兩大商業合作社，他們有下述的發展範圍：

一四一四個協會加入在裏面，參加資本達二百萬鎊，任事的人數達二五、〇〇〇人，其中有二〇、〇〇〇人係從事自給生產。這兩個大購買合作社的貿易額在一九〇八年達三千二百萬鎊，純益盈餘達七三一、〇〇〇鎊。

一九〇八年，工作合作社（生產合作社）在英國有一二〇個，社員達三一、〇〇〇人，貿易額達三百萬鎊。純益盈餘達一六四、〇〇〇鎊。合作社的自己生產，在一九〇八年，總額達四萬五千六百萬馬克；其中一半——二萬二千二百萬——是屬消費合作社；兩個大商業合作社所參加合作社的自給生產的成分計算計達三分之一以上即一萬二千九百萬。最後所謂純粹消費組織的合作社，磨坊，所生產

的總額達二千一百萬馬克。消費合作社，大購買公司與磨坊合作社，總而言之即我所述的消費合作社之一切形式，約占英國合作社的自給生產百分之九十。剩下工作合作社（即生產合作社）與其他合作社所生產的不外百分之十，即四千四百萬馬克。但即在這些生產合作社中又有一部分是消費協會的所，或則消費協會在股分裏面占主要的分子。

再就不列顛消費合作社從事房屋建築的問題而論。一九〇七年有四一三個消費合作社會把約二萬萬馬克用在房屋建築上面。於是建築了八、三五〇家的房屋，其中有五、五七七家賣與給住戶。此外由消費合作社的會員自己建築，而得合作社予以資本援助的有三二、六〇〇家。

工人參與一切這些合作社的管理實非常增進工人階級的智識與道德，這是很明瞭的。合作社的主要目的是改良支出經濟，而工會却志在改良收入狀況。

工會是工人的經濟的利益團體，意在提高工費、縮短工作時間、及其他的經濟狀況之改良。世界上沒有一國像英國有那樣強有力、那樣成功的工會。英國的工人運動在他們方面實達到最高度，英國工人中最進步與最高尚的分子都結合在裏面。經過長時期的奮鬥之後，這些工會方始達到現在有勢力有名望的地位。

在第一期中，工會是工人對於企業家所作秘密的、不合法的結合，及一八〇〇年發布嚴厲的法律之後，於是工資工人意在改良工資的一切協定，集會與結社都受禁止，凡違反這禁令的，都受了拘禁的刑罰。

因為人家用極端的不信任心觀察這些工人團體，於是工人方面在充滿了仇恨雇主的心理。一八二四年取消了結社禁令。惟是凡應用武力以對抗人或物，即應用威迫以要求工人參加工資運動，却受了拘禁的刑罰。一八二五年的法律修改了。結社自由固然表面上受了維持，但是從前嚴厲的反抗暴動的規定又復發生效力了；表面上工人聯合起來共同作工資與工作時間的討論，却是獲准的。

在次期中——約自一八二九至一八四二年——歐文的社會主義思想對於工會得了勢力。社會主義者滿心希望用結會，以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這就是說，以取得生產手段。基督敎徒運動從工會方面得到許多援助。於是激烈的罷工竟以出現，并且往往惡化而為暴動。

當四十年頭時候，革命的基督敎徒運動已超過了他的頂點，歐文及他的徒黨的許多社會主義實驗都失敗了，於是工會的態度也較冷靜，較切實了。他們於是不用革命的、惱人的奮鬥以對付企業階級而設法利用工會，以和平的，但是很有勢力的，取得工人的利益。他們於是不用攻取的政策以對抗企

業家，却努力用和平的同他們磋商的方法，取得關於工作時間與工作工資的種種便宜。

當時創立了所謂工會的「新模型」，并且這種新組織先由機器工人的混合團體所組成。

依這新的結構，工會只應儘量收羅在一職工業內工作的工人。然則會員的經濟的利益應該極其間類，但在這同職工業內却可以在國內各地儘量拉攏一切工人。該工業所在的地方，與工人所住的地方，都設了分會。該工業主要的所在地就是該職工會的所謂執行委員會的所在地。

於是罷工的進行通例如下：

分會如以為該工業的一般狀況有提高工資或改良其工作條件的必要，便應將必要的理由報告於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如不同意該分會的企圖，那末這分會如罷起工來，便不得援助；但如果執行委員會贊成他來發難，於是該分會地方的工人派遣代表到雇者那裏，陳述他們的苦況。這件事於是說來說去，往往至於說妥。如果這樣和平的解決不可能，工人於是停止工作，并且在罷工期間內向執行委員會那裏領取所謂贈款（罷工津貼費）。

這種收羅該工業中一切工人的組織所擁的巨款實賦與他們在這等工資奮鬥中以偉大的力量。但是工會的作用直超過工資奮鬥的這種組織之上。他們常創了一組基金機關，由是工人可以用自助的法

子，幾乎取得德國工人用強制工人保險所取得的一切利益。甚且不僅取得這些，他們還有一種工人保障的支機關，這在德國尚未受法律上的規定，尙未十分完成；就是失業保障。

這裏所說的援助力量有多麼大；現在我要引上述結合的機器工人工會為例，給你們看看。會員在失業時候在十四星期內每星期可得十先令，後三十星期內每星期可得七先令，此後每星期可得六先令。疾病時候，在二十六星期後每星期可得十先令，此後每星期可得五先令。逢着災殃時候，如引起持久的不能工作，可得二〇〇鎊；卽年老保障也實施了；凡達到五十歲的會員如不能享受從前的工資率，每星期可用七先令。會員死了，其遺族可得十五鎊輔助金。工會還從事工作介紹，他們製作精確的工作統計，所以隨時知道失業會員的數目以及出缺的工作位置。

工會在其法律的地位上實得了大的功勳；蓋他們由了一八七一年的法律已取得法律上完全的承認與權利能力。把其章程交在登記的工會都享有結會權。

依一九〇七年終的統計，英國方面的商會有一二七三個，會員二、四〇六、七四六人。商務局（Board of Trade）的工作區報告最重要最巨大的工會已超過一百個。這些工會共有會員一、四五七、八五六人；每年收入達二、四九三、二八二鎊；支出達二、〇五四、一五七鎊，所集積的財產達

五、六三七、六六一磅，然則其數已超過一萬萬馬克。一九〇七年就這些工會給與會員的款目中，關於罷工津貼一三三、三六三鎊，關於失業津貼四六五、六六八磅，關於疾病與災殃津貼四三一、五五九鎊。

我在這裏不想廣論工會在社會政策上的價值；因此我得把人家對於工會作用的種種見解以報告。這工會從一方面看來，却被稱為非常有益的機關，是達到「社會的和平」的最好手段，有人甚且極力主張急把這施設移到德國。他方面却因見工會對於企業家施行這種暴行，遂斷定他們愈其妨礙英國工業對於外國的競爭能力。

其實得避免作這等偏於這兩方面的過言。吾人尤不當忘記的是：在工會裏面結合的只占英國工人一小部分，即不過五分之一，其大多數工人尙未受組織。但是在這些團體內組織的這五分之一，當然成爲一種極其顯著的力量。這種組織實完全不能擔任社會的和平，因爲英國雖有這些工會，然而還是最近數十年來最大罷工的活動地點。英國工廠主屢斷言德國工人運動的方法在他們看來實比英國那裏盛行的狀況爲舒適，這話實在可以完全相信。因爲我們德國方面的工人移其時間、力量與金錢於選舉競爭中政治的活動，以達到他們的究竟目的；至於英國雇主却不斷的受了工會的愈其推陳出新的要

求，而被提醒。有多少屬主在未引用新機器以前，却得先取得工會的同意，或則在引用該機器時候，得對他們表示多少讓步。

這第二期內工會的政策與策略之完全變遷也可以在工會對於機器的態度之變遷中看得出來。對於機器採取直接仇視的攻擊態度只見於零星例外的場合。自工會取得法律上承認之後，他的全部策略既較偏於實際政策，而少含有攻擊的作用，即他們在機器問題中所取的態度也變了較不急進的。現在工會再不認各工業內輸用機器為有關係，而認在什麼條件下輸用牠為有關係。他們設法在輸用機器時候極力使會員免受損害。所以他們設法強迫企業家接受關於工作時間、拒用無訓練工人、避免工資減少等等條件。這種約束往往很有效果，但在別的情形之下，却難得一致，而且英國工業的競爭能力也很受工會的這種進行的苦。

在這時期的工會業務內，還有一種直接攻擊機器的行為，吾人可用一八五七至五九年諾坦普吞郡內鞋匠的態度為證。縫紉機器之引用在那裏實引起許多激烈的糾紛；那裏的這種罷工似乎即在同業的其他工會內也引不起人的同情。

依衛布氏 (Webbs) 在他的論英國工會 (一八七八年) 的作品內所作的報告，有二三個老工會對

於他們的工業大規模引用新機器，并雇用新特殊階級的工人的這些問題表示反抗。但依上述，這仇視的態度却是一種例外。往往在引用機器時候由工會方面提起種種要挾，即他們欲藉限制他們的工作強度以減少機器的效力。這就是「喀喀尼」原則的結果。什麼叫做「喀喀尼」(Ca'canny)？

如果兩個蘇格蘭人出去散步，這個比那個走得太快，那個就說：喀喀尼，喀喀尼，——這就是說稍為慢些。

工會就是本這個意旨要求會員慢慢的工作，務使不因機器之引用而生產了大量的產品；他們於此蓋自一種很奇怪的理論出發，人家也許可稱他爲——有似於工資基金理論——工作基金理論。他們斷定在特定時間內，特定工業中往往對於該生產品只有特定的需要，如果用機器的助力生產的愈快，那末該工作所需於工人的自也愈少，要使工人不致沒飯吃，得把從前的工作率壓抑下來，藉以互相抵補。

英國玻璃工業，尤其瓶子工業在引用機器時候所受反抗方面的損害之大，如這反抗所尤其加與工人自身之損害，這是一般人所知的。

我最後所述的運動——即合作社與工會的運動——自其基本性質看來，絕不是社會主義的。但因

爲他們在英國工人運動中占了很大的勢力，所以我不得不略加以較詳的敘述。至於最近中社會主義的運動如何發達起來，要在次講中說出。

第十七講 英國社會主義

三 社會主義運動之最新的發展

現在英國國會內有一工黨，他根本上在職工界也有他的黨羽并且占議席四十二。這可說是英國職工已自經濟的移為政治的活動麼？這就是表明社會主義已大形侵入英國麼？如要判斷這問題，便得先觀察目下英國所有的社會主義的組織與所謂工黨（Labour Party）。

(A) 社會主義的組織

(1) 費邊協會 (Fabian Society)

這費邊協會創立於一八八四年。他是由新生命同志會 (Kameradschaft des neuen Lebens) 中產生出來，這同志會又是一八八二年以來成立的一個研究會。他的目的蓋欲集合一切欲自研究社會改革的人物於一堂。他跟着社會主義的傾向走，并在他的綱要中會標明他的究竟目的：「他把土地與個人資本從私人所有中改爲公共所有，藉以努力改革社會。」在這協會的創立者中有本哈·蕭 (Bernhard Shaw) 與息德尼·衛布 (Sidney Webb) 諸人，此外在其主要代表中尚有可稱述的是：希德蘭 (Headlam)、皮斯 (Pease) 與馬克洛赫替 (Maccresty)。這個組織體并不是德國社會民主黨那樣的政黨。無寧可稱他爲一種科學的研究會。他用以研究并宣傳社會主義的思想；他的會員係自一切階級的人民中集合而成。這費邊派却不欲自成一黨，但也許願意用社會主義來渲染一切政黨，他們并不自創一個黨的機關報，却喜用社會主義的思想供給一切黨派的新聞紙，他們欲藉講演、小冊子、及其他宣傳活動，使愈多數的人了解社會主義的問題。

這費邊派所主張的社會主義去急進者所主張以完全廢除私有權爲究竟目的的實在遠極。他們把上述他們的綱要的第一原則作這樣解釋：即他們贊成把相當的採用社會主義的方法，來經營的那些工業資本，而加以集產化。這些集產的經營，尤其爲人民的一切生活必要之安全計，應該先向原料生產與

交通手段而着手。所以費邊派很活躍的替國家社會主義與都市社會主義作宣傳，並且尤其主張麵包、牛乳、瓦斯、水、煤等，由國家以及都市來供給，其次則主張鐵路以及其他交通手段之地方化。他們極力宣傳強毅的工人保障政策、八小時工作日，並且主張由都市長官方面確定最低的工資率。他們的主要政策與策略，有多少和法國可能論者相似，並且關於拒絕各種階級鬥爭政策，與關於贊成依社會改革的途徑逐步漸進的辦法，也是和他們相一致。這費邊的名稱也就是出此，他們的格言說：「吾人得期待一個機會，像費比阿斯（Fabius那樣）容忍的反抗漢尼拔（Hannibal），不顧一切人罵他的遲緩；但是如果時期到了，便當認真起來打去，也像費比阿斯那樣做法，否則寧可徒然無功的老等着。」

我們從費邊派在一八九六年對於國際社會主義者大會所提的報告中，可以看出他們的讓步性質，他們的期望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相妥協的政策。他們在那宣傳書中要求把英國憲法完全依照民主政治改造起來，并把工業這樣的改造起來，使人民的生活品之供給完全不受制於私人的資本主義。他們顯然承認私人經濟的經營在特種工業中實有長處。在費邊的個人主義（Fabian Individualism）那一段中有云：「賦予個人以關於考察新發明品的社會價值，輸出改良的生產方法進行公共的企業等自由權，使他們為新的社會需要着想，以自行獨立的運用其一切力量與才能，簡單說起來，把生產的活動與私

人的直覺之來源加入於公共經營之中，以補充社會組織，這種自由是費邊協會所尊重的，一如一列人民自由權中之言論、出版以及其他項目之自由。

費邊派反對信條的性質也顯然表示出來：「他們堅認對於馬克斯與拉薩勒有取批評態度之必要，因為馬克斯與拉薩勒的見解在現在已不免半視爲錯誤，或且老舊的，猶之這兩位有名的社會主義在他方面也會批評他們的前輩如聖西門與歐文等的見解。」

這費邊協會現在有二千會員。因爲他的重心點不在於實際的政策，而在於科學的啟蒙，所以他直接對於社會運動的影響很少；但是他的巨大的間接影響却是不可否認。英國方面的公意所以從曼徹斯忒的見解轉而漸行重視社會改革之必要，大半蓋出於費邊派的努力。

(c1) 社會民主協社 (Social-Democratic Federation)

社會民主協社適與費邊協會正相反，他是一個分明根據馬克斯主義的階級鬥爭黨。

一八八一年倫敦方面有幾個急進的俱樂部創立了民主協社 (Democratic Federation)，一八八三年改組爲社會民主協社。他們的首領是奧德曼 (Hyndman)。奧氏意在利用這黨替馬克斯主義進行工人運動，該社堅決的主張政治的及社會主義的活動，并且認工會的策略是錯誤的。他的綱要是嚴格合

於馬克斯主義。其主要部分中係標明生產手段與交換手段之社會化，并把工人由資本家階級及地主階級中完全解放出來，作為其究竟目的，并且把社會主義解釋為資本主義的發展之必然的結果，把企業家階級與工人階級間的階級鬥爭解釋為這發展的以後的結果，這也都是完全依據馬克斯主義的。工人階級對於資本家執行沒收財產的行為被認為解放上最終的手段，至於現在綱要中更臚列一些要求，這是該黨即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內所應實施的，例如：一切間接稅應行取銷，十六歲以下一切兒童應受免費的國家教育，法律上應定最低工資率，君主制與現存軍隊應行撤廢。奧德曼於一九〇四年在倫敦所發表的言論「社會民主政治」，根本上包含共產主義者宣言的摘要。其中認明社會主義為經濟發展的一種必然的生產品。

「社會主義是一種勢所必至的生長物——」在先儘有人抱着少數人聯合起來從世界的殘局中解放出來的理想；但是在競爭的制度中生那種大衆衛護個人、個人衛護大衆的社會主義團體理想却不能出現於太古共產主義時代。因此，我們斷定這社會主義是人道主義逐漸發展中所成一種不可避免的宿命論，所以我們應幹的，是估料正在發生的現象；估料了之後，就得感受他，不當推想他，我們在估料或且理解之前，就已感受著。」奧德曼希望藉他的政黨能夠仿照德國社會民主黨喚起一種偉大的英

國工人運動，但他的希望終不得實現。該黨幾乎對於英國社會主義運動不生影響。他們的實際政策的效力是渺乎其小。該黨在本世紀頭十年中約占一二、〇〇〇黨員。一九〇六年提出八個候選者於國會選舉，但沒有一個獲了選。

與德曼之外出來做該黨的首領的是刻爾赤 (Quelch)。該黨的機關報叫做正義 (Justice)，許多英國工人領袖與社會主義者曾一度屬於社會民主協社。他們或因原則上的立腳點相去太遠，或因認該黨的策略不合於英國情形，由是都脫退出來。

威廉·摩立斯 (William Morris) 和與德曼都算是該協社的創立者，到一八八五年他脫退出來，創立社會主義者同盟 (Socialist League)。他接近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甚於接近馬克斯主義。一八九〇年他復從社會主義者同盟中脫退出來，該同盟遂完全停頓。——還有兩個很有勢力的工會首領本斯 (Burns) 與曼 (Mann)，先也屬於社會民主協社，後也脫退出來。本斯總是愈和自由黨接近，一八九二年得了該黨的援助竟獲選入了下議院，一九〇五年他以閣員的資格投入自由黨坎普柏爾·班涅曼 (Campbell Bannermann) 內閣。——對於英國工人運動，比方才上述的黨，發生遠為巨大的影響的是……

(c) 獨立工黨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社會民主協社在羅致工人階級時候，所收微細的效果，實造成創立一黨的動機，這一黨自始即想不求黨員堅奉特種理論，却只與各派的黨徒以加入的可能性。他尤其注意的：是羅致那些在國會中或屬自由黨或屬保守黨的工會，却不推行一種獨特的工人政策。

哈第 (Keir Hardie) 於一八八九年在他的故鄉蘇格蘭 (Scotland) 會組織了一個小小的獨立的工黨，現在對於新黨的創立，尤其熱烈的參加着。

在一八九一年及一八九二年的工會大會上，才初次詳細討論一種一般的，由各工會負責徵收的捐款，作為創立與維持工黨上必需之用。一八九三年由是創立獨立工黨 (I. L. P.)，該黨對於工人政策生有特定的影響。當時故意加該黨以「獨立的工黨」的名稱，蓋不欲因此使工會畏不加入也。該黨往往拒絕階級鬥爭并且主張一種妥協的政策。因此他也把許多平民分子結合在內，這獨立工黨在其綱要中顯然稱為社會主義黨，凡援助該黨的原則與政策，而又不屬於保守黨或自由黨的社會主義者都可以加入該黨。

該黨所認為目的的是：設立一種社會主義的國家，在裏面所有資本與土地都歸社會所有，并供團

體之利用，即是交換也是以團體爲本位，由是人人各得了儘量優良的生活維持之保障。該黨綱要舉出下列的作爲接近這目的的手段：如法定的工作日，設立市有與國有經營以役使失業者，國家給與五十歲以上的人人以補助費，酒類小賣業改歸地方所有等是。——該黨的重心與其寄於社會主義的究竟目的，無寧寄於社會改革的動作。他因爲和工會發生密切的關係，所以不得不取這機會主義的態度。他愈想適應單獨英國的關係，又因爲合作社的與工會的工人運動一向收了極大的效果，所以他極力聯合合作社與工會推行實際的現在政策。這獨立工黨的領袖哈第有一次對於政策有說道：「在二十年前，當社會民主協社創立時候，英國的社會主義方始初次接受一種有組織的形式。他的創立者在當時做了一件錯事——這當然是一種自然的錯誤，蓋他們不特要由大陸，尤其要由德國輸入社會主義，甚且要從那裏輸入特種的信條、章紀、及宣傳方法，這些都是適合德國的政治狀況，事實上在這國內也是不可少的；但因爲英國方面有完全不同的社會、經濟、政治諸狀況，所以是絕對的移用不得的。其結果，這種運動只得極微的進步，直到一八九三年才創立了獨立工黨。這黨自開始以來卽想在與工會處於極密切的結托之下，從事活動。他并不壓抑或且輕視工會、合作社以及機會等的運動，却對這些取同情的態度，同時并指出他們在方法上不以足解決社會問題的理由。」（見社會月刊，一九〇五年十一

卷第一號第五二九頁

同一作家在一九〇三年八月北美評論報 (North American Review) 中發表有一論文名曰不列顛政治中新因子之聯合工人 (Federated labour as a new factor in British Politics)，他說：「加入的會員人數現在是一三、〇〇〇，其中智識階級和富人階級占了很多，他們都看社會主義爲解決社會問題的唯一希望。」哈第在那裏公然反對階級鬥爭。他在工人領導報 (Labour Leader) 中那篇名叫反對階級鬥爭的一句話 (Ein Worth gegen den Klassenkampf) 中更有激烈的言論反對階級鬥爭，他說：「工人階級并不是階級，他就是國民自身。從這點看來，把他牽引下來落在兩黨僅爲政權而作鬥爭的水平線上，不啻是降抑社會主義運動的身分。我們無需有階級意識的社會主義者；我們只需有意識的社會主義者。男男女女得知他們的社會主義是什麼，爲什麼他們是社會主義者。……社會主義是對一種制度，不是對一個階級宣戰；我們因要促進社會主義成功，所以無階級的差別，把一切有意識的社會主義都收羅起來，此外我堅決的認階級鬥爭與階級意識之存在適足以害社會主義的運動。工會運動如視雇主與工人爲兩個利益相反的階級，而認兩者之繼續存在爲其運動的前提條件，那末上述這幾句話也足以糾正他；但因爲社會主義極力想把各階級溶化爲一個人類的家庭，所以這些口號不外

是社會主義信仰中之一部，所以只好在應用社會主義的原則於近世產業界時候，才用這些口號來啟發他。」（見社會月刊，一九〇四年第十卷第十一號第八九二頁）——他在該論文中自認爲逐步的社會改革之信徒，而反對馬克斯主義的革命信條：「階級鬥爭理論所根據的主要思想就是說：社會主義是革命性，並且只有藉革命方才可以實現，所以用公開鬥爭的手段以強制推翻有產階級就是他們往往看在眼裏的目的。由是看來，凡由政府提出的改革都只想掩蓋階級鬥爭的本性，並想保障有產者社會之長在。連這兩原則我也不能同意。說社會主義是革命性，這是確不可移的，但謂他只有藉武力的突破方才得到勝利，却不是真確的話。我不承認實行改革（只是）出於這樣齷齪的動機，在這等改革行爲中占着重大勢力的，還有一種正在長大的社會的良心。試把兒童工作來說：我們在此事上，實見有產者定下的種種法律，比無產者所要求的還超過一層，姑無論無產者於改訂法律中想得到的是占便宜，而有產者想得到的是吃虧。我可以想到一件件的改革案都爭到了手之後，結果在前年取得了愛爾蘭的地主；而社會主義并不引起較大的激昂。大凡革命背後沒有民意存着，總不會有效果，如果這民意起來動手，那末依我們所見了的，他可以打穿私利的牆壁。——事實上，階級爭鬥所因之而形成的全部前提條件，在現在已老舊、失效了。」（見前著第八九三頁）

他在所著該黨宣傳品一切爲着他 (all about it) 中有宣言：「我爲避免人的誤解計，所以還要添幾句話說明獨立工黨固然堅守着社會主義的高尙理想，但他也知道這產業的制度連同他的巨大的財富及他的救濟方法并不死於衝峯之刃下。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面，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得按進化的方法而前進，而現存的制度，却也是依這方法而創造出來的。所以獨立工黨的煽動者不特在本黨內，并且在都市各團體內設法把一切注意力移用在實際的改革上面。替學校兒童設備食饈、替失業業者取得工作、替老年人取得補助費都是這種進行的實例。」

關於獨立工黨的其餘活動，我要連同工黨 (Labour Party) 報告出來。哈第於工黨的創立尤與有大功，因爲把一切社會主義的組織和工會結合起來成爲一個政治的總機體，這正是獨立工黨的這位領袖所常常懸爲理想的。

(B) 工黨 (Die Labour Party)

因爲要把由工會及社會主義的各種組織提出的議會候選者選舉加以組織，於是乃有工黨的創立。自一八七四年以來工人已有代表在英國國會內，當時有麥克·唐納爾 (Mac Donald) 與柏特 (Burt) 以所謂工人代表的資格被選入國會。這些工人代表是自由黨的黨員。并且凡其選舉費與薪給都是全部或

且半部分由一種工人團體擔負的議員，人都稱爲工人代表，這些工人代表往往出生在某種有良好組織的工業所集中的地方。因爲有時甚至工會提出一個候選人，社會主義者又提出另一個，而爲選舉目的而出現的委員會又提出第三個，由是很希望造成一種共同的選舉組織。及一八九九年——是年已有十五個工人代表在國會內列席——快要新選舉時候，在工會大會議決了一個議案，委託他們的國會委員會，召集一個工會與社會主義團體的聯合大會，把工人的政治代表加以組織。一九〇〇年二月舉行成立大會於倫敦，參加者有一百二十九個代表。這些是代表約有五〇〇、〇〇〇會員的六十七個工會與約有二三、〇〇〇會員的三個社會主義團體。於是議決，組織一個委員會稱曰工人代表委員會 (Labou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工會應選出七個委員，獨立工黨與社會民主協社應選出二個，費邊協會應選出一個。但各團體的獨立性却不得因此而受損害，不過互相競爭的候選人之提出應加廢止，無論何時應與工會以提出他們的自由黨的官吏爲候選者的自由權，并准社會主義者團體以提出他們的會員的權利。工人代表委員會所取這種中立的政治上無色彩的態度却不得社會民主協社的同意，該社自始即想把這種結合改造爲一種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組織。該社方面曾兩次提出一種動議，賦與工人代表委員會以一種社會主義的綱要，及該動議受了兩次拒絕之後，該社遂於一九〇二年脫出委員

會。其時接受這動議，似乎完全不可能，因為結合的目的是把兩不相屬的工會與社會主義團體聯合在一起。這工人代表委員會係合三五三、〇〇〇工會與二三、〇〇〇社會主義者而成，當一九〇〇年選舉時候由工人代表委員會提出的候選人只有二人獲選，并且一個是鐵路雇員工會的總秘書柏爾（Richard Bell），他是得了自由黨的助力而獲選的，一個是哈第。及一九〇二至〇三年新選舉中尙有三個候選人獲選。自一九〇三年以來，該黨得了一種新組織。現在嚴厲的通過了一個原則，即委員會所提的一切候選人與官吏不應與自由黨或且與保守黨相結托，也不得促進這二黨的利益。其次一切候選人得用「工」字做黨名，由於這原則，這工人代表委員會遂改爲工黨了。——依新的黨綱，工黨應爲一種結合，他係合工會、社會主義團體及各地方的工黨而成。黨綱的最重要之點是如下：「黨的目的是促進候選者的選舉，這些候選者是由加入的各團體提出的，他們應負責在國會成一特殊組織，在工人問題中有其固有的領導者與固有的政策，嚴厲的不與自由黨或且保守黨，或且他們的利益相結托，並對於黨中提出的候選人不加反對。一切這些候選人得許諾把黨綱做準繩，服從議會中工黨支部的議決案，並在選舉者面前，只能自承爲工人候選人。」

工黨却故意不提出特種黨綱，他尤其不願爲社會主義黨。所以全部黨綱中不說到社會主義。——

工黨却要守中立，只要對於代表工人利益的候選者予以選舉的援助。他的在國會的黨員中有幾個會明白宣言他們不是社會主義者。他們在一九〇八年哈爾（Hull）黨大會上，以極弱的多數通過的那議決案中，還是堅持不變這方針；該議決案是主張：生產、分配、與交換等手段之社會化，并應用他們於民主國家內，以利全體之用；次則把工人由資本家與地主的統治中完全解放出來，并實現兩性在社會上與經濟上的平等。」這議決案并不主張馬克斯主義的社會主義；該工黨的最重要的理論者麥克·唐納爾在他的作品中却激烈的表示反對馬克斯主義的信條、反對唯物論的歷史觀、反對滅亡的理論。麥克·唐納爾是達爾文進化論的一個信徒。他有一次說：「社會主義不外是經濟界上的達爾文主義，是應用在人類社會的進化條件上的達爾文主義，是凝結為一種政治理論的達爾文主義。」社會主義者的口號不應復為「階級意識」，當為「共同意識」。社會主義不應造成鬥爭與糾紛，他得使「互助的法則」發展起來。因此工黨應為一種社會化的，不應為一種社會主義的黨，他的任務是預備社會主義，是強制推行社會改革的工作，增加工人對於國家生產收益的參與權，逐漸實施政治的與產業的民主主義，逐步把現存的經濟組織歸為全體的所有與控制，求使社會逐漸接近社會主義。工黨并不是個別的分子的結合，乃是各團體之同盟；只有合作社的、工會的與社會主義的團體可以加入這同盟。——英國工

會中一大部分都加入這同盟；但有幾個有名的工會，例如鑛工團體——當時已有六個代表在國會，其初并未曾加入。麥克·唐納爾曾把一九〇七年的工黨情況述之如下：（見社會月刊，一九〇七年十三卷第二號第八三〇頁）

社會主義者工黨等（二〇〇人？）
社會民主協社（七、〇〇〇人）
費邊協會（一、〇〇〇人）
工黨 獨立工黨（四〇、〇〇〇人）
工黨（一、七〇〇、〇〇八人）
社會主義

在一九〇六年選舉時候，有二十九個工黨黨員被選了，其中十六個社會主義者，其餘是工會中人。此外尚有十二個鑛工代表，他們後來都加入工黨。洛特士泰因（Rohstein）對於這次選舉結果有下述的談論：「我們然則可以說選舉的結果是一種工會政黨之成立，該黨蓋用政治手段促進工人的本職上的利益并且選擇這些手段時候并不關顧任何一切中等人民政黨。這分明比之前世紀末的工會運動是一種進步，可不待再加解釋；但使閉着眼睛不認、或且蒙着心不明，說他還只是一種工會的、還未至

社會主義的運動，却是極其愚策。」（見一九〇五至〇六年之新時代“*Neue Zeit*”第七九一頁）社會主義者布拉特福（*Blatchford*）在號笛（*Clarion*）中也有相似的代表道：「……如果我們認選舉結果爲工人政治家的，那末我們儘可以表示滿意；但是我們以社會主義者的資格所感謝的却只很微，有幾個社會主義者固然占了勝利，但有幾個却落選了。在不成功的中，尤爲社會主義者所不滿。與德曼、哈特力（*Hartley*）、刻爾赤（*Quelch*）、與霍布孫（*Hobson*）——一切都是堂堂正正的自認爲社會主義者，一切都被打倒了。……要使羣衆理解社會主義，還須費好幾年的極苦工作，這是很明瞭的事實，并且要遮蓋，這事實似乎是一種犯罪行爲。我又明白真正社會主義者的最高尙的義務是在攻擊自由黨。在自由黨與社會主義者間如有似實的結托或且友情，便不能有所謂社會主義。」（見前著第六六八頁）

在一九一〇年選舉時候，有四十個工黨黨員被選了，其中有二十六個社會主義者；但社會民主協社派的一切候選者及一切獨立的候選者都落選了。即這次選舉結果也表明工黨理論的勝利，因爲他不是根據馬克斯的那種社會主義，乃是一種工會合作社的黨。——由於獨立工黨與自由黨之密切的結合，足見英國國會內并沒有一種具有目的意識的社會主義的代表團或且一種主要的代表團來代表工人

利益。新時代對於一九一〇年的英國選舉會有深切的報告；現在要就這報告中摘取其幾項給你們看，你們由是可以窺見所謂工黨的選舉如何受了社會主義的雜誌的批判：「試把工人候選者所因之而成敗的條件加以研究，便見得，他們只有在對方只提出一個候選者（并且對方所提的還限於保守黨員，如果對方是自由黨員，他們就提不出）以與他們對抗的地方，方得了勝利。但在對方有兩個中等階級候選者（一個自由黨員，一個保守黨員）的地方，他們便告失敗，并且在此類二十八個地方中，有二十四個地方給自由黨占了勝利。這是關於只選一個議員到國會，或且只選兩個的選舉區。再看工人候選者在前次選舉及補額選舉中，屢在這種三角式競爭中得了效果，那末吾人不能不斷定他們這次固然不是全用，却也主用自由黨的助力，才能够占了四十席。選舉者——以及工人選舉者——所以投了他們的票，至少因錯認他們為自由黨員，如果同時因為有了正式的自由黨候選者，選舉者便不至錯認了他們，而棄了他們不選。……

「工人候選者在選舉中所取的態度和自由黨員所取的，竟有如是相差之甚麼？他們中間有幾個管自稱為社會主義者，但他們的綱要在各點上猶如一隻蛋，好似自由黨綱要那樣圓通。他們亦認預算案及自由貿易為很重要，即在地主問題亦不主張過於激烈。……工黨的首領在該黨不提出候選者地方

——即在社會民主黨員或且獨立的社會主義者奮鬥的地方——到處發出援助自由黨員反對世仇保守黨員的口號，因此他們引起他們的徒黨對於貴族發生重大的敬畏，由是他們的徒黨即在自由黨提出候選者以與工黨候選者相抗的地方，還是投自由黨員的票。因此，工人竟把自由黨員自完全的墮落中救了出來，但對於工黨却不啻予了一個打擊，……國會的黨支部中有大多數在精神上完全被囚於自由黨的，即社會主義者的少數派也採機會主義的政策在後面追隨自由黨。過去四年中國會的歷史會把這事完全證明。如應舉行示威運動時候，便委托哈第這一流人，從事社會主義的演講；如關於行動的時候，便聯同自由黨前進，而社會主義者也是這樣做法。在這種精神的屈服之外，還有一種物質的；他們在物質上所以也屈服於自由黨，實因為凡工人取得一個議席——如我們所述——都是藉取自由黨的助力或且即藉着自由黨的招牌。這就是說工黨如一旦被追而認真對自由黨取攻擊的態度，他就不免失却一切他的議席。（見新時代，一九一〇年第八〇六頁、八〇七頁、及八一〇頁。）

工黨領袖中有一個名叫斯諾登 (Snowden)，曾在每日新聞 (Daily News) 中宣布關於他的黨的言論如下：「工黨不希望陷政府於困難之境，或則只顧黨的利益，利用新形勢，以危害進步的改革；工黨是達到改革目的的一種工具，他并承認改革的事大於黨的事。……現在的形勢是一種困難而周折

的，并且不堪施以一種強毅的壓迫。政府絕對不能適應任何種種極端的要求，姑無論工黨有意提出這些要求。……但工黨并不是無理性的，他承認政府的地位很有困難、很受限制，……因此我們當然有『兩角論法』(Dilemma)。還是犧牲一部分獨立性，以取得直接可能的好呢？還是藉獨立的行動以取得的東西恐足以引起政府的辣手手段的好呢？我個人不想表示這二種策略中那一種於我認為較好。……我只要能達到多少必需的改革的目的，我就很願意犧牲巨量的自由，以促成宣傳的議決案。『這位痛快的工黨領袖歸結說：「政府會製有一個實際的、科學的及政治家的計劃以抵抗失業(意指當時已允許的失業保險提案)……并且工黨也願意予政府以一般的援助，作為正當而誠懇的嘗試之代價，他願意把一切實際做得到的提供出來給政府，務使科學的施設能多少緩和最重要的貧困問題。』(見前提第八一一頁)新時代對於這演辭有說道：「這是工黨中一個最出色的領袖說的，吾人由這幾句簡簡單單的話中可以看出政府不用十分畏懼工黨。」(見第八一一頁)

一九一〇年因解散國會而舉行的新選舉對於這種結論，絕不生一點變動的影響。工黨的議員人數已自四十人加至四十二人——而自由黨與工黨還在屢相援助。社會民主協社的唯一正式候選人與德曼，因為採取急烈的支隊煽動而引起人的注意，遂又失敗，并且所得的票比之正月中還少。

如謂由於工黨創立之後，從前英國工人政策中遂發生根本的變動，這是再錯沒有的見解。工會的運動依舊是工人運動中主要的因子，并且工會中人根本上推行的還是從前那樣實際的目下政策，并且依然緊隨着自由黨。所變動的，無寧是自由黨對於工人問題的態度。自由黨在最近已愈其放棄舊日的曼徹斯忒政策，并且現在多主張社會改革的政策。

試瀏覽工黨在國會內從來的行動，便見得，他所提出的要求完全是社會改革派與國家社會主義者的。這也都是數多中等階級政治家所主張的要求。工會的分子在工黨內還在占優勢。一九一〇年該黨係合一、四七五、〇〇〇個工會會員，與三一、〇〇〇個社會主義者而成。哈第曾在一九一〇年社會月刊的一篇論文中說到工黨：「該黨的政策自始是大陸各國稱為修正派的，并且現在還有不出其中發生何種變動。」他在論文中復列舉該黨在立法上的各點貢獻。根本上如下：工黨的一提案——這也被通過了——是用公款設立學校膳室供給二五〇、〇〇〇人學童；其次也成了法律的提案是：在重工業中設立工資局；又次是：在制定養老金、災殃保險等法律時候該黨要求參加，該黨又設法用國幣替失業業者尋覓工作。依我們所見，這些一切都不是社會主義的要求。因為該黨採取這種態度，所以社會民主協社每每稱工黨為反社會主義的。在每次年會中，社會民主協社總是發表言論。劇烈的攻擊獨立工

黨，攻擊工黨受了他的影響而採用的這種政策。一九〇八年大會席上有一個黨員宣言道：「如果我們加入了工黨，我們恐不免衝突了我們自己的原則；又有一個黨員以為該黨沒有一種黨綱，却反有三十種黨綱。與德曼在一九〇九年英國國際社會主義評論報（International Socialism Review）中發表一篇論文，名叫社會主義與工人主義（Socialism and Labourism），其中說道：英國工黨現在是予我們國內社會主義的進步以極大的阻礙。」

人如因此不能稱工黨為社會主義黨，那末其意也暗謂英國工會正因為大多數已加入工黨的關係，所以還是完全未進於社會主義的壁壘。即從最近的工會政策中看來，也不能斷定他們已進於社會主義的壁壘。工會現在固然不復推行那種只顧專門工會利益的工會政策，他們在最近中固然想逐漸感應社會改革的政策，但這不是社會主義的，如我上面所述，這無寧是關係於他的漸重社會的活動，然而這種活動即在自由黨裏面也可以窺見得出。工會依舊守着工會不願推行政策的立腳點；他們即使推行政策，也不是獨立的進行，却和自由黨密密的聯絡着，而自由黨在最近中當然也愈主張親近工人與社會改革的政策。至於工會表示主張法定的八小時工作日、國家的老年保護、以及其他類似的法律，這只能說是社會自由主義（Socialliberalismus），絕不能像孫巴特所說的，說是共產主義。

現在舉行職工會大會時候，猶如從前那樣，每年由一個神父或且牧師來致演辭，由官廳來致祝辭，這等大會的討論案即在最後幾年也不露社會主義傾向的紋跡。一九〇九年伊普斯威赤 (Ipswich) 地方的大會由縣長致開會辭；他於辭中表示希望會中的討論能有利於企業家與工人。又有一個演說者在會衆的盛大的采聲之下，致祝辭，他以為工會實希望企業家與工人互助攜手，不應互相攻擊。——在討論失業問題時候，大會明言完全相信對於這問題所取的態度，而大會的主席沙克爾吞 (Shakleton) 對此也說道：「政府於此行其第一道實際的步驟，以關除現代社會的最大劣況。我們對於這些提案將予以誠懇而同情的觀察，大會儘可以確信本國內有組織的工人之地位依然完全保得牢，不然我們恐怕不能予這些計劃以同意了。我們須記得採取這種行動的政府不啻是從工會的書中摘錄其一頁。」

在一九〇八年諾定昂 (Nottingham) 大會席上討論到國家的老年保險法的問題，這法自一九〇九年以來，即在發生效力。即這種國家的立法也受了盛大的歡迎。大會的主席還說工會委員會對於這種社會改革的大方策，自始即表同情。即在一九一〇年瑟夫飛德 (Sheffield) 大會席上也宣言，工人問題向來很少（固然總有過）能引起了比現政府閣員更強的注意。

工會在最近所以進而從事較重大的政治行動，也是關係於內部工會政策中的幾樁事件。所謂這幾

椿事件我還要簡單的報告你們聽。

第一，是塔夫·未爾(Taff Vale)的事件，一九〇一年七月國會對於塔夫未爾鐵路的事件通過一種對付鐵路工會的議決案，遂危害及工會的不負責任與其全部罷工權。罷工，佈崗被視為不合法，由是受了法庭的處分；兩個或且多個的工人如協議對於一個企業家採取非賣同盟的行動，便被視為暴動。工會在民法上被宣布為對於其職員之不合法的行動應行負責的團體，並且在法庭上應負損害賠償的責任。這種判決無論如何實促使數多工會加入於工黨，他們加入的用意在於希望因此對於這種法律狀況之廢除，發生較大的壓力。事實上，在一九〇三年的開會期中，工黨方面曾提出第一次職工辯論法案(Trades Disputes Bill)，並且由於一九〇六年的法律，由是該目的——即從前的法律狀況之廢除——竟被達到了。

其後發生奧斯本案的判決，——其經過如下：工會應用其一部款項以達政治的目的，即用以援助特種政策。已經好幾年了；到了此刻，這種權利却被褫奪了。當時鐵路工會的某地方的小組中有一祕書，名奧斯本(Osborne)控告他的工會的領袖，說他們根據工黨的黨章向他的會員每年徵取一先令以供議會中各種目的之用。法庭於是依據原告的動議，下了判決。最後尚有上議院本其司法的特性，

宣言反對工會。由是工會與工黨同陷於極劣的狀況之中，因為工會如其此後推行政策仍與工黨立於密切的關係，那就不得再以議員俸給援助被選的議員并不得為選舉故徵收特種費用。由是他們不免任憑自由黨來擔任一切費用，由是益形其隸屬於自由黨；不則他們就得放棄政治的活動，并對他仍照從前那樣謹守中立，由是工黨的幹部從前找了一條出路：即將來在下議院中的工黨黨員不復負服從黨的上級機關的議決案。由是工人的代表或且復得保留他們的個人的自由，工人或且也復變為一種相對鬆動的團體。這種作用的真意蓋藉此以希望關於工會得以補助費給與自由的（即對於黨的服從不負保障義務的）議員的這種法律能得政府的許可罷了。不管政府對於這問題如何解決，即就工黨歷來的發展看來，可知多少人希望於此造成一種團結的社會主義黨實在很幻想的。——依歷來的閱歷所給我們的教訓看來，一般工會總不會十分拋棄其非政治的性質；即關於他們所推行的政策，也不是依階級鬥爭政黨的形式而活動，仍然密切的附和着自由黨。

結果，我們如照陳述法國社會主義運動時候的辦法，要問英國社會主義運動中到底有否發見一致的傾向，或則換句話說，到底英國社會主義運動是否逐漸入於馬克斯主義的航流，那末依客觀的批判，不免比對於法國的運動還要下更堅決無疑的否定論。再沒有比馬克斯主義更為非英國的，他絕對

不能在英國土地上着根。英國的工人運動猶如法國方面一樣，他也是適應國家的特殊條件而生的，英國工人尤其希望推行平易的實際政策，并且只願給可以達到的目的所驅策。較多的工資與較短的工作時間，這都是他所重視的利益之點，由於這原因，所以英國工會運動會有如是顯著的發展，而真正的社會主義運動却幾乎毫無成績可言。獨立工黨與最近組成的工黨只有犧牲其真正的社會主義原則，以實施可以達到的目下要求，即只有站立在社會改革的境界上，方才能夠取得多少效果。

第十八講 德國社會主義

一 斐特南拉薩勒

來比錫市劇場於一八四一年七月十九日排演斐斯科 (Fiesco, 戲劇名)。聽衆中有一個是來比錫商業學校十六歲學生，他很興奮地看這表演，回家之後寫道：「我現在固然擁有革命、民主、共和等觀念，但我猶之一般人一樣也自知有這麼一回事；不過我却覺得我如站在伯爵拉發格那 (Laragna) 的地位，恐怕也是這樣做法，并且還不止單願做熱那亞 (Genoa) 的第一個市民，甚且進而探手取那王冠。使我生來是王子或且公侯，恐怕我生死都要做貴族論者。但是因為我不外是個平常的市民子弟，

所以當這時代要成爲一個民主論者。」

把這幾行寫在日記裏面的就是斐特南·拉薩勒(Ferdinand Lassalle)。這幾句話最足以表現這位在德國站在最初次社會主義運動首領地位的人之性質與觀念。

他記上述這本日記的時候，是做北勒斯勞(Breslau)地方馬格達勒能高中學校(Margdalenengymnasium)的二年生；隨後在來比錫做商店學徒；這本日記後在一八九一年給林道(Paul Lindau)發行出來。如果你們要深識這位特別的人的心理，就請諸位念這本日記。

在這位精神飽滿的煽動者的一生事業中，往往發見種種矛盾。他的一生是爲解決無產者而奮鬥，但他在表面的行動上却和他所欲解放的階級不大契合。

晚間當着幾千工人面前舉行他的動人的社會民主的演講的是拉薩勒；日中喜歡和社會的「上流人物」交際并且設法仍與他們常常接觸的也是這位拉薩勒。在政治的及個人的事件中，他就往往表示援助「上等階級」中有勢力的人物，至於他如何致死的那種貴族的氣派——他的死是死在和拉科威察(Rackowitz)的格鬥——簡直和他在民衆演講中所表民主思想不相契合。

現在若觀看他的個性，便容易解決這謎：他自少即充滿着熾烈的虛榮心與無邊的自負心。他永遠

不能把事業由個人裏面分開，又因為他無論如何要處領袖的地位，并且要即在他生時眼見自身站在社會改革的首領地位，所以如果一切所有的手段似乎允給他以多少實現，他的虛榮計劃的功效，他就不管一切立刻利用起來。

他的猶太的血統的確於他的性格之形成，生了極重大的影響，當他少年時，猶太人在德國所受的壓迫，實刺激他到極端，因此他同時要把猶太人由政治的與社會的特殊地位中解放出來，要把第四階級由經濟的壓迫中解放出來。他十五歲時候，即寫在他的日記道：「唷，如果我做我的未來的夢想，那末我最喜歡的是手裏拿着武器站在猶太人的前鋒之列，把他們獨立起來。」

他有一次嘗夢想得一個愛人，同她坐着六馬駕的馬車，進入柏林就共和國的民選總統的任，於此可以窺見他的虛榮心；他又有一次把他在巴門（Barmen）（一八六三年）舉行的演辭告訴給另一個情人道：「我當時所引起的電磁的影響，實不能使你對之得個近似的想像；全城的人、全州的人竟然浮現在烈感的風濤之中。」於此又可以窺見他的自負心。

俾斯麥在國會中（一八七八年）有一次曾說到拉薩勒，他把拉氏的優點與弱點說得非常痛切；他說：「他具有一種使我以私人資格非常感動的特質：他是我一向所接觸的人中最精警最可愛者之一，

他是一個大虛榮的人，他絕不是共和論者，他實具有一種極其鮮明的國家思想與君主思想，他所推求的理想是德意志帝國，我們於此實和他相同，拉薩勒是大方的虛榮者。到底德意志帝國究竟以霍亨索倫皇室結合，抑或以拉薩勒皇室結合，在他也許還很疑問，不過他的思想完全是君主主義的。」

用動人的雄辯才與極其巧捷的煽動力在德國喚起一種可資稱述的社會主義運動，固然推拉薩勒為第一人，但你們却不能說在他以前德國絕不知所謂社會主義。但只能說拉薩勒以前的德國社會主義，或則只具有理論的性質——當時只有幾個超羣的社會主義理論者——或則和他發生關係的社會主義運動實不足以遺留較大的影響。

當時社會主義運動就是所謂那種煽動行為，尤其是在四十年時候為威廉·威特合 (Wilhelm Weitling) 所推行的那一種。威特合之外還有赫斯 (Heus) 與格隆 (Grün)。他們設法傳播的思想根本上却是從外面輸入進來的。他們尤其想照法國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的方法活動。當時大工業與工人階級尚未占勢力，所以所謂社會主義無寧是一種手工徒社會主義 (Handwerks = burschen-Sozialismus)，當時完全沒有一大批的工人階級，可以給煽動行動做根據的。

我所說的德國偉大的社會主義理論者是約翰·哥特利布·斐希特 (Johann Gottlieb Fichte) 與

約翰·卡爾·洛德柏圖 (Johann Karl Rodbertus)。

斐希特在他的一八〇〇年出版的作品鎖閉的商業國家 (Der geschlossene Wandelstaat) 中，主張國家嚴厲的干涉經濟制度。因此，他的實際的提案，主張國家爲工商業故而收容人民的力量，只限於現有的農人所能給養的程度。他方面，農人、工業者與商人對於他們的職業的經營却享有絕對的權利。此外國家應行規定一切物價，並且還當以不可少的生活品(麥、燕麥等)爲規定物價的標準。

洛德柏圖也是像斐希特，主張國家社會主義。他也不是社會主義煽動者，他也不曾實際參與工人運動，他是學者，並且把他的社會主義制度寫在科學的作品，尤其寫在他寄與啟耳喜曼 (Kirchmann) 的社會尺牘 (一八五〇年及一八五一年) 中。

洛德柏圖以爲貧困與商業恐慌的原因在於工人不能獲得他們的工作的全值，却只得了一小部分。因爲土地私有與資本私有的關係，工人由一切國民收入中所所得的不外必需的維持費而已，至其所餘的全部化做地租與資本利潤都落在地主與資本家手中。這種微細工資的結果也就是商業恐慌，因爲技術方面日有新的改良，由是生產量逐漸加增，至於大批工人的購買力依舊薄弱，由是生產品不免賣不出去擱在那裏。

洛德柏圖并不主張土地與資本之公有立刻起來代替這種法律制度。他却相信在以後的未來中，約在五百年後，共產主義社會制度的時期方才到達，暫時只好要求現有的法律制度與社會主義間能得一種妥協。目下應加施行的提案的所有根本的內容是如下：國家不得把工作工資與商品價格之規定委諸自由的貿易，應該制定一種範圍廣徧的價目表，把這規定權收歸掌握。價格不應像現在這樣照物質貨幣而定，應照工作貨幣而定。爲達目的故，各業內應確定一種定時工作日及這定時工作日中的定量工作；就是一切商品與勞役的價格也是依這定規的工作時或且工作日而定，計算商品的價格時候，不只計及直接使用的工作，并且根據耗費的情形計及工具的價值。因爲工作的生產率有種種變遷之不同，結果同量的定規工作在不同的時期中，所生產的品物也有多少之別，所以國家得按照時期，修正他的價格表。

爲使工作貨幣底於流通計，國家應保留發行這種貨幣的權利，給與工主以此等貨幣的信用借款，并設立國家倉庫貯存商品以換取工作貨幣。依洛德柏圖的見解，用這些方策替勞動階級爭來的利益大半在於保障他們獲得國家總收入中之特定部分（例如十分之三）。目前勞動階級的收入雖然在逐漸增進的工作生產率之下，還是退守在必需的維持費的水平線之上，將來勞動階級的收入恐怕與資本、利

潤以及地價同程度的加增起來。

斐希特與洛德柏圖的作品在社會主義思想史上固然有如是價值，但其對於社會主義運動，簡直不會有影響；反之拉薩勒的思想却有很大影響。

就是拉薩勒本人也是比較的很遲才從事運動。及一八六三年以後，即自德國一般工人協會 *Alle meine deutschen Arbeitsverein* 創立之後，他方開始替社會主義作實際的政治的宣傳，但是這種宣傳還經不了二年，因為在一八六四年拉薩勒即死於上述的格鬥之中。

在說明拉薩勒社會主義的特性以前，要簡單的給他們描寫他的一生歷程。

拉薩勒在一八二五年四月十一日生於北勒斯勞；他系出那裏一家猶太的商人家庭。其先進入他的母城的高中學校，十五歲以後往進來比錫商業學校。他的這次遷學并不是因為——如一般人所臆斷的——他違反本意，由父母作主預備進入商人階級；是為他在學校犯過，所以不能在北勒斯勞證住。他在來比錫決意把他的一生致力於學術的研究。自一八四二年以後，則在北勒斯勞及柏林先研究語學，次哲學，并且計劃完成一本較大的作品以研究哲學家赫刺克力特 (*Heraclit*)。一八四四年出去旅行，在巴黎證住較久；及一八四六年回到柏林之後，認識伯爵夫人哈次飛特 (*Hatzfield*)，他於是用計策

援助她的年久不決的離婚案。——當一八四八年革命爆發的那時候，他在杜塞爾多夫住，因他實伴伯爵夫人哈次飛特到那裏去；於是加入民主黨並且在馬克斯發行的新來因新聞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中幫同工作。因為他要求武裝反抗的組織以對抗加稅，於是以挑撥反抗公共的權力被控，但陪審人却說他無罪，拉薩勒為這案會草了一篇辯護辭，隨後用陪審辭 (*Assisenrede*) 的標題貫世；這演辭在當時却未被演過，因為拉薩勒受了法庭禁止發表的判決，所以放棄了辯護的宣傳。——在第二次被控中，却被判處監禁六個月。到了一八五七年，還住在杜塞爾多夫；隨後移居柏林，因為已得了洪德德的介紹，蒙普魯士王的許可，在那裏居住。在這裏完全他的作品赫刺克力特的哲學；後來繼之以史劇夫藍次·豐·息輕恩 (*Franz von Sickingen*)。

在一本小作品意大利戰爭與普魯士的任務 (*Der Italienische Krieg und die aufgabe Preustens* 1859) 之後，出了 (一八六一年) 巨大的法律哲學作品既得權制度 (*Das System der erworbenen Rechte. Eine Versöhnung des positiven Rechts und der Rechts philosophie*)。

在後此最後的生活期內，即在一八六三及一八六四年內，他才單純替馬德國一般工人協會從事鼓吹。

拉薩勒是黑智爾哲學的一個信徒，並且在他的一生中都是本這種哲學觀念的精神而活動着。他歸斷史的現象蓋出於思想之發達與其運動。他以為法制是史的精神概念之具體化。他尤其藉古代哲學與古典哲學之研究而形成了他的唯心論的見解。他知道很工巧的把黑智爾的辯證法用在他的經濟政策的努力之上。他完全照黑智爾的本意，而認哲學為思想運動（辯證法），為概念的總匯，其中每一概念會涉及次一概念，再把這次一概念推離出來，猶如他自身由前身的概念推生出來一樣。

他認國家為堪以實現社會理想，並且正式形成一種國家信仰心。所以他的言論與文學的基本特徵是唯心論的，並且他總是宣言國家是適當的機關，足以實行他所期望的改革。

我對你們所述的還是極其有限。等到他對羣衆發表演論及文字的時候，他就把一切這些思想都表示出來了。在他寄友人，尤其寄馬克斯及恩格爾的尺牘中，却顯見他抱有別種思想。讀他的尺牘的人只覺得他內心裏實與馬克斯的唯物史觀較為接近，好像他也願意引用馬克斯的策略——即國際的階級鬥爭——，如果只有依急進的、革命的途徑才可以較快的達到目的。如果你們要正確的批評他，要了解他自身所含的種種矛盾，那末你們就得盤算拉薩勒實有這種首尾兩端的病。他自己在寄與友人的信中也公然說出：凡人在政治的宣傳中不免有所隱藏，有所掩蓋，決不能到處表示他的實在的意見。

現在我要略述他對於一八五九年的意大利戰爭所取的態度，以作表示他的這種特質的例。他在討論此事的小冊子內會簡單的草就綱要，主張先行利用這機會以謀德意志的統一，他以為，在奧國占有獨立的世界地位的期間內，德意志的統一便是不可能，所以他以為，得先破壞奧國，并宣言，藉什列斯威·好斯敦之解決，以接收這國家的任務，在普魯士方面時期已經到了。在這小冊子的結論中有寫道：「這次戰爭也就是德國人民與普魯士的生存利益，德國民主黨應該在這次戰爭中握着普魯士的軍旗，并且應當利用陶醉的愛國心爆發時候所生的發展力，把當前的一切阻礙都打倒了，這愛國心自五十年來實抑鬱在人民的心裏抽搖而顫動着。」

在這小冊子的好意的讀者看來，必定覺得拉薩勒實際懷抱的德意志國家的任務是撲滅哈布斯堡皇室以促成德意志的統一，因此他根本上主張站在俾斯麥政策的旗幟之下；不過所不同的是：他於此主張德國援助民主政治而已。

但使我們把這小冊子作為研究寄與馬克斯的信的基礎，就曉得上述的主張和他的實際的意見所處的關係何在。由這些信中，可知他推薦這種方法時候，實有一個假定，即這條路不會給政府走的，他希望政府不走這條路，由是他可以證明政府不願意走這條唯一合於民意的途徑。他希望這樣的揭發普

魯士政府可以增進革命的潮流：他蓋指示與政府以一條國家的而且合於民意的途徑，在抽象上政府儘可以走得過去，在具體上他却完全不會走，又因為他確信普魯士不會走這條路，遂希望因此得個方法使政府根本上失了人心。

然則他所以攻擊對外宣戰者，就是要播君主與人民間不信任的種子！由於這理由，他也推崇息輕恩，他在寄與馬克斯尺牘中曾有一次描寫息輕恩優於胡騰（Hutten）的實際。息輕恩把外交的最後目的隱藏起來，這種態度正可以表明他的優處，所以拉氏說：「在這種狀況之下，革命領袖如欲使他的超越的實際的智能達到勝利的地步，似乎得採用現有有限性的手段，對於他人（有時甚且對於自身）却得把真正最後的目的祕而不宣，唯獨有意的詐欺統治階級，甚至利用他們，才能夠組織新的力量，由是即藉這一點兒的現實以戰勝全體現實。」

拉薩勒屢在寄與馬克斯的信裏反覆叮嚀的說着，使他確信他的這種「革命的」思想：「我的文據與論文在證明我自一八四〇年是革命家，自一八四五年是決心的社會主義者。」

今假定拉薩勒確把他的真相暴露在寄馬克斯與恩格爾的尺牘中，并且實際上用他所推薦的方法，蓋欲加強革命的勢力，然而他對於馬克斯總有很大的差別，因為拉薩勒想着德國國民革命，而馬克斯

却代表國際革命的立場。

但我在此的任務不是把拉薩勒的真意推研到刻心入骨，我却欲提出一個問題：拉薩勒利用他的公開的活動，對於羣衆發生什麼效力？這問題的答案只說：他的煽動適與馬克斯立於正反對的地位，他主張的是唯心論的、國家社會主義的、社會改革論的立場；這適與馬克斯所定唯物的、反國家的及革命的綱要相反。

在他的煽動工作中，在他的爲煽動目的而發表的言論與刊物中，屢屢反覆陳說他從前在學術的作品中所表示的那幾種基本思想。

這些作品的內容不是國民經濟學的。拉薩勒並不是原始的國民經濟學思想家。他的唯一的國民經濟學的作品——巴斯提亞·叔爾策或經濟學的朱理安 (*Bastiat Schutzi oder der ökonomische Julian*)——在他死前不久方才發表，並且表明拉薩勒在經濟學方面完全是個折衷論者。他對於利息、工資、地租、價值等理論，尤其一方面受了馬克斯、恩格爾、洛德柏圖的影響，一方面受了法國社會主義者的影響。其實這些理論早已給前人用較佳較動人的說法表示出來了。

拉薩勒的草創的貢獻却在於哲學界與法學界方面。他在這兩境界內——依極有權威的專門家之批

判——實創了永久價值的創作貢獻。尤其是他的赫刺克力特哲學 (Philosophie des Heraklitos des Dunken von Ephesos) (柏林，一八五七) 與他的法律哲學作品既得權制度 (System der erworbenen Rechte) (Leipzig, 一八六一)。在這本法律哲學作品中，已可以窺見他所根據的幾個哲學觀念，因為他的社會主義理論概是以此為標準。

拉薩勒在那裏是從這種思想出發，即凡根本研究法律的人結果必定斷定：研究所有權、承繼權、家庭契約等範疇沒有好結果，必定說：羅馬的家庭概念又是一種不同於日耳曼的，總而言之：法律原屬於歷史精神的法律，所以他不應研究邏輯的永遠的範疇。所謂法制不外是歷史的精神概念之具體化，不外是各歷史的民族精神與各時代的精神內容之表示罷了，所以不外是個法制而已。

至於所謂既得權，則拉薩勒以為：個人所以能夠藉他的行為、他的片面的或且雙面的契約，保護自身或且他人的權利，唯獨限於現存法律承認這種權利內容為合法的而已。因為法的唯一來源是全民族的、一般精神的共同意識，所以如果現存的一種法制——例如奴隸制、服務、捐稅、信託贈遺的承繼行為等——因了這種共同意識之變動而被撤廢；到那時候，就不能說什麼既得權受了如何摧殘了，我們也不能承認對此有要求賠償的權利。個人實不能在各時代中，對於一切未來的、壓迫的而且制限

的法律宣言自主，并且個人所要求的自主權不外是要求：在制限的法律不許這自主權存在時候，還要繼續保存其既得權。

拉薩勒於是把他的法律觀念應用到承繼權。他以爲：羅馬的承繼權是由羅馬民族精神的不朽論中產生出來的；古日耳曼的承繼權則根於下述的觀念：即財產的所有者是家庭，并非目前的占有者。在我們現代中，這些舊觀念都不存在了，所以承繼權也得改造了。現在的承繼權實根據「家庭是國家機關」的概念，根據「國家的公意調節遺產」的概念，現代的自然權并不是法定承繼權（*Instaterecht*），也不是遺書承繼權（*Testamentrecht*），乃是「社會調節遺產」。

在這本作品內，有一地方已可以使我們明瞭認識作者的社會主義的傾向。拉薩勒在裏面把一切法律史在文化史上所經的過程加以這樣的解釋，即：私人的所有範圍將愈受限制，一切品物將愈脫出私人所有之外。最初不受私人意向爲轉移的是神聖的品物，但是人類自身尙是他人的所有對象。關於義務部門的法律已有如是的多的限制，他也把所有權削除了許多。拉薩勒於是再引伸他的這種思想而歸結道：「從社會的關係看來，現在的所有物既不復爲他人的直接所有了，然則他是仍供他人間接榨取之用；這就是說：自己的工作力之自由的活動與發展到底是否擁有工作基金與工作墊款（合而言之，

即是資本）的人之完全私有物，又這工作價值（就是資本保護金、資本利潤）原是由生產品的售價、工資的總額與一切（以及精神的）工作的酬給（無論如何工作總是促成生產品的原素）中間所有的差別形成出來的，然則將來他人的工作價值之所有，除開給與精神的工作以報酬之外，應否仍屬於所謂企業家；現在的世界正在研究這個問題。」

拉薩勒嘗於一八六二年，在奧朗尼恩堡（Oranienburg）市外的手工工人協會中講演「工人綱要，論及目前的歷史時代與工人階級的觀念之特別關係」。他在演辭中，嘗依每時代中的支配階級以分別各時代。最初造成中古的支配原則，復把那時代的一切制度都加以薰陶的就是貴族或且地主的觀念。這時代歸結於法蘭西大革命；他所對而讓步的新時代却把大市民的財產或且資本做他的原則，更把這財產化做特權。在一切社會的施設中都有這特權的存在，並且擁有特權的人對於國家意向與國家目的皆握有指定的參與權。

在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四日，新的歷史時代之曙光爆發起來了，他實把第四階級的原則提高起來，作為社會的支配原則，並且就用這原則來薰陶社會中一切施設。

「但是」，拉薩勒說下去，「在第四階級統治時候，立刻就有無限的差別；即第四階級是社會裏面

最後、最極端的無產階級，他在法律與事實方面不但不擁有獨占的條件，不擁有貴族地位、地皮或且資本；并且也不能擁有牠，因為他擁有了牠，便會把牠形成爲特權而輸用於社會的一切施設中。」

他又用動人的辯才，對着工人喊道：「第四階級的心紋內絕不含有新的特權之苗，所以第四階級就是和全人類同其意義的。所以他的事件實際就是全人類的事件。他的自由就是人類本身的自由。他的統治就是人人的統治。」

「然則誰若本着我對你們說的這意旨而宣稱工人階級的觀念爲統治社會的原則，他就不發一種呼聲，以離開與分裂社會的各階級，他發的無寧是妥協的呼聲、是包羅全社會的呼聲。」

他在這次演辭中已經指出國家的任務是在實現工人階級的這種規定。「這是國家的本來的德性，是他的真正而較高尙的任務……工人階級，以及社會中諸下等階級分子因爲常處在困窮無援的狀況之中，所以他們的本能已深深地感覺：提高第四階級的正是國家的目的，而且只能算是國家的目的；因此工人階級，以及一切下等階級應該把各分子團結起來，助他們的這本能發展起來，達到各個人所不能達到的地位。」

拉薩勒付印的這篇演辭却被柏林警廳沒收了，作者却被控爲「挑撥無產階級的恨心并且藐視有產

階級的人格。」判決書斷定四個月監禁；但拉薩勒向柏林上訴院上訴，結果徒刑改為罰金。

拉薩勒所發極其巧捷的辯護論却印出作為小冊子，第一集用科學與工人 (Die Wissenschaft und die Arbeiter)，第二集用，間接稅與勞動階級的地位 (Die indirekte Steuer und 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n)。這二集中只有一部分宣讀於法庭，拉薩勒在裏面，遂把他從前在演講中關於下等階級所受間接稅的壓迫，再加詳說，并且援引國民經濟學者的許多言論與統計的材料來證實這事。拉薩勒還設法證明：一切間接稅的收入不只能各依資本與收入的關係，以加擔於個人身上，甚且其最大部分是由無產者付給，其次這種稅正是有產者用以替大資本家取得免稅特權而加社會中較貧階級以國務負擔的一種機關。

及一八六三年二月十一日來比錫地方舉行召集，德國工人大會的中央委員會 (Zentralkomitee) 請求拉薩勒把他對於工人運動，尤其對於替無產階級設立的叔爾策得力次合作社 (Schulze-Delitzsche Genossenschaften) 的意見用他認為適當的表述形式表示出來，於是拉薩勒就藉這機會把他的理論的思想加以實際政策的形態。

他於是發表公開的回答書 (Offene Antwortschreiben)，把他的原則陳述出來。這綱要遂成為

德國一般工人協會的基礎，而這德國一般工人協會（Allgemeinen Deutschen Arbeiterverein）却就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最初的組織。

拉薩勒在他的公開的回答書內開頭即勸告德國工人階級自行組織起來成爲獨立的政黨，創立一個德意志工黨以對抗進步黨。工人階級在立法的團體內有了代表，方才能夠滿足他的政治的利益。

就社會問題來說，那末叔爾策得力次合作社、信用協會、墊款協會、原料協會、以及消費協會等都不外是姑息手段，他們不足以徹底的改良工人階級的狀況。誰要徹底的改良這個，應把現在供給與要的支配下的經濟律先予以撤廢。這經濟律就是工資律。

拉薩勒遂把所謂「工資鐵律」（Chernes Lohngesetz）詳加陳述，這工資鐵律在他以前已經被屠耳哥（Turgot）與李嘉圖（Ricardo）類似的形成出來了；但在這裏却被作成爲社會主義綱要的基礎。這工資鐵律在目前的狀況之下，實支配工人工資，他就是說：平均的工人工資依然永遠回歸於必需的生存維持費，這維持費在一民族方面通例是維持生存與傳留子孫所必不可少的。他不能持久的高過這平均率，因爲工人的狀況如果較易較佳，工人結婚與工人繁殖便也加增，由是工人的人口以及工作力的供給便也加增。這麼一來將把工作工資復抑到他的從前的立腳點以上，或且以下。工作工資也不能十

分降落在這必需的生活維持費之下，因為到那時候便發生出外移殖、不結婚、避孕，最後還因困苦而減了工人的人口，這個又復減少工作力的供給并且把工人工資又復提高到從前的地步。

這鐵律的結果是：工人不免享用不到因文明進步而加增的生產率，這就是說他免不了享用不到加增的工作收入額。德國工人階級欲自這可憐的狀況中解放出來，只好他成爲他自己的企業家，工人自己占有財產，由是把自己由企業界中解放出來，拉薩勒由是提議工人應心願的自行組織生產協會，國家應藉信用貸款，予以援助，這并不是社會問題的解決，却是預備解決的過渡方法。

要迫使國家從事這種干與行爲，得先爭得普通直接選舉權，拉薩勒認這目的的到達爲德國工人的最大的政治任務。

有人責備拉薩勒說他的計劃不外鼓起一八四八年巴黎國民工場的觀念而已。這種責備實在毫無根據，因為據我們的觀察，拉薩勒并未曾提議用這工場以實現工作權利。拉薩勒的計劃與我們上文所說二月革命時代，路易·布郎克所主張那種擁有國家信用的工作協會，其間確也有多少相似之點。但布郎克走的路比拉薩勒走的遠了許多，布郎克式的協會不外是偉大的社會改革計劃之一部。其次布郎克的協會應隸屬於一個中央經理處，而拉薩勒却只提議設立自由的、個人的協會。

拉薩勒在他的一生的最後期間，即在一八六三年及一八六四年中，則幾乎完全替德國一般工人協會作宣傳。

至於拉薩勒和俾斯麥（Bismark）所行屢次的討論也是在那時代。

兩人在反對進步黨上有一共同的接觸點，並且俾斯麥想利用拉薩勒以施他的對付自由黨攻擊的政策。

兩人的討論根本上糾纏着拉薩勒的兩條主要綱要：普通選舉權與生產合作社。

俾斯麥固然多少主張普通選舉權，並且也想小試生產合作社，但他於此絕不走入拉薩勒的徑路。

俾斯麥所以採用普通選舉權，并非因為他要促成工人階級的解放，却是因為他要利用牠以確立國家的思想。依他某次和亨利·微拉德（Henry Villard）的談論中所表示的，他實認普通選舉權之絕對的必要為「建築國家的水門汀，為壓抑我們的幾個小君主與小國家所抱領士離心力傾向的手段。」

俾斯麥於一八六四年春嘗勸普王威廉，給予西利西亞織工人以六千乃至八千塔勒（Taler），試行創立一種生產合作社；但這不外是一種慈善行動，却和拉薩勒用他的生產合作社以達深遠的社會改革的目的，絲毫沒有關係。

在拉薩勒看來，德國一般工人協會的發展却是一種大大的失望：他原來希望這協會在最短期間內有一〇〇、〇〇〇會員，其結果雖經一切動人的鼓吹，却不過有四五千人集合在協會的旗幟之下。

拉薩勒死後，德國一般工人協會因為首領間激烈的爭端而削弱了勢力：固然會員的數目增加起來——在一八六七年選舉中該協會曾集四〇、〇〇〇票於他的候選人身上——，但是有力的、一致的、熾烈的協會鼓吹都不復見了。

當時一切都照拉薩勒的計劃做去。柏克 (Becker) 也好，士威策 (Schweitzer) 也好，夫里策 (Fritzsche) 也好，都不能把拉薩勒創立的協會持久的支持下去。

不久便有較強的勢力出現，結果把拉薩勒在德國工人運動中的理想完全放棄了。

於是拉薩勒的理想與計劃都破壞了：他的最重要的國民經濟學的基本學說——工資鐵律——猶如他的實際的提案——擁有國家信用的生產合作社——現在社會民主黨內外都被完全放棄了。他所要求與他所達到的唯一的是普通選舉權。但其實現也是根於其他的動機，絕不是由於他們所虛擬的動機。

然則拉薩勒自身所得的悲慘的運命，適為他對夫藍次·豐·息輕恩 (Franz Von Sickingen) 預言巴爾塔薩 (Balhasar) 的……

「最可怕的不是你們倒了，

最可怕的是你們倒了時候，

竟沈沒於打不倒的未用力量之倍當中，

——這是好漢最難消受的打擊。」

不管一切這些的失敗，而拉薩勒的活動不惟在工人階級中並且在我們的全部公共生活中所生的那種意味，却是非常之大。

在拉薩勒活動的時代，即在前世紀五十六年時候，全國各階級直到最富有教育的那一流人對於國民經濟學只有極少的興味與了解。或且完全不理這件事，或且即把英國與法國方面輸入進來的那曼徹斯特學說大加推許。及拉薩勒出現之後，大批的學者方始注意到社會問題的價值，並且許多的人都抱這種觀念：即替工人採取法律的方策，乃是國家的任務。

也許近世德國社會政策的立法，在實施上，還是和拉薩勒的計劃相去很遠；但是在許多點上是間接由他提倡的；尤其是那種基本思想：即國家對於「自由的工作契約」如不採干與的態度，那末工人階級在文化上之提高，是不可能的。

直到現在工人對於拉薩勒——雖然他的觀念在政治的工黨方面不復爲主要的——，却保有一種感謝的紀念；他們還在裝飾這位第一個工人運動組織者的北勒斯勞墓上的墓碑，墓碑上刻有考古家柏克（Böckh）的字句道：

「這裏休跟着思想家兼奮鬥者堤特南·拉薩勒的屍體。」

第十九講 德國社會主義

二 卡爾馬克斯與修正派

在德國一般工人協會創立的那一年，即在一八六三年，在來比錫地方也組成了工人同盟（Arbeiterbund）。這同盟是由進步黨提倡的；所討論的工人問題也是根據自由個人主義的見解。

這工人同盟中一個最活動的分子是奧古斯特·貝柏爾（August Bebel）。他漸把這同盟拉入社會主義的潮流中，直到一八六八年該同盟竟公然皈依國際勞動團的原則，一八六九年這工人同盟遂和德國一般工人協會的從前會員合組為社會民主的工黨（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partei）。

於是除了根據拉薩勒的觀念而實現的最初社會主義組織之外，還有第二個社會主義組織。

根本上使貝柏爾的意見變動的，是威廉·李布克涅喜特 (Wilhelm Liebknecht) 他是卡爾·馬克

斯的一個熱誠信徒，他自四十年末以來即同馬克斯在共產主義者同盟中本着國際的社會主義而活動。

馬克斯的精神現在侵入德國社會運動中，馬克斯主義者不但能夠把拉薩勒觀念的勢力完全打退，並且能夠在德國根據卡爾·馬克斯的原則創立一個直到現在還是團結的、一致的工人政黨，而且保持他。

人家如察見拉薩勒與馬克斯的個性，則幾乎找不到一種對立比他們兩人間的對立還大。

拉薩勒的性質是熱情的、無定的、虛榮的；馬克斯的性質却遠為鎮靜，他柔韌而堅忍的注重一個特定的目的。

拉薩勒向來不能把人物的關係分開，馬克斯却完全不顧及他的個人。他只想藉不倦的精神的工作以鑄成他認為在無產者的解放奮鬥中所必需的武器。

拉薩勒個人形式上在他的鼓吹的活動中鼓舞着，馬克斯却恬靜退藏的從事科學的工作，却把一切國際工人運動的總綱握在手裏，並且極其精細的推究與開發他們的進展歷程。

拉薩勒在科學的工作中的貢獻甚為破碎，並且用獨創的見解以增益許多科學。馬克斯有一次寫道：「爲生產的關係，我不專攻一門，却兼攻四五門的學科，」——他固然在人類所知的一切學科中都得有知識，但只專攻一門，就是政治經濟學。

依上文所述，拉薩勒在國民經濟學上是一個折衷論者，而馬克斯却認「經濟」爲一切社會進化的推動力，所以他於此實做下極特異、極深造的研究。

現在成爲三四卷的那本資本論是我們這學科中大名著之一，連對於這本書的基本思想表示不滿意的人也得承認。

我甚且相信世間很少的人認馬克斯的價值論——這價值論貫穿全本書猶如一條紅線——爲國民經濟學在理論上所得正確的根據。第一卷與第三卷在這一點上所有的矛盾是這樣大，連馬克斯價值論的許多從前信徒對之也很灰心，有一半的人設法這樣的解決這些矛盾，即他們只認全部價值論爲一種「思像」，經濟生活中絕沒有實際的事件可以用這「思像」解釋清楚的。

但是人家到底是否承認價值論，這都沒有關係：資本論自身實充實經濟理論的、經濟史及經濟政策的種種觀念，並且成爲國民經濟學識的寶庫，無論何人——即使那人不想把全部書材所因之而改造

與別選的片面視察點擁為已有——也可以由這書裏面取得極其豐富的教訓與興奮。

馬克斯并且到處採取材料——他不僅和古典時代及古典以前時代的經濟著作家等接近，并且向專論英國社會狀況的藍皮書中採取其極微細的材料。

求拉薩勒與馬克斯的原則持久的合用在工人運動中是不可能的，所以拉薩勒的思想如其不出頭，馬克斯的便定出頭；你們如其想到這兩個社會主義者所主張根本不同的宇宙觀，便見得上述這二點是不可避免的。

拉薩勒到死還是黑智爾派弟子，馬克斯是站在唯物史觀上面，所以兩人實不能融合為一。

拉薩勒說：工人運動得了特定的觀念而進展，這特定的觀念却就是時代中「民意的精神的內容」；馬克斯却反過來說：「理想的」不外是經濟狀況的反應。所以不能說，工人階級的「理想」，或且任何一種其他「理想」可視為社會運動中的推動機；吾人得由生產關係的實際發展中認出那些完全不受人的理想所左右，却與自然力同其形成為新組織形式的傾向與力量。

要觀察馬克斯與拉薩勒在社會哲學、與社會經濟學上的見解之根本不同，那末最豐富的材料莫過於一八七五年馬克斯寄與德國社會主義者布刺克（Bracke）的信。當時要想把馬克斯派與拉薩勒派結

合起來成爲統一的政黨，并且根本上是使兩派的主要原則互作讓步。馬克斯在這封信內嚴厲堅決地反對這樣的融合。這封信在一八九一年那「新時代」的年度內，用社會民主黨綱要批評 (Zur Kritik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programm) 的標題印行了。

你們先聽取馬克斯攻擊拉薩勒經濟學理論的主要言論，即攻擊工資鐵律的言論。

馬克斯用極嚴厲的辭句，反對工資鐵律，并且斷定拉薩勒的根據不外是馬爾薩斯 (Malthus) 的人口論，「如果人口論是對的，我就不能取消這鐵律，并且我所以屢次撇開傭工不說，就是因爲這律不只支配傭工工作的制度，并且支配各種社會制度，五十餘年以來的經濟學家正都是站在這立場上面，他們已經證明社會主義不能撤消，只能輕減自然的痛苦，同時他只能把這痛苦，攤派在社會的全面積上面！」

他稱拉薩勒之作這律是可怒的退縮行動。這律在一八七五年的妥協綱要中還受了收容，到了一八九〇年修正社會民主黨綱要時，竟被徹底的抹殺了。

有人因見馬克斯與其徒黨這樣的攻擊工資鐵律，由是以爲這是證明社會民主黨對於我們的社會狀況之批評漸取較溫和、較樂觀的態度。人以爲，這就是承認社會主義者即在現存的社會制度之下，也

可以達到改良工人狀況的目的。總而言之，人以為工資鐵律之放棄就是表明親近改良的那一派在社會民主黨中戰勝了從前得勢的那急進派，其情形適與此相反。工資鐵律之放棄蓋表明急進派在社會民主黨中占了勝利。

首應說明的是：馬克斯與恩格爾先已主張一種工資論，其內容和所謂工資鐵律幾乎同一。例如恩格爾在一八四四年在他的國民經濟學批評大綱 (*Murissen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ökonomie*) 中曾定了一原理，即「工作力之自然的」，即常規的價格適與工資的最低限度相合或且適與工人在生存與傳種上所絕對必需的生活品等值。即在共產主義者宣言中，還是堅持這工資鐵律。其中對於傭工作有說：「傭工作的平均價格是傭工的最低限度，這就是用以維持工人生存所必需的生活品之總和，然則傭工人藉他的力量而取得的僅足以再造他的赤裸裸的生活而已。」

馬克斯後來所以改變了見解不是因為他對於工人的傭率狀況漸取樂觀的態度，是因為當他打算在資本論中系統的建設他的理論時候，他已取得新的理論的認識了。他在那作品中已經定了一種新的、和工資鐵律完全不同的工資論。

我在第九講中已經把馬克斯的最重要的理論陳述出來了，並且言明馬克斯的價值論與剩餘價值論

并不顯然含有工資鐵律的意味，馬克斯却把產業預備軍的法則作為這理論的基礎。——你們由前幾講中已經看出馬克斯對於工資高度是否表示上升的、下降的、抑或均衡的傾向，却認為支節之事，因為他以為工資構成時候，所關係的只是經濟生活的第二事實。他認為主要問題還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自身，至於他到底是和高價工資抑或和低價工資相結託，實在都沒有關係。因此，不應把工資律放作前提，因為即使工資上昇，然而資本主義榨取的其餘一切事實却依然存在。馬克斯由是在上述的那封信內寫道：「傭工作制度是一種奴隸制度，并且其殘酷適與工作之社會的生產力所發展的程度相和，姑無論工人獲得較佳抑或較劣的酬備。」他又說道：「等到我們的黨內漸漸明瞭這見解之後，再回頭說到拉薩勒的信條，但有一事不可不明的，即拉薩勒并不知道什麼是工作工資，却跟着平民經濟家亂說，把事實的虛像看做真相。」

「其情形好像，在揭破了奴隸制的祕密，起來革命的諸奴隸之中，有一個株守老舊想像的奴隸在革命的綱要上面大書特書道：『奴隸制度得加以撤廢，因為諸奴隸在奴隸制之下所得的贍給不能超過某種最低限度！』」

在我陳說馬克斯的理論如何影響及德國社會民主黨以前，先要加入一段關於馬克斯的價值論與剩

餘價值論的短評。

工作價值論的缺點似乎在於：把所謂「工作」作為價值標準；其實無人敢假定，如何能够把各種人的工作歸元而為一種平均工作。其次，假定這是可能的，并且還可以是一切花了的生產費都歸元而為工作量；但是這理論總是錯誤的，因為最後決定商品價值的，並不是用在製成商品上面的工作量，也不是其他的耗用；最後規定商品價值的，乃是商場，這就是消費者的需要，就是商品購買的需要。歸結決定的，還是商品的使用價值。

根據這價值論而成的剩餘價值論完全是錯的；因為馬克斯只是牽強附會的把工作力當作商品，工作力並不是商品；所以他的價值并不能歸元而為工作費。縱使這是可能的，但其中還有的確的錯誤，蓋馬克斯假定商品的價值可以由工作小時的某定量中表示出來，而企業家支付給工人的定量却只一部分。其實工人所貢獻的與其工資因此而得的，都是不外於製成物品時所盡某種協同工作。至於這些物品到底能否取得價值，與其取得的價值達到何種程度，這却關係於市場的狀況、關係於需要與供給的狀況、關係於商品的適用性。企業家把產品賣出後所得的收入到底能否抵得住，如何抵得生產費，抑或超過生產費，抑或抵不過生產費，這却關係於這位指揮生產的企業家之巧捷而僥倖的投機。然則

所謂工人藉其工作以製造完成商品的價值的這理論却是完全錯誤的見解。

但是這價值論全部并不決定馬克斯的社會主義制度，換句話說：無論他是真確還是錯誤他絕不能證明馬克斯社會主義的主要思想之真確抑或錯誤。

也有許多社會主義者，反過來站在主體的價值論上面，而認價值是由商品的使用性指定的。例如我在上文所述的英國費邊派就是屬於這一派。事實上莫明其妙的是：爲什麼人家不從使用價值論的立場出發而抵抗社會主義的結論；就是說：爲什麼人家不指出一切經濟的活動結果是關於購買者的意與、關係於市場的偶然景況，因而主張計劃的組織經濟生活。反過來說，也許人家儘可以認馬克斯的剩餘價值論爲真確，但他却不至於皈依社會主義。誰如謂，資本人家因犧牲了工人而取得的剩餘工作是維持文化生活上所必需的；那末他雖然承認剩餘價值論，却可以說是個人主義者。

作爲馬克斯社會主義見解之標準的理論就是我在上文所述那三種：集中論、貧困論與恐慌論。這三種理論都被收容在一八九一年厄耳福特綱要裏面：集中論見於厄耳福特綱要的下述幾句中：「平民社會的經濟發展必定自然的至於小經營之滅亡，……小經營化爲大經營的一切利益都是給資本人家與大地主獨占去了；這種變化在無產者與墮落的中等階級——小市民、農人等——方面，無寧是增加他們

的生存之不安定，增加痛苦、壓迫、虐待、侮辱、榨取等等。」

該綱要關於恐慌則有下文：「有產者與無產者間的深淵，將因資本主義生產法所特有的恐慌而加大，這些恐慌將愈其擴張、愈其殘酷，他們將把一般的不安定提高而為社會的常態并且證明現在社會的生產力已經長過社會的頭上了，生產品之私人所有已經和生產品之合於目的的應用與其完全之發展不相契合了。」

至於馬克斯如從這立場出發，那末他對於拉薩勒所提出生產合作社以及國家信用貸款的辦法所不得不取的態度，你們自然容易推想得出。馬克斯即對於此點，也是較為急進的。他永遠不想即用這社會自身的手段和機關以改造社會；因為拉薩勒的生產合作社是即在自由競爭的社會內建設的；但依馬克斯的見解，得先除去自由競爭的制度，然後才能築成新生產制度的基礎，其次這些合作社之設立得用國家的助力，但自馬克斯看來，國家自身却是社會中支配階級的代表，因此馬克斯在上述討論綱要的那一封信中對於拉薩勒有極端反對的表示道：「不由革命的改變社會的過程中，『成立』所謂一切工作的社會主義組織，却『借助於國家』，國家所援助的是生產合作社，『促成』這生產合作社的却就是國家，并非工人。因此拉薩勒才有那種幻想，主張可以用國債來建設一個新社會，猶如用他來建設一條

新鐵路一樣。」

信中又說道：

「全部綱要雖然一切含有民主政治的音韻，却是完全中了拉薩勒派臣服的國家信仰之毒，換句話說完全是中了民主政治的奇怪信仰之毒——這也不見得比前者好些——，或則是這兩種奇怪信仰間所作一種妥協論，其去社會主義却同其相遠。」

馬克斯又嘗攻擊拉薩勒在指揮工人運動中所取國家的立場，其激烈的程度和他攻擊拉薩勒的國家觀念相等。馬克斯劈頭卽已是認社會主義爲國際運動。

拉薩勒派與馬克斯派因爲在原則上有這種意見的參差，所以兩派不免至於顯明的決裂，其中總有一派占了勝利。

一八七五年的哥塔綱要是兩派因之而合併的一種妥協綱要，并且合併的黨名是德意志社會主義工黨 (Sozialistische Arbeiter partei Deutschlands)。所以在這綱要內，除其他外，還可以尋見工資鐵律與擁有國家信用的生產合作社。

但是拉薩勒的理論逐漸退後：馬克斯的理論却在黨內逐漸得勢。——德意志社會民主黨 (Social-

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的新厄耳福特綱要在各點上所以承繼馬克斯的各種觀念，也不外是上述事實之必然的結果而已。

因為馬克斯總是要求工人實行政治的階級鬥爭，所以社會民主黨對於德國各邦及德國國家所作一切社會政策的努力，都是取消極的或且直接的反抗的態度。由於這理由社會民主黨也不贊成德國工人保險法，姑無論這法律替工人階級的狀況會致有物質的改良，該黨有一次會說這些一切不外是姑息小手段，完全拔除不起苦況的根苗，因為他相信在這社會內製造下來的各階級與各機關是使國家與企業家對於工人握着過大的實權。至於社會民主黨所以急於加入議會以製作工人保護律，并提出許多自立議案，他的真意并不是說藉這社會政策的立法，能夠廢除經濟的劣況；他的真意蓋欲藉此助使工人到了解放那時期成爲一個儘是健全的，不因過渡的工廠工作而至退化的階級。

德國社會民主黨自拉薩勒的勢力消滅之後，不特在這問題，並且在他所討論的一切政治問題中，都是謹奉馬克斯主義的信條。今若細加推證，未免說到太遠。至於馬克斯學說的特性在於何處，我在本講中業已反覆說過了。現在我只能說到這一層，德國又是唯一的國家，能使馬克斯學說在統一而團結的運動中表現出來。這當然不能證明，那裏并未見有糾紛、爭執與意見的參差；但就是由就這些零

碎的爭執之中出現這大黨，其對外還是一致而團結，成爲整個的黨。卽所謂修正派（Revisionisten）對於這黨的原則所作那最巨大、最劇烈的攻擊，自表面看來，至今還不能動搖該黨的一致。

所謂修正派是什麼東西呢？這個名詞的第一次應用見於某社會主義著作家名諾息喜（Dr. Alfred Nossig）的一篇論文名叫社會主義之修正，其中把社會主義的，就是所謂馬克斯主義的理論基礎，加以批評。惟是修正派的全部運動并不和這篇少受注意的論文相關，却與本斯泰因（Eduard Bernstein）的幾篇作品有關，他先在一八九六至九七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公開的科學雜誌新時代（Neue Zeit）中用社會主義的問題（Programm des Sozialismus）的標題，發表幾篇論文，以對於社會民主黨中通行的一切觀念下了批評。本氏更於一八九九年出版的論文，社會主義的前提與社會民主黨的任務（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把這些見解加以深切的陳述。

你們如讀這篇作品，在裏面幾乎可得德國國民經濟學的作家在最近數十年中對於馬克斯理論所提出一切駁論，并且陳說的這人正是數十年來在社會民主黨內立於領導的地位，是最優越科學的社會主義主張者之一；但正因他的科學的研究，而逐漸發見馬克斯學說裏面的遺漏、缺點與重大的錯誤。我

固然斷定本氏在許多點上所取拒絕的態度適與所謂「平民的」國民經濟學者相似，但我却不是說他也缺少創造性，或則說他就是簡簡單單的就是一般平民的經濟學者對於社會主義的批評抄錄進去。他的反對論無寧是獨創的并且出於自己的研究；但其結果，他的批評所趨的傾向適與平民的經濟學的不同，并且不黨的科學的批評所作的種種研究，的確激動他改變他的從前的見解。

在本斯泰因的作品出現以前，在社會民主黨的內部，對於馬克斯的信條各項已經起了很重要的責難了，例如一八九七年申郎克（Schönank）即已宣稱：「本黨一向所抱的，在厄耳福特綱要第一部中還在保留的那種見解，說社會的貧困在作逐漸增進，現在已不可信了，……民衆的水平線在近世發展中已稍稍提高了；就是德國的收入統計也不能使人對此發生懷疑了。」

但是各個黨魁所作這樣以及相似的宣言至多只攻擊馬克斯主義制度中各個學說或且其中一部。但在本斯泰因的書內，却從根本的攻擊馬克斯的學說，并且此外幾乎盡把一切各條斷定加以嚴厲的批評。全部制度所根據社會哲學的基礎，尤其被本氏批評了。他反對唯物史觀所抱經濟的發展依着潛伏的法則而前進的那基本思想——在他的書內可以顯然窺見他的唯心論的基本思想。本氏在這本書未嘗宣稱：「社會民主黨應該有一個人像康德那樣，對於傳來的學說加以完全嚴格的批評；遇着黨內所主

張似是而非的唯物論成爲最高的，由是最易以引起錯誤的理論時候，他又表明理想之受輕視與物質的因子之被尊爲發展中萬能的力量，都是那些人的自欺而已，其實他們的自欺，已屢次被事實證實了。」

誰如發出「飯依康德」的呼聲，或則照本斯泰因的修正，發出「飯依蘭格」(Zurück auf Lan-
ke)的呼聲，他就不能隸於馬克斯主義；因此本斯泰因所走的途徑，是遠超他以前幾個黨同志對於馬克斯所下的批評之上。本斯泰因固然稱引恩格爾在刊物及尺牘中所有的表示，說他已曾於經濟的因子之外，更認理論的與政治的因子也是很必要，以緩和唯物史觀的默滯的原則；本斯泰因固然因此斷定說：恩格爾認爲正當的，我也認爲合理；所以也可以把馬克斯的多少偏頗與過言加以糾正；其實本斯泰因與恩格爾二人根本上有很大的差別。恩格爾在上述的地方上所以加以這樣的限定，是意在拒絕那些過激的馬克斯主義者，因爲他們違反唯物的歷史理論，有時竟至斷言馬克斯絕不知理想的因子之重要；所以恩格爾只求申明理想的因子實具有次要的協助效力，但「其結果」并不否認經濟的因子之決定的意味。本斯泰因却比他很進了幾步：他的解說參雜很強的理想論，所以事實上歸結至於完全放棄馬克斯的基本原則。本斯泰因想把社會主義在唯物論與唯心論的根據加以融合，結果馬克斯所堅持

的立場却被他取消了。無論如何恩格爾總未曾像本斯泰因那樣的說：「社會在理論上對於經濟的推動力，總比先前更爲自由，并且只有他的分子間的利益之對立——即私人利益與集團利益間的勢力之對立——，才要求這理論的自由具體化而爲實際的自由。各個分子於此也可以獲得公共的利益，并且在這限度之內，無論何處，所有經濟的力量都無由發揮基本的意向。」

本斯泰因也是用批評的態度，解釋馬克斯的價值論。因爲馬克斯的價值論和經濟生活中公開的事實不能一致，所以本斯泰因只認牠爲一種「想像」，好像附有靈魂的原子一樣，或則只認牠爲「思維的虛構」。他認牠爲偏頗的，并且認限界利用論（Grenznutztheorie）爲這理論中一種必然的補充說而已，他屢說「社會的需要」在價值論方面是很重要的。他嘗引述馬克斯的註解：「條件依然是使用價值……，社會的需要——就是視社會而上的使用價值——於此實左右社會裏面各個產業界所費的全部工作時間，」接着又說道：「這幾句話倒使人不能打倒哥森·柏謨（Gossen-Böhm）的理論與少數人優越的論調了。」

因爲馬克斯自身不把價值論，而把資本主義的生產法必定在我們眼前逐漸崩壞的事實，做他的社會主義的根據，所以本斯泰因就把馬克斯的未來預言所根據的經濟生活事實加以更詳盡的討論。他於

是卽把經濟生活中的實際現象做根據，由統計與歷史中採取正確的證據，以證明馬克斯、恩格爾的斷言之不確。我們在這幾段文字中顯然可以窺見科學的國民經濟學，尤其所謂講壇社會主義之新發展對於本斯泰因所生的影響。還有一層也是很明瞭的卽：社會主義的壁壘中固然對於本斯泰因下了許多攻擊，但對於本斯泰因的這等議論，差不多沒有異議：蓋這裏所舉的都是確定的事實，大概不容人批駁的。考茨基在他的作品本斯泰因與社會民主黨綱要 (Bernstein und sozialdemokratisches Programm) 對此所下的一切駁論也不能反駁本斯泰因的駁論。社會民主論裏面通行有一種想像，說產業的企業之集中，是與財產的集中相併行的，本斯泰因却以爲這話并不正確，他證明股份公司的形式爲例，這形式由於財產所有之反集中的關係故其發展適與經營集中的傾向大相反對。本斯泰因說：「然則所謂現在的發展表明有產者之相對的，甚或絕對的減少之說是錯誤的。無所謂增多或減少，只是完全增多而已，這可說：有產者之數絕對的與相對的皆在增加。」如果社會的組織與其向來的發展，適如社會主義的教條所預擬的那樣，恐怕經濟的崩壞只能說是一短期間的問題罷了。但是依我們所見的情形却不是這樣。現在社會的區分并不比從前來得簡單，卽就收入的額數，以及職業的活動兩方面來說，其等差與區別的程度實在很高。」

本斯泰因根據英、德、法、美、比各國統計以證明經營集中進展的程度并不如馬克斯主義所假定的之甚，他由是更根據這證明而作結論道：「在產業各支業的數目逐漸加增之中，經營的技術與集中固然真個不斷的前進——這事的意味，現在狂亂的反動派還在那裏竊論——，但是同時所有產業各支業界裏面的中、小經營却也的確完全與大經營併存而俱立。」如果近世社會之崩壞是由於社會金字塔的尖端與基礎中間的那些中等分子之消滅，如果是由於這些分子被站在他們上面而且下面的兩極端所吸收，那末這種近世社會現在英、德、法各國境內，去崩壞之路，并不比十九世紀中任何一時期為近。」

但他對於恐慌的批評又那樣呢？恐慌豈不是顯然表示我們的社會秩序的基礎愈陷於動搖之境，結果不能抵抗得住這些永續的動搖麼？本斯泰因於此所處的立場也和馬克斯不同。馬克斯以為恐慌實必然的漸趨於銳尖化，本斯泰因却反對這理論，而舉出在目前的進展階段上有許多因子在減殺恐慌的勢力。他認卡忒爾（Kastelle）也算這些減殺恐慌勢力的因子之一，所以他判斷卡忒爾完全與馬克斯、恩格爾二人不同。他們二人認卡忒爾一方面不足以減殺生產混亂狀態，他方面又視他為未來計劃的、社會的生產之預備階段，但本斯泰因却認卡忒爾的產業聯合為比從來所有防止過剩生產的一切對策，

都是好的。」他（指卡忒爾的產業聯合）所負的危險比之私人企業家爲少，但在市場過於充斥的時候，又能暫時的限制生產。他在抵抗外國的跌價競爭上又比私人企業家爲優。如果否認這事實，不啻就是否認有組織優於紛亂的競爭的種種特長。但是原則上不承認卡忒爾對於恐慌的性質與常度有匡正的能人的人總是否認這事實。」

本斯泰因於是進而討論社會主義之政治的與經濟的前提條件，而予社會主義以新的界說。他以為對於社會主義所下最精確的界說總是那種以合作思想爲依據的；因爲這種界說實同時表現出經濟的、與法律的關係；認社會主義爲「向於或且達到合作社會秩序的境界的運動」，蓋就是適合於這種界說。本斯泰因關於期望社會主義實現的問題，却以爲目下完全不能期望國家立刻把製造與配置生產品的任務接收下來。國家不能一次盡把所有中、小經營接管。那就是地方於此也沒有多大的能力，也許各地方能夠把當地就地生產的那些經營收歸地方所有，也許他們於此知道善爲處置。「但是——本斯泰因接說下去——，「吾人試想那些一向替大市場從事生產的企業難道也可以併在一起統歸地方所有麼？我們現在如說起一個中等工業市，如奧格斯堡(Augsburg)、巴門(Barmen)、多特蒙特(Dortmund)、哈瑙(Hanau)、曼亥謨(Mannheim)等地，恐怕沒有人那樣愚妄的相信那地方的地方政府能夠在政治

的恐慌期內，或且即在其他時期內，把一切各種工廠與商店都歸自辦，並且還能夠很成功的操縱牠們。恐怕他們仍然把牠們託付從來的所有者管理；如果他們要絕對的沒收這些所有者的財產，那末他們一定根據任何一種租借條件，交與工會執掌。由是這個問題在一切這些狀況之下，實際上已變為合作社在經濟上占有勢力的問題。」

由此一切可知實現社會主義的問題，自本斯泰因看來適與經濟合作社活動能率的問題同其意味。因為依經驗所得生產合作社占的勢力實在很遲緩，所以要使這些機關適用於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便得長久從事工會合作社的工作。

你們由於本斯泰因從來的批評的解說中，可以知道他對於社會民主黨之積極的任務所具的見解，適與一般的黨定成見相去很遠。本斯泰因在研究社會民主黨的最要任務那一章中尤其反對馬克斯主義者的國際的立場，而認各種政治的活動為必要，尤當各視該國的國民的特性為轉移。他對此雖有極其合理的理論道：「縱使社會主義的各政黨原始把同一的前提做他們活動的出發點，他們經過了一時也都得把他們的活動適應他們本國的特殊情形。所以在某時期內，儘可以提出社會民主黨施政的一般原則，并要求適用一切國家，但絕不能提出一種完全同樣適用於一切國家的活動綱要。」——因為他不

像馬克斯主義者那樣觀看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快要崩壞，所以他主張民主的改革政策，以利「佃民」，例如在農業問題中，就是這樣。他尤其要求的是地方之民主的管理工人與農人的能力之保障與發展合作事業之推廣，他尤其寄期望於後者之促進。「凡小農人經濟得勢的地方，那末農人所有工會的或且其他的組織無論如何都是一種怪物，只有擴充合作社的形式，才能够把農人提高起來使他們跳出生資的關係。」「合作社連合着利率之低降（後者實增進資本之集積）事實上足以助長農人經濟對着大經營的競爭力，我認這事是不可批駁的。」——他好像法國的可能論者，要求嚴厲的推行地方的社會政策，這種社會政策久亦成爲社會民主黨運動的「嗣子」了。這種地方的社會政策蓋就是實現本斯泰因所謂「民主的工人權利」之一步工作。

簡言之，本斯泰因歸結總是說他先前在新時代裏面的所作的論文社會主義的問題（*Probleme des Sozialismus*）中，所主張的社會政策的綱要，他尤其主張在政治上把工人階級組織起來，并養成他們從事民治的能力，并努力求使國家從事一切改革以提高工人階級，并依民治的精神以改造國體。」

本斯泰因是唯理論者，因此他和馬克斯主義派中間被一道鴻溝隔住；并且也沒有什麼津梁能夠從這一個宇宙觀渡過那一宇宙觀，本斯泰因的唯心論的社會哲學顯然在他的書中許多地方表現出來，例

如他證出貧苦論是錯誤的時候，便說明社會主義的希望并不因此而會減少：「你們這樣探求較合理的分配而且這樣探求一種包括較合理的分配在內的組織，并不因此而減少了妥當性與必要性。——然則社會主義至是已直接根據於『合理的』國民經濟之探求。」這適與馬克斯主義完全相反。本斯泰因是社會民主黨的社會改革家，因此適與馬克斯正相反對，他希望社會民主黨有膽量由辭句中解放出來，這些辭句事實上早已失其效用了。并且他似乎意欲實現他的實際：即一種民治社會主義的改革黨。如果本斯泰因至今依然孑然孤立，未得一大批徒黨，那末上述的一切恐怕依然是一種慈祥的願意而已。但是現在他已經能使黨內正式視為絕對固定的「科學的」基礎中有幾個受了重大的打擊了。如果本斯泰因的解說將來在黨內漸被確信為對的，也許在晚後的未來中有一派由社會民主黨中脫離出來。在社會民主黨內部已不復有地位給本斯泰因站了。也許他在英國為費邊派，在法國為可能論者所收容；在德國却沒有一黨的範圍能適合他的教條。他和南德民主黨的接觸點算是最多。

歸結起來，本斯泰因的作品是一種極其可喜的現象：從來被所謂科學的社會主義認為正確的一切學說，在那裏都被依嚴格科學的方法反對了。反對這些學說的人正是數十年來站在這觀念的旗幟之下的人，這正是一種完全榮耀的證據，證明著作家實本其無偏無見的精神以從事他的研究。這研究就是

科學的工作之批評。

本斯泰因所主張的見解已經給社會民主黨的幾個領袖所同意了，所以現在所謂修正派已給一些社會民主黨的作家所代表了。他們把布羅和 (Dr. Bloch) 所編輯的雜誌社會主義月刊 (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 做他們的機關雜誌。

在社會民主黨的著名的修正派中還有大衛 (David) 一人，他的作品社會主義與農業 (Der Sozialismus und Landwirtschaft) 是反對馬克斯的農業發展論，更有卡爾末 (R. Calwer)，他現在已脫了黨，還有坎夫邁耳 (Paul Kampfmeier)，拍斯 (Heinrich Peus)，斐瑟 (Edmund Fischer)，厄爾謨 (Adolf von Elm) 與叔爾次 (Arthur Schulz) 諸人。我現在要把叔爾次的作品德國經濟的與政治的發展傾向 (Ökonomische und politische Entwicklungstendenzen) 中舉出幾段，以證明修正論者和馬克斯主義信條相去之遠。他與馬克斯相反，而認農業的小經營為完全堪以生存的：「在經濟方面，小經營足以保障農業工作的生產力之儘量的發展，在社會方面可使無產者不致成爲農業小佃戶與佃戶，而受了榨取。農業小經營與小資產確是用力量促進發展的經濟形式。」(見三七頁)

他猶如從前舒拍爾 (Schippel) 那樣也主張農業稅，尤其主張牧畜稅與肉稅，而對於穀物稅則主

張逐漸低減。由是看來，他是反對一種完全的自由貿易政策：「如用農人與逐漸化為農人的有產工人以重復殖民的占領東方，最好是照從來的方針，鎮靜的進展下去。不必期望，也不必要求穀物稅之立刻完全取消；因為這樣一來不僅引起德國穀業之荒蕪，極有價值的生產品之致命的摧滅，無數家庭的財產之巨大損失，并且結成那一種的果，適如細拍爾所常常描寫的那樣：即農業工人工資之立刻低落，逃鄉現狀之激增，工業工人受了鄉村工人向於城市工場侵入之推翻。……姑無論穀物稅的運命如何解決；但是提高或且減抑畜稅與肉稅必定撞着一切鄉村人民之反對而歸於失敗，他們認農人之維持與促進為德國經濟政策中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或且直接使用農人移殖法，或且間接使用有發展能力的農工移殖法。」（見三九頁、四一頁）他也算是促進內地殖民工作的信徒。

然則在著作界上，所謂修正派顯然具有相當強烈的勢力；在正統馬克斯主義的代表界內，盛行理論停滯的現象，在修正派內，却與之相反，而發生對於科學研究的活躍的興味。表面上，修正派對於黨之形成，還沒有可稱的影響，尤其舊日馬克斯主義綱要還是依然不變的得了保持。凡用強力把原則上的要點加以修正的嘗試，總是失敗，這是很堪以注意的。修正論者要想把幾條便利農人的規定納入社會民主黨綱要，這種嘗試却被黨內大多數人所拒絕。農業委員會的提案在北勒斯勞（1898）黨大

會上曾被深切的討論，但是結果考茨基的提案竟得了通過，其原文曰：「農業委員會所提出農業綱要的草案是不足取的。因為這綱要意在提高農人的地位，增進他們的私產；他宣布現在社會制度中農業界的利益是無產者的利益，其實農業界的利益猶如工業界的利益同受生產品私有的支配，所以還是占有生產品者，榨取無產者的利益。其次農業綱要實授與榨取者國家以新的權力手段，因此反阻礙無產者的階級鬥爭；最後還有一層，這提案對資本主義國家提出的任務，是唯獨無產者取得了政權之後的國家才能充分實現的。」（見 *Protokoll* 第二〇四頁）

修正論者在原則上固然不信馬克斯學說中那幾條原則，但至今還是對黨忠實。爲了「本斯泰因的事件」的爭執固然很烈，但是結果總是以妥協了結。在呂柏克 (*Lübeck*) 大會席上 (1901) 正式斥責本斯泰因道：「黨大會爲本黨的精神的進展計，承認不顧一切的自身批評爲必要，但是像本斯泰因同志幾年來完全對黨下了片面的批評，而置有產社會及其支持者於不評之列，實不啻陷他自身於首尾兩端的地位，而引起大部分同志的惡感。」——在德勒斯登的大會上 (1903) 通過了嚴重攻擊修正派的議決案，並且以二五八票對十一票；其文曰：「黨大會極其堅決的斥責修正派那樣的努力以求修改我們從來所保守，獲得勝利，而以階級鬥爭爲基礎的策略，即不想打倒了我們的敵人以取得政權，却只主張

採用逢迎現有制度的政策。」

修正派正式雖然受了黨內大多數的多少斥責，但其對於黨內增進多少下流勢力的力量却是不可泯沒的。從前在北德及南德的黨員之間，早有了一個差別。南德黨員無寧願與他黨作妥協，他們屢次違背正式的黨令而在各邦議會內接受預算案，例如一九一〇年的巴登社會民主黨員就是這樣。南德黨員的這種態度因了修正派而得了多少的硬化，這也是很明瞭的。其次依我們所見，修正派認實際的目前工作含有重大的意味，這適與申言最後目的的主張相反，所以工人中主張極端推行這種目前工作的那幾派，就是所謂工會運動與合作社運動也不免從修正派方面受了特殊的助力。

德國工會適與英國的相反，他們在政治上不守中立，却有特種政治傾向。喜耳士·頓刻（Hirsch Dunker）派的工會信奉自由主義的綱要，至所謂自由的工會却信奉社會民主黨的綱要。德國工會總委員會包含一切這社會民主黨的工會。在最近中，工會的勢力非常發展；他們在一九〇八年有一、八三一、七三一一個會員，並且有財產約四千萬馬克，至於社黨民主黨却只有約五十萬個黨員。自工會運動發展之後，黨與工會間舊有的對立越發暴露出來了。黨則恐怕工會的會員如受了工會運動所牽引，便與政治運動隔離太遠；因為工會運動只注意在工資之提高、工作時間之縮短等等，由是黨的努力總是

在於求使真正的工會動作對於黨政的動作不致占了太強的勢力，但工會運動自得了修正派所唱應求達得實際的個別結果的主張之後，却得了巨大的援據。晚近以來工會如何求使黨政的活動逐步退縮以利用工會活動的進展，工會首領厄爾謨（Eilm）在黨與工會（Partei und Gewerkschaft 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 1905, II. Bd. S. 735）中的表示可以爲例；他說：「工會爲有效的實現他們的經濟活動計，得使一切職業同志都來加入，並且將來他們如果愈其發展，必定被迫而在大會不討論黨政以及宗教的爭端問題。誰如不是昏頭昏腦的被人打倒了，誰如注意及發展的徑程，他就不免會知道社會民主黨的黨工會時代業已過去了。」

「有幾個黨員所以還在株守他們這個心愛的觀念，並且所以不能了解也不願了解工會除了成爲社會民主黨的預備學校之外，還有另一目的，這是很可解的。蓋工會增強工人階級的經濟力，由是以間接促進社會主義之實現；稱爲社會主義者的我們當然都翕然不從無產者的才幹之逐漸完善方面，但從他的勢力之逐漸增進方面，期望他的解放。誰如欲強工會而爲黨的機關，便不啻妨礙工會的發展，同時也就是妨礙我們理想的目的之急速實現。」

一九〇五年尤有幾樁事件證明工會運動與政黨運動間的差別。當時黨內因感着俄國革命的印象，

於是發生一種主張政治的羣衆罷工的強烈的潮流，但在科倫 (Köln) 開會的工會大會却製定一個議決案，意在直接拒絕這一類運動，其文曰：「大會因此也認要把宣傳政治的羣衆罷工作爲特種策略的一切嘗試爲可詬，大會希望有組織的工人嚴厲的反抗這些嘗試。大會認無政府主義者與向無經驗的人們所主張在經濟鬥爭的界上施行的總罷工是不值一試的；大會警告工人，勿因接受或且廣傳這等觀念而拋棄增進工人組織的日常小工作。」

曼亥謨 (Mannheim, 1907) 地方的黨大會爲對付工會的這樣離立運動起見，曾通過一議決案喚醒他們極端對黨的服從心，其文曰：「黨的與工會的思想與行動之一致是政治的階級鬥爭逐步勝利中萬不可缺的一種要求，今若保持這種一致，便須絕對的使工會運動感受社會民主黨的精神。因此本這意旨而活動，正是每個黨同志的義務。」

合作社的運動，猶如工會的運動，的確也是由於修正派的進步，而得了益處。德國工人合作社固然不像工會那樣與該黨立於密切的關係，但是消費社中的分子從前大半是出自小市民界，現在大多數事實上都是工人，并且其中有許多社會民主黨員。其結果德國消費合作社內遂發生多少對立，而表現於一九〇二年克累次那哈 (Kreuznach) 大會席上，甚且至於決裂。當時有一消費合作社因把下列條

文列入規則之中；即：「合作社當進貨時候，首先關顧那些承認工人團結權并且履行工會工作條件的企業，」因此遂被聯合會拒絕進會。於是內中社員尤其是工人的幾個合作社都脫了會而組織德國消費社中央聯合會。該會固然不是社會民主黨的，但大體上却包含一切工人消費社。這德國消費社中央聯合會的發展非常之快，并且雖然不及英國那裏，却也有了很足紀的效果。一九〇九年中央聯合會有會員一、〇五八、一四二人；他的貿易額達三萬八千二百萬，運用資本（自己及他人的）達一萬萬。——一九一〇年德國消費社大買進公司在格勒巴里薩（Groba-Riesa）所創立的肥皂廠是一種大成功。睦勒博士（Dr. August Müller）曾作有一書專論這工廠的成立經過，其中有云：「該企業所託付的廣大而安全的基礎是德國消費社中央聯合會中各消費合作社社員，計一百餘萬人。使格勒巴里薩肥皂廠具呈特殊性質的正是這個基礎。他所具的技術的特長，凡是具有應有的手段與才幹的人，都可以模仿得到。他的特質是：無人能否認他寄託於偉大的社會運動之中。」（見該書二四〇頁）

工人中大部分如努力於工會合作社活動的小工作，他們對於黨政的活動便愈間斷，這是很明顯的。——到底修正派的理論能否驅逐黨內正統馬克斯派的信條，到底工會合作社運動在他們方面能否戰勝黨內舊日片面的階級鬥爭政策，到底修正派與馬克斯派會否至於徹底的分離，這些一切要待後來

來啟示。對此倘作種種臆測，似乎也沒有效果，因為這是一半關係於未來的政治的形態，這是我們不能先見的。

德國社會民主黨適與法國、英國的運動相反而呈有一致的團結狀態，并且雖然碰着修正派的種種努力，還在具有一致的無產黨性質，甚且能夠發展到這麼有力的地步；這是何故呢？該黨在最近選舉中竟集合有三百萬票！這個的確和多少國民的特性也有關係。大產業與產業的無產者在德國的發達比較遲晚，而這無產者受拉薩勒的個性極強的迷惑，拉薩勒用他的燦爛的活動力知道激動工人向於一個大目的前進，即取得政權以達獲得經濟利益的目的。拉薩勒所開始的，馬克斯與恩格爾又繼續推行下去。他們的哲學的信條也是迎合德國所特有的信條信仰心。於是大批民衆給馬克斯學說占領了。德人所具那種自願合於一致的全體的特性對於黨的組成中之團結性也與有助力。此外尚有一點適使馬克斯主義能夠在德國獲得愈多的信徒。——這就是官廳與政府對於工人運動的態度，世界中沒有一國像德國那樣對於方興的工人運動抱着那樣多懷疑心與那樣少的理解力。甚且對於極小的工會組織也施行不厭的那種苛細的警察統計，必定驅使工人成爲馬克斯信條的信徒，而使國家、政府、統治階級等和工人階級作萬無妥協可能的對立。

關於這方面發生最大效力的尤其是一八七八年至一八九〇年的社會主義者律。由於這律的頒布，於是，社會民主黨的危害公共的種種努力都受了例外的處置，然而正在這律的制裁之下，而工黨的黨員却非常加增起來。現在如重施這種立法政策，恐怕也不過獲同樣的惡果；現在社會民主黨內，一方面在本斯泰因的領導之下，他方面在各個工會領袖的領導之下，正發生一種潮流求使工人起來實現工會、合作社的自助，如果復行一種新例外律以對付工人運動，恐怕錘鍊的結果又將鑄成一個團結的馬克斯主義的階級鬥爭黨。

因為社會民主黨在德國內能夠直到現在維持其一致的、團結的黨，所以德國社會民主黨員還是從前本馬克斯的意旨促成一致的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那一班人。——到底國際工人運動中有否這種一致性，或且到底他有發展到一致的可能性，這個問題我們要在次講中再說。

第二十講 國際黨

我如對你們照從前描寫法、英、德各國社會主義運動那樣，再把其餘各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加以陳述，恐怕說了太遠。其次我再說下去也不過把我先前對你們描寫的形像略加補筆罷了。我們現在所知道的腔調之中也許尚有幾種新的，但我們恐不能認這幾種在運動中爲新的主要形態；其實其餘各國的社會主義運動無寧呈有與上述那幾種形態多少相似的象徵。現在只舉一例，像美國工人運動實和英國的大大相似。在美國，資本主義已得了極徹底、極偉大的發展，然而堪以陳述的社會主義工人運動總是未見。卽在那裏的工人階級中也是工會的，注重目前工人的活動占優勢。但是我們終結還要覽及國

際社會主義運動。

馬克斯已經在共產黨宣言（一八四八年）中承認工人運動爲國際的，而國際的運動蓋具有一致的性質；所以只能在國際的團結之下方能促進他的發展。馬克斯一生實株守這種見解。事實上，直到現在除了國家的運動之外，確有一種國際的社會主義運動，其形式極其錯雜。他所表現的是那種果呢？他能夠把我們所認識的各國對立加以疎通并促其結合以利一致的活動麼？到底在這條途徑上將來能期望其一致麼？然則我們現在應把我們在第九講中所提出的問題加以答覆。我們在各國運動中始終找不出的一致傾向性，難道可以在國際運動中撞得見麼？

我們得分出兩時代：

（一）從一八六四年至一八七六年之國際工人運動時代。

（二）從一八八九年至現在之國際社會主義者大會時代。

在第一時代中國際黨要將共產黨宣言的結句實現出來：即各國無產者呀，你們團結起來。蓋欲使無產者從事國際的一致的動作。國際黨應成爲一種受集中主義所指導，而具有一致原則的政黨，雖然英國的工會派，法國的無政府主義者與德國拉薩勒派及馬克斯派都結合起來，但人家相信在國際的基

礎上總可以組成一個統一的政黨。一八六四年九月廿八日世界各國工人在倫敦聖馬丁廳吃飯時候，遂組織國際工人協會。當時的人實期望替各國工人運動，創立一個共同機關。大會遂以五十人組織一委員會，並委之起草國際工人協會的章程與緣起。結果馬克斯所草的章程與緣起被接受了，後來在一八六六年根夫大會上也通過了。在緣起中指出工人階級的痛苦；蓋技術的補助手段雖然儘經改良，而他們的痛苦并不爲之輕減，並且只有增加。現在只有把生產品歸爲公有，才能夠徹底的解除他們的痛苦。工人階級同時已經證明在這途徑上能夠在向有產者統治的進攻中取得巨大的效果；英國的十小時議案與工人聯合運動就是這事實的證據。工人取得了政權之後，他們才能够在這條途徑上收到永久的效果；但要達這目的只好由一切工人起來作國際的結合。所以國際工人協會的成立緣起正與共產黨宣言用同一的語句作結；即：各國無產者呀，你們團結起來！在發表成立緣起時候，馬克斯更提出國際工人協會的章程；這個後來在一八六六年的根夫大會席上也只略加修改而被接受了。

依章程的第一條，國際協會的創立，應使各國境內抱着保護，促進并完全解放工人階級的這同一目的的那些現存的各工人團體於此得個聯合與計劃的合作之中心點。

(第五條) 應由加入國際協會的各國工人組織一個總會議。

(第六條) 總會議應作協會中各地方集團與各國集團的國際代理處，使一國的工人常常知道他們的階級在別國境內所作的種種運動；使他們同時共同考察歐洲各國的社會狀況；使一團體提出關於全體利益的問題能被其他各團體所接受，並且如有立即實際行動之必要——如遇着國際發生爭端的時候——各團便可同時同樣動作起來。

真個適如章程中所說，造成了一個「友愛團結的永久聯合」麼？其實國際黨的不幸之發展適與這一句話相反，他的歷史表現有繼續不斷的爭執與深切著明的成見。雖然國際協會的努力而統一組織的工人運動終不可得，而且各國境內的工人運動，各隨其經濟的與政治的特殊狀況，各隨其勢力的首領之社會理論而取得極其懸殊的性質。因此國際協會的總會議發出的宣言與綱要解說只能採用無色無臭的表述：只有這樣才能把互相歧異的集團用一條鬆動的綑帶連結起來。

種種對立尤其因為英人、法人與德人根本不同的原則，而表現出來。英國代表尤其要增進他們的工會政策，他們在要求較佳的工資條件時候很得國際協會的援助；但自他們的立腳點出發，却不能協同推行馬克斯派的革命性階級鬥爭政策。及國際協會替巴黎地方自治派活動的時候，英國代表便退出協會。法國蒲魯東派與馬克斯派中間的對立比英國工會派與馬克斯派間的還為激烈。這裏所謂的蒲魯

東派并不是狹義的信奉蒲魯東理論的信徒，乃是指國際協會中屬於羅馬系國家的許多黨員；他們因為他們的反集中的或且無政府主義的觀念，簡言之，因為他們偏於自由主義的信仰，所以對於馬克斯的權威觀念；適立正相反的地位。法國人自身大多數是蒲魯東的信徒。金屬雕刻家托楞 (Tolain) 是蒲魯東的最有天赋的學生之一，猶之其他有名的法國黨員如嘿力袁 (Héliçon)、夫里波耳 (Fribourg)、利摩桑 (Limosin)、貝雷 (Beslay)、雪對 (Chaudey) 諸人也都是蒲魯東主義者。

國際協會初成立那幾年中所通過的議決案也顯然呈有蒲魯東派的影響。普勒察諾夫 (Plechanow) 很有理的說道：「國際工人協會內部歷史是蒲魯東主義與馬克斯發展的近世社會主義相爭的歷史。」國際黨的紀史者由是稱這運動的第一時期為共棲主義者的時代 (Période mutualiste, 1865—1867)

例如夫里部耳說：(註一)「這時代的協會是共棲主義者的；這就是說：大家要求聯合起來以保障從前所討論，所贊成的協約之實現。」

馬隆 (Malon) (註二) 也稱這第一時代為「共棲主義者的時代，他的性質是受蒲魯東理論的影響。」馬克斯與蒲魯東的社會理論之深切的差別也見於實際的動作：馬克斯主義要把國際協會作為無產者階級鬥爭的一個機關，蒲魯東主義者却要把他作為一種研究團體，以討論社會改革中所有最好的手

段與途徑，（註三）後者尤其要求組成隨意的交換合作社與信用合作社，而馬克斯的信徒却要求生產手段之集合。

國際協會巴黎支部本着蒲魯東的意旨尤其認警告罷工為他的任務，夫里部耳也很得意的聲稱他們的活動已把多次罷工防止了；他說：「這就是國際協會的關係，才有一八六五、一八六六、一八六九年的房屋罷工計劃失敗之光榮。」——國際黨的巴黎黨員相會時候所討論的問題尤其創立雙方信用借貸的聯合合作社。

夫里部耳和舍馬雷（Chevalé）又曾計劃自創一種新聞以宣傳這種理想：這新聞叫做聯合論者（le Fédéraliste）。這新聞的綱要由夫里部耳印行出來的也全是依據蒲魯東的意旨：其中例如有云：（註六）「我們深信經驗的時代過去了，社會應當建設在那些（同時為頂點及基礎）不變的法律上面，所以無產階級得要求科學從此起來解決他們的問題，民衆相信社會的公約——即特別相互的交換的公約，即公民的尊嚴及其自由之保護者——是包含在互助或合作的觀念中。」關於允許婦女加入國際協會的問題，聽憑各支會自己解決，而巴黎支會則因受了蒲魯東的影響，宣言反對婦女入會，因為他們認婦女的地位是家庭不是公共場所。巴黎辦事處嘗大聲疾呼勸告一切工人協會，無論其屬於何派，并勸告一

切黨派的男子，無論其爲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同居共產主義者 (Phalansterorner)、可能論者或且民主主義者都來加入國際協會；國際協會蓋欲研問工人階級的狀況，并且歡迎人家提出任何一種社會的救濟手段。

一八六六年在根夫舉行的國際工人協會第一次大會時候，由法國代表提出一種覺書，詳寫他們對於工人問題所取的態度；這覺書引有許多蒲魯東的原文，并且完全表明他的精神而作的。例如其中有一處說道：「我們的空想所能肯定的，就是一個工人的國家，可以互相交換及實行互助與公道。」——他們對於婚姻，適與馬克斯派的見解相反，主張絕對的嚴守單婚制與家庭生活：「家庭是一種自然的組織……他是加於人類的負擔，是原始的狀態，是萬物進化上不可避免的，」——該覺書對於結合團體 (Association) 與聯合團體 (Coopération) 間的差別會有極詳盡的討論。說到結合團體尤其憶及路易·布郎克所提議的那一種，但按蒲魯東的批評是應被拒絕的，因爲他們這一類團體是奉國家爲主體而受其組織的強制團體；因爲會社的分子對於生產以及消費都是視中央權力爲轉移的；至於合作團體却是一種隨意的組合，他賦與他的分子以完全的自由與獨立，尤其關於他們的生產與消費，他們只藉個別

的組織，以互相增進他們的經濟力，尤其藉着交換與借貸的機關：「結合團體包羅着許多使他們失去

個性而為團體單位的各個人；至於聯合團體便不同了；他聚集衆人以發揮每個人的能力及其創作的精神。」

布郎魁對於這一類溫和的議決案會發有極苦痛的怨言道：「聯合團體是一種特殊的東西，血統不純的生物，有一半像馬爾薩斯（Malthus），或且像披肉帶骨的馬爾薩斯，其餘則戴着幾個類似蒲魯東主義者的面具。」

巴黎代表對於最少工作日問題所取的态度最足以表明他們的立腳點。當英人贊同國際工人協會的最少工作日的宣言時候，法國會員却起來反對，并且本下列的曼徹斯特派的口吻，發揮他們的拒絕的態度：「在契約的與契約自由的名義之下，國際協會不得干涉工人與資本間的特別關係；即欲供給意見，也得等待人家向之要求。」

一八六七年在羅散（Lausanne）大會席上，嘗討論土地國有的問題。比利時代表得·帕普（De Paep）猶如許多比利時代表同是蒲魯東主義者，當他提議研究這問題時候，却被另一個蒲魯東主義舍馬雷（Shemals）斥為極端遵守異教的主張。

雖然大多數會員都主張國有，但這問題因受法國代表極堅決的態度之影響，竟被撤出議事日程之

外。他們說：「除了個人的特性之外，再沒有一條途徑比向於權威及絕對的共產主義而走的那條途徑更爲不幸的。」

這種袒護私人所有的宣言是蒲魯東主義的，至於對於信用貸款與聯合團體的議決案却也是蒲魯東主義的，他的言辭中有說：社會的改革之實現只好正式而且徹底利用那些，對於全社會發生效力，而且適合於互助與正義的手段。

自一八六七年以後，法國政府開始嚴拿國際工人協會的會員，自那時候起巴黎派中也呈有一種更激烈的潮流。

一八六八年不魯塞爾 (Brussels) 大會席上，共產主義派占了大多數，由是關於土地所有的問題，議決如下：

「大會意謂：近世的社會之經濟的發展將不免把土地改作公共的、社會的所有，這是一種社會的必要事項。」

法國蒲魯東派那一方面只通過一種不負責任的關於交換銀行的議決案：「大會因想到不能決定像交換銀行那麼複雜的問題之實際的價值，他又在理論上堅持採用雙方的信用借貸，所以要求把不魯塞

爾支會所提出的章程草案送交各支會，作為那裏一種根本的討論的對象，以供下屆大會的議決。」

一八六九年巴塞爾（Basel）大會席上，這土地所有的議決案不特被保持了，并且更加厲了，大多數會員所主張的該議決案有說：「大會宣稱：社會有權廢除私人對於土地的所有權，并且有權把土地歸為公有。」

「大會宣稱：為社會的利益計，把土地歸為公有是很必要的。」

李布克涅喜特說的很有理：如謂法國少數派所以抱着反對的意見，蓋由於法國農人對於社會主義之不信任，無寧當說裏面還參雜有蒲魯東派小市民的思想。——巴黎共棲主義的代表認他們的事業在國際工人協會，經過巴塞爾大會議決之後是失敗的；他們宣稱給德國共產主義打敗了；現在巴黎派看來只好把共棲主義的社會主義由這次一般的破舟之難中搭救出來。

除了法國比國的共棲主義者之外，尤其還有所謂共產主義的無政府主義者在巴庫甯的指揮之下，他們在國際工人協會也造成劇烈爭執的素因。自巴庫甯及其由他所創立的社會主義民治國際聯合會中的分子收入國際工人協會之後，不久便見得無政府與馬克斯派的合作是不可能的，一八七五年海牙大會上，遂生巴庫甯革出黨外的果。

由國際工人協會中脫離出來的還有布郎魁派，因為國際工人協會不能依據共產黨宣言所說，成爲奉行議決案的有力的槓桿。後來國際工人協會的總評議會移在紐約，於是朱刺辛協會 (L'Association urssienne)，比、西協會都被革出，意大利協會也不承認爲協會。只有英、德、美三國依然效忠於國際工人協會。他們於一八七三年，還在根夫開過一次最後的大會，及一八七六年在菲列德爾菲亞 (Philadelphia) 地方，宣告完全解散。

自此之後開始國際會的第二時代。從此之後只舉行國際社會主義者大會，這會不像舊日的國際會那樣，成爲工人運動的集中機關，却不過是各國社會主義黨代表的集會，以討論與議決關於工人運動中重大的問題。經過幾次無甚意味的小會之後，一八八九年才在巴黎舉行一次較大的國際社會主義者大會。派往這次，以及下幾次的代表，由是不成爲「國際會的代表」，不過是他們社會主義黨的代表，他們欲藉這種會合以表明政治的活動有國際的聯合與一致之需要而已。他們所要討論的是政治的活動中共同的目的與途徑。——然則這吹新國際會的會議所表示的結合與一致，竟在舊日的國際會之上麼？誰如客觀的熟讀國際社會主義者大會的記錄，便不免不了這種印象：即舊國際會的運命所招致的離心離德，在現在依然毫不減少的存在着。如要「一切國家的無產者聯合起來」這一句話底於實現，

似乎得求各該國內的無產者先自行團結起來，大會記錄告訴人：各國的集團中間往往發生劇烈的爭端。即重大的希望所寄的巴黎大會適極其顯然表明其不一致，關於可能論者能否加入大會的問題，雖然經過幾番討論，結果還是不能一致。因此事實上舉行兩個大會，一個給馬克斯主義者與布郎魁主義者所訪問，一個給可能論者與英國工會派所訪問。這種現象適發生在英國社會主義者與德曼 (Hyndman) 宣布他的預言的那一年；他說：「讓我們的宣傳來促進各國工人聯合起來向榨取者作共同的巨大的階級鬥爭。我們不能找出比一八八九更妥當的一年，能確定這種以公共的基礎為根據的國際活動；統治階級實戰戰兢兢的目睹這一年，而羣衆却滿懷希望迎接他。」

一八八九年在巴黎由英國工會派與無政府主義者所決行的乾淨的區別，竟直截了當的實現了。由是關於加入社會主義者大會的一切爭端都得避免了。於是關於入會議決了許多議案，并且根據巴黎（一八八九）、不魯塞爾（一八九一）及沮立克（一八九五）幾次大會的規定，應許加入國際會的是：「凡承認工人組織與政治活動有必要的一切工會與社會主義黨。」在倫敦及巴黎（一九〇〇）大會上，入會規定更受精密的制定，此後得以加入者為：

（一）承認社會主義的主要原則如：生產品與交換品之社會化、無產者之國際的結合與活動、無

產者之奪取政權等的一切團體；及

(二) 站在階級鬥爭的基礎上面，承認政治活動為必要的一切工會。

這是形式上的入會規定；大會就是以這規定為基礎而作實質的結合如下：

(一) 關於無政府主義者方面，各次國際大會經過許多爭議之後，才有這等議決案。於是無政府主義者，毫無他言，一本巴庫爾派的意旨却脫了出來；他方面則法國工會，在其社會的觀念上雖然和無政府主義者有許多接觸之點，却不得不許其入會，這件事又屢次引起異議，等待下文再行說明他。

(二) 凡在政治上活動的英國工會派都被許可加入，但自他們的全部政策與策略看來，他們不特與德國馬克斯根本上不相同，并且和許多其他各國的社會主義者根本上不相同，因此發生種種裂痕。

由是在以下各次大會上，每見有兩件事（這足以顯然證明其不一致）：一是法、德、英三國代表間永遠發生的爭端，二是議決案之製作是這樣的審慎，務使各派都能夠同意而後可。不魯塞爾國際大會的經過（一八九一）可以證此；可能論者與英國工會痛詆比利時工黨，因為比利時工黨除了由一八八九年巴黎可能論者大會接受組織第二次國際大會的任務之外，更秘密由馬克斯主義者接受同種類的全權。他們只勉強的派遣代表到這根本上受制於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大會。布魯塞（Brousse）自身却離

開該大會。阿勒芒派與馬克斯派對於法國運動，互作歧異的報告。

沮立克（一八九三年）與倫敦（一八九六年）大會的情形大概也很相似。至於無政府主義者於此實種破壞的因，在這裏可以不必申說，因為據我對你們所指示的，他們的政治的與經濟的綱要根本上是與社會主義的觀念不同，所以合作是完全想不到的。但是即在無政府主義者脫退之後，內部還不見得一致。法國人在倫敦宣言，只好分作兩組，才能參加大會；一派的四十七位代表宣言；他們不得不與其餘的法國代表分離，因為其餘代表是代表工會，其所要求的無以異於無政府主義者。米勒郎（Mille-rand）以這少數的名義發出宣言道：有些人假工會名義，而以無政府主義者出席這裏，并且違背沮立克的議會，我們得和這些人算個清賬。這些無政府主義者已來在這裏，用一切手段來攻擊馬克斯主義者。他們的目的不是為工會的利益而活動，却照其中最正直的人所自承的那樣，只是利用大會，替他們的無政府主義的理想作宣傳。他們如回到法國，將要大吹大擂他們的勝利，又把社會主義者加以極端的侮辱。和這等人實不能共事，所以他和他的同志已和無政府主義者脫離了，并且要求大會承認他們為一特殊的代表。——味郎（Vaillant）則以其他五十二位代表的名義發表宣言，說明法國多數代表并非無政府主義的；他們只拒絕依個人的政治信念，以控制各代表。如果無政府主義者各自認為無政

府主義者，他們恐怕也被革除了。「我們以工會代表的資格，不得不與你們共同開會，我們和你們合作，正要戰勝與打倒他們在工會內的勢力。」

在司徒嘉特 (Stutgart) (一九〇七年) 大會席上，因為英國工黨的關係，也發生相似的不和。

——獨立工黨嘗出一個議案請求修正國際大會的章程，務許工會聯合會善意的加入大會，這議案顯然只為英國新工黨的利便而提出的。而社會民主同盟會員刻爾士 (Ketch) 却表示反對：「我們沒理由來反對那些工會加入，依據章程，他們便是猶如政治的團體，也得許其加入國際工會，不過有一點，須請工會自己明白：他們來到這裏，就是來到社會主義者大會。如果他們參加社會主義者大會，他們便得和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原則有切不斷的結合，如果他們回到英國，便當接受替社會主義工作與活動的義務。我們現在英國問過了工黨 (Labour Party)，到底他是否社會主義的，他都不會答覆過（聽！聽！）。為什麼他注重派代表到社會主義者大會呢？他不能在司徒嘉特加入社會主義者大會，他可以在英國選舉宣言中說世間沒有階級鬥爭（好極）。工黨蓋已直接拒絕社會主義原則之承認。連足以達到社會主義的目的，足以完全從各種榨取解放工人階級的改革，他也拒絕拔用（聽！聽！）。工黨並沒有什麼黨綱，我們并未見過牠。工黨只有一種基礎，就是替小小的姑息政策作奮鬥。他是一種超越

常軌的工黨，却不是社會主義黨，我們不願排斥人，我們相信各代表是善意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但我們不能替擁着假旗號的那一組人得利便，而修改國際的章程（極其不錯）。我們要求完全堅決維持入會規定，作為一切國際大會的原則（熱烈的鼓舞聲）。」

這黨的另一代表，愛耳汾 (Irving) 也以爲大會得拒絕工黨加入，一切這些奮鬥的議案結果是：大會因本自由主義的精神以解釋他的入會規定，所以也許可英國與法德的工會派加入，由是因爲國際社會主義者大會事實上含有異種異質的分子，所以他們討論事件的性質也當然易見。或且製作實際一致的議案，於是所關的對象往往例如常備兵之撤廢、一般的民衆武裝之引用、或則實際的工人保護立法之實施、或則兒童教育等等，總而言之，是完全不關社會主義的問題；却是爲社會改革、倫理文化而舉行的大會或且和平大會所能解決的對象。或則所討論的是社會主義的原則問題，例如總罷工的問題、或且政黨對工會或且對於合作社事業所取的态度。然而其間的對立立刻出現，以致或則議不出議決案，或則所議的都是籠統浮搖的，務使各種極不相同的立腳點能夠互相妥協。例如在倫敦討論農業問題時候，有一議決案原文如下：「土地所有的關係與各國村民階級之區分太形複雜，所以關於引用何種手段以達到目的（即土地所有之集中），與關於在村民中如何找出贊成這種辦法的階級，不能規定

一種能拘束各國一切工黨的規程。」申郎克 (Schönlanck) 說的很有理(第十六頁)：「要使一切社會主義黨的意見歸於一致，只好使議案限於一般的原則。」

到了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一九〇四年) 大會討論關於黨的統一的議決案時候，內部的不和尤其暴露出來。——在委員會時候有一個籠統無意味的議案竟得了通過：「爲要賦與工人階級以他們的完全力量以反抗資本主義故，必須在各國內對於許多市民的政黨，只有一個社會主義黨，像只有一種無產者那樣。所以一切同志與一切社會主義的團體應絕對負責竭盡全力，在國際大會所指定的原則之根據上面，造成黨的統一。爲無產者計這種統一是很必要，所以一切同志與一切社會主義的團體應對持續的破裂之不幸的結果負起責任。」(見第三十二頁) 至於從前在德勒斯登大會時候早已通過的另一議案則嚴厲的攻擊修正派，其原文如下：「大會極端反對修正派來努力修改我們業已修效成功的種種以階級鬥爭爲依據的策略，使我們不用打倒敵人以取得政權的方法，而採用迎合現存事況的一種政策。」該議案竟以二十七票對三票及十三票棄權通過，委員會討論時候意見紛歧之烈一如全體大會討論時候，并且往往至於激昂憤慨，尤其是朱雷 (Jaures) 與革斯德 (Guesde) 二人間的爭辯。

朱雷在委員會中宣言道：「我堅持我的斷言：各國內的社會生活若愈發展，他和該國的生活便愈

密切的混合在一塊兒；他多少帶有該國的特性。大凡提出社會主義的政策中一般的原則是很容易的事，但要在各國發展的複雜而錯綜的問題中規定社會主義黨的態度却是愈難愈難。所以國際社會主義者大會對於原則之提出，必須採取審慎態度。」他由是申言他那「黨替共和國做下的事業：「最初我們會助法國援助共和憲法，即在反動的暴動在在可以爆發的時候。其次我們雖要求學校還俗，要求保障精神的自由、工人保護立法、無產者的組織；最後我們於歐洲和平之維持會有大貢獻，因為我們實安定法國內部的狀況。我也曉得共和與社會的正義并不是同一意味的；他們單獨不足以保障進步。但是在法國，共和是進步上一種必需的前提，因此無產者於此為其原有的階級利益計，得防衛共和。君主制在社會上完全是出於利己心。推翻法國共和，恐怕會賦予歐洲反動派以新力量；因此當我們保障法國共和安全時候，不啻已經對一切國際的無產者盡了大貢獻了。」

華斯德對此答覆道：「你對於你所說的階級鬥爭完全沒有感覺，你也未曾實際的推行他，人家可以就你搭救共和的情景中看得很清楚。也許共和在我們，以及在馬克斯看來是革命的理想國，但是何以故呢？就是因為他能讓階級間的對立直接顯然表示出來，蓋這些對立不致因為朝代的變遷而被掩飾過去。但是一等到（這是朱雷所要說的）無產者為要搭救陷在危險中的共和故，不得不拋棄他的要求

時候，於是共和政治能讓階級對立表現的優點便立即泯滅。於是共和將成爲最劣的政體。……你的錯誤是一種基本的。你看社會主義爲十八世紀市民革命的演流。我們却說社會主義是階級鬥爭的結果，他是由資本主義的社會中產生出來并且到處啟發同一現象，甚且雖然國體有不同，而無產者的策略總是相同。所以我們特把這問題提交各國無產者面前處理。但是你對於社會主義不甚了解，所以你才以爲世間原有根於歷史的原來與目前的狀況而發生的差別，這是與那種認世間原有一致的社會主義的實際，原有同等的國際社會主義活動的思想完全相反。你由是不啻把國家主義引入國際會。李布克涅喜特有說：在我們看來世間只有兩種人民，一是榨取者，一是被榨取者。我們以爲他這句話至今尙是有效。」

在大會上，法、俄、瑞士各國辯士都贊成總罷工的議案，結果竟被否決了。——當巴黎（一九〇〇年）大會討論議事日程中第三點（即關於解放工作的必需的條件）時候，在委員會中也說到生產合作社的問題。但其意見各自紛歧，以致拒絕討論這個問題，反翕然議決把這問題交與各國各隨其政治的與經濟的關係而自作決斷，在該大會上，關於米勒郎（Milliard）事件以及關於社會主義能否做市民內閣的開員的原則問題，發生了劇烈的爭論。辛革（Singer）在當時宣稱：在大會上只能討論「重

大的要點」，至於個別問題，只好交與各國去討論（見二十二頁）。本斯泰因對於所製作的議案，會有很合理的理論；「考茨基的策略議案顯然帶有妥協的色彩，可以不用證明而知他內部含有衝突。」

即哥本哈根大會（一九一〇）也表示同樣的現象，在一九一〇年社會主義雜誌新時代的一篇文章中有關於這事的言論道：「如果大會勸告狹量的英國工會們，就他們的規程中，把足以妨礙工會的領袖機關運用金錢以援助外國奮鬥的種種規定除去（蓋他們往往根據這些規定拒絕予人援助），這却不過是一種空想的議案而已，這事蓋不特關於這些規定存在的問題，甚且關於那樁可悲的事實，即英、美二國的工會并不滲有無產者階級鬥爭的精神。這種精神如果缺乏，便不能證實他們具有國際團結性的感覺。」

其實大會在議決國際的團結性時候，也不外像貓兒在熱騰騰的米湯傍邊打旋的走一樣，這是他們得自承的，蓋大會嘗極力避免和其中最熾烈的那個問題，即所謂關於英、奧、美各國的工會拒絕外國的問題相接觸。英國社會主義者的態度被人罵得最凶；不是關係於英國工人代表形式上是否同意於鐵甲艦的經費支出，却是關係於他們是否一般的援助有產者的政府。所以這問題雖然提了出來，但其答詞只能以一義為限，即：凡政黨如和政府黨同其甘苦，無論在選舉時候，抑或在解決議會的實際問題

時候，他便當對於這政府黨的態度、以及對於這黨所主張的政黨，協同負責。」——即對於合作社事件的議案也是很搖移兩端：「合作社應該預備生產與交換之民治化與社會化。」

國際工人運動裏面所代表的其他利益也表現同樣的散亂與紛歧。第一是所謂工會的國際。我們在國際工會大會上碰見的原則上意見之紛歧，一如在社會主義者大會上所碰見的。近代國際工會大會證明雷基恩 (Legien) 的斷言很有道理。他說：工會的國際目前只能成爲一切國家的工會之散漫的聯絡機關，並且一切國家的工會如作國際的結合，必須先求各該國境內工會的組織先組一個團結的統一體，然而這先提條件至今還未具備。——有人嘗認國際工會大會的組織爲不合於目的；在理各國中央地方派來的代表在國際大會上應該先多少有了了解。第一次這種大會於一九〇二年舉行在司徒嘉特。於是設立一個國際祕書處，甚且指定德國工會總委員會爲國際中央機關。其實這機關也不外含有傳達消息機關的意味而已。在大會初期中法國工會與其餘工會間即已出現意見的紛歧，於是議決工會大會只討論純粹工會的問題，但是法國本國中央工會對此不滿意。及阿姆斯特丹（一九〇五）大會宣言把凡一切理論的問題甚至關於各國境內工會運動的傾向與策略的那些問題應加除出討論以外之後，於是認這種決定爲不當的法國中央工會遂離去克里斯提安那 (Christiana)（一九〇七年）大會。美國工會代

表也告缺席。雷基恩以爲關於內部建設以及策略的問題只有完全交給各該國的機關自由解決，才能夠使各國工會間發生較密切的關係。

國際合作社大會的情形也無以異於此。他的第一次大會是在倫敦（一九〇五年八月）舉行。在這裏也是想把各種見解歸爲一致：德國合作社運動首領之一，漢斯·睦勒（Hans Müller）有說：「本聯合會不只打算促進或且擴充那些以對立的社會原則與經濟原則爲依據、性質極不相同的合作社，甚且欲宣傳利得的參加，簡單一句話，綱要與組織都是兩種完全不相容的觀念所作妥協的結果，所以不能經歷好久。」即一八九六、一八九七及一九〇〇年的下幾次大會也表現同一的景象。「國際合作社大會的經歷足以證明生產合作社那一派雖然要把他的理想強諸一切其餘工會，其實在這理想的基礎上面實不能建築有氣力、有發展力的國際合作社機關。」

一九一〇年漢斯·睦勒在國際合作社大會席上，在他的關於現在以及未來的合作社事業之發展的報告中曾宣稱消費協會在政治的問題中之嚴守中立實是合作社發展上一重大的要務。

社會主義者方面對於無產者中之國際的運動、也常常下有批評，說他們每當依據馬克斯的本意，要想實際從事統一工人階級的活動時候，往往失了力量。所以本斯泰因說：「各國裏面現存的社會發

展與政治發展，以及黨的強度、與黨的地位都是大不相同，而各國的社會主義者又在國際大會占有議席與投票權，所以他們對於策略上的手段是否合於目的所下的批評，以及對於原則與策略的限界所下的批評，也都不免極其參差。彼從前因為舊法律的關係，以致失却他們對於本國政府的勢力的那些弱小政黨正不免被迫而宣言這方策爲原則上不可行的，蓋他們自覺處在上述的狀況之下無法足以對付這方策的反動作用。即使他們在特殊狀況之下能認某原則爲合理的，而這原則却不能適用於那些業已超過此發展階段的政黨。并且政治的作用與地位也各隨憲法狀況而含有各不相同的概念與內容。」

英國獨立工黨黨魁麥克唐納爾(Mac Donald)在司徒嘉特大會(一九〇七年)那一年曾說道：「我們所求國際的社會主義能吻合於簡單的，足以表明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的格式的這種希望，實際比三年前還弱，較之十二年前則更弱不可言，并且將愈變愈弱。」他發有極中肯的見解，以爲社會主義者抱着世界政治的思想，其錯誤等於從前的自由主義者：「自由主義時代所有的這種錯誤依然是給社會主義者做警告，社會主義者的國際主義含有形而上與烏托邦的性質，適如從前自由主義所唱的。如果認國際的大會爲一種進步，而非一種阻礙，那麼我們對於上述這一點就不免三復不厭了。最不合理的是莫過於要求德、美、英三國於一般的社會主義政策作一致的議決與行動。姑無論這不外是社會主義信

條的一種共同表示而已。」

我信相於此已對你們表明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實未見有統一的傾向。我們在各國社會主義運動中所見的種種重大差異足以證明這是重大的文明的現象，他和各國的歷史的發展以及國民的特性實有極密切的關係。照馬克斯所說那種進化說，以為跟着資本主義的進展，同時不免也形成一種社會主義的階級鬥爭運動，其實這是不成話。各黨的黨綱在細別上儘管互相不同，但在具體上大多數工黨總具有任何一種的社會主義的目的，這并不是互相矛盾的。一切利益結合體所抱的最後目的，都是最適合於他們的特殊的經濟利益，這也是一種普遍的現象，——如謂手工人要制定法律，科機器以重稅，如謂地主要求制定法律，令國家收買一切外來的穀物，使國內沒有人起來和他們作競爭，以視工人夢想生產手段歸屬他們時候的狀況為最高目的，難道有點不同嗎？這些都是「星期日思想」(Sonntags-ideen)，布梭塔諾早就作有這適當的比喻了。實際上每日的目前工作是較重要。這種工作惟獨在德國，并且即在近代不免受了階級鬥爭論者的非議，因為馬克斯前所宣傳的是階級鬥爭論。在他們却往往看見工人抱着實際政策的態度，其所注目是在取得目前的小利益。

至於我們能否視社會主義爲我們所應該或所可以接近的社會制度，這個問題決不是客觀的在科學中所能討論的問題。在從前我已告訴你們，何以在逆賭得到的時期內似乎不能希望私人資本主義的制度退避社會主義的制度。

當然只能說「在逆賭得到的時期內」。我們不應效巴斯提阿特 (Bastiat) 在他的國民經濟和諧論 (Volkswirtschaftliche Harmonien) 那樣的斷言，而謂「自由與所有」是一切經濟生活的「永久的柱石」。國民經濟學絕不能說出「永久的真理」；我們不能知道還有何種經濟現象會出現，他們也許會與未來的人類達到一種完全不是以我們現在的基礎爲根據的社會制度。但是我們只好委之於未來的子孫：至於我們最近未來的社會主義制度所碰着那些實際政策的困難，許多疑慮，我已經在「論社會主義的國家」那一講中對你們說過了。

但這問題中，猶之在我們對於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合目性所表示的觀念中，當然儘有主客的見解徘徊的餘地，我所首先注意的，是：告訴你們以社會主義的客觀的性質與其重要的派別，并請你們明白關於這個問題的所有錯誤見解。

其次我最不願意作的是：從科學的國民經濟學立場出發指示你們任何一種「永久的」法則，使社會

主義因這原則成爲各時代都「不能實現的東西」。——我若這樣做法，就不免超越科學所具的種種限界而置康德的見解於不理。康德蓋嘗說：

「純粹理性的一切哲學所具最大的而且也許唯一的益處，大約不過消極而已。因爲哲學并不是供擴充而用的官能，乃是供限制規定而用的信條，他也不是用以發現真理，却只有用以防止錯誤的暗助而已。」

第二十一講 俄國社會主義

一 鮑爾塞維主義之成立與其意味

倘使我要在下述數講中陳述社會主義運動在德、法、英諸國境內之最近的發展，我就不免先要說起俄國社會主義，這就是尤其說鮑爾塞維主義的運動；因為如果不明鮑爾塞維運動所生的種種影響，便無從瞭解其餘各國社會主義黨之新生與其改觀。

(A) 俄國各社會主義黨的發展之一覽

在觀察俄國社會主義運動時候，不可忽視那裏的社會主義黨之形成與德國那裏絕不相同。在德國

自拉薩勒派運動停止活動之後，在馬克斯主義的綱要的土地上即已生出了一個惟一的團結的社會民主黨了，在俄國則社會主義運動自始即已分為數派了。而且俄國社會主義運動因為政治的活動遭了種種困難，所以直至一九〇五年為止，不得不假借秘密團體的形式。主要的俄國社會主義黨是如下述：

(1) 社會革命黨 (Die sozialrevolutionäre Partei) 該黨并非站在馬克斯學說的基礎上面，乃形成為一種特殊的俄國黨，社會革命黨員實反乎馬克斯主義而爭謂：須等生產力與資本主義到了相當的發展之後，方才可以轉而至於社會主義。他們以為：即在俄國這樣的農業國境內也可以實施社會主義。依他們的見解正惟俄國各地方帶有農業的與合作社的性質，所以俄國堪以實施社會主義。所以他們尤其依賴着農民。

(2) 馬克斯主義黨 (Die Marxistische Partei) 一八九八年在普勒察諾夫 (Plechanow) 與阿克塞爾洛特 (Axelrod) 領導之下，創立了俄國社會民主主義的工黨，這就是根據馬克斯主義的。其先普勒察諾夫即已創立社會民主黨，自稱為「解放工人的俄國集團」，但在根本上不外秘密活動而已。這社會民主黨自行分裂起來，一部分主張溫和的策略，他們贊成該黨和各種反對政府的運動合作并增進工會的運動。而激烈的那一派則攻擊和非社會主義的政黨合作，其對於工會的運動也取拒絕的態度。在

一九〇三年倫敦大會席上，這條裂痕遂顯然暴露出來。列寧（Lenin）領導的那多數派對於組織問題，希望一種嚴格施行的集中制，而馬托夫（Martov）領導的少數派却視此為阻礙黨的行動自由。屬於多數派中的激烈派此後自稱為「多數黨」，這就是鮑爾塞維黨（Bolshevik），而屬於少數派的代表者却稱為孟塞維爾黨（Menshevik）。孟塞維爾黨主張漸進的教育與漸進的集合無產者，而在列寧領導下的鮑爾塞維黨却要求對於近在眼前的革命作預備。兩者的意見參差復見於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之批評。當時這次革命原是一種政治的，而非社會的。他的究竟目的是注重在憲法與普通選舉權之獲得。他是一種中等階級的，而且無產階級的革命，而且是由農民及中等階級的分子共同施行的。孟塞維爾黨——所謂溫和派的社會主義者——由於這次革命所含這種平民的性質中途推斷：無產階級舍為中等階級所能接受的之外，也不能再進一步；他須和中等階級的政黨締結妥協的條約。而鮑爾塞維黨却堅決的反對這種主張。他們以為因為中等階級只要依合法的途徑進行國家的改革，所以無產階級得勇而不息地實施革命。因為農人一般的是小小的以商品生產為根據的生產者，所以農人得處中立地位，而中等階級得被推翻。無產者，加上赤貧的農人，應該團結起來繼續革命；這就是社會主義的革命之規範，他是與平民革命相對立的。

這種極端的革命的策略被鮑爾塞維黨以加强的程度在一九一七年的革命時代中繼續推行了。無產者在一九〇五年中等階級的民主政治革命中既已連合了農民向君主與大地主進攻了，現在鮑爾塞維黨却要無產者向中等階級的社會推行階級鬥爭。他們於是把較貧的農民和真正的無產者融合起來成爲一個極端的革命的階級。沙皇室打倒之後所建設的臨時政府以及繼起的以下兩政府都是聯合政府。雖然一大批閣席讓給社會主義者——克棧斯岐 (Kerenski) 也在內——然而總算和中等階級的各政黨成了合作之局，併且這聯合政府是由市民、小市民、少數黨以及社會主義革命黨的代表合成的。鮑爾塞維黨一等到握了充分的權力之後，他們便推翻政府、解散國民議會 (Konstituante)。這個假蘇維埃民衆委員會的形式以創立的新中央政府却只由鮑爾塞維黨組織而成。他們反對和一切中等階級的各政黨作妥協和讓步；他們只要建設共產主義的國家並且爲達此目的故，宣布無產階級的獨裁制；交政權於蘇維埃！依黨的術語而說，這口號在前時代是指社會主義革命黨與孟塞維爾黨得勢，而反對和自由主義的中等階級作聯合。但現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時候，同一的這口號却表明全部權力移交革命的無產階級，而這時候站在無產階級上頭的却是鮑爾塞維黨。然則這工人階級的獨裁制，他在領率着或且說妥些他能夠領率着好幾百萬的貧農。這就是「十月革命」之史的意味。(見托洛次基著從十月革命到布勒

斯特和平會議：“Von der Oktoberevolution bis zum Brest-Litovsk-Friedensvertrag” Berlin 1913, S. 39) 托洛次基於一九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依蘇維埃民衆委員會的名義曾發出一張無線電報，却被德國無線電臺拒絕接受，該電報中有說：「工農民主政治獨裁制的偉大理想已結成了軍隊的行伍，而且加強他們的意志了。從此全國將確信：蘇維埃政府并非過去的政府，乃是表示工農兵統治之永久的事實」。

依鮑爾塞維黨的見解，工人階級的獨裁制是何意義呢？

鮑爾塞維黨員布哈林 (Bucharin) 說道：「我黨的黨綱是無產階級的獨裁制。(Programm der D.P.) (見布哈林著共產黨的黨綱“Das Programm der Kommunisten”, Berlin 1918, 第二十頁) 這黨綱的性質可以最明瞭的由於俄羅斯蘇維埃聯邦共和國法律草案第二段中看出來，該草案中已載明憲法的一般原則。其中有說：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對於目下過渡時代的憲法所設的主要問題，是在維持城鄉無產者與赤貧農民的獨裁制而假以全權的全俄會議權的形態：用以完全壓抑中等階級，撲滅人對人的榨取，而確立社會主義；在此社會主義之下不應有階級分離，與國家權力的發生。」(見源流與研究 Quellen und Studien’ 2. Haft, Leipzig u. Berlin 1920, 第三十七頁)

依吾人所知，無產階級的獨裁制實具有兩方面，一是政治的，一是經濟的。在政治的方面應該藉

無產階級的獨裁制以創立一種全新的政體，即所謂會議制度（Ratensystem）。在經濟的方面，應該先行實現社會主義，後圖實現共產主義。

(B) 無產階級獨裁制之政治的意味：會議制度

鮑爾塞維黨所主張無產階級獨裁制的見解，實密切的關係於他們的階級鬥爭的理論。他們以為：俄國革命就是表明工人階級戰勝資本家階級，因此所謂中等階級的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已經達到終點，而工人階級的統治却就是隨着革命的勝利結果而開始。現在達到統治地位的工人階級也得單獨施行政治權力。無產階級可不受法律的束縛，對於一切非無產的分子施行權力統治。列甯解釋道：「獨裁制是一種直接以權力為根據，而不受法律拘束的統治。革命的無產階級獨裁制是由無產階級力爭而得，而且是以無產階級對抗中等階級的權力為根據的統治；他絕不受任何法律的拘束。」（列甯著無產階級的獨裁制與背教者考茨基：Die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und der Renegat K. Kautzky, Leipzig 1919, 第五頁）「所謂不受法律的拘束」不能謂為無法律的狀態，也不能謂為無政府主義所主張的各種強制力之取消。

「不受法律的拘束」蓋謂：鮑爾塞維黨不願株守傳統的舊法律，其次則謂在法律尚未出現之前，武

力應該代之而起。但是在無產階級獨裁制中所實現的并非暴厲統治，乃是一種極嚴格調節而成的強制組織。所以鮑爾塞維黨會發布一大批法律附有極細碎的條文規定。單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末到一九一八年八月的期間內，在公私法各方面，已發布了六百八十五種法律。

鮑爾塞維黨附和着社會政策的文獻中常見的那種見解：即所謂無產階級者乃工業與農業中的傭工人階級之謂。這階級一方面與自由職業者及官吏相對立，他方面與資本家及地主相對立。但是鮑爾塞維黨對此却加以很大的擴充與改造。因為俄國那裏工業的傭工渺乎其少，也許還有一大批貧農，由是鮑爾塞維黨却把無產者的概念擴充起來而稱之曰：工人及「赤貧」農或「貧」農的階級。在鮑爾塞維黨的文獻中對於赤貧農與貧農並沒有較切近的區別。由各種黨綱看來，他們所謂的這種農人是那些具有財產而僅足以生產他們自己生活品的農人。在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四日關於貧農委員會的法律中，凡具有過剩穀物，兼營商業或且雇用奴僕的農人都被除外。赤貧農與貧農的那一階級却應與大地主及所謂一切村莊中等階級相對立。

因為無產者與赤貧農合成的這階級堪以單獨取得政權，由是同時一切其餘階級所有一切政治的權利都剝奪了，無產階級獨裁制乃是有意識的反民主政治的（*bewusst antidemokratisch*）。所有法律

不應依據民主政治的理想，仿照盧梭的意見，成爲一切意志 (Volonté générale) 的表示，只應成爲唯一階級的表示。依盧梭的見解，只有一般的意志才能順着共同認爲最佳的國家目的，以運用國家的目的。現在鮑爾塞維黨方面則廢去盧梭所謂的人民主權而代以無產階級的階級主權。在這裏應該注意的是：鮑爾塞維黨雖建立了階級統治，却并不在國民會議中組成多數人；他們在社會主義黨中無寧處於少數地位以對抗社會革命黨員與孟塞維爾黨。托洛次基說：「我們却曉得我們向於歷史的發展的大道只有一條唯一的出路，而這條出路乃是經過工人階級的獨裁制。」

無產階級的獨裁制在鮑爾塞維黨下所形成的形式就是所謂會議制度。這并不關於會議制度是無產階級獨裁制所能形成的唯一的形式。這種獨裁制所假託的形式乃是特殊的俄國形式。這會議制度和兵士會議及工人會議之設立並沒有關係，兵士會議及工人會議在俄國革命爆發時候早就形成出來了，這些急速地組成的兵士會議與工人會議，乃是一種暫時的政治的救急手段。這個與其可說爲一種會議制度，無寧可說是一種會議的無制度。鮑爾塞維黨的會議制度，也和新德意志國法中所施行的經營會議 (Betriebsrate) 不相干；因爲經營制度乃是工人在各個經營體內派有代表以控制諸經營體并協助工作條件之規定。這種經營會議不外是在太平時候早已存在的工人代表會之繼續行動而已。俄國的會議制

度無寧是一種原則上新的政府形成體與國家形成體，特與一切從前的政體相對立而已。會議制度的本體是在於：「工人階級的羣衆組織成爲全部國權與全部國體的唯一支柱及唯一的基礎。」（見列甯的共產主義的國際黨之方針“Richtlinien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第二十頁。）列甯說：「因爲蘇維埃權力不外是無產階級的獨裁制——即進步階級的獨裁制——之組織體，他進爲新的民主主義，進爲數千百萬工作者與被搾取者之直接參與國家行政，他們藉着他們的經驗，已漸知無產階級中有紀律，有目的意識的前衛爲其最可恃的指導者。」（見列甯的蘇維埃權力之最近的任務“Die nächsten aufgaben der Sowjet-Macht”，第五十九頁）會議制度是與各國境內所形成的議會制度極其相反的。一般的議會是由選舉產生的，而選舉則依地理上與領土上限制的區域舉行的；至於這裏所謂這些政治的團體却由職業階級的選舉產生的。但是——這正是無產階級的獨裁制所特有的——惟獨一種民衆階級，即鮑爾塞維黨所謂較廣義的工人階級，裏面的人才具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一切其餘的公民都沒有選舉權。其次，重要的民主政治的民權，如自由的立社、集會與出版的權，都把一切民衆剝奪了，只保留給與工人階級。一般議會的代表是選出經歷較長的時間的，例如期限二年、三年或且五年，而在這制度下選出的代表可以隨時被撤回。工人應由他們的工廠、他們的工作場、他們的村農區

中派遣他們的代表到一切代表團體上——從地方代表團體到最高的全國代表團體為止，因此全國應布滿一個代表團體的網，他們的代表都是由經濟的機關中選出的。即彼最高的代表團體——中央會議——固然也是照議會的選舉區選出的，也應該再由經濟的集團中派遣的代表組成的。

會議制度還有一種和其他一切憲法不同的特質；即他乃是立法權與行政權的併合體。舊式孟德斯鳩的原則是分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反之現在這裏乃合一切這些權而為一，會議應同時為立法團體與行政團體。不特國家的立法，就是國家行政中一大部分都交給會議。各國境內交給地方的及國家的官僚政治執掌的大多數職權都給會議接受了，此外則每個民衆同志都可以承受一部分的官吏職權。會議的分子也不是議員，也不是官僚。要避免這現象的發生，所以把一切分子都拉進去，會議的小組應變為國家行政的機關。官僚政治的名譽職應儘量使之實現。鮑爾塞維黨員的目的在使各個工人在無庸的條件之下履行國家任務。工人既做了他的八小時的生產工作，更須把幾個鐘頭貢獻於官吏工作。依最近的立法還施行一種政治的工作義務：會議中的一切分子每日應該做二小時的任何一種官吏工作：一、每個分子應負責在國家行政中執行特種工作。二、對於行政工作應施行一種不斷的交換制，以期從事各種行政。三、人民中凡屬於工人階級的應個個都拉來從事國家行政的工作。」

如果這些方策得以到處無限制地施行，如果此事足以鞏固行政職權，同時提高了工作者的文化水平線；則其結果國權自然也自消滅。依列甯的表示，如果一切都成了官吏，那末官僚政治自然消滅。依這原則就是一切法庭也被取消了而代了用選舉制的民衆法庭，只有工人得被選爲法官，就是判決也得和勝利的革命之趨向相吻合。工人應該，作爲會議政府的一部分、參與產業的管理，鄉村會議與農人會議應該以工人政府的機關參與國家行政。工人階級之真正的絕對權是藉會議制度而表現的，所以只有會議制度才能使大多數人的意志表現出來。

無產階級的獨裁制大約不外是一種過渡的政體，他只成爲資本主義的統治推翻以後、共產主義社會建設以前的一個中間的必然的過渡階段。爲要建設共產主義的社會與實現共產主義的社會政體，才先打破中等階級——資本家與地主階級——的全部勢力。爲達這目的故，一時得把獨裁制的統治權交給新掌握這實權的那一階級，並且只有把重要的有力的強制手段交給這個堪以握着統治權的階級去運用，才能夠打破舊統治者的勢力。

工人階級所握這種有組織的政權應該同時成爲最終的政體。如果政權的運用不復需要了，國家恐怕也死滅了。但這情形的發生須在中等的各階級打倒了之後，一切民衆都成爲工人時候。到那時候如

果只有一個統一的工人團體，那末民主政治的最高階段達到了，而且再無需政權用強制手段來對付民衆中某某階級了。於是一切階級差別都撤廢了，再也沒有國家了，只不外一個自治的工人團體而已。

屬於無產階級的獨裁制的還有一種軍權。依鮑爾塞維黨的見解，政權如沒有軍權是不可思議的。又因爲他們所製定的憲法規定有一種新的政權（固然是最終的政權），所以他們自始即已認強大的軍隊之設置是很必要的。

其次，鮑爾塞維式的無產階級獨裁制中所特有的的是他的暴虐主義的策略。有產階級將不願意好意的放棄他們的權力，所以得用武力行動強迫他們出此。

有產階級的權力得用武力打破了，並且即在他的瓦礫場上建設無產階級的新權力。共產主義國際黨的方針已給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至六日的共產主義國際黨大會接受了，其中對此有說道：「革命的時期對於無產階級，要求應用那些攻擊手段以集中他的全部勢力，即應用羣衆行動的方法，其邏輯的繼續程序就是在公開的作戰之下直接和平民的行政機關衝突。一切其他的方法，例如平民的議會主義之革命的利用都得供作這目的使用。」

會議制度在憲法中經了詳細的施行，所以除了中央會議權之外還規定了無數的地方會議權。就地

方的會議而論，則有區域會議、省會議、郡會議與縣會議，此外尚有代表會議。凡握有中央權的高級機關的議決案之施行與純粹地方的問題之解決都屬這些會議負責。各區域的會議大會係由市會議的代表與郡會議大會的代表合成的，并且市民於此實占優勢。我們於此也可以看出一種反民主政治的規定，蓋這裏并不施行平等的普通選舉，却是由各市依每五千選舉者派出一個代表，由各鄉依每二萬五千人派出一個代表。省區的會議是由市會議的代表與縣會議大會的代表組成的。這裏也是市民占優勢，因為在各市每二千選舉人選出一個代表，在各鄉中則每一萬人才選出一個代表。郡會議則由村會議的代表中選出，每一千村民選出一個代表；縣會議是由該縣的村會議的代表選出，每十個村會議議員，選出一個代表，中央政權是由全俄會議大會執行，這大會就是表明俄羅斯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的最高權力，他是由市會議的代表——并且每二萬五千人選出一個代表——與省會議大會的代表組成的——其中每一個代表是由二萬五千人選出的。全俄會議大會選出全俄會議執行委員會，人數至多二百人。這個委員會可以隨時取消，修改政府的議決案或且法律，或且停止其執行。他還得選出民衆委員以代從前的閣員。民衆委員全體是政府與立法機關的主持者，民衆委員會的會議是根據第二次全俄兵工農會議大會的議決案取得執行最高法律的正統。這次大會與其中中央執行委員會却也算支配民衆委員會

議的機關，他可以控制民衆委員會的行動，可以罷免民衆委員而代以他人。民衆委員會執行俄羅斯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的一般事務。全體是由十七個民衆委員組成的。鮑爾塞維黨的憲法中尤其特別的是選舉權之制定。憲法中第四段是關於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的；他最顯明的表示無產階級獨裁制的思想之受了如何徹底的實施。在會議中享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的人只限於下列達到十八歲的那幾種人：

(a) 凡藉生產的及公益的工作以維持他的生活的人以及處理家政，使前述那一類人有從事生產的工作之可能性的人如：在工業、商業以及農業中從事的各種工人與雇員、農人，以及從事耕田，而不雇用傭工人以達利得的目的的哥薩克兵；

(b) 屬於會議的軍隊與艦隊中之兵士；

(c) 屬於這章 a 及 b 二項的市民中，有在某程度上失却其工作能力者。

顯然失却選舉權者是下列那幾種人：

(a) 雇用傭工以達利得目的之人；

(b) 不靠工作的收入以爲生的人，如：靠資本利息、企業收入、財產等以爲生的人；

(c) 私家的商人，商業的與商人的中間人；

(d) 教堂與教會內的神父與教役；

(e) 從前警廳、特別憲兵團及保衛團的雇員及代理人，以及從前俄國皇室的分子；

(f) 依規定的手續被宣告為神經病或精神病的人，以及受監護的人；

(g) 爲了漁利及過誤而判處刑罰的人；限於在法律或且判決書規定的期間之內。

(C) 無產階級的獨裁制之經濟的意味

——以共產主義爲最終目的——

鮑爾塞維黨員布哈林宣言：「由無產階級的獨裁制至於共產主義！這是我黨的口號。」會議制度共和國應該這樣的利用他的政權，務求在經濟界上逐漸達到最終目的——即造成共產主義的社會體。在政治界上應用了階級鬥爭的學說，在經濟界上也應用了這學說。依鮑爾塞維黨的見解，俄國革命已證明資本主義的秩序與資本主義的工作紀律都解體了。現在工人階級似乎已經成夠，已經成熟，去占有生產手段並指揮生產：「有產階級徒然延長舊社會的死戰而導經濟生活陷於完全破產的危境，今若提高經濟的生產力而且儘速地摧折有產階級的抵抗，那末無產階級的獨裁制得實行沒收大資產階級與貴族階級的財產，而把生產手段及交通手段化爲無產者國家的共有財產。」無產階級的獨裁制絕不表

明：現存的生產手段應分配給工人，而且各個工廠應交給在那裏服務的工人作為他們的財產。反之，現存的生產力應儘量地集中起來。所以應首先置在工人的支配權之下的是：大銀行的全部機關、一切公共企業、業已公司化的生產各支業以及一切工業的大經營。農業的財貨應該社會化，而且變為社會管理的經營。小的工業經營與小的農業經營應漸漸合併為大經營。其始小資產可以不受沒收，而且凡不雇用傭工的一切小資產者可以不受強制的制裁。他們應極漸進的，把已社會化的大經營為例，也併入社會主義的大生產之中。無產階級如愈把生產的管理機關弄來而實現工人的管理，那末無產階級獨裁制的任務便也愈速的解決了。

和無產階級獨裁制有關的還有一條綱要即：採用富人的工作義務制。務使工人階級不因富人的偷閑而受損失，應對富人施以工作義務制，并且是這樣的，即：凡月收五百以上至於六百盧布的人，凡雇用工人或僕人的人應領得一本消費工作簿。只有根據這簿裏所載這種人做過的工作，他才能領得維持生活品，但所得的數量遠少於傭工階級。富人的工作義務應成為一般的工作義務之過渡。「我們應立刻採用工作義務制，但實施時候應取極漸進而審慎的步驟，我們由是藉實際的經驗以步步體察，并且富人工作義務制之採用當然是第一步。對於每個有產者——其中也有農人的——施行工作消費簿記

是第一步的計劃，最後須達到完全「封鎖」敵人并且考核每日一般的賬目與控制生產及分配生產品的地步。〔列甯〕

我們最近的目的是仿照郵局來組織全部國民經濟，務使受有組織的無產階級所控制與領導的一切技術家、視察人、簿記員以及一切官員支取一種比工人工資不得超過的薪俸。〔列甯〕。因此得施行無產階級的獨裁制，使工人階級不但事實上在軍隊、法庭、學校以及其他官廳之管理中握其支配權，甚且即在生產品之支配中也是這樣。此時為實施無產階級獨裁制計，應制定一種工人控制法，把尙有所有的資本家置在工人與雇員的控制之下。於是對於一切經濟的企業——無論已否社會化——設立經營會議，作為工人控制的機關。經營會議中工人的權限遠超出德國經營會議律中所設相當的規定。依德國經營會議律工人只有附於企業家的一種協定權與若干的控制權；而俄國的經營會議却規定工人階級對於企業家與高級雇員具有統率權。這等經營會議不但監視一切生產，確定該經營的最低工作率，并且他們還握有控制全部業務通訊的重要權限。依德國國法（第七十一條）經營會議的權力，只限於要求雇主在不危害經營或且業務的祕密的限度內，報告經營的經過；至於俄國法律却分明取銷業務的祕密。至於握有工人控制權而兼處理一切工作事件的最高審判機關是全俄工人控制會議，該會議應製成

關於控制、設計等一般的方案。

用這裏所述的方略以求實現的，不外是共產主義社會之第一階段，就是社會主義社會。其初所求的實也不外社會主義的社會體；因為暫時不外把生產產品，即工廠、機器等歸為公有。在這種社會制度中，凡使用品生活品、等尙是私人所有；這就是說：人人用工作換來的工資購買他所需要的需用品。因此，完全的平等尙未達到；因為各個工人并不平等。這一個強些，那一個弱些，這一個結了婚，那一個却沒有，這一個有多數兒子，那一個却只有少數，如果每個工人根據他所幹的工作對於社會的總收益獲得某程度的參與成分，那末這其間總還有比較好過的人，平等只有在共產主義的社會內，在裏面生產品之分配不是根據產業的工作率，乃按各個人的需要與能力，但事實上需要是不平等，例如各按家庭的大小。如果按各人的事實上的需要而分配，那末平等才算達到了。如生產力有一日達到了高度的發展使一切人生需要能夠受了極度的滿足，那末各個人也可以自願的各按其能力而工作，由是也可以根據這能力與其需要以獲得社會的收益中一部分。然則這第一階段之用紀律，及對工作施行嚴厲的控制與調節絕不是鮑爾塞維黨的理想；得等到一切民衆依自願的行動，藉他們的工作以參與社會的一切工作，這理想方才達到了：一那時候，從第一階段到過渡之門，由是到國家完全死滅之路方始洞

開。〔列甯〕

然則先在俄國的國家制限內施行的無產階級獨裁制應再進一步而為國際的無產階級獨裁制。俄國革命應為世界革命的始幕。

鮑爾塞維黨在其作品及黨綱中屢屢申言：他們不願只替俄國建立無產階級獨裁制，並且他們要認這是一種國際的要求。一切其他民族應該以他們為例而宣告獨裁制。惟有這樣，俄國的無產階級獨裁制方才獲得存在、持久與完全的效力。

第二十二講 俄國社會主義

二 鮑爾塞維主義的根據

(A) 鮑爾塞維主義并非馬克斯主義的

我已把無產階級獨裁制之政治的與經濟的意味與其在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境內如何實現的情形設法表示出來了，現在發生一個問題即：這種無產階級的獨裁制是否馬克斯思想之實現？階級鬥爭的學說、國家的死滅、用工人階級來掠取政治權與經濟權、暴動的策略與世界革命之希望等等，豈不是由馬克斯的溫室中擷取而出的思想麼？十九世紀社會運動中這位極有勢力極其成功的領袖，豈不是早已

製定了這黨綱，并且這發展的系統豈不是從馬克斯與恩格爾在一八四八年所製定的作各國社會主義運動的一般方針的共產黨宣言出發，經過巴黎地方自治政府（即無產階級獨裁制之第一次失敗的嘗試），達到這次要求之最近的實現，結果是本馬克斯的意義以達國際社會主義革命麼？

我們事實上在鮑爾塞維運動的一切領袖方面尋見這種見解，就是鮑爾塞維立法者克利班斯岐（Klinskij）也曾宣言：在俄羅斯會議制共和國的宣言中可以窺見純粹社會主義的國家思想之基本思想是根據馬克斯與恩格爾之真正的學說。

如謂馬克斯猶之鮑爾塞維黨員，曾提出無產階級獨裁制的要求，而且這個要求於他也是和階級鬥爭的學說相關，這是實在的。鮑爾塞維黨也和馬克斯一致拒絕各種欲藉漸進的社會改革或用現存的政權之助力，藉國家的改革法案以達最終目的——即社會主義社會體——的社會主義政策。他們宣言：只有藉工人階級對着資本家與地主階級而施的階級鬥爭，方才能夠實施社會主義；這真是馬克斯的思想。至於所提出的最終目的：先行廢除生產手段的私有權，作為第一階段（社會主義的社會體），次則廢除消費手段的私有權，作為第二階段（共產主義的社會體）；這也是馬克斯主義的。即「國家死滅」之見解，各種政治的權力統治，各種國體將隨共產主義社會而消滅，而代之以經濟的聯合等思想，也

是真正馬克斯主義的。就鮑爾塞維黨所要求的無產階級獨裁制和馬克斯的這兩種思想有關係的地方來說，那末二者間多少的一致是不可否認的。然而惟獨這些是一致的思想。然則就是拒絕一切對於其他社會階級與現存國家施行各種讓步的或且妥協的政策。此外就是社會革命的最終目的。關於其餘一切，則鮑爾塞維黨所抱無產階級獨裁制之見解却與馬克斯的真正的根本觀念立於直接的反對地位。鮑爾塞維黨對於無產階級獨裁制的概念所作特殊的解釋是根本上和馬克斯對於這概念的觀察不相同。社會革命的全部實施法、會議制度、立刻的完全社會化、暴虐主義的策略，這些一切適與馬克斯的思想立於極端的衝突的地位。

依我上述，馬克斯自從德國唯心論哲學，尤其自從黑智爾主義回轉了頭而自行創立他自己的新哲學的基本觀念——即所謂唯物論的歷史觀念——之後，他常常是進化論思想的代表者，而且因此不能算爲鮑爾塞維主義所謂革命的人物了。他的基本思想是：在自動的、不受人的意志與希望所左右的、漸進的發展過程中勢必出現社會主義的，而後出現共產主義的社會體。如果經濟的生產力發展的程度，能使這些力量向在其中供人利用的社會體——就是資本主義私有權的形體——對於新的社會體不得不自行讓位的時候，這共產主義的社會方才出現。如果私有權不復能夠控制這些偉大的力量，那末

只好藉了一種新的有組織的生產力之社會的操縱，以發展經濟生活。於是私有權并非因爲不合理故而被廢除；他將不免沒落，因他衰老了。

列甫與托洛次基指出共產黨宣言以斷定他們是代表馬克斯的基本思想；這并非出於偶然。因爲馬克斯在他的這活動第一時期中所充實的革命精神與社會革命成功之希望自比他的後幾年中所充實的多出甚多。

馬克斯在五、六、七十年時代漸漸從這種對於革命運動的效果之有望的情感中脫出；他的進化論的基本觀念竟至暴露出來。在他的精神的發展中愈其附麗着他的經濟的進化論的基本思想，使他不免對於革命的武力行動之效力愈其感覺懷疑。這就是他在十九世紀的社會革命運動、在勞動急進主義者運動、二月革命及巴黎地方自治政府中所得的種種經驗。他根據這些經驗，遂至反覆申言：關於革命行動成敗的問題，他得修正他的觀察，并且他已不復像從前那樣注重革命的策略了。自民主政治的憲法在各國逐漸施行之後，他也認革命的進行之必然性并非爲絕對的了。他的意見是謂：在嚴格施行民主政治的憲法的那些國家內，即不用革命而走合法的途徑也可以達到無產階級的目的。

馬克斯當然自己也會說明過——這是常常給列甫及其他鮑爾塞維黨員所稱引的：「在資本主義的

及共產主義的社會中間有一個以革命使前者化為後者的時期，一個政治的過度時期也算與他相適應，這過度時期的國家只有革命的無產階級獨裁制而已。」但是這一段話應作如何解釋呢？馬克斯在這一段中蓋欲說：「國家」往往適應着統治的階級狀況；所以我們得完全改造國家，以求達到社會主義地步，并且——這是他的以下的思想——即在民主政治的共和國中也得出現政治的過度時代，務使政治的革新，能與改變了的經濟狀況相適應。他爲了這麼一個過度時期——如他從前嘗有一次說過這是以廢除一般階級差別的必然的過渡時期——才要求無產階級的獨裁制。但是由此使他原則上又與鮑爾塞維黨不相同：即用無產階級的獨裁制不得創造一種新的與民主政治相衝突的政體，這獨裁制只好算爲一種短時期的暫時的例外狀況。他只能成爲一個政治的過渡時期，不得爲政治的新形成物——不是在全部歷史的時期內的政體。鮑爾塞維黨固然也只認無產階級的獨裁制，爲資本主義社會與無國家的共產主義社會間一個間隔期間，然而他們所指的是幾十年。幾代，而馬克斯却從未會說到這一層。反之，依他的見解，民主政治的政體應加保留，不過充以其他的內容而已；馬克斯并不會說過那種與民主政治的憲政體相反的新政體。把全體民衆的政權都剝奪了，這與馬克斯的觀念正相反對。馬克斯屢屢皈依於民主政治的原則，他的合作者恩格爾在批評一八九一年社會民主黨的黨綱草案中有說：「所

謂堅定不移的便是：我黨與工人階級只有假民主政治的共和國之形式才能取得統治權。這是無產階級獨裁制的特殊形體。——馬克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早已宣稱：工人革命的第一步是提高無產階級成爲統治階級，是力爭而得民主政治！——然則馬克斯所謂無產階級獨裁制是表明工人階級業已取得統治權的事實，他不應成爲一種專替無產階級中某一層人掠取統治權的手段。

如果鮑爾塞維黨認巴黎地方自治政府爲達到獨裁制與會議制度的徑路上的第一階段，認馬克斯爲巴黎地方自治政府的極端贊成者，那末這種斷定也不準確而且和我們上面所述的巴黎地方自治政府的實在情形適相衝突。

俄國的會議制度不能視爲和地方自治共和國的憲法立於同一的階段上。馬克斯固然背地稱讚巴黎地方政府，說那裏立法權與行政權是併在一起，但其意却不是作俄國會議制度那樣解釋。地方自治政府尤其具有共產主義的性質。他反對巴黎對於地方與地方官採取過度的集中行爲。他要增加地方的自治力量，他要宣傳：給各區以及各處較大的地方以依據自己的情形而不遵奉中央官廳的指令以處理他們自己的政治事件與社會事件的權限。巴黎地方自治政府，和蘇維埃共和國間尤其有一個根本的差別，即巴黎地方自治政府堅持着普通選舉權。地方自治政府的中央委員會自始自認爲臨時政府，

立刻在地方會議召集之後，即舉行根據普通選舉權的選舉，其時有七十二個與黨及二十一個反對黨選了出來。

(B) 鮑爾塞維主義之特具有俄國式性質

依此，鮑爾塞維主義絕不是與馬克斯主義相同的；他在各點上只有多少與馬克斯的思想相同；鮑爾塞維之實在的、真正的思想在比較上却反出於其他的根據。我們須屢次申明：鮑爾塞維主義是一種特殊的俄國現象而且只能認他爲出於俄國的國民性與俄國的國民性質。即鮑爾塞維主義的這現象也是一種新證據，證明我們平素所屢屢提出的斷定：即各文明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并不表示一致的性質，却暴露特殊國家的異點。如果吾人讀了俄國作家如托爾斯泰、哥果爾 (Gogol) 尤其多斯托夫斯基 (Dostojewski) 諸人的作品，或許會最精確的認識俄國鮑爾塞維主義之真正的本性與其廣播之原因。

在鮑爾塞維的理論及其實際的方案之中覺得有許多點和大多數社會主義制度相接觸的；然而鮑爾塞維主義在全部內容上絕不和這些制度相吻合。我們對於鮑爾塞維主義所根據的俄國國家的基礎，以及隔斷西歐文化與半亞洲文化的深溝，萬不可加以忽視。給與鮑爾塞維主義以異面目的尤其是一基本特徵；這就是單由俄國方面出發的那種真正俄國式思想：即造福世界與支配世界的思想。全人主義應

帶有全俄主義。而宗教神祕的特徵本是鮑爾塞維主義所特有。鮑爾塞維黨員相信他們的學說之萬能，是出於與教會的信徒同其一樣的熱誠。俄國人對於他的國民的解脫職責之信仰心是根於宗教的見解；即所謂俄國教會是唯一真正虔誠的。其次就是那種信仰心：即只有藉忽然的社會的改革方能化全世界而為較佳的未來國家。其間完全缺少進化的觀念，缺少一切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須經特定進展階段與特定過程階段的觀念。這就是對於「那種制度的信仰心」，即以爲要達到目的須用毅力與愛情以遂行這制度。

鮑爾塞維黨的暴動策略也是根據俄國特殊的情形。像西歐諸國內那種強烈的工人運動連同良好組織與良好紀律的工會，在俄國是沒有的。由是人家以爲藉武力革命的進行一轉移間即可助無產階級取得勝利。這種策略絕對不合馬克斯主義的，然而在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中即已表現出來了。固然當時不外是一種政治的革命，是求爭得民主政治，是求打倒貴族政治，然而即在第一革命時期的社會主義潮流中已可發見：有多少是最近鮑爾塞維潮流的出發點。普勒察諾夫所領導的那一組之脫出社會民主黨，不僅由於上文所述關於策略上的抵觸，並且由於原則上與普勒察諾夫所代表多少合於馬克斯主義的觀念相對立。例如列甯提出八小時工作日的要求以對抗工會的設立，他宣傳暴動并勸加入一般革命

的政府，拒絕一切合法的行動形式，并且適與嚴格馬克斯派的信徒相反，而要求替農民立刻沒收一切非農民的土地。這與社會民主黨的正式黨綱正相反對，蓋這黨綱實替農人要求發給解放時候收回的土地，而常常鄙視一切土地沒收之要求為空想。（見 Max Weger, Zur Lage der bürgerlichen Demokratie in Runland.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1906, Bd. 4, S. 281）列甫在一九〇一年所發表的「做什麼」(Was tun) 中已經有說到馬克斯主義者（斯特魯味 Struve 等）的話：「本斯泰因派，以及大多數正統馬克斯派所趨歸的那批評派等實姦淫社會主義的意識，因為他們把馬克斯主義貶抑到極低的地步；他們宣傳磨折社會的對立鋒稜的理論，他們認社會革命與無產階級獨裁制的思想為不合理的，他們把工人運動與階級鬥爭還元到工會主義 (Tradeunionismus) 把『實在論』的鬥爭還元到小小的按級而施的改革。」列甫所尤其啣恨的是一切只注重眼前效果的人。……這位作家既把一切見解不同的人們駁倒之後，便製定組織俄國社會民主黨的一個方案。他以為社會民主黨的「理想」是一種極強的組織，「能夠採取暴動與其他各種進攻手段，予君主專制主義以致命場。」他應為一種強有力的、極其祕密的、絕對集中的組織，把一切陰謀活動的羈勒握在他的手掌裏。」

enin, Was tun? Die Schmerzfragen unserer Bewegung, Bibliographie des Sozialismus. Do-

kumente des Sozialismus. 1901-1902, Bd. 1.) 善乎衛柏 (Max Weber) 曾指明馬克斯主義的社會民主黨與列甯主義的(即鮑爾塞維的集團)相對立的原因是在後者的暴動主義：「目下這個(即普勒察諾夫集團與列甯集團的決裂)乃是那些根本上生存在外國而對於西歐的社會民主黨的傳說具有意識的正統派領袖，因反對現在俄國自出版自由之後許多成立的團體採取暴動主義，而生自然的結果」。因此貝柏爾的介紹也竟告失敗：列甯蓋拒絕接受不諳俄國情形的外國人之勸告。這種暴動心理自身的確不只是由於那種因目前形勢而生的熱烈的希望：即以爲現在正是政治上徹底的推翻自治，至少足以強迫立刻實現社會主義的「最低限黨綱」的時日。革命主義以及對於「進化律」之反對態度無寧出在赫爾層 (Herzen) 與拉夫洛夫 (Lewrow) 以來俄國特有的社會主義；牠非關於「特種的黑智爾思想深在血液中所起的反應」。(見 Max Weber, a. a. O. S. 232)

列甯派在原則上也堅決地詆毀馬克斯所唱的進化論學說，他說：無產階級中所抱：「團體是一種過程」適足以「削弱革命意識的原素」。

暴動主義的策略也常見在一九〇五年各社會主義黨的口號及宣言中；例如在加蓬 (Capon) 寄與一個社會主義者的一封信中有謂：「我眼見目下狀況而知道現代史的重大關係，我以行動的人

物，尤其以革命黨員的資格，喚起俄國的無產階級及一切社會主義黨立刻結合起來開始作反抗沙皇的暴動。各黨的一切力量應該都動員起來。技術的作戰計劃應該在人人方面是同一的：炸彈、火藥、個人虐待與羣衆虐待——一切這些可以促進民衆的激昂。」(Offener Brief Gapsans an die russischen Sozialisten. Dokumente des Sozialismus, 1905, Bd. 5, S. 141.)

鮑爾塞維黨固然指明他們，與馬克斯同認社會革命爲一種國際的，然而即在這裏也可斷定在馬克斯主義與鮑爾塞維主義中間有一重大的差別，馬克斯因株守他的唯物史觀，當然承認社會主義運動爲一種國際的；但他的意思是說：因爲資本主義漸漸侵入各國，所以他的結果現象——就是傭工無產者——也不免逐漸多量地出現於各國，因此階級鬥爭也不免變爲國際的。在這種社會革命時候，資本主義所在最成熟最發展的各國必定做了指導，因此資本家階級與工人階級的對立必定銳化到極端；然則尤其是各工業國，而英國最占先，所以馬克斯也說：「這種解決應始於世界大戰，在那時候，無產階級將被推到現在支配世界市場的那民族，——即英國所立的領袖地位。」鮑爾塞維黨却完全異於此見解，他們只希望未來有一個新世界國家出現，能予一切人類以新福利。他們要把他們理想向全人類宣傳，要賦予全人類以平等。要把思想與理想託付全世界，這是俄國特有的性癖，猶之多斯托夫斯基有

一次在他的政治論文中嘗明言：「我現在不說基督的徒黨，而說我們俄國的社會主義；俄國社會主義的目的，是欲在地球能許他實現的範圍內，成爲全世界的教會。其次我說的是那一種不可遏止的渴望着：本基督的名義而作巨大的、一般的、同胞的結合；這是俄國人刻刻在懷的思想。固然這種結合其始只寄於希望與祈禱，不寄於行爲，然而這些千百萬人所具宗教的本能絕不會推進這種結合成爲機械的形體：俄國民的社會主義不在於共產主義；他信心神的療治在於本基督的名義以結合一切民族。這是我們俄國的社會主義。」

他在他的愚人 (Idiot) 又說：「你們試指示俄國人以未來全人類之革新與復甦，也許單獨由於俄國的思想、俄國的神與基督，你們將見有一個極強大而忠實、聰明而慈祥的巨人出現於奇異的世界，出現於奇異而駭愕的歐洲各民族之前；因爲他們所期望於我們民族的不外刀劍與武力，因爲他們自己以判決我們，所以舍野蠻人之外，更不能想像得出我們。他們現在還是這樣想像，其實他們作這樣想像，愈久愈好！」

就俄國這樣奇異的信仰着世界宗教宣傳這一點上看來，鮑爾塞維主義也有和赫耳層 (Alexander Herzen) 相接觸之點；因爲赫耳層相信俄國施行一般的共產制足以解決各國的社會問題，他并且以爲

資本主義時代可以越過去，而且俄國行將復活垂斃的歐洲。

即會議制度的思想也是根據於俄國特殊的狀況；我在這裏要指明會議思想自身并非新創的東西。尤其在帶有工團主義性質的各國內，這工人會議的設立早已很久爲人主張了。但謂在俄國何以正在復施這條綱要，這却又關係俄國的狀況。會議制度前驅是一九〇五年彼得堡的工人代表會議，蓋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二十二日）屠殺之後政府假上議院議員細德羅夫斯基（Schitlowski）之手設法和工人接洽，並且爲這目的故，要求選舉代表，工人因爲他們的條件不待接受，竟拒絕談判，但保留這代表會以先解決地方問題。這工人代表會議依一九〇五年十一月末所接受的規定係由至少擁有四百工人的各工廠派來的代表組成的。即立法權與行政權合併之思想也早已受主張了。所謂「聯合會之聯合會」是以自由職業之自由結合爲其核心，他在一九〇五年頭幾月的期間內創立起來，尤其用以推行民主政治的目的；他公布一種立憲大會的計劃，這大會應在全國九百六十八選舉區內由兩性之年逾二十一歲者選舉出來，並且應把立法、司法、行政三權萃於一身，然則這就是：「羣衆的獨裁判而造成一種偉大的中央的革命裁判所。」（Max Weber, a. a. O. S. 291）在一九〇五年五月初舉行的俄國社會民主黨全黨大會席上，把議會選舉的要求案取消了以抵抗鮑爾塞維黨的劇烈的反抗。即鮑爾塞維黨所特有的那

種和農民的結合在當時也已經受人要求了。在一九〇五年三月由俄國社會民主黨散發的農人傳單中有說：「現在農民對於我們的奮鬥應處什麼態度呢？他們應如何措置呢？助誰呢？助我們或且沙皇呢？和誰合作呢？和爭自由的我們工人、或且和正爲這次奮鬥屠殺我們的沙皇呢？——對此只有一個答案：和我們工人、和你們的兄弟、兒子及同志啊！你們農人在這次和沙皇及其政府的鬥爭中，應站在我們工黨的紅色旗幟之下啊！而且結合起來，用共同的力量，我們快要取得自由啊！」(Dokumente des Sozialismus, 1905, Bd. 5, S. 474)。事實上農人會的代表在形式上會和工人代表會議的社會主義團體及聯合會之聯合會聯合了。今如謂鮑爾塞維主義不是根據於俄國特殊的觀念及其狀況，而是受了外國的思想與黨見的重大影響，那末對牠生有特殊勢力的與其爲馬克斯派，無寧爲其他各派。

(C) 鮑爾塞維主義是布郎魁主義、工團主義，無政府主義、與歐文主義各種思想的混合物

(一) 布郎魁主義的 列甯與托洛次基要用武力的革命對抗有產階級以引起社會革命；這就是適合布郎魁主義的，不合馬克斯主義的思想歷程。現在我把上文所說布郎魁主義的策略引出，再行指明布郎魁主義的政策在各點上和鮑爾塞維主義的相同之處。這可於布郎魁在他的作品資本與工作所公表

的革命的要求中看出來。他在那裏，關於政治方面則要求：壓抑軍隊與法官階級，直接的取消中等及高等官職。暫時維持下級官吏。淘汰一切黑軍，無論男女。集合教會、寺院、男女市民以及皇室領地管理人的動產及不動產。重行採用這些方略以對抗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共和國之一切真正的敵人。宣告自此日爲始凡買賣或抵押財產都爲無效。

改定官吏薪俸。廢止刑法與法庭。對於民事採用仲裁裁判所，對於刑事採用陪審制，這是一種依罪抵罪的科罰，是由陪審員本其良心不依法律而判決的；至於科罰的種類則自始卽已規定。

組成一種國民的國防軍。予工人及共和國人民以一般的武裝。
敵人無自由。

關於財政方面：壓抑國債的總賬簿。設立委員會整理貯金。採用一種依遺產與收入爲比例而徵的直接稅以代一切直接稅與間接稅。

以巴黎獨裁制爲政體。「一八四八年整年的巴黎獨裁制似乎已替行將結束的法國與全歷史省却四百年時間了。」

(二) 工團主義的 因爲工團主義者一方面聲言反對國家、反對議會政治、反對民主政治；他方

面申明工人在其經營與其職業團體中活動的重要性；所以在這點上看來他實有與鮑爾塞維黨員相同的地方。工團主義的思想對於鮑爾塞維的學說之形成，實有極大的影響。因此，德國工團主義者曾接受贊成俄國蘇維埃共和國的議決案，並且其餘各國的工團主義集團也有類似的議決案。但工團主義者對於羣衆固然要求直接的行動、創造的行動以代議會政治；但這種直接的行動是意在移一切活動於各地的工會。反之，鮑爾塞維主義在會議制度中實創立一種集中的勢力而附中央機關以巨大的權限，工團主義者是完全反國家的，他們只要經濟的，不要政治的活動。然而工團主義者却往往對於鮑爾塞維主義的若干原則表示強烈的同情，例如在工團主義者雜誌的一篇論文中有說：「在西方未受社會主義的組織化以前，我們只有把一種財貨介紹到那裏去。而且這就是鮑爾塞維主義。」(Der Syndikalist Nr. 6. 1919) 在該論文中却有另一句說：「如其工人要自行執政——他們惟獨可以做社會主義社會的統治者——，那末國家便是不可能的。工人至是自理其政務，也無所用中央機關及國民大會。工人至是結合起來，替自己，不替不工作者而工作，而且對內對外也無須兵力。」這是完全反鮑爾塞維主義的；因為工團主義者不只拒絕國民大會，並且拒絕中央機關；至於在俄羅斯會議制共和國內則見有強大的中央權與軍權，至該論文中以下所說：「工團主義者要的是工人自己的，可以付與工人會議的那

種統治權；」這也是與俄國會議制度相反的：蓋工團主義的工人會議是被視為自主的、地方的、工會的會議。德國共產主義各黨所唱的會議制度，也顯然在那裏受了拒絕：「工團主義者是純粹會議思想的信徒，這會議是建設在社會革命的工會上面。」他們蓋要求一種工會的會議制度。俄國的會議固然也是建設在地方的團體之上，但選出的是各經營的代表，而且這些會議是以全俄會議大會為最高機關。工團主義却反此而宣言：「我們應該完成工會而為會議機關。」（見共產黨與工團主義者 "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und die Syndikalisten" Der Syndikalist. Nr. 30, 1919）「工會的心腹之人應作工人的會議人物，他們得同經營的工人討論目下狀況下應為之事。各經營與各工會聯合會內應有工會組織的工人；他們和他們的心腹，他們的會議，討論之後，再議決行動。如果工人是主張工團主義，是有良好組織的，則其組織的範圍是很簡單的。但阻礙健全組織的是政黨與中央機關。」這種見解顯然反對鮑爾塞維式的會議制度。「會議聯合大會處置一切經濟的及政治的問題，他決定政治的行動之必要與否，并且聯合其他以革命社會主義為基礎的工人團體以實施這些行動。此外，大會對於經營會議的行動，提出一致的方針，并調節主要各集團的關係。」這種大會政策同時被視為政策與理想。然則工會制度不只是由下向上而建設，并且得儘量予各集團以獨立性。這是一種集團制度，却不

是一種集中組織的會議制度。反之，俄國會議制度內的選舉條例是多麼精密地規定了的。這些規定并不是合於工團主義。在一本工團主義的小冊子中有說：「依此可以明瞭：我們所要求的會議制度是和其他一切極不相同的。我們視此非為特殊的、新穎的、却完全是藉工人自身以調理一切社會的情況。會議不應受選舉條例所規定，不應受法律所制限，而且不應隸屬於政府。他們是生產的、管理的、調節的而且實施的工人機關。他們依雙方的協定以處理一切事件，不受議會壓迫，以組成他們的基礎，而且依然是各經營中的工人，這就是工會。而各個委員會與關係集團當然可以依自由的協定和別區域內負有同一任務，同一目的的委員會及關係集團，例如學校委員會等，互換意見；這些會合却有一種指明的與開導的性質；至於發展的自由依然保留給各集團。」〔Der kommunistische Aufbau des Syndikalismus im Gegensatz zum Partei. Kommunismus und Staatssozialismus. S. 10〕

工團主義者關於無產階級獨裁制也像關於會議制度一樣地和鮑爾塞維黨不相同。於此，又現出工團主義的反國家的、反集中的性質。像俄國那裏由一階級執行的一種無產階級獨裁制把國中的全權擁為己有而表現一種單一組織的意志；這是工團主義所不知道的。他們反對各種政治的獨裁制，甚且反對一般的暴動方策之應用，他們只認罷工是奮鬥手段。

(三) 無政府主義的 鮑爾塞維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相同的地方在於：他們是反對（所謂傳統性的）國家、反對議會政治的活動。而和所謂共產主義的無政府主義者及他們所主張的共產主義策略相接觸之點，尤其密切。在這裏尤其是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如巴庫甯等，他們的思想顯然有和鮑爾塞維黨很相似的地方。但是鮑爾塞維黨同時却有和無政府主義根本不同的主張。因此可以明白：何以俄國會議制政府把無政府主義者解除了武裝，何以各國的無政府主義者集團屢次發出嚴重反對鮑爾塞維主義的宣言。其差別在於下列幾點：

(a) 無政府主義者原則上、原理上反對「國家」。他們要求一種無國家的社會。他們反對用中央權、法律或且上峯命令來監護自由的個人。他們要求自由人自行結合。他們說：「社會主義文明的基礎體是獨自經營而互相交換的團體之聯合。……自立的人，不許他人干預他自己的事；家庭的房屋團體，是以家屋為他的世界；地方團體是自治的；官廳或且團體聯合會，依此類推，即凡範圍愈大的聯合會其任務便也愈小——這就是一種社會的情形，這惟獨是社會主義，我們值得為他而活動，因他會救我們於痛苦之中。」〔見 Landauer 的喚起社會主義 'Aufbruch zum Sozialismus' 130至131頁〕

鮑爾塞維黨也反對國家，他只反對資本主義的國家、有產階級的國家；却不反對國家的權力與國

家的制度。反之，如上述，蘇維埃政府實用極嚴厲的爲資本主義的國家內所未見的規定以施行國權。鮑爾塞維黨員刺得克 (Radek) 在一本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冊子裏有說道：「無產階級破壞的是那個作爲榨取并虐待民衆的機關的國家，但他仍保留國家機關，以圖徹底的剝奪資本家階級的財產并壓制他。」〔見 Radek 的無政府主義與會議制政府 'Anarchismus und Räteregierung' 第五頁〕在另一段中有說：「會議制革命如其沒有創立一個中央的作戰機關，即一個政府，即集合地方蘇維埃的一切力量而指導他們的那一種政權，恐怕早已給反動派的勢力壓倒了。」(前著第一一頁)然則鮑爾塞維主義爲撲滅有產階級故，實認一個固有的工人國家，一種固有的工人權力是很必要的，而無政府主義者却拒絕階級統治。另有一個鮑爾塞維主義的領袖——布哈林——也說無政府主義者對於國家所作的想像「是非科學的，甚且幼稚的」(見布哈林的無政府主義與科學的共產主義 'Anarchismus und wissenschaftlichen Kommunismus, 第八頁)。他也斷言：無產階級爲他的鬥爭計實需用一種組織，這麼一種權力就是政權。

(b) 鮑爾塞維黨要社會主義的社會成爲集中的大經營，而且正惟無產階級獨裁制是實施這種完全社會主義化的一種手段。而無政府主義者却反而要求小小的地方經濟集團。他們主張反集中的生

產，他們要賦與各個經濟聯合會及經濟集團以極端的獨立性，並且要維持小經營。布哈林有一次很準確地描寫二者間的對立：「我們主張大經營的集中生產，牠把生產力發展到最大限度；而無政府主義者却主張反集中的小生產，牠不會提高只會降低生產力的水平線。」（見布哈林的無政府主義與科學的共產主義第九頁）。由此可見兩派對於無產階級獨裁制所取不同的態度。無政府主義者根本上不要無產階級獨裁制，因為他們反對任何一種統治權。他們主張各個人的武力行動與集團行動，却不贊成依計劃而組織的羣衆團體。然則在這裏猶如在經濟界上，贊成反集中，不贊成集中。無政府主義者所主張破碎的、由各個小集團進行的暴動實與鮑塞維黨所唱的無產階級獨裁制漠不相關，所以布哈林也申說：「共產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對之表示異見的那第二個重要問題，就是對於無產階級獨裁制表示的態度。……他們（指無政府主義者）因放棄無產階級獨裁制，遂放棄了鬥爭中最強的武器；他們因為反對獨裁制，遂弛解了無產階級的力量，從無產階級手中奪却武器，在容體上實援助資產階級并該階級中反叛社會的代理者。」（同著第九及第十一頁）。列甯也申言：無政府主義反對革命的無產階級藉他的革命的獨裁制以運用政權。（見列甯的國家與革命 "Staat und Revolution" 第一〇七頁）他在另一處又說：「資產階級尤其小資產階級的習慣與傳說都是反對國家控制，而贊成『神聖私有權』、

『神聖』私人企業之不可侵犯。我們現在尤其瞭然窺見：馬克斯所謂無政府主義與無政府工團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流派這句話是多麼正確，這二派對於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獨裁制、共產主義是處於多麼不安協的對立地位。』見列甯的蘇維埃國家之最近的任務，'Die nächsten Aufgaben der Sowjetmacht'，第二十三頁。

(四) 歐文主義的 鮑爾塞維黨以為要使工人堪以施行社會主義，只有使用必需的教育與性格養成；在這觀念上他實和舊時歐文的思想相合。上文已經說過：這位英國社會主義者在他的十九世紀初期發表的作品中已經主張這種思想：即人的性質可以藉根本的教育而受了根本的改革并且堪以應付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現在托洛次基也說：藉他所用的工作紀律可以使人的良心、義務心與創造慾達到最大限度，并且此後可以發展一種新的，即共產主義的道德；這正是與歐文同一的思想，至列甯所主張藉習慣可以養成一種新道德，也是一種類似的見解。他說：「我們向於社會主義而努力，確信牠將不免發育而為共產主義，并且由於此種關係，連人對人之暴虐、人對人之壓制以及一部分人民對他部分人民之壓制，自然歸於淘汰了；因為人類將無需受了強制與壓服而自慣於遵守社會主義的共同生活上的基本規律。」見列甯的國家與革命第七十頁。

三 對於鮑爾塞維主義之批評的最後觀察

鮑爾塞維主義的批評是以鮑爾塞維黨的理論及其實驗為對象，就鮑爾塞維黨義的理論而言，則批評的任務越發難以了結；因為鮑爾塞維黨並沒有一致的，整個的理論，如果真如鮑爾塞維主義的領袖所屢屢斷言鮑爾塞維主義無非就是馬克斯主義，那末只需簡簡單單的把馬克斯主義的批評做鮑爾塞維主義的批評就夠了。但是事實上如上文所述，鮑爾塞維主義乃是馬克斯主義、布郎魁主義、工團主義、無政府主義以及歐文主義的各種思想之混合物，所以依嚴格來說，我們的批評也應再批言各派再加以批評的討論；但是在這裏却不能做這套工夫，我只能請諸君參看本書各處對於這些各派所作批評的說明。

關於鮑爾塞維黨的實驗與政策，其情形却不相同，在這裏不特見有顯明的而且確定的提案，並且鮑爾塞維黨的原則大半部在實際上也都實現了，或則至少已設法作實際的實現了。在從來歷史上未見有一種巨大的社會革命運動被這樣強毅的實施了，而這運動的領袖能夠這樣長久的保持統治權。就社會革命的方略之持久性而言，那末英國勞動黨、法國二月革命、巴黎地方自治政府比之鮑爾塞維

主義尙有什麼意義可言。

國民經濟學家很少的能夠從實際的經驗方面出發對於各派社會主義者及社會改革論者所作大膽的改革方案下了批評；因爲通例這些方案依然未經實施；牠們不外是思想形像，從未曾得有肉與血。無產階級獨裁制與會議制度却事實上底於實行；我們可就牠們的果實而認識牠們。

對於鮑爾塞維黨的運動的批評者，尤其對於鮑爾塞維黨所實施的無產階級獨裁制及會議制度的批評者往往有這種錯誤，即：他們把現在俄國國民經濟陷於重大苦境與不幸的全部罪過推在鮑爾塞維黨立法者所定的方略身上。現在俄國工業與農業所處的苦况大半是由於戰爭及與此相關的種種事件，吾人固然承認了這事實，但對於那裏的情況下了客觀的判斷的人却也得歸結說：鮑爾塞維黨的政策在大體上實陷於那種過失；即鮑爾塞維黨對於俄國政策與經濟之改造所寄的一切大希望與期待依然未得解決。

鮑爾塞維黨所實行的革命運動又證明了自勞動急進派以至現在的各次大社會革命所得的老經驗，即實行革命的政策目的實比經濟目的容易而持久。表面看來政治上的與憲法上的革新固然實現了而且直到現在還在維持着。反之，經濟的改革却完全不成功并且在許多點上完全回到舊時資本主義的經

濟制度。鮑爾塞維主義的政治力量還沒有崩壞。在這方面可以說有多少表面的成功；可是這種成功絕不是內在的。憲法的字句成績可以表面上受了維持，而且其中也可以不必一定含有該憲法的創造者所本的精神。因為現在無人願意說鮑爾塞維黨的立法由於會議制度已經成了一種較完全的，合於真正民意的了。這會議制共和國的法律與規定中不知有多少，在最近以前中不免又取消了，更有多少依然完全未經實施。

官吏的數目說是應該減少了；因為大部分的官吏職務應由會議的自治體接受了。可是正惟在蘇維埃統治下，發生一種非常增加的官吏軍。再就官吏自身而論，說是他們應該沒有資本主義時代的放恣與腐敗，然而就這新官僚所得的一切經驗却適證其反。會議所選定的新官吏常常證明完全不勝其任，而且這在鐵路業務方面尤其引起極重大的不幸。「舊的」官僚不免大批的又被吸引回任，并且一般對於新政府常有官吏腐敗與賄賂之訴。例如列甯說：「鐵路業務也許最明顯的表明大資本家所創設的機關中之經濟的狀況；在裏面尤其顯現地表明無行的小資產階級分子在和無產階級的組織力作鬥爭。行政機關雇用大批奸人、污吏，一部分無產階級分子則為紀律而奮鬥，但在這一部中猶之在其他部分中一樣，也有許多遊移的弱者，不堪以抵抗個人的利益之投機、與賄賂所『誘惑』；而吾人所希望以正當的

工作戰勝災荒與失業的全體機關竟為誘惑所賣而被破壞了。」

會議制度說是要使各團體的代表傳達民衆的實在的民意與其真正的經濟利益。事實上要使選出的代表都是鮑爾塞維主義的信徒，常常只有使用暴虐的手段。別黨或且別派的分子在系統上都被摒絕，會議制憲法說是應為無產階級的政體，事實上却發展而為列甯與其黨羽的獨裁制，許多服從新憲法規定的官吏與代表，內心裏并不同意於鮑爾塞維黨的傾向。

然而會議制度却也有一點極合理的辦法；就是較加力、較切實的吸引經濟上熟練的人以從事會議的與政治的工作。這種極對的思想，即除開一般選出的代表之外再令職業階級代表在會議內的思想，固然已經實現了，但是還是不充分；因為不特只極片面的單許傭工人及赤貧農作為這種職業代表，甚且竟把職業階級的原則作為政治的活動之唯一的基礎，而不把牠作為補充之用；其結果把一切經濟的經營加以危險的政治化。鮑爾塞維黨的會議制度的負責者欲使農業、工業及交通業中熟練的代表，協同討論，協同行政，務使不惟純粹的政治家及對於這些經濟問題甚形疎遠的人支配着立法與行政；這是極對的要求。不過對於這要求也得認真去做才是；并且如果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只限給與傭工與赤貧農，那末要得這種必需的內行的判斷，便是不可能。

就實現經濟目的而言，無產階級獨裁制實完全失敗。在這裏個人的獨裁制立即起來代替工人階級的獨裁制，甚且這種發展乃是一種極順自然的。因為鮑爾塞維黨是從這種假說出發：好像平等化了工資率，足以形成一個一致而團結的階級。但在所謂無產階級裏面實無一致與團結可言。除開工業上的傭工人與赤貧農人是完全不同的社會層之外，就是傭工人階級裏面已有極大的差別。各就技能多少，而且技能有無的工率而言，已見有極大的差別了。此外則更把設計的工作與組織技術的工作的代表降落到執行的工作那一層，并使現在復收入經營中的舊日企業家接受平均工資。在精神的與肉體的、有技能的與無技能的、設計的與執行的工作中間，所有一切差別在實際上極其嚴厲的發生效力，并且一般的工人層在必需的精神與道德上并非成熟，勢不能教他們做經營的統治者。由是各經營內生產率之驚人的衰落迫着列甯，逐漸放棄同僚制度而改用個人獨裁制度。此外迫他出此者尚有無紀律之關係，這是階級獨裁制裏面缺少統一的指揮所致。這裏所得的經驗，正與在工人生產合作社裏面常常所得的一樣。在二月革命中所得的實驗已經特富有教訓；蓋那時早已有一種潛伏的無產階級獨裁制，并且工人所提出以國家信用貸款給予工人生產合作社的主要要求也被接受了。一八四八年七月受國家三百萬馬克信用貸款的援助的五十六家工人生產合作社，到了一八五三年只剩下九家。

卽列甯也被迫而逐步回到資本主義的工資與工作方法：回到工資差別法、回到特殊能率獎勵法，甚且回到資本主義所使用極端的手段，卽「泰羅制度」(Taylor system)。列甯、托洛次基及其他的鮑爾塞維黨領袖很奇怪地公然承認無產階級還沒有成熟，沒有教育與高度文明，以適應種種要求。這事竟也引起修正鮑爾塞維黨的黨綱，於是一九一九年三月代以一種新黨綱。在這新黨綱中句句說到羣衆之無教育，此後應圖有以改正牠。現在應藉強毅的系統的工作以造成工作紀律的基礎，卽養成工作時候極端的責任心與極端的雙方控制力。然則從前希望牠在全勝的革命之後立刻對於其餘民衆施行政治的及經濟的獨裁制的那一階級現在被視爲「無教育的」了。但是列甯倒還樂觀地，相信經過若干短期期的教育與慣習之後可把工人提高起來，到時候可無需再以較優的酬備雇用中等階級的智能之士了。

由於經營會議的同僚制度而遭了失敗，由於失敗而引起了新法令，於是廢除了經營會議而代以各個組織者的指揮，列甯當然希望因此不致有墮入資本主義之恐懼，因爲藉着工人組織的力量與「有經驗的」共產主義者之監視可以壓制這種統治的野心；因爲這不外是一種過渡制度，直到全體工人取得必需的能力爲止，在最近的鮑爾塞維黨綱要中爲了這目的曾提議工人每日應以兩小時，在無特別報酬的條件之下，研究手工業及生產的理論並完成技術上、國家行政上及兵役上的實驗。此外則藉一種新

法律施行普通工作義務，以代從前專施於富人的工作義務。這種普通工作義務是經托洛次基所作蘇維埃共和國的一種新法律而施行，共三十七點，其中一部分是很嚴格的規定，對於工作不雷發布一種軍隊的強制制度。所有工人，應由各處——甚至由軍隊與鄉村中——徵集而來，並且用嚴酷的強制手段驅赴工作，為確定首先必需執行的工作計，應設立地方機關，以報告工作力的需要并分配工作。結果，工作的軍事化被直接認為各種過渡經濟上「絕對的」必要行為，而這種過渡經濟却就是建設在普通工作義務的原則上面。這種組織之天然的領導者與組織者應由軍事機關抽選出來；所有工人應歸他們管轄。

普通工作義務的思想，猶如會議制度的思想，的確也含有多少至理。但是這種工作義務得成爲一種道德的義務，他得成爲倫理的假定說，深深地中入各人的心坎裏，無論這人是富或是貧，或且屬於那一階級。可是對於各個人若用軍事的錐刺與壓迫，教他們盡某種工作，這却不能使工作義務在經濟上收了效果。強迫的工作在經濟上是惡劣的。列甯對於經濟的處理既被迫而採用資本主義的方法，在這裏復試用與這種方法相衝突的手段；這是一種可注意的矛盾；因為資本主義的方法是自由的工作爲前提的。

不但工人不願在這種強迫制度下勒其工作，就是技術家、中等階級的專門家與組織者也不願意在「有經驗的」共產主義者監視之下而工作；謂在短時期內一般的工人可以藉教育與慣習學得工夫，把其始尚是託付於俸給較優的雇員的事來幹，這種思想乃是空想的。依鮑爾塞維黨的見解，還是信任羣衆的「創造力」，這是由於他們完全不理解個性、才能、創造力等的意味。得給這種人以其才幹的發展上所必需的自由及遊餘地步，這種人才能自行發展。

到底鮑爾塞維黨的夢想幾時可以實現，人類在將來會否達到人人皆自由願意不假強制而事工作的階段，我們可以安然交給未來擔負。我們現在應做的苦的眼前工作：無論是像俄國的國家，在那裏豐富的自然寶藏只在期待組織力與創造力，以供作非常增進國民富力之用，抑或是像德國的國家，在那裏，處於不良的自然條件與凡爾賽和約的苛酷條件之下，只有藉密集的精神的工作方可使國民富力達得舊時的高度而又加增起來——，在這兩種國家內，我們尤其需要那種人物，即具有創造力與冒險心能夠完成功業的人們。姑無論俄國那裏如何在試行無階級獨裁制，我們只不見其對精神的工作表敬意與對自由的創造者具理解。這兩種東西却正合着理智的獨裁制，他們雖歷經一切時代潮流，還將勝利而且必定勝利。

第二十三講 德國社會主義

一 科學的社會主義中新潮流：新馬克斯主義與戰時社會主義

如上述（見第十九講）戰前馬克斯主義在德國實占着優勢：不特德國社會民主黨團結起來皈依馬克斯思想，就是離開政黨政策，惟特作品而本馬克斯主義的精神以活動的著作家中也是絕大多數屬於馬克斯的信徒。

社會民主黨方面正式主張的馬克斯主義信條固然是不無可爭議的：我們已見在所謂修正派裏面已成立一種反潮流，他以爲在本斯泰因的精神的指導之下，不得不將馬克斯主義及其利用在黨綱中的重

要各點加以修改。

由於世界大戰而生的重大的政治事件遂引起了一新派以對抗舊的正統的馬克斯主義。就是由社會民主黨自身也出現了許多人物如楞士 (Lensch) 梭涅 (Renner) 庫諾 (Cunow) 嘿尼士 (Hänisch) 等——這不過就最重要的名字中舉出幾個——，他們在原則上是批評該黨的馬克斯的舊基本觀念，並且在決定的各點上，替社會民主黨的政策及方略主張新的思想與視察點。帕服斯 (Parvus) 發行的社會主義週刊鐸報 (Die Glocke) 就是供作宣傳這思想之用。

我們可以用短短的警語稱這新的精神的運動為新馬克斯主義或且也可以稱為戰時社會主義。修正派一方面在大體上批評馬克斯的各個經濟理論，尤其批評貧困理論與集中理論，他方面則言明工會及合作社的小小工作實含有重大的意味；而新馬克斯主義却特別注重國家本體與國民性意味的新見解。修正派的領袖本斯泰因主張國際平和說，而新馬克斯派却反過來認民族與民族的國家，即在社會主義的運動上，占有重大的意味，以對抗從前德國民主黨片面注重的政策。

戰前，阿德勒 (Max Adler) 已經設法提出康德思想與馬克斯思想的一種綜合說，現在新馬克斯主義者一方面却要即在社會民主黨裏面，予黑智爾、斐希特及拉薩勒以新的效用與承認。

現在各國境內社會主義各黨的黨員，都毫無顧忌地，甘供他們的祖國的防禦之用；這種事實適予國家主義的思想在社會主義之內，以一塊新的滋養土地。楞士竟稱社會主義為「國家主義」的救星。戰時國家在經濟界上所推行廣大的組織適表明國家在經濟組織界上面的力量。楞士在法蘭克福民聲報 (Frankfurter Volkstimme) 中鑄出「戰時社會主義」(Kriegssozialismus)，并且欲以此表明：用一種藉封鎖以為名的制度，不啻已有意識地對於我們的經濟生活之完全組織化進了從來最大的一步了。楞士在一九一六年出現的論文社會民主黨，他的末日與他的幸福 (Die Sozialdemokratie, ihr Ende und ihr Glück) 中有說：現在的德國在主張一個歷史上進步的社會原則，而且此次世界大戰也導進一個新時代，在這時代中「社會」的分子在預備讓位給個人主義的分子。強烈的國民聲浪打開了，這一向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中未曾聽過的。例如楞士又稱德國為「歷史的進步之主持者」，同時又加德國以證明堪任他的歷史上職責的義務 (見該作第一三六頁)。於是注重無產階級的「國家化」的力量并且認社會主義的工作與國家主義的工作是一體的。楞士在他的後二年出版的作品三年的世界革命 (Drei Jahre Weltrevolution) 中更把這思想推演下去。於是申言德國具有解放民族的任務，而且德國所以和英國相反的地方，就是因為在德國那裏，國家從未會像在英國那裏那樣，成為階級社會所組成那樣無意志

的機關（見二一六頁）。德國內部所具偉大的世界史的任務是在歷史中初次實行把國家與人民合爲一致。

梭涅的作品馬克斯主義，戰爭與國際黨（*Marxismus, Krieg und Internationale, Stuttgart 1918*）也是徘徊在類似的思想徑路之中。他也指出從無國家的社會到完全國家化的社會之必要，而且他也經了戰爭而至於社會主義的新見解。他以爲：「馬克斯主義過於簡單地想像着從自由主義的社會一躍而到社會主義的社會，而把藉國家而施行的一種組織所經的中間階段忽視了。現在關係的是在以『國家化』滲進私人經濟中」甚且直到他的細胞裏去，即不關於各個經營之國家化，乃是關於用有意識有意志的規定與指導，然則即用馬克斯制度在論理上與實際上所拒絕的方法來成就一切私人經濟。」（第十二頁）他從這立腳點出發，所以要求「經營的完全國家化」。梭涅說馬克斯主義者所主張的階級鬥爭論是「有隙漏」而且「愚笨」的。無產階級只好一段一段地向上打去。

從前對於國際黨有過一種「幼稚的奇異信仰」。現在却主張無產階級用全力來服務於他的國民與他的國家的自存。這種義務的思想應該起來代替前者。嘿尼士嘗宣言：「活潑的德國戰勝了死的國際的空想。」見戰中及戰後的德國社會民主黨（*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in und nach dem We-*

(Ikkriege, 第九十八頁)

其他的馬克斯主義者在言論及文字中也類似的宣示了，這新馬克斯派的思想却不會引起根本的修改社會民主黨的黨綱，然而在多數黨員所作的小冊子社會民主黨綱要中已經有了改革黨綱的提案，其中顯然表現上述新馬克斯派思想的影響。

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溶解與分裂并非發自該黨的右翼，却是發自他的左翼。在這反對本黨多數黨員的左翼中尤以鮑爾塞維主義的思想占重大的勢力。下面一段將把該黨改造的情形加以陳述。現在此處却先指明：在不屬於社會民主黨即不帶任何黨的色彩，而是由於科學的觀察出發，并且有一半由所謂平民的國民經濟學代表所提倡的那各派中，也有與新馬克斯派完全相似的思想。在這裏應先述普楞革 (Pleige)自世界大戰開始以來陸續發表的各種文字。

這「組織」的口號的聲響出在普楞革方面，猶如出在楞格那樣。他說到「一九一四年的德國革命」並且把一七八九年的思想與一九一四年的相對立。他稱前一次革命為十八世紀中破壞性解放的革命，後一次則為二十世紀中一切國家力量之建設的與其團結的革命。（見戰時經濟與國民經濟 Kriegs- und Volkswirtschaft, Münster, 1915）。普楞革謂：戰爭已使德國從世界商業國的狀況過渡到鎖閉的商

業國，因此已把他變成爲第一個實在的未來國家。因爲鎖閉的商業國乃是一個真正的理想國：卽斐希特的理想國。戰時鎖閉的商業國是在來的德國未來國之基礎，「他在他的經濟政策的關係上的地位實高於戰前的。」（第八十五頁）在他的作品革命黨員的革命化（*Die Revolutionierung der Revolutionäre, Leipzig, 1918*）中，他解釋社會主義如下：「社會主義是一種組織牠有意識，地向於全體而前進，同時注意及全體分子的健全，牠是由全體分子組成的并且沒有他們的願意的協作是不能發生效力的。」在戰爭的壓抑之下出現了第一次社會主義的組織狀況，他起來代替一向浮移在我們腦中的社會主義的未來希望。」（第三十三頁）普楞革謂：戰爭的遂行是在一九一四年思想的徵號之下（見戰爭與國民經濟“*Der Krieg und die Volkswirtschaft, Münster 1915, 第一〇六頁*）他宣稱：如果戰爭過去了，將有另一世界史的國民經濟時代開始，不是我們在戰前所處的那時代。戰前的國民經濟是資本主義，他在戰後將成爲社會主義，或則——依他在別處所表示的——國民合作社的第一個經濟時代行將到達。（見普楞格的國民經濟戰時講演“*Einige Kriegsvorlesung über die Volkswirtschaft, Berlin 1915, 第二十五頁*）他斷定戰時經濟具有一種不可掩沒的社會主義的象徵。雅斐（*Jaffé*）却說到未來中「我們的經濟生活的軍事化」。他宣稱：經濟生活中個人主義的與無限制自由的舊原則已經過了

他的時代，并且新經濟制度的交臨同時就是百年前由英國傳來的那種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之末日。（見雅斐的國民經濟與戰爭（Volkswirtschaft und Krieg, Tübingen, 1915, 第十二頁）瑙曼（Naumann）也宣稱：戰時經濟所具國家社會主義的特徵將後於戰爭而存在。（見璠曼的中歐 Mitteleuropa, Berlin 1915, 第一五三頁）。惠斯（Heuss）謂：吾人「可以斷定斐希特所倡閉鎖的商業團就是現在困苦中管理組織之理論的形物」見惠斯的戰時社會主義 Kriegssozialismus, 第十四頁）。塞令（Sering）也說到戰時社會主義，（見一九一四至一五年的戰時德國國民經濟“Die deutsche Volkswirtschaft während des Krieges von 1914-15. Sitzungsberichte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并謂德國戰時政府的戰時經濟方略是適合斐希特的要求與想像。（第四四八頁）

在這裏不能對於新馬克斯主義及戰時社會主義下了深切的批評，只能短短的對於下述問題表示意見，即：世界大戰時，德國戰時經濟組織可以稱為戰時社會主義麼？德國戰時經濟組織是與斐希特的鎖閉的商業團相類似麼？

「戰時社會主義」的名義是引起誤解的，并且德國戰時經濟組織不能視同社會主義的或且國家社會主義的。斐希特的鎖閉的商業團是一種嚴格真正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制度；他是一種社會主義的制度；

現者先把這個常常給人採用而罕被人知的名稱之真義，加以說明：他是依據方案用社會來調理經濟生活，而把個人對於生活手段的自由使用權撤消的。在戰中重新調節經濟狀況時候，都沒有談到這些一切。如把一切幾百條的戰時方略加以考察，便見得造成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的那東西，即有節制的生產并未見實行。當時最重要的經濟方略可以簡括如下：即國家對於幾種重要的原料與生活品，施行部分的節制是。這個絕不能視為經濟生活的社會主義制度。就是關於國家社會主義制度之不能直接的實施，斐希特自己也承認過；他也說這種制度不外是一種可供逐漸施行的制度的連鎖中之一節；然則當戰爭暴發的時候，怎麼可以立刻就把它實行呢？況且對他也未見得有實行之必要。斐希特所以實施鎖閉的商業國，是因為他確信自由的競爭制度是可毀的。只有在這限度內我們才有對於經濟生活的自由發展採取干涉之必要；因為如其不然恐怕因為外國輸入受了阻礙，而引起我們國家所仰給的最重要的需用品中發生了種種困難。戰時宗國、各邦及地方所施的方策都是個別的救急方策，其中完全缺少一種嚴格地依統系而施行的改革方案所具的組織性。時時發布的方策，都是當着窮困迫着採用這些干涉的時候。尤其應加申明的是：國家所節制的不是生產，乃是商業與分配，并且即在這方面也是部分的關於若干生產品，尤其是原料與生活品。由於這種根據事實而施行的一切方策之半徹底，可以窺見在各

點上實施之困難。政府不過調節生產品之使用、銷售與分配，并未曾干涉及生產品自身的生產。政府只設法使每個公民就麥粉、麵包、牛乳、穀物等獲得其必需的部分，但是麥粉、麵包、牛乳、穀物等的生產依舊如前讓給各個人去辦，或則不過在細點上加以限制而已。——在斐希特的鎖閉的商業國中其情形却全不相同，在那裏是先把必需品加以精確的斷定，以調節生產，再根據這調節的生產以施行生產品的交換與分配。戰時國家只有間接的而且在各個例外的情形之下，也會干涉生產，例如普魯士邦用大筆款項促進荒地的墾植，聯邦政府則限制甜菜的種植地，把來耕種較必需的植物，國家對於特種原料的精製所採的干涉行動只在這限度內，即他對於火酒業、啤酒業及其同類的經營，予以使用穀物的一種最高量。即聯邦畜料處根本上也負有依據用途以分配燕麥、小麥、糠粃等的任務。然則即在這裏也見得：現有的貯存品是給國家分配了，不是由國家製造出來。即對於工業的原料也施行一種國家的節制；但是這單是關於現有的原料之分配，至於生產之調節，只限於現有的原料之精製受了多少節制，或則在個別的情形之下國家直接來促進生產，例如用國家津貼費來設立窒素工廠是。當然軍隊對於金屬、紡織物、化學品、尤其炸藥原料之需要特別加增，這些東西在外國對德封鎖之下恐不免引起危險的竭蹶，因此陸軍部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三日已經設立了戰爭原料股，其任務是先確定與保障

軍政府的需要。他有直接徵收若干重要炸藥原料、紡織物、金屬之權。戰爭原料股隨後却和私人工業發生密切的關係，由是加入的各工業被要求從事自行調節，務使他們在自己的控制與在國家官廳的協助之下，能夠所生產的量能對於軍政府與私人所需用的要求加以考慮，並且各按其在一般利害的重要上而予以滿足。在戰時羊皮公司、戰時木棉公司、戰時皮革公司等名義之下，而設立的許多創立機關大都不是國家的企業，乃是多少受國家控制的私人公司。吾人也許可以稱他們為混合經濟的企業，因為他們固然是委之於私人經濟的利害，然而都當供作公共經濟的目的之用。所謂德國工業戰時委員會對於這種組織固然擁有大功，然而也不是一種國家機關，却是由於德國工業家中央聯合會及工業家同盟之合作而組成的，這些聯合會固然和聯邦的及各邦的官廳發生極密切的接觸，然而在各點上却是各工業完全由自己負責虧的責任并且本私人利害的直覺以完全為適應國民經濟中變遷了的需要而設的；并不是適應國家社會主義的本體，由於國家指導的。

一切這些所謂戰時公司，自其基本結構看來，既不是社會主義的組織，即自其不免享有利得這一層看來，也不是社會主義的組織。這在斐希特的鎖閉的商業國裏面也是絕不相同；因為在那裏只有工資，沒有利得。一切價格都是由上峯確定的，務使生產者爲了他們的工作而獲得相當的工資，務使一

切「國民都能夠接近於舒適的生活」。然則人人應依其適合的生活維持的高度以支取工資。——我們戰時由上峯執行的價格規定却帶有極其不同的性質，價格向上不得越過某最高度，務使牠能夠保持在消費者堪以支持的高度上。在這種戰時組織中并未談到削除利得的問題。即使在這些公司的會議中發有宣言說，他們具有公益的性質，但這宣言也不會使人失望於利益。縱使這公司的會議沒有規定；或不發紅利，或則把超過百分之五的紅利歸作慈善之用；然而這規定的意思是說由公司募集的基本資本——即規定作為全部營業，購買商品等之用的——不得或且只得生產一種有限的利得；但是與公司有關係的人儘可以商品的賣者、改製者、仲賣人等資格獲取極大的利得。各關係集團對於分配各種利得發生的小爭執適表現即戰時狀況也可以給私人經濟極端利用去，甚且利用戰時狀況的這種利己心并不以在半官的組織保護之下足資發展的為較可喜。

在鎖閉的商業團與戰時經濟組織中有最類似的地方，可以在幣政中求之。斐希特教一切金銀都歸政府，而創一種不具內值的新國幣以供流通。我們豈不是也有這種同一的？塞令 (Seigniorage) 說戰時德國有一種幣制，這似乎是證實斐希特在鎖閉的商業團中所主張的那一種。(見塞令前著第四五四頁)。當時豈不是把金存積在國家銀行，而且我們在國內貿易中只見紙幣麼？然而即在其中也有很深的差別；

因爲在斐希特的作品中就是幣制也不外是國家節制的商品集中之一部，這種生產品的量是由國家依範圍與價而定的。凡自由的商業交通都被取消；我們這裏却不相同，自由的商業交通當是依舊存在，連一種本身含有完全價值的錢幣還不免存在；我們應有一種價值比較手段，他自身有內心的價值。金依然潛存着，即所謂在貯存所中。斐希特恐怕要稱我們的紙幣爲第二乘方的；他在他的鎖閉的商業國中却不要第一乘方的，也不要第二乘方的錢幣，統而言之，不要所謂「只有金與銀是真正的錢幣」的那一種錢幣。我們的紙幣却不外是金的全權代表。塞令說，戰時德國有一種幣制，這似乎證實斐希特在鎖閉的商業國所主張的那一種。其實我們的紙幣是一種商業社會的金錢，並且依經驗所得，在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中流通的金幣被紙幣驅逐了的時候，往往引起一切惡效果。

歸結我還須再行指明：在一種經濟制度內，如尚有國家的組織力在某限度內發生在經濟界上；若連把社會主義的概念加在這種經濟制度身上，那就原則上錯了。我在上文已經說過有人爲了「無上命令」(Kategorischen Imperativ)竟稱康德爲社會主義的主張者，這是一種錯誤。如果現在有人稱「組織」爲屬於社會主義的範疇；那就不免也陷於類似的錯誤。不然他就不啻下斯益格勒(Spengler)所下的概念；斯氏蓋嘗稱霍亨索倫(Hohenzollern)家爲社會主義的真正代表。他所謂函義最深的社會主

義的思想是：達到富強的決心，不為個人而為全體的幸福而作奮鬥。依此而觀第一個有意的社會主義者恩腓特烈·威廉，並不是馬克斯。（見斯益格勒的普魯士主義與社會主義，*Preussentum und Sozialismus*, S. 42）。他又說下去：「普魯士本超人的觀察以變理經濟生活，這種思想自一八七九年的保護關稅立法頒布以來在無意中已把德國資本主義導入所謂國家組織的社會主義政體之中。」（見斯益格勒前著第四九頁）。

二 世界大戰後德國社會民主黨之發展

戰前德國社會民主黨之團結與一致為世界其他各國所無。我們在上文已說過德國社會民主黨在理論與策略上雖有種種意見不同，然而黨員對外時候總是團結為一黨。戰爭與革命却把這種團結完全破壞了。劇烈的鬥爭與對立表現出來，其結果使現在不復存有一個，而存有四個社會主義黨，并且就破碎與分裂而說，德國工人運動現在也呈有一種類似的形態，猶如戰前的英國工人運動與法國工人運動。我們現在應述及德國社會民主黨所分的四黨：（一）多數派社會主義黨，（二）獨立黨，（三）共產黨，（四）工團主義派。我要把這次分裂的歷史短短的陳述出來，再把這各派所因之而離立的原則上的

對立陳述出來。

(1) 德國社會民主黨分裂為多數派社會主義黨與獨立黨

在對戰時公債下第一次與第二次表決時候（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與十二月二日）社會民主黨員翕然同意於所要求的款目；在第二次中惟獨議員李布克涅喜特（Liebknecht）是例外的。在第三次戰時公債（一九一五年三月十日）付表決的時候，除了李布克涅喜特之外，還有一個議員投否決，並且在表決時候該黨中三十個議員離去議場。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社會民主黨國會支部中二十個議員在蓋耳（Geyer）領導之下，拒絕戰時公債之同意。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哈塞（Hase）代表一幫黨員在國會大會中對於社會民主黨業已同意的緊急法律（Notgesetz）投以否決，於是發生議會支部內的分裂。這種態度被黨中詆為破壞原則；於是被處分的黨員團結為一新支部，各為社會民主黨的工人團體（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gemeinschaft）。這個由十八個黨員組成的反對黨自身却不一致，他乃是由兩組根本上不同的集團而成。如果稱舊社會民主黨為「右派」，那末在反對黨中有一個「中立派」；他以考茨基為他的理論家，以哈塞為他的最主要的議會代表，以新時代（Neue Zeit）為他的科學的機關報，以他的前進（Vorwärts）為他的日刊。此外還有一個左派；所謂德國國際社會黨（In-

ternationale Sozialisten Deutschlands)與「國際派」(Internationale)集團都屬於該派。這左派被稱爲親麥林派。他們有了這名稱，是因爲他們一九一五年九月八日在百倫附近親麥林 (Zimmerwald) 地方開了一次國際社會主義大會。德國代表團由十八人組成。親麥林大會同意於反對戰爭的宣言，這是由德國代表團員霍夫曼 (Adolf Hoffmann) 與雷德部耳 (Ledebour) 代表簽名的。在刺得克 (Karl Radok) 精神上指導之下的這親麥林左派也發表一種特殊宣言。他們的黨員在德國合成了一個特殊團結，自稱爲德國國際社會主義者。波沙特 (Julian Borchardt) 所發行的雜誌光線 (Lichtstrahlen) 供作議會支部內這特殊團體的機關報。——這團體之原則上的思想實表現在他的引言：「無產階級只有一個祖國」，即社會主義的國際，並表現在他的口號：國際的階級鬥爭藉羣衆的意志反對戰爭以求得和平。刺得克提議把「我們是無祖國的同志」，編在這新革命黨的黨綱上頭，一九一五年下半年這派開始把舊社會民主黨協會的會員結合而爲特殊組織。

一九一六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社會民主黨舉行全國大會，設法和反對派求達多少的團結，以避免逼迫的黨之破裂，可是這次團結不能成功，反對派的黨羽自開一個全國大會（一九一七年一月二日），由社會民主黨的工人團體做主席。當時除工人團體的分子之外還有所謂斯巴達團 (Spartan-

takusgruppe) ，這就是該黨最激烈的由李布克涅喜特與盧森堡 (Rosa Luxemburg) 領導的那一派徒黨。這斯巴達團的名稱是由於李布克涅喜特會發表所謂斯巴達函件。此外加入的還有那些結合成爲德國國際社會主義黨的集團，這些團體中各提出各的議決案。因爲這次各集團的組成對於以下社會主義各黨之發展是很重要的，所以就這些議決案中摘錄如下：

甲、斯巴達團 他極端攻擊舊黨，他要求對於上級黨部斷絕黨捐，此外要求系統的攻擊工會內的工會審刊的政策，并要求堅決地攻擊「黨的審刊」的政策。這個議案只得二十四票，而

乙、社會民主的工人團體却替他的議案取得一一一票。他反對停止黨捐并且設法維持附着於舊黨，而斯巴達團却公然要求破裂。

丙、德國國際社會主義黨 他的議案却只得七票，而且未被發表出來。

一九一七年一月十八日黨代表會議決多數派在組織上和少數派脫離。反對派的全國大會之經過引起舊社會民主黨的上級黨部於一九一七年一月二十日發表告本黨書，其中極嚴厲地攻擊反對派，有說道：「現在得辨明色彩了，凡宣告與反對諸派的全國大會的議決案聯合的黨員及團體不能同時依然爲社會民主黨分子。」黨的裂紋於是越走越深；舊黨的黨徒與新黨的黨徒中間所發生的爭端愈趨愈

烈，結果黨的分裂不得不繼之以議會黨部的分裂。在社會民主黨的反對黨的哥塔大會上（一九一七年四月九至十一日），於是創立了新黨，名曰：德國社會民主獨立黨（*Unabhängig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雖然斯巴達團的代表在這次大會上宣言：他們在許多點上并不同意於工人團體的政策，然而工人團體與斯巴達團所作表面的組織的團結竟告成功；不過兩派的根本的見解却相差很遠。——在我把這些意見參差所生以後的成果陳述以前，要先試把獨立黨的經濟與政治綱要加以描寫。

(2) 德國社會民主獨立黨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德國社會民主獨立黨舉行黨大會於柏林并議決接受黨綱的通告，以確定獨立黨根本上對革命所取的地位并對於革命的實施規定一種行動綱要。修正派與新馬克斯派把馬克斯主義所含進化論的性質列在前列，而獨立黨却重申馬克斯主義所含革命的性質，而拒絕一切改革的、國家社會主義的、甚至一切機會主義的策略。他們反對右翼社會黨，却要立刻着手「社會主義化」，即應先把大工業與大地產中資本家的企業歸為社會所有。

在這一點上，這新黨所主張的見解，也可以在戰前本黨的激烈的那一翼中求得來。此外，德國社

會民主獨立黨的黨綱也很受了鮑爾塞維的思想與俄國革命的事變所影響。自世界大戰以來德國社會主義中幾乎完全沒有新的獨立理想出現，並且也沒有一次革命比一九一八年具有還少的巨大思想；這可說是德國社會主義發展中一種堪以注意的現象。在十九世紀的社會革命運動中，其情形却多麼不同！例如不知有多少豐富而複雜的種種思想、刺激與計劃引起了法國二月革命，如我們所見，在那裏出來計劃的有聖西門主義者、佛里耳主義者、布郎魁主義者、國家社會主義者、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及一切其他應有盡有的類似的集團，一切各具有基礎的作品、精細的改革計劃、固有的月刊、小冊子等。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地方自治政府時候，其情形也是這樣，當時馬克斯派比之其他各派只形成爲一種小小的、謙退的集團。

及革命全勝地施行之後，一切德國帝王都被推翻了，替德國宗國及各邦引用了共和政體，並且社會民主黨的黨員在宗國各邦及地方都占了最重要的領導地位，所以有人期望這次革命具有新的巨大的思想。各社會主義派的發言者却只努力去證明他們對於革命所見解的方法完全適合馬克斯的意見。新的視察點是生在鮑爾塞維主義，並且這兩個鮑爾塞維的主要綱目：無產階級的獨裁制與會議制度，居然列在前茅。

中央幹部在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二日發表的第一次宣言中即已用下列幾句表示這新黨的任務：「對於政府政策表示獨立，對於中等階級各黨的努力表示獨立，對於政府社會主義者表示獨立，這新創的團結行將有意識的推行一種獨立社會民主主義的政策。在經濟、政治及社會起了極深切的革命的時代之中，他要本國際黨的精神集合無產階級的羣衆以促進和平。應導民衆回到馬克斯、恩格爾及拉薩勒所指示的，及貝柏爾、李布克涅喜特與辛格 (Paul Singer) 所曾經功成譽滿地領導我們走的那條途徑上。不僅應本犧牲心及毅力來繼續推行他的事業，甚且要繼續完成以求實現民主政治及社會主義，徹底的把人類由戰爭的恐怖與殘酷中解放出來。——這是我們的任務。行將有幾百千人逐漸意識舊社會民主黨在哥塔那裏重新復興起來了，而熱誠地歸集到新的獨立的各團體；牠們或則已經成立或且在各區中正在設立中。凡是極其心痛地眼看舊黨把舊日原則拋棄了而成了一個國民社會黨，因此對於社會民主黨失了信仰的人們應欣然、帖然成爲這新黨的黨員，再替他們從前爲牠用盡力量，爲牠而渡生活的，即再替社會主義的神聖的理想而奮鬥，而繼續奮鬥。」

在德國社會民主獨立黨中占有重大位置的是三個主要綱目：

(一) 社會主義化 黨綱中對此有說：「應立刻把資本家的企業歸爲社會所有。這種計劃應立刻實

施在鑛業及動力的生產業(煤、水、力、電)，實施在已集中的鐵及鋼的生產業，以及其發展到高度的工業及銀行業與保險業的界上。大地產及大森林應立刻改作社會所有。」——在第一次黨大會上哈塞即宣稱反對右翼社會主義者所主張的那種社會主義化：「我們的黨綱中已確定我們要求把生產品改歸全體所有。我們本種種理由來嚴格施行這一點，因為『社會主義化』在現在是一句警語，差不多全世界，就是不免即對而施社會主義化的那些資本家也得贊成這句警語。在附有標題『社會主義化正在前進中』的宣言中，已經宣傳把若干經營改歸國有；然則這不是社會主義，乃是國家社會主義。政府的提案也只求更退一步，即只求混合經濟的經營。然則資本家不應被摒，也許他們在股份上只應占百分之四九，不應占百分之五一；但是資本家於此雖被打碎，然而他們却知道使其勢力完全有效；他們早知所以鞭策國家了。政府却更退一步。最後他只視政府控制經營為社會主義化。政府代表也許出自中央機關，也許甚且出自最高財政機關。政府實際是想要藉這等方策把工人羈在他的車前罷？」(見非常黨大會討論集稿) (Protokoll über die Verhandlung der ausserordentlichen Parteitagcs)。——

德國社會民主獨立黨在第一次黨綱宣言中也早已(一)主張會議制度與(二)無產階級的獨裁制。其中有說：「德國社會民主獨立黨的史的任務：是替具有階級意識的無產階級在他的革命的解放戰爭中執旗

先導。德國社會民主獨立黨實站在會議制度的基礎上。他援助會議來奪取經濟的與政治的力量。他要求無產階級的獨裁制，即大多數人的代表獨裁制，認他為實現社會主義的必要的前提條件。「暴動的策略於此却反乎鮑爾塞維黨而被拒絕，而議會的協會却被贊同：「為欲達到這目的故，德國社會民主獨立黨却使用一切政治的及經濟的鬥爭手段，連議會手段也算在內。他詆斥無計劃的鬥爭手段。他的目的不是毀滅個人，却是廢除資本主義制度。」在德國社會民主獨立黨新定的行動黨綱中（一九一九年十二月通過在來比錫黨大會上）。無產階級獨裁制與會議制度的兩個要求更依較嚴厲的形式提了出來。在黨綱宣言中，無產階級獨裁制被稱為大多數人的代表獨裁制，在新的行動綱要中却不復談到這層。那裏只說：他（指無產階級獨裁制）指導工人階級團結起來，以排除從前的階級統治。然而即在這裏也未嘗完全詆責到議會的權力手段。其中有說道：「為達到這目的故，獨立社會民主黨實依計劃與統系，連合革命的工會及無產階級的會議團體採用一切政治的、議會的及經濟的鬥爭手段。」

我們在上文已經說過，德國社會民主獨立黨一方面在拒絕暴動策略上，他方面在利用議會手段上，實與鮑爾塞維主義不同，並且在新的行動綱要中也顯然不同意各個人之暴力的進行。「最高尚而有效的鬥爭手段是羣衆的行動。他反對各個集團與個人之暴力的進行。他的目的不是撲滅生產機關，

而是排除資本主義制度。」

雖然這種差異，然而在若干原則上却與鮑爾塞維主義很一致，德國社會民主獨立黨中有一個領袖兌米喜（Däumig）在一九一九年三月該黨的黨大會上的演辭中會宣稱：他們具有種種理由，就俄國同志在那裏所經歷與施行的當中，學得許多地方；當然他們也不得奴隸的模仿俄國同志。他認這事是當然的：「務使舊民主政治的方法連同他的期間選舉制在會議制度中不復占有位置；務使根據那個原則——即在公共團體內惟有藉社會上有益之必需的工作以對於全體履行過義務的人享有政權——在會議制度內當然只有事實上可稱為無產者的人才享有一種選舉權，才享有政權：這就是說，凡靠着他人的工作爲生，或則犧牲全體的人，單靠地租或且無工作的收入以渡日的一切寄生者自始都應被褫奪政權。」根本上他所主張的會議制度應照現在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的憲法中所定的那樣組織起來，當然加以適合德國狀況的種種改造。他於是述及會議制度實施上的各點，從最低級的機關直至全國最高機關：「然則我是說會議制度在組織上應從這基礎起逐漸建設上去，最後以全國組成的會議大會爲其最高機關。這個會議大會根本上却不外是監督機關；他是巨大的團體，所以不能完成屬於會議制度的任務。他從中選出一種執行代表會、或且一個中央會議、或且一個執行會議——名字却沒有關係——，

該會議在俄國由二百人組成并且常常開會，但是每年應兩次對於全國大會報告并由兩次選舉出來。這個中央執行代表會也不是一種聚合在議會建築物內僅作演說的議會；他的分子被分派為許多委員會，該委員會應每日清理行政工作，并且只有聯合起來從事討論。然則事實上這是一種關係，是依這途徑而組成議會工作與行政工作的集合體，是立法者與執行者的集合體。」

除了工人會議應行執掌政治的職務之外，還當選立經營會議以經理會議制度中經濟的職務。這經營會議應完成一切關於經濟行動的任務，務使工資關係及工作關係適應工人的要求，務使經營依然有活動的能力，務使進行一切步驟能夠達到社會主義化的目的。兌米喜反對暴動的策略：「我不躊躇地宣稱：我在原則上絕不離開共產黨所設：『一切權力交給工人會議及兵士會議』的要求。但我在策略上却尤其和該黨有極多的，甚且有根本上的差別。我絕不能參加該黨實際上推行的暴動策略。」他也不拒絕議會的協助。「我依然如前地站在這立場上，即我雖然固執會議制度，但是教我們的議會黨部對於國民大會提出他所製成明瞭而實用的法律草案，也可以視為革命的手段與目的；這法律草案不僅限於經濟的權限，并且可以要求完全的政治上的平等；至於政府以及中等階級的各黨當然也得帶有色彩。」但是這議會的策略根本上用以鼓舞羣衆：「我們還有議會；這是不錯。但是我們在目下社會主

義所處的這時代中只能而且只應在某限度內利用牠，因為牠曾一次是攻擊的目的，因為牠在尙可利用的範圍內尙可供以達革命的目的，以鼓舞羣衆。」德國工會得用柔韌的、密集的動作，使工人理解會議制度。

在十一月革命爆發（一九一八年）時候，德國社會民主獨立黨是革命的推動力，他尤其要求組織工人會議及兵士會議，把國權交在那裏。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日德國社會民主獨立黨議決聯合多數社會主義派接受政權。兩派對革命政策之實施發生劇烈的爭執，結果獨立黨於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脫出政府。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九日國民大會選舉時候，獨立黨獲得二、三、七四、〇〇〇票與二十二位議席。在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至六日的第二次黨大會時候，黨員人數約達三〇〇、〇〇〇人，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二日的第三次黨大會時候，已經增加至七五〇、〇〇〇人，有人要求聯合多數社會主義黨及中等階級各黨以參加聯合政府，而獨立黨却拒絕這種要求，并於一九二〇年六月十一日發出理由書道：「由於革命的進展，遂生設立社會主義的政府之必要，所以德國社會民主獨立黨只認純粹社會主義的政府爲一種過渡政府；在這裏面他占有多數，擁有決定的勢力并且把他的黨綱作爲政策的基礎。」德國社會民主獨立黨的黨員數在一九二〇年七月一日約達一百萬人。

第二十四講 德國社會主義

(3) 德國共產黨(斯巴達團)

結合爲斯巴達團的社會主義者一向編在獨立黨裏面。但因哈塞及考茨基——獨立黨的領袖——主張民主政治而不承認無產階級獨裁制，而該黨又不與以否認，而且贊成國民會議，於是斯巴達團認爲再不能在該黨內久留了。獨立黨內，由雷得部耳 (Ledebour)、及兌米喜領導的左傾分子既不同意哈塞及考茨基的政策，又不能採取斯巴達團的政策，由是決意創立一個一般的工黨。這種計劃却被斯巴達團妨礙了，因爲斯巴達團堅決地和其他社會主義者雖異，而且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由李布克涅希特及盧森堡領導，創立德國共產黨(斯巴達團)。他的臨時黨綱載在小冊子斯巴達團要如何？(Was

will der Spartakusbund?) 中。德國社會民主獨立黨，雖然多少和俄國所主張無產階級獨裁制及會議制度的思想相接近，却不欲完全打斷和社會民主黨的聯絡，只要向着漸進的革命化工會與議會團體而前進；現在斯巴達團却完全採用鮑爾塞維的思想，而且宣傳徹底的、即時的實施所謂兩要求；即斯巴達團的戰聲所謂「一切權交與工人會議及兵士會議」。然則上述獨立黨的領袖兌米喜認為「神經昏亂」的，毫無結果的口號，現在却被斯巴達團作為主要黨綱要求。在斯巴達團的黨綱中幾乎可以字字窺見鮑爾塞維黨的要來。例如他所要求立即保障革命的是：用工人會議及兵士會議的可靠之人以代替從前政府的一切政治機關及衙署。此次則拒絕和議會主義作妥協。在第二次黨大會上——即在所謂海德堡 (Heidelberg) 大會（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上，官稱本黨在原則上嚴厲的反對採用議會主義作為提高階級統治的手段，然而本黨在現狀之下，却可視議會為策略上的鬥爭手段，并且只在這樣目的考慮之下，才可以決定德國共產黨對於參加選舉與議會內行動所取的態度。他和德國社會民主獨立黨相反的理由，據說如下：「獨立黨之利用議會主義在圖感化統治的各階級，德國共產黨却在圖感化羣衆。」他的究竟目的是在反對議會主義。由是要求：「廢除一切議會及地方會議，由工人會議與兵士會議以及他們的代表會與機關接受他們的職務。由城鄉各鎮已成年的一切男女工人依據各

經營以選出全國各工人會議；由軍人——除開軍官及再服役兵士以外，選出軍人會議；賦工人及兵士以隨時撤回其代表的權利。」即在社會主義化的問題上，共產黨也比獨立黨更進一步，除開「經營社會化」之外，他們更提出最近的經濟要求：沒收達到某定量的財產，抹殺一切國債，沒收一切銀行，鑛山、鍊鑛場等。此外則尤其注重革命的國際意義，而且要求：「立刻接受和外國的兄弟黨的聯合，把社會主義的革命置在國際的基礎之上，并藉世界無產階級之國際的結義與革命的發難以形成并保障和平。」其下又說：「斯巴達團絕不站在工人階級之上或且利用工人階級以取政權的政黨。斯巴達團不外是無產階級中具有目的意識的那一部分，他在步步行動中，在指示全階級工人以史的任務，他在革命的各階段中看出社會主義的究竟目的，在一切民族問題中看出無產階級革命的利害。」刺得克在他的小冊子工人階級與共產黨的獨裁制 (Die Diktatur der Arbeiterklasse und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中宣稱：「共產黨并不替任何一層人掠取任何一種特權，却只要打倒資本主義，解放工人階級，依社會主義以組織社會。爲要達到這目的計，所以在有產階級的反抗尙未摧折的鬥爭時代中，實有施行無產階級獨裁制之必要。這就是說，在有產階級對勝利的工人階級表示反抗，又要把他們屈伏的時候，所以得用武力的手段摧折這種反抗。像雷得部耳及喜爾斐定 (Hilferding) 所宣言：

他要獨裁制，却不要暴動，不要武力，這不啻是說他們并工人階級的獨裁制也不要。不預備暴動的獨裁制可比沒刀身的刀。要使這獨裁制完全勝利，得成爲工人獨裁制，無產階級的獨裁制！」

斯巴達團的代表本這意義在上述的會議大會上提議把這會議大會宣告爲最高的立法兼執行機關。他的動議說：「革命的無產階級聯同革命的軍隊把勢力打倒。由於這次革命成功的結果，把最高的權力交與工人會議及兵士會議。大會以全德工人會議及兵士會議的代表資格，奪取政權并實施牠。他以全國最高機關的資格，對於執行者握有監督權、任命權及罷免權。」就斯巴達團的創立及其全部行動看來，當然可斷定俄國勢力在裏面很有影響。十一月四日蘇維埃政府柏林外交代表團的急使從莫斯科來到斐特烈街車站。在行李由站廊運下時候，有一箱摔壞了，由是其中所有的紙件落到地上。看來，這些紙件是用德文印就的傳單，內求德國工人與兵士起來作流血的革命。傳單中有一紙是由「國際」團（即斯巴達團）簽字的，內係激動革命戰爭，又有一張則替這次戰爭作較詳盡的指導，要求起來暗殺與暴動。依車站官憲的請求，把專使的一切行李放在一間封鎖而且看守的房子裏，并報告到外交署，請求根究並討論這事件。（見德國革命，德國史歷（Die Deutsche Revolution, Deutscher Geschichts-kalender. I Bd. S. 395）依報告所說，在德國共產黨的成立黨大會上俄羅斯共和國的黨員受了極

熱烈的歡迎，他對於俄國革命中「創作的工作」所作的演辭引起大喝采。黨大會發了下列的電文給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今日創立德國共產黨的斯巴達團的全國大會致與俄羅斯會議共和國，即致與協同反抗各國被壓迫者之共同敵人的俄國同志，以極誠摯的慰問。我們知道你們那裏一切的心弦都是爲我們而鼓動；這種意識給我們在奮鬥中以力與氣。社會主義萬歲，世界革命萬歲！」德國共產黨由於德國社會民主黨中一大批人的加入，而強大起來；蓋當時獨立黨裏面自己也發生破裂。

(4) 德國社會民主獨立黨的破裂

獨立黨的左翼和共產黨合併爲德國聯合共產黨。

獨立黨裏面分裂的原因是黨員對於莫斯科鮑爾塞維的第三國際(*Moskauer bolschewistischen 3. Internationale*)所取的態度。在這國際第二次大會時候，曾把無產者對於世界革命的策略大綱寫下去并把實施條件確定爲二十一條；只有肯服從這二十一條的政黨才可以收入第三國際，德國社會民主獨立黨的右派不欲同意於這條件，而欲對於莫斯科的這口授保持若干獨立性。投贊成接受莫斯科條件，即贊成服從俄國黨綱的票二百三十七人；投反對的一百五十六人，由是這少數人宣稱多數人因此放棄其對德國社會民主獨立黨的服從心，而他們依其全部觀念却服從法國社會民主獨立黨。於是獨立

黨中抱機會服從主義的那一派〔特里斯品 (Trispen)、狄特曼 (Ditmann)、喜爾斐定 (Hilferding)〕與所謂莫斯科派，遂告決心的分裂，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四至七日柏林舉行的共產黨合併大會上，獨立黨左翼宣言加入。現在德國聯合共產黨希望藉這批加入軍能夠儘量推行政治的行動。從前德國共產黨是小政黨，所以只能設法在大的工人團體中活動；至於羣衆行動他却不敢嘗試，因為他背後沒有羣衆。現在德國聯合共產黨却相信他的力量已足以靠自己出來活動；他要在工會、在經營會議，藉他的機關報與他的宣傳求與羣衆作極密切的結合。「他在從前爲革命思想而奮鬥的力量，可謂甚小而且不影響及於工人階級。現在他強大起來，根據羣衆的援助，將爲革命而奮鬥。他們只好這樣幹下去，因爲勝利的時期接近革命。」——這是見於告德國及國際無產階級宣言中的。（見德國聯合共產黨創立大會議決案，柏林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四至七日）當時并努力與鮑塞維黨作極密切的結合，因爲該人階「在會議制德國與蘇維埃俄國中間建築一道橋樑」。「在這旗幟下入伍作戰啊，這是全世界革命工黨要級的旗幟，無產者中最優劣會爲了這旗幟而流血，這是共產主義的、無產階級獨裁制的、會議統治的旗幟。」

(5) 德國共產主義工黨

即在德國共產黨中也有一次分裂，並且是在德國聯合共產黨創立之前。在一九一九年二十至二十四日德國共產黨第二次黨大會上，即所謂海得爾堡大會，有兩個漢堡黨員勞芬柏喜 (Laufenberg) 及窩爾夫亥謨 (Wolfheim) 連同他的反對黨羽出來攻擊該黨。他們代表漢堡派，這派又是代表漢堡的一般工會。在這次大會上這兩個代表被除了黨籍，一九二〇年四月四日這反對黨羽自組一黨名曰德國共產主義工黨 (Die Kommunis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

這反對黨的主要原因是他們對於議會主義的態度。共產黨在其究竟目的固然拒絕議會主義，然而在現狀之下却欲利用議會主義為其策略上的手段；而漢堡派却完全拒絕各種議會的活動。他不欲確立黨治，只欲確立以各經營為其細胞的階級獨裁制，所以主張共產主義工作得移歸各經營執行，即共產主義的思想之活動也得由各經營方面出發。

鬥爭不應在議會及工會的基礎上面執行，應在經營中，尤其對着法定的經營會議而進行。因為自由的工會站在政治的黨治之下，所以他的鬥爭也對着自由的工會而發，並且他替工人製定的口號是：「脫退工會，進入經營團體。」依這派，革命的鬥爭不能由共產主義的羣衆來推行，却須採用新的、適合無產者革命的鬥爭手段，德國共產黨，以及後來德國聯合共產黨的全部態度尚是太飽滿着機會主

義，而無產階級的革命却要求展開明瞭的、一致的階級鬥爭陣容。問題是：議會工會的地方的政策——或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階級鬥爭政策。德國共產主義工黨在該黨所發表的小冊子（見博士雷維的途徑——德國聯合共產黨的途徑，'Der Weg des Dr. Levi-Der Weg der U. K. P. D., S. 27.）中，對於這問題有答道：失敗了的德國中部三月革命之經過（一九二一年）證明革命的潮流尚未充分預備，而德國聯合共產黨却讓這主動革命的政策缺着。鬥爭只是寄託在無產階級的革命前衛；如果鬥爭的前線上先要討論及一切工人階級的經濟利益，然後衆多的、愈多的羣衆方才漸漸地贊成一種攻擊政策。由經營中出發的各種鬥爭，似乎最足以使一切工人階級參加。須經過這種行動之後，方能造成那種激成爲革命羣衆鬥爭所必需的氣圈。此外德國共產主義工黨尙有一點和舊共產黨相反的；就是他們所主張的國家主義的立場；因此他們才被敵人稱爲國家鮑爾塞維黨。他們雖然傾向「國際黨」，然而主張無產階級的鬥爭得先給國家使用。他們不願由於俄國特殊情形而創立的策略上的方法立即移用到德國。在海得爾堡黨大會之後這兩個漢堡代表嘗發表一種黨綱宣言，在裏面有說道：「把德國人民中勞動階級定爲統治階級，這就是自由的德國人民，他將要與俄國的自由人民攜手，作爲諸國民的聯合、諸民族的同盟、世界自由的基礎。那時候全人類方成爲國際黨。」在德國革命的過程中，應首先造成

一個適合德國情形與德國工人的成熟程度的政體。所以這黨只視為表同情的分子而被接受入第三國際內，并且以表同情的分子的資格又復宣言脫退第三國際。

德國共產主義工黨要求一種雙重的組織：一是經營的組織，即工會，牠應養成無產者全階級為革命的鬥爭者，此外是一種黨的組織，即黨應吸引最優良、最睿智的分子以從事黨的工作。黨却不是成為議會的黨，也不得只替自己爭得獨裁制，只應替全階級爭得獨裁制。——這派的一個領袖哥耳忒(Gorter)用下列幾句話總結他的小冊子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組織(Die Klassenkampforganisation des Proletariats)：「你們德、英、西歐、北美的工人，請結合在德國共產主義工黨或結合在像德國共產主義工黨這樣的政黨，或則結合在像德國一般工會這樣的工會之下。」(第三十二頁) 所以有兩種組織應加以區別，一是革命的經營團體：即依會議制度而組織的德國一般工會，又把這經營團體合成為地方集團及經濟區域，一切地方集團及經濟區域合成一般工人聯合會，由此以求「根據社會的精神，達到逐漸團結羣衆思想」的目的。一般工人聯合會應在政治上與經濟上訓練無產階級；至於第二組織，即共產主義工黨的任務應藉政治的活動養成無產階級運動的階級鬥爭性質。

因為德國共產主義工黨要把活動的中心移在經營裏，所以往往被稱為工團主義者。在德國共產主

義工黨與工團主義中間固然有多少相同，然而也有差別。在工團主義者裏面尤其可以斷定若干含有無政府主義的氣味，並且我們可以在這一點看來，即工團主義拒絕一切政黨，而依我們所見，德國共產主義獨立黨除了經營團結（工會）之外，還許政黨存在。

(6) 工團主義者（德國自由工會）

我們已經說出革命的工團主義的性質，並且言明他的主要特徵是拒絕政治議會的行動，他的傾向是把他的行動移向經營裏去。現在却要表明這工團主義的運動在德國經過何種發展。德國工團主義者目下集合在「德國自由工會」（*freie Arbeiterunion Deutschlands*）中，他的黨機關報是週刊工團主義者。他們是由常常多少反對社會民主黨的工會政策的德國工會自由聯盟中產生出來的；蓋這派工團主義者最後竟與社會民主黨決裂而自行脫出該黨（一九〇八年）。在一九〇八年社會民主黨大會席上通過了下列的議案：「不顧磋商依然株守工會之自由結合的那些團體已經藉他們的態度而表示：他們反對司圖嘉特黨大會及國際社會主義者大會的議決案，而不欲工人階級作急不可緩的統一的組織以作經濟的鬥爭。德國工會之自由的結合也已經顯然反對政黨，因此他依附着無政府工團主義的運動，而有意攻擊并侮辱社會民主黨。」

黨大會因此宣言：黨員在和德國工會自由聯盟相聯絡的團體及在不經當地工會聯合會及黨部承認的地方工會中如有各種合作行為，便是違背社會民主黨的原則與趣旨。」

工團主義者的原則是什麼？工團主義者尤其反對國家、反對議會、反對民主政治。他方面却認工人在他們的經營及他們的職業團體內有施行革命的行動之重要。在這些一切看來，自然和鮑爾塞維主義有一致之點，并且工團主義的思想確是對於鮑爾塞維學說之完成很有極大的影響。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七至三〇日柏林舉行的第十二次工團主義者大會接受了援助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的決定：「德國工會自由聯盟第十二次大會宣告和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的革命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向着反革命的有產階級在作禁止革命的暴動而進攻。大會尤其極端嚴厲的反對德國及其他國家等意在干涉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的內部情形，或則意在從外部向牠攻擊的一切方策。大會要求德國及國際的無產階級，尤其要求我們的團體起來強毅地攻擊一切反對蘇維埃俄國的行動并且援助各種向於同一方針的運動。」工團主義者不願組成新的政黨，他們是一般的反對一切政治的行動，他們只願藉直接的經濟的行動以生效力。他們的策略是：不附屬於各個現存的政黨，依自己的實力來推行政策。所謂依自己的實力是就本義而言；因為革命的工團主義尤其欲推行革命的政策。他的革命性不是像宿命論者靜待着革命的來

臨，乃是繼續的攪擾、損害并侮辱雇主及統治者的政權。爲達到這目的而用的手段尤其是非賣同盟、破壞器具、怠工、局部罷工以及最後主要手段的總罷工，這是站在全部工團主義的政策之中心點。……直接行動應叫做：把社會主義行動的重心點由議員中移到工人的工場，工人不應求得立法權的參加，這個只造成監護制，至好不過造成特種形式的國家社會主義；工人只好用自己的、其職業所賦予的手段來解放自己。這些原則一向是由法國社會主義的領袖所主張，自好久以來也被德國工團主義者所接受了。他們也只要純粹經濟的組織——即目的工會，他們不附屬於各種政治的中央權之下。他們不要以指令權及命令權爲根據的社會主義社會，只要人類充滿着自由精神以作或大或小的結合。只有一種從下而上而組成的聯邦式的組織，一種反集中的、自由的組織才能保障自由及進步；惟獨他能持久的注意羣衆的利益并且化他們而爲新組織的主持者。自願的團結、自己的制裁、自己的負責，應作爲新建築的基礎。在上述大會上所發表的原則宣言（Prinzipienklärung）中，尤其指明到各個工會的自主與獨立：「一切從上發施的集中行爲、一切中央權力都被毀斥。」這種強烈的反集中的聯邦式的傾向實使工團主義和一切其餘的社會主義派相異。工團主義者是國家組織的反對者，所以詆毀政權之掠取。他們反視政權之廢除爲完成社會主義的社會秩序上第一個前提條件。他們在原則上也反對議會

行動的各種形式并反對在立法機關中各種協作。在這點上，他們實完全和鮑爾塞維黨一致。「工團主義實詆毀對於有產階級的議會之參加。」可是——在這裏立刻出現他和鮑爾塞維主義的差別——在同一的宣言中有說：「工團主義提出羣衆的直接行動、創造行爲，以代被選出的領袖在議會中徒作無益的談論。」這直接的行動是指一切行動移歸地方工會之意，至於鮑爾塞維主義却視會議制度爲一種強大集中的力量并且有中央機關的巨大的權限。工會制度固然也是反議會主義的，却是一種政治經濟的組織兼具有國家的性質，我已經在上文指出工團主義與鮑爾塞維主義間的對立。德國工團主義者的態度也是與此相適應。——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工團主義者大會席上，洛克(Rocke)對於無產階級獨裁制有如下的說明：「如果無產階級獨裁制，不外就是一黨占領國家機關，如果他不外確立一個新國家，那末工團主義者就是這麼一種獨裁制的誓仇。但是如果說無產階級要指令有產階級放棄他們的特權，然則不是從上對下的一種獨裁制，却是從下向上的革命之效用，那末工團主義者却是無產階級獨裁制的信徒與代表；因爲工團主義者是各種國權的敵人，是反對人對人的榨取。無論何種形式的國家都是一種壓迫機關，絕不會成爲解放羣衆的機關；羣衆的革命行動是他們解放自己的唯一手段。」他們要利用地方的小戰爭，不欲利用強制獨裁制之確立以活動，在一九〇四年工團主義者大會上已經

通過了一個議案，其中有說：「我們達到我們的目的，不是藉一種革命，不是藉流血與暴力的方法，却是藉一種倫理的鬥爭手段，即是拒絕那些從前在廣大的實行範圍上把無產階級驅出生產界之外的人們，由是把資本家階級的經濟上統治權及其機關——即國家——廢除。」

由於上述，即可窺見工團主義者及德國共產主義工黨間的對立必定存在着。工團主義者尤其也拒絕無產階級的獨裁制，並且在他們的經濟的究竟目的上，他們尤其藉他們的極端反集中的經濟政策表明其與共產主義派的對立。最近工團主義者在人數上却大增加。他們在革命開始時候至多不過六萬人，現在却約有十六乃至十八萬人。

(7) 世界大戰以來德國社會民主黨發展上之概括的最後觀察

就社會主義各派的實力及其在選舉中的結果而論，則工團主義者自始即已離開，因為他們拒絕各種政治議會的行動。關於其餘三黨，即多數派社會主義黨、獨立黨及共產黨的勢力狀況，則最近對於政治團體的選舉結果分明表示極端各派的得勢與舊馬克斯黨的失勢。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九日國民大會選舉中投獨立黨的票占百分之三七·九；投共產黨的票占百分之一·九；在全體上，實表明社會主義黨的票數之減少；因為在一九一九年一月投社會主義者的票數實占全體百分之四五·五，到了一九二

○年一月却只占百分之四一·九。普魯士議會選舉（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日）的結果顯然表示因為獨立黨分裂的關係，票數多流於極端左派方面。獨立黨約失了二百萬票，其中一百萬票落在共產黨手中，更有三十萬票落在多數派社會主義黨手中。其餘則取厭煩態度，而不投票。多數派社會主義黨固然受了獨立黨方面之加入，但他們的議席却自一四五減至一一四。聯合共產黨得三十席，獨立黨得二十九席。該黨一九一九年共有一、〇一二、二九九黨員、至一九二〇年增加至一、一八〇、二〇八人，約增加百分之一五·六。一九二一年又增至一、二二一、〇五九人，約增百分之三·四。

社會主義中極端的那一派——即聯合共產黨——此後會否保持這麼巨大的增加與充實，或且較溫和的那二派多數派社會主義黨及獨立黨會否勝利，這是根本上關係鮑爾塞維主義的進展。鮑爾塞維主義如尙能支持較久，而且增進其勢力，那末共產黨也可望增加。但使或且鮑爾塞維主義在看得見的時間中崩陷下去，那末他的反響及全德國也將不免，結果恐怕舊日馬克斯黨因此又多增了勢了。

總而言之，現在社會主義各黨這樣分裂而為各小黨，實予工人階級的活動力以重大的損害。關於對內政策以及關於對外政策各方面。在最近國會選舉時候，在全體二千五百萬又四分之三的德國選民中社會主義各黨占去一千萬又四分之三，試想他們有多大的力量左右政局！但只因世界大戰以來這些

社會主義黨，猶如別國中的社會主義者分裂爲各集團，他們間不但互相攻擊，並且極端忿恨的互誣着，所以政治上組成的工人階級實不能作團結的行動。由是乃知社會主義者雖然在人數很多，而且自革命以來在宗國及各邦的政府內也占有極重要的地位，而在比較上却很難能根據他們的黨綱與其最終目的，以對於立法及行政發生積極的效力。

到底這次破裂將又引起社會主義黨之多少一致，却是完全不可靠。最可能的：是獨立黨與多數派社會主義黨之又行團結：在這兩黨中也常有求作合併的努力，並且因爲獨立黨中激烈分子趨歸到共產黨那裏去，所以對於這次合併多少具有可能性。

一九二一年革耳力次(Gottin)黨大會上所議決的新黨綱，實帶有強烈的改革傾向，所以很足以阻礙該黨和較激烈的獨立黨的結合。這新黨綱是顯然表明現在多數派社會主義黨在理論上含混不明。一方面設法迎合右立的黨員如楊士、庫諾、嘿尼士諸人的思想；這些人重視國家的價值，超出從前該黨所重視的程度之上，並且主張依漸進的改革之途徑以求逐步的前進。他方面又關顧到黨中站在正統馬克斯的基礎上的舊分子。於是該黨綱表現一種妥協性，他缺少從前厄耳福特綱要那種單義的、嚴厲的理論基礎。他與後者相反的地方尤其在於缺少那種明瞭的歷史哲學的出發點，即缺少那種視社會主義

的社會爲自然的必然的比資本主義的社會進了一階段的進化思想。在該黨綱的一般部分內，屢次說及改革社會的那種民意：「社會民主黨實替組織在人民國家內的民意取得經濟上統治權而戰，實爲根據社會團結的精神而圖社會改革而戰。」

其次階級鬥爭被作爲一種道德的要求。階級鬥爭自身不復像在厄耳福特綱要中那樣嚴厲的說了出來，在該綱要草案中幾不說到階級鬥爭。在正式的黨綱中固然把這句「階級鬥爭」收進去；可是其思想却完全削弱了，蓋卽在一般部分的開始中已經說道：「德國社會民主黨是在城鄉各地工作人民的黨，他要使肉體上及精神上創作的人們團結起來，達到共同的飯依與目的，達到爲民主政體及社會主義而奮鬥的團結。」由此看來，這其中并不是說到特殊階級，卽傭工階級的鬥爭；現在却是說一切工作的階級應團結起來以對抗不事產業的人們，然則連手工工人、農人、官吏、各種精神的工人也都被羅致進去。見於厄耳福特綱要內嚴格的要求——卽把生產手段歸爲公共——現在受了很大的削弱，才被收進去。現在只「說把巨大的集中了的經濟逐步改爲社會主義的經濟，以利一切經濟。」該黨受了國家社會主義的影響在字句裏都表現出來，蓋他主張國家尤其應對各種生利團體，卡忒爾及托辣斯等，施行監督。利便農人的特殊規定——這是見於該黨綱草案中的——并未收入於正式的黨綱中，留待日後列入

特別的農業綱要中。總之一切係表明這新黨綱實顯然由極端革命的工人階級黨離去而成爲一個民主政治的人民黨，他要在極其不同的各職業階級中組成極大的民衆階級，以從事社會主義上漸進的改革。在製成該黨綱時候，當然也有意使該黨在政治上堪與其他各派合作。

(8) 德國社會主義各黨對於所謂社會主義化所取的態度

「自革命以來」社會主義化」這名詞成了一個無窮常用的口頭禪，他的意義與價值在大半人依然完全莫名其妙，因爲他在一切應有儘有的變態之下被人解釋。要得社會主義化的一個明瞭而堅定的概念，却須絕對的把這概念這樣的形成出來，務使社會主義化只能成爲那些方策的總概念，即可以實施社會主義的實在的究竟目的的方策；所謂把生產手段由私人手裏移交公團運用是也。所以一切閃動不明的社會主義化之概念是可斥的。社會主義化并不是把各個經營交與其中工作的工人來接受；這樣一來恐怕變成工人資本主義，却不成爲公共經濟，卽志在把私人經營歸爲國有的政策也不是社會主義化；社會主義化的信徒對於國家經營會否不免成爲官僚政治那樣呆笨的機關，正抱着懷疑，在革命以前已經有了所謂國有問題。如果除了鐵路、鑛山等等的國有之外尙加有其他的，這也不外是說私人資本主義的經濟之內公共經濟的經營之增加而已；至於社會主義化是指一種原則上新的經濟制度，而完全廢除

私人企業，蓋這些私人企業應移交全體的民衆團體。

即從來德國宗國立法上在這方面所施行了的，也絕不是實際的社會主義化。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所謂德國社會主義化法律不外是一種邊緣法律 (Rahmengesetz)；其中是說，宗國有權依立法的规定，在相當的價給之下，把堪以社會化的經濟的企業，尤其是弋取地下寶藏及利用自然力的企業，歸爲公共所有。德國宗國在革命前即已有這種權限，并且革命以後宗國還未曾運用這種權限過。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關於節制煤炭經濟的法律還讓煤炭經濟的私人經濟的經營存在，并且只給宗國以若干監視及控制的權限。

如認混合經濟的經營之設立，或且工人參與利得之實施爲社會主義化，那末社會主義化的概念便是完全不能這樣解釋；然而已經有人竟謂工人以小股分參加企業爲社會主義化矣。(索爾夫 'Solf' 就是這樣說，見他的論文社會主義化的一個提議 'Ein Vorschlag zur Sozialisierung. Deutsche Zeitung' Handelsteil 15. 7. 19) 即在所謂威塞爾——麥楞多夫的計劃經濟 (Planwirtschaft von Wissel-Möllerendorf) 裏面也未會想到嚴格意義的社會主義化。當社會民主黨員威塞爾被任爲宗國經濟部長，而負了社會主義化德國經濟生活的時候，他拉了麥楞多夫進去。這計劃經濟的概念就和這二人的名字聯

合起來。這二人所作實際的計劃是在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間作一種妥協。威塞爾有一次說道：「我們要使工人一樣地和雇主參加簡單的經濟團體，務使工人除了在政治上共同負責，在經濟上也共同負責。」——到底各個經營經濟應否移歸國家所有，似乎完全要視財政政策而斷定。其餘，經濟的法律制度在原則上應依然不變，私人所有應不受干涉，不過負責者的處理權受了制限。威塞爾——麥楞多夫的經濟組織的建造應在自治體中完成，在這裏面工人與雇工享有同等權利，全國經濟會議應為最高機關，企業家不得對於他的經濟行為單獨決定；當由雇主、工人及消費者合組一個會議協同決定之。這些一切的計劃固然不是純粹的個人主義，却也不是資本主義。因為這計劃表示自由的與社會的經濟政策間的一種妥協，所以遭了兩方面——個人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嚴厲的攻擊。

社會主義各黨對於社會主義化所取的態度是依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而定。實際站在社會主義基礎上的一切社會主義黨如其不願違背他們的黨綱，都得求達社會主義化；不過關於社會主義化的時期、限度與步驟容有異向之走。於是分為全部與局部的社會主義化。溫和派——多數派社會主義黨——，就其新黨綱的草案看來，主張漸進的、逐步的前進，獨立黨却希望較快的、較徹底的前進。一九一九年三月獨立黨在黨綱宣言中有提出「最要的要求」說：「資本主義的企業之社會化應立即開始，在鑛山

業及發動力業(煤、水、力、電)、已經集中的鐵及鋼生產業、以及很發達的工業及銀行業與保險業中應立即實施社會化。大地產及大森林應立即歸為社會所有。共產黨更進一步；他要求立即沒收一切農業上大經營及中經營的土地，一切銀行及鑛山、鑛鑛場，以及工商業中的一切大經營。

社會主義的重要領袖所作的表示却與各黨的黨綱不同。不特多數社會民主黨的代表，甚且獨立黨的黨員都相戒過急從事社會主義化。例如考茨基在他的社會主義的行動綱要上的方針(Richtlinien für ein sozialistisches Aktionsprogramm)中有說：「但因這個任務是這樣重要而效力遠大的，所以不能一反掌之間便可實施，却只能按步就班，對於事實上的情形與新制度的預備須經過審慎的考慮。」在他處他說(見世界大戰的勝利者，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七日「自由」的勝利者 Der Sieger im Weltkrieg, in der 'Freiheit' vom 17. November 1918)「在總括上把一切宣告為社會主義化，然後再替他們設立種種條件，這叫做加羈勒於馬尾，叫做造一過渡時期；在這時期裏面資本主義的生產已不復存在，而社會主義的尚未可能；總而言之，在裏面合理的生產是不可能的。這叫做暫時叫生產停滯。在現在的民主政治化時期中如施行或且只要求這樣一種社會主義，不啻就是教德國化做瘋人院。」本斯泰因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所舉行的演辭什麼是社會主義(Was ist Sozialismus?)說，「現在我

們的工業停滯，我們的工業和極大的困難奮鬥，而且站在他面前的尚有許多難以計量的困難，因為我們完全不知道外國人將加我們德國以什麼條件，現在還有——不錯，我敢大膽地說了出來——一種奇異信仰心，以為我們如果宣布工業社會化、社會主義化了，那末目下關於工人或且關於全體的狀況將會有所改善。」——反之，有一個主張徹底的社會主義的代表餒刺 (Otto Neurath) 他在瑟謨尼次 (Chemnitz) 地方對於薩克森的社會主義化會作有一次講演，內中說：「所謂經濟的社會主義化是關係全體，我們應從上面開始社會主義化，不應零點散處的段段舉行。我們不應問及某一個經營到了社會主義化的成熟程度與否，我們應問及，一切經濟到了社會主義化的成熟程度與否。對於這問題的答案是：我們現在薩克森可以社會主義化實比從前為易，也許比之以後十年百年還容易。」（見薩克森的社會主義化，"Die Sozialisierung Sachsens," Chemnitz 1919, 3. 23.）

我本人對於社會主義化的問題不用再用細說，因為我可以指出上面第三講最後數頁中我所作原則上的表示。我對於最近新發生的改革，還堅持這種主張，甚至正在現在這時候，自戰爭及革命發生之後，我對於廢除私人企業的精神所抱的疑慮，比在戰前經濟興盛的時代所抱的還甚，因為現在應該用盡一切力量再把落下的德國經濟生活提高起來，現在最要的是企業家之強有力的直覺，如果採用混合

經濟的管理機關便會壓抑他們的最佳的努力。根據財政上的種種理由在宗國各邦及地方，已經得逐漸加增混合經濟；但是在這裏得設立像混合經濟的經營那樣的機關，儘量容許私人企業精神以許多活動的餘地。

第二十五講 法國及英國的社會主義，國際黨，結論

一 法國

在上文關於法國社會主義運動的陳述中已經指明各黨中起了巨大的裂紋；這是表明法國發展的特徵。固然在一九〇五年藉着「合併黨」(Parti unifié)之組織，達到各黨結合的目的；但這種結合不外是一種表面的，因為內部的黨之對立依然潛伏着。此外尚有目的只求改革的一派社會主義者離立着，他們假獨立黨的名義自行組成一黨，這些獨立黨徒在議院中只有幾個代表，他們并非徹底的社會主義者，却只在極端者與社會主義者中間形成一個過渡，并且努力和有產階級各黨作妥協。完全脫離

政黨運動的，是工團主義者；我在上文已經把這事詳說了。

戰中及戰後的事變之影響使在戰前所做到的表面的結合也站不住了。不特在社會主義黨中，甚且在工團主義者中也起了分裂。這些分裂并非受了新理論的出現，也非受了新出頭的領袖之出現而促成；牠們不外是表明從前業已存在的對立一碰着牠們因外面的動機而顯然暴露的時候，便不克持久的敷衍下去。

在戰前，法國社會主義黨（合併黨）曾在各種宣言及通告中宣言主張一種強毅的和平政策而且反對戰爭。在一九一四年七月十四至十六日在巴黎舉行的全國黨大會上，尚且接受「保障和平」的一個議案，是提議採用總罷工，作為防止戰爭的最好的手段。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即在奧匈國向塞爾維亞宣戰的時候之後，工團主義者的戰鬥（Bataille syndicaliste）提出要求：「巴黎人民起來啊！我們以強毅的態度制止戰爭！我們今晚聚集在林道之上！」——巴黎各工會也要求起來作市街遊行示威運動以反抗戰爭。次日議會中社會主義者集團宣稱：他們的幹部命他們和政府磋商，教政府堅決地維持人民所渴望的和平。即在那個始終為着和平維持而活動的朱雷（Jaurès）被人暗殺之後，社會主義者方面還繼續進行維持和平的努力。

和平的情緒變爲戰爭的情緒；是在德人侵入盧森堡，德國對法國宣戰那時候。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是朱雷出葬的日期——在工團主義者的戰鬥中出現反對霸權（*gegen das Faustrecht*）的一篇論文，結句說：「我們反對霸權，反對德國軍國主義，以挽救法蘭西民主政治的傳說與革命家。」現在社會主義黨方面屢屢發出口號：如反對德國帝國主義，這次戰爭不是對德國人民，乃是對德國帝國主義等。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大會上，由政府提出的戰爭法律草案被無爭議的一致的接受了。在朱雷入土時候，有一個社會主義者說，他（指朱雷）保障着法國，他猶如我們深信，本黨所謂人皆同胞的高尚的理想應受保障。戰爭事變其初曾使法國一切社會主義者作更堅牢的團結。他們結合爲「神聖的聯盟」，求把各黨間的一切爭端葬送了，其初有二個，其後有三個社會主義者開員被招入閣。

戰爭持續愈久，和平要求愈烈，而各黨各領袖間原則上的對立便也愈暴露出來，並且在戰中已經顯然有五派出現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六日至十日的國民大會上。

一、四十人派 這是照布朗廷（*Branding*）革命的四十個署名者而稱的 他們宣稱：國家主義實先於社會主義而來，並且階級合作得起來代替階級鬥爭，這派預備着和有產階級各黨作妥協，他只有極少數黨員。領袖是坎佩耳（*Compère*）、摩勒爾（*morel*）及發叻（*Varene*）；他的機關報是自由法蘭

西 (La France libre)。

二、多數派 (Majoritaires) 他們這樣稱謂，是因為一九一八年大會席上他們占該黨多數。領袖是托馬 (Albert Thomas) 及累諾得爾 (Pierre Renaudel)。

三、中央派 這個在一九一六年創立的集團的目的在於防止黨的分裂，並且欲對世界資本主義組成一一個統一的陣容。領袖是：桑巴 (Sembat) 及卡商 (Cachin)。

四、少數派 是反對黨的中心，他們現在不復少數，而是多數了。領袖是隆革 (Jean Longuet)、普勒塞曼 (Pressemann) 及夫洛薩 (Frossard)。

五、壘塔爾派 是主張親麥林及壘塔爾 (Kienthal) 的黨綱並且經過兩年曾把其他各派所同意的戰時公債加以拒絕。

現在如在這裏把這各派所因而分離的各種差異之細點陳述出來，似嫌說了太遠。現在只好指出兩個重要對立，即關於戰爭目的，以及和平政策的問題及關於對鮑爾塞維主義的態度之問題。

在戰時尤其是那問題，即國家主義的戰爭政策結果能否如何利及國際的和平政策。在這裏有許多對立，却不甚顯露出來，因為反對國家主義政策的反對派結果往往因顧及本黨結合的利益，而同意於

一般的議案，以便繼續戰爭與承認戰時公債。當時在社會主義的運動中已有一個潛伏的危機，到了戰爭終結之後，方始公然暴露。這危機不免引起破裂，因為即在對於鮑爾塞維主義所取的態度也有極端對立，於是此後他們再不能共處了。

一九一五年已經出現敵對行動，因為李摩日 (Limoges) 所草的黨之組織宣言中已決定一種表示，即黨不只參與國家的捍衛，却應復興國際社會主義的關係以促進和平。這些反對者——屬於其中的尤其是少數黨員，如普勒斯曼 (Pressmann)、孚耳 (Paul Faure)、發雷耳 (Vallières) 等——同時努力保持黨的一致。在一九一五年七月所開的大會上，這反對派還願意對於全黨表示讓步並且承認「支持到底」的原則。到了麥耳亥謨 (Meerheim) 及部耳得隆 (Bourderon) 到親麥林去并且根據那裏的議決案，創立「一個委員會以復興國際行動」之後，這反對派的勢力愈其澎漲起來。現在重新開始多數派與少數派間的鬥爭。在一九一六年八月黨大會上已經有千以上的反對者贊成召集「國際局」。議會裏面有三個屬於反對派的議員到黎塔爾去，并且在議會內提出他們的議案，即否決戰時公債并認有立即議和之必要。其餘反對者在少數派隆革及普勒斯曼的領導之下，却願意同意於以後的戰時公債，經過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巴黎黨大會之後，反對派的勢力愈其增加起來，其時他們對於要求「完全復造國際

關係與立刻召集國際局」的議案，已經得了一三到一四、〇〇〇票。

該黨的真正分裂直到對於鮑爾塞維的態度發生不同的時候，方始出現。在斯特拉斯堡黨大會上（一九二〇年二月至三月）法國社會民主黨正式宣言脫出第二國際。

第一次對於鮑爾塞維主義的熱誠不久引起論議與鬥爭，就是關於依附莫斯科的問題。在圖耳（Turkey）的黨大會上（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至二十九日）少數派的領袖隆革又宣稱是第三國際的信徒，却不欲承認鮑爾塞維黨所提出二十一條件並且不願接受莫斯科的命令。於是發生分裂；一方面要求無條件依附莫斯科的「共產黨」，一方面是拒絕這個的「社會民主黨」，此外還有隆革及少數派，以及其他各派如中央黨及多數黨也屬於其中。卡商是贊成依附莫斯科的主要代表。分裂的外因引起鮑爾塞維主義者辛諾葉夫（Sinowjew）提出革除隆革黨籍的要求之表決。及這要求的拒絕被多數否決之後，於是發生分裂；四、七六三人的投票結果，贊成依附莫斯科者以二、三五二票對一、〇二二。現在德國社會主義各黨中大多數算是屬於共產黨。黨報人道主義落在共產黨手中。可見鮑爾塞維主義在法國猶如在他國，對於工人運動實生分解的作用；他并不會引起社會主義各黨間的一致，却反引起他們間的不和。

在工團方面，猶如在政黨方面，也發生爭端與分裂，並且這裏引起分裂的，也是關於戰爭目的與

鮑爾塞維主義的問題。如我們所知，工團主義者在戰前曾拒絕對於各政黨的參與；但在戰後，他們却和社會主義各黨聯合起來作共同的行動。爲謀接近計，曾由工團總聯盟及各聯合合作社的代表組成一個殊別機關。名曰「行動委員會」，用以集中工人階級對於戰時一切需要的一切獨自行動。在工團主義內，猶如在黨內，不久成立一個反對派，是由麥耳亥謨領導以反抗國家主義的戰時政策。他們在諸大工團聯合會及工作交易所中占很大的勢力，而和總聯盟委員會及社會黨中多數作頑強的奮鬥。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四至二十九日舉行工人總聯盟大會，會中通過那一議案，足以表明國際派在工團運動中擁有很大的勢力。蓋大會要求德國政府虛心靜氣答覆和平的提議，并要求政府鼓勵聯合國各政府作同一的進行，務使和平的時期從速到達。

工團主義者中的反對派現在對於鮑爾塞維主義的問題却舍却從前所推行那種非政治的、純粹工團的政策，而主張直接根據革命的武力策略而進行。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五至二十一日里昂工團主義者大會席上發表同情於俄國革命的宣言，他們實要求工團主義者起來作實際的援助。其時工人總聯盟的主席遂發通告於下了決心的各工團，請他們對於如何最可以防止聯合國對俄的干涉及可以促進對俄結立刻而完全的和約的問題表示態度。反對派却認這種進行不外是工團領導機關的狼狽演習。由是當巴黎

工團聯盟的代表大會討論這通告時候，他們便認在法國實施革命的總罷工爲對於俄國革命的唯一有效的援助，此種動議遂以六十票對四十二票，加以十九票的棄權，通過了。這議決的結果是聯盟會幹部的辭職。聯盟會幹部認對於這議決案不能負責，并且宣言：總罷工不得被降抑爲一種純粹消極而且破壞的手段；得等到無產階級的自信力很鮮明很有力，足以繼總罷工之後立刻起來應用實際建設的，那些由於工人自己認識的原則；到那日，這總罷工才達到他的完全革命的價值。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新召集的聯合會代表大會上却以九十二票對五十二票，加以四票的棄權，同意這宣言。此後幹部固然撤回他的辭職書，然而投票結果足以表明即在工團中也有裂紋。在工人總聯盟中的共產主義分子自行組成一種特殊團體名曰革命工團主義者委員會 (Comités syndicalistes révolutionnaires)。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旬工人總聯盟開了一次非常大會，通過了議決案，斥這共產主義的特殊機關爲破壞工團陣容的一致，同時不許一個工團會員隸於兩種不同的團體。可是極端主義者却不顧這里爾議決案依然繼續進行其革命的特殊團體之組成。工人總聯盟的中央幹部遂召集全國代表會；這是由各區各職業的聯盟中各代表組成的工會機關。這全國代表會宣稱里爾大會的議決案應作如是解釋，即凡隸於革命工團主義者委員會的各個工團及各個工團聯盟即失了工人總聯盟的分子資格。法國工團中的新鬥爭

將復不免，因為共產主義少數派宣稱他們不願退出工人總聯盟。

關於黨的人數問題，却應視及下述的：在戰前，社會主義黨有七五、〇〇〇個黨員，戰爭爆發以後，其人數很縮少；一九一五年只有二五、〇〇〇人。議和以後，其數又大增，一九二〇年該黨有一五〇、〇〇〇人。反之各工會的會員人數却大減少；一九一九年末他們有一、三一五、〇〇〇人，到了一九二〇年末却只有六〇〇、〇〇〇人。

一一 英國

英國社會動運自世界大戰以來曾經重大的改造與新形成；他們半是回溯到戰前所說的理論；不過自最近以來方始廣傳與深造。在這裏應首先述及基爾特社會主義，他是一派新的特種的思想。

(A) 基爾特社會主義

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思想行程首先見在建築家盆替 (Penty) 在一九〇六年所發表的基爾特制度之復古 (The Restoration of the Guild-System)。但自科爾 (Cole) 的工人世界 (The World of Labour, 1913) 發表後，基爾特社會主義方始侵入廣大的範圍內。科爾是替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思想作最有效力

的奮鬥的人；我現在設法把基爾特社會主義的基本思想簡簡的陳述出來，這也是大半依據着科爾的作品的。他的基本思想總括在工人年鑑 (Labour Yearbook) (1916) 中所定的定義；依這定義而說，基爾特社會主義的目的是：藉一種和國家相連絡的制度，即國家的基爾特（亦稱行會）以廢除傭工制度而採用自治制度。基爾特社會主義不欲供給新的社會主義的制度，也不欲創立新的社會主義黨，他們只願供給現存的工人組織及現存的社會主義黨以新思想并關於他們在政治上及經濟上活動的方策，他們尤其要改變極其有勢力的英國工人運動，工會運動，蓋他們賦與工會的目的，實比從前工會政策所賦予更為高尚更為廣汎。他們爲這目的故，遂把從前已有的思想，尤其二十世紀以來從法國傳到英國的工團主義思想，和費邊協會的若干國家社會主義的原則聯合起來成爲一種新的學說，即基爾特社會主義。

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所力求的，最好依知簡的方式表示出來：即「產業之控制」是，并且這控制是由結合在產業的團體內的工人來實施的。從來工會的任務是藉工資之提高、工作時間之縮短、消費之便宜及其他同類的方策以促進他們會員之物質的福利，他們却不管生產的基礎，而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却要使未來的工人團體把經營的基礎，即生產自身，以及經營的指導與管理握在掌中。但是——在這一

點上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根本上和工團主義者不同——在監護生產時候，他們應和國家立於極密切的關係，蓋他們應與國家共同控制工業，未來的基爾特應和過去的工團不同，即他們不僅包含手工工人，甚且用腦工人，如各經營內的高級雇員、技術家、官吏等也得根據平等的權利列入基爾特。手工工人與用腦工人應聯合起來管理各經營。基爾特之根本的任務——這比之工會政策是完全新的——是注意物品的生產、產業的指導與管理。

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從這幾點出發，即資本與工作是對立的；企業家雖是生產手段的所有者，此後却不得再擁從前的權力；這權力應歸與結合在各經營內的用腦工人及手工工人。基爾特社會主義者視一切社會的劣況之根苗在於工人的工資關係；所以應對工資制度下攻擊。工人應由一種領薪的、隸屬的工人，變為獨立的對於經營的自治的參與者。什麼叫做產業的控制？並不是說一切生產手段應屬於工人；却是說，生產手段的所有權應歸全體、國家以及地方。就是盈餘也得歸國家以及全體，但在經營的內部，則指導權應歸於聯合的手工人及用腦工人，如果，視基爾特為具有自治權的產業團體，把他們組織起來以達這目的，那末各經營的自治不應推展及於消費者利益的問題。基爾特不應自主的規定着生產品的價格，消費者對此應有發言權，並且在確定價格時候，可以在消費會議中協同討論；不過

最後國家也得以全體利益的代表者對此參與發言。

當私人所有移歸公共所有的時候，應行分別出三個產業集團：

一 大產業，如鑛山、鐵路、航業、鐵工業等，應受國家化，這是說：應歸國家所有，不過這并不是指通常所謂的國家化，蓋全部管理權是交給基爾特，惟獨所有權歸與國家。

二 凡供作維持公共的福利之用的經營分業，如水、煤氣等業，應成爲地方所有。

三 所謂「家庭的工業」，例如傢具業、衣服業等，應歸合作社所有。所以未來的工人不應復爲工資奴隸，却應成爲產業的參與者，他應不復隸屬於一個資本家，却應成爲他所選的工頭、指導者等的同志。此後不應製造商品以供漁利，却只製造物品以供消費；消費的量是依消費者的需要而定的。

基爾特還須規定他們的會員的酬庸；因爲真正所謂工資此後應沒有。酬庸的高度也得確定，務使各個會員得有充分的生活維持費。

基爾特的外面結構應作這樣的，即：某地方內某種工業的一切工人應團結在一種組織之內；例如建築業的一切工人被結合起來成爲一個建築基爾特。并不是建築工人的各組工人，如泥水匠、銅匠、細木匠等各自組織基爾特。一切鐵工人也被結合起來作全國鐵工業基爾特。職業制度得取消，代以工

業制度。

這種中央制度之外，還保留着聯邦式的原則；因為各經營應成爲自治的核心；每個經營的一切工人應選出一個代表會以執行管理業務，這代表會應解決經營內部的一切問題；他尤其對於生產品的質與量負責。區代表會比各經營高一級，他們是在一地理的區域內由各經營選出，他們應設法使各工業合作，並且是介在各經營及國家基爾特之間。執行基爾特的一般政策之最高機關是全國代表大會，這是由各個經營內各個職業的會員所施行一般的選舉中產生出來。

有人會把從前提議過，以及實施過的工人生產合作社中之享有國家信用借款者，和這基爾特相比較。然而比較時候往往把國家在基爾特社會主義中所處根本上不同的地位忽視了。因爲在這裏國家不僅是信用貸款者，却是一切生產手段的「最高所有者」；經營不應獨立的隸於工人？却應讓與國家以重大的權限。國家固然不得干與各經營的內事，只得於此一委之於自治的經營，然而他却應爲全體的「囑託實行者」。他以這資格，應協同并領導消費者代表，保持消費者的利益。此次他對於最低工資及最大工作時間應設規定，如其消費者與生產者中間發生爭端。

「基爾特社會主義」這名稱也會引起人的那種觀念，即其意是在復興古代的行會制度，務求促進小

經營以代大經營。其實基爾特社會主義和古代的行會制度只有很少的共同之點，他所求產業中的改革并不放棄大經營，不過最初的基爾特社會主義者中有幾個對於機器的生產法取敵視的態度；在這學說的新代表者中却不復有這種態度，當然，即彼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最新的信徒中也是主張特別保護手工的工作，特別注重質的工作，并且遇着質的工作最好由手工來維持的時候，更主張優待小經營。

基爾特社會主義要和平的達到他們的目的，他們拒絕無產階級的獨裁制、以及總罷工、怠工等手段。他們只要漸進的，但不革命的進於基爾特國家之境。他方面，他們也拒絕一切小小的社會改革的手段，如利得之參與等。

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在一九一五年創立了全國基爾特同盟 (National Guilds-League) 以達宣傳這些思想的目的。現在尙未至大規模的實施他們的思想的地步；這基爾特社會主義的原則在建築業基爾特中已經多少得了應用，現在這些基爾特已分設於英國各城市。當時成立的建築業基爾特會在一九二一年二月聯合爲一種全國的組織。依雷部瑟 (Leubuscher) 的報告 (見英國之社會主義及社會主義化 (Sozialismus und Sozialisierung in England, Verlag Gustav Fischer, Jena, 1921, S. 220)。這些建築業基爾特是建設在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思想之上，即凡擁有在這工業中工作的人之一切或且大多數

的工會實享有一種工作特權，這特權可以作為享用信用借款的基礎，並且使他們能夠不私。人企業家的資本之拘束而有利的運用他們的工作力。市團體應墊借以於此所需的資本，他是直接參加基爾特所接受的任務之實施，然則這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思想是把生產手段的公共所有權和組織在基爾特內，而享有特權的工作力聯合起來。

人也以為所謂「業務監視者」(Shop stewards)的制度為多少是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思想之前驅。這業務監視者在戰前業已存在，他們代表某經營中的工人乃至工會的利益；例如控制工會款目的收入等。戰中這業務監視者的權限大受擴充。當時集合在各種戰爭的各經營中的工人階級管認工人有派代表參加經營的指領之必要。蓋工會的組織因為分裂的結果，所以不堪當此責任。由是各種戰爭的經營中的工人各自選出經營監視人，即所謂「Shop stewards」，他們組織業務委員會(Work Committees)。工團主義及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思想，對於工人這樣努力擴充并加重其代表參加企業中的工人利益，確生有影響，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希望藉業務監視者的助力逐漸接近他們「控制產業」的目的。

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思想在間接上具有何種價值，我們可以在他們對於英國社會主義各黨所生的影響中看出來。現在我進而陳述他們的這種影響。

(B) 英國社會主義各黨與工會運動的改革與新形成

(1) 獨立工黨(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一切社會主義各黨的代表在戰爭爆發以前在英國猶如在大多數其餘各國內是戰爭的反對者。他們的態度在戰爭爆發及戰爭繼續中方才表現出來，獨立工黨尤其他的領袖哈第(Keir Hardie)及麥克唐納爾(Mac Donald)即在對德宣戰以後還保守他們的態度，并不參加一切對德侮蔑的戰線。然而屢欲發表戰因的見解的那位麥克唐納爾也宣言現在得戰到底，惟獨立黨在一般中却與其他社會主義各派相反，而表明其和平的態度。該黨在一九一四年在議會中的三十九個工人議席中占有七個，現在爲了這種態度而失却了不少黨羽。他的最優秀的黨員中有多數在一九一八年選舉時候失了議席。自一九一九年以來該黨又復發達起來。

獨立黨員對於無產階級獨裁制及工會制度的問題也取拒絕的態度。該黨在一九一九年發表的覺書中詆斥蘇維埃共和國的兩要求，并且堅持他的舊態度，即：等到社會主義的宣傳對於公意生了充分的影響，而且社會主義者被選爲各公共機關的代表之後，社會主義的國家方才得個安定的基礎。工團主義的思想之影響實也在該覺書中表現出來；因爲裏面有說：「依獨立黨的見解，過去中，尤其在過

去五年中的政治經驗已毫無疑惑地證明：如果不採用相當方策把行政的機關在更比從前遠為密切的關係之下，和工人階級在產業上的組織結合起來，那末議會主義的民主政治是不能存在的。本黨在考慮如何可以設立代表制的產業會議，付之以廣泛的全權，以控制工場內的工作條件，并付之以國家的行政與立法上的特種討論權。」

即在格拉斯哥 (Glasgow) 的黨大會上，該黨還堅持這主張；大多數議決脫退第二國際；然而加入第三國際的動議也被拒絕。該黨蓋努力自創一新國際，以歸納一切社會主義派。該黨在一九二一年三月薩坡特 (Southport) 黨大會席上所取的态度也很相似，在這裏也議決不接受莫斯科 二十一條件；該黨拒絕來跟從鮑爾塞維 的方法，他反要求社會主義者此後設法逐漸侵入地方及國家的行政機關，把破產的資本主義的社會逐漸改爲社會主義的。在表決莫斯科 二十一條件時候，以五二一票的反對九七票的贊成。鮑爾塞維 主義的少數於是離去大會，并且決定和英國那裏所謂共產主義的集團結合起來。

(2) 社會民主協社

這個根據馬克斯主義的政黨於一九一一年在曼徹斯特和國際工黨中有認他們的黨對於政府不甚堅

持的幾個支會并其他激烈的社會主義者合成一新黨，即所謂不列顛社會主義黨（*Britishe socialists* - *che Partei*），他於一九一二年在曼徹斯特舉行第一次年會，該黨的黨綱一半是社會民主黨的，一半是革命工會的。在大戰中這不列顛社會主義黨分成對立的兩集團。與德曼（*Hyndman*）所屬的那一集團重申國家的防禦之必要，而另一集團却主張各國工人應互相了解以達終結戰爭的目的。國際主義者在該黨中愈占勢力，甚至激烈的攻擊上述那一派，以致與德曼及其羽黨在一九一六年的黨大會上宣告脫黨。

不列顛社會主義黨實站在鮑爾塞維的思想之上。一九一九年在瑟斐特（*Sheffield*）舉行的大會席上，大多數議決脫出第二國際，加入莫斯科國際。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選舉時候，不列顛社會主義黨以二十五個候選人參加選舉，却得不到一個議席。

社會民主協社中蘇格蘭分子於一九〇五年脫出該黨，在蘇格蘭創立了社會主義工黨；他們也是鮑爾塞維的信徒，一九二〇年八月和不列顛社會民主黨結合為一黨，名曰共產黨。反之，與德曼及其同志從前脫退了社會民主協社，現在創立那個以國家主義為基礎的國家社會主義黨（*Nationale sozialistische Partei*）。

(C) 工黨

工黨在一九一八年一月舉行的諾定罕 (Nottingham) 大會席上議決改組他們的組織。自他們的創立 (一八九九年) 以來，這工黨根本上是工會合成，此外還有國際工黨、不列顛社會主義黨、及費邊社三黨的黨員。這工黨在主體上是代表議會內特種工會利益的組織。現在這些工會固然還是該黨的基石，然而此外在比較重要的城市及選區內還創立地方選舉會；不特手工工人，連用腦工人也可以隨意加入。因此，這工黨此後是由各工黨及選舉會合成。

在一九一八年七月舉行的大會上，一方面工黨與他方面自由黨及保守黨間的妥協取消了；工黨自行提出候選者於議會選舉。至於其餘，則工黨依舊堅持他們從前自他們的領袖亨得孫 (Henderson) 一九一五年進入阿斯魁 (Asquith) 內閣以來所主張的作戰政策。在一九一八年議會選舉時候，工人自行提出三六一個候選者，却只能獲得六十權。

工會依舊作為工黨的核心。一九一八年有一二六個工會連同三、四六四、〇二〇會員編入工黨中。然則他們在三、五一、二九〇人中實占絕對多數。在一九二〇年工黨大會席上，尤其鮑爾塞維主義的問題引起興趣。請求加入莫斯科國際的動議被二九四、〇〇〇票對二二五、〇〇六票否決了。

又一個請求脫出第二國際的動議也被否決了。工黨愈其堅決地主張國際理解的政策。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思想對於工會的發展尤其有過重大的影響；這可由新的黨綱中看出來（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規定的；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更有附加條文）。其中有說：「黨的任務是予手工工人及用腦工人以他們的工作所得全部收入，并根據生產手段歸為共同所有（common ownership），儘能力所及以管理與控制產業，及由人民儘量服事役務的等原則，以力求生產品分配之合理。」

(D) 工會

在工黨裏面，既顯出基爾特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在新的工會政策中也是一般如此。蓋工會政策愈其主張工人團結在產業團體內以代從前團結在職業團體內的政策。

關於這種團結傾向，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一九年機器工會中六個工會結合起來成一個包括四〇〇、〇〇〇人會員的總聯合會。此外，表現這種影響的還有在於工會等都逐漸放棄從來只求參與工作條件之規定的那個政策，而且在原則上已進而要求以公共經濟代替私人經濟。

自一九一五年以來，工會大會的議決案總是重覆不已的要求各生產分業歸為國有。他們同時要求工人與雇員起來作有效的民主政治的控制。三個大工會尤其要求他們的經濟分業歸為國有，同時實現

自治制的思想，這三大工會是鑛工聯合會、鐵路工人全國工會及郵務工會。鑛工聯合會在一九一三年關於煤鑛的國有會發表一種法律草案——這是完全規定鑛山國有的——，他們自大戰終結以來即已推行社會主義化政策并且對於一九一九年舉行的研究委員會提出完全根據基爾特社會主義的精神的議案。

工會和政治的工人運動之合作愈其鮮明的表現出來。一九二〇年八月創立一個行動會議 (Council of Action) 以圖工會的力量與工會運動中的政治力量共同動作。加入這行動會議中的是工會大會中的工會委員會、工黨的執行委員會、與該黨在議會中的支部。上述議會中的工會委員會把他們的任務的範圍逐漸擴充起來，尤其關於工會向來對之表示中立的國際關係。工會大會及由此產生的議會委員會在未來應成爲英國全國工人團的中心點。

議會委員會將來應改稱爲總會議，其特殊任務是：和別國的工會及工人運動發生關係，以促共同行動與國際活動的目的。最近工會尙在逐漸發展中。一八九二年至一九一〇年間會員的人數增至一百萬人，在最近八年中（至一九二〇年止）復合了一倍。

關於法律提案的重要討論與內部政策的各問題，工會的代表常被當權的官吏吸引進去，優越的工

會領袖常加入聯合內閣中。

三 國際黨

戰爭與革命事變既在各國社會主義各黨中引起了重大的分裂與改觀，而國際黨也因之而受了完全的變動。我在上文已經說國際黨的發展，在這裏却應分出兩階段。

(一) 第一國際——是從一八六四年至一八七六年止。他的解散的原因是在無政府派及馬克斯派間不可妥協的對立。

(二) 第二國際——是成立自一八八九年，至今還在着，這國際黨的大會上雖屢屢發生了對立的各派，而表面的結合却至少受了維持。世界大戰竟也把這外表的結合破壞了而引起國際黨的完全的改觀。在司徒嘉德國際社會主義者大會（一九〇七年）席上，已經由革命派列甯及盧森堡提出一個動議說：「如果戰爭爆發起來，社會主義者應負責使其從速了結，並且行使一切手段，利用戰爭所引起政治上及經濟上的恐慌以鼓動民衆，并藉此以促進資本主義霸權的覆滅。」戰中德國及其他各國境內所發生嚴厲的黨爭引起了各集團的分立，並且在各國中尤其得有勢力的是那三集團。(1) 社會愛國主義

者(Sozial-Chauvinisten)，稱爲這派的是如德國多數派社會主義黨的那些社會主義者；他們贊成戰時公債，在戰後則主張和中等階級的民主政治合作。(2)中央派；德國方面的考茨基及其羽黨并獨立黨等可算是屬於該派的；他們又被稱爲社會和平派(Sozial-Pazifisten)，因爲他們主張從速了結戰爭；所以也拒絕戰時公債。(3)共產派，他們代表無產階級獨裁制與會議制度的種種要求。主要代表是俄國的鮑爾塞維黨員及德國的斯巴達團。這派的羽黨自行組成爲

(二) 第三國際——并且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至六日在莫斯科舉行他們的第一次大會。

被延請加入這次大會的只限於這派的社會主義黨。這第三國際「告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宣言宣稱只有無產階級獨裁制的手段才能夠縮短目前危機的期間。這第三國際顯然反對民主政治：「無產階級如要攫取統治權，只有斷定：應用有產階級的民主政治方案是不可能的，并且只有對於新的工人民主政治創立種種條件與體制。」此外，第三國際還有他的特徵，即他自視爲代表從前武力革命見解的革命黨，所以自稱爲「從巴柏夫到卡爾·李布克涅喜特及盧森堡爲止的革命系統之直接的繼續者。」

第三國際應爲公開的羣衆行動，革命的實現之國際黨，應爲行爲的國際黨：「在工人會議的旗幟之下，在爲政權與無產階級獨裁制而作革命的奮鬥的旗幟之下，在第三國際的旗幟之下，你們各國無

產者團結起來！第三國際要公然與從前屬於國際黨，而不站在無產階級獨裁制及會議制度的基礎之上的分子，例如德國多數派社會主義黨及獨立黨等斷絕關係。」他方面他們却要與從前不屬於社會主義黨的分，例如工團主義者中相當的分，團結起來。莫斯科大會中所通過的方針歸結說：「無產階級會議制的國際共和國萬歲！」列甯在一篇論文：第三國際，他在歷史上的位置中有說：「共產主義的第三國際在世界史上的價值是：開始實現馬克斯的偉大口號，這口號是總結社會主義及工人運動百年來的發展賬，這口號是在無產階級獨裁制的概念中表現出來的。」許多國家的各共產主義黨會對斯巴達團發出請求參加莫斯科大會的申請書，其中顯然申明新國際之組成是根據德國斯巴達團及俄國共產黨（即鮑爾塞維黨）的黨綱的。該申請書中又說：「這新的權力機關必定實現工人階級的獨裁制，在數地方還要實現小農人及農人的獨裁制。……無產階級獨裁制應為立刻沒收資本與取消生產手段私有權的槓桿。」第三國際要與從前的相反，而認真實現世界革命：「鬥爭的基本方法是無產階級起來作羣衆行動，直至用武力公然向資本的萬能進攻為止。」第三國際要走第二國際所走以外的途徑。他不再與有影響的社會主義者團結，却只要把徹底的、暴動的共產主義信徒融合成爲一種世界組織。他要成爲「無產階級革命的總參謀部」。他要比第二國際更爲進出，因他不僅收容「白色皮膚」的人類，甚且

要收容黃色皮膚以及黑色皮膚的人類，要收容全世界的工人，只要他們是共產主義者。只有各國的共產黨才被收容，其餘各派都被革除，即是德國共產主義工黨也以同情的分子而受收容，因為他并不嚴格地遵奉莫斯科的獨裁制。後來他完全脫出，至謂俄國的無產階級獨裁制單獨不能持久的施行下去的這種見解，——這種見解刺得克自己也宣稱：俄國證明一國不能單獨達到無產階級獨裁制——遂引起那些嚴格的條件之規定。

第三國際的收容條件之規定共爲二十一點，現在舉出其中最重要的，以見第三國際如何和他的前輩之不同。

第一點 一切宣傳與提倡得帶實際共產主義的性質并須適合第三國際的黨綱與議決案。黨的機關報得由可靠的共產黨員，即已經證明致力於無產階級事件的共產黨員來領導，所謂無產階級的獨裁制不是簡單的照從前所規定那種依國別而定的體裁；他須受這樣的宣傳，務使每個簡單的工人、女工人、兵士及農人，依日常生活的事件而理解這種獨裁制之必要；而我們的報紙却應同情的觀察這些事件而且逐日利用着牠們。

第二點 凡要加入共產主義的國際的各個團體應依常規與方案使改革派及中央派離開工人運動中

多少負責的地位(黨的組織、編輯處、工會、議會中幹部、合作社、地方政府)，而代之以可信的共產主義者，却不必即着手由羣衆中舉出簡單的工人以代「有經驗的」敵對者。

第六點 凡希望屬於第三國際的各黨應負責，不僅舉發公開的社會平和主義，甚且舉發社會主義的詐僞與虛飾；依系統的教工人知道：不以革命的手段推翻資本主義，那末無論對於軍備限制作協定，對於「民主政治」求革新，都不能防止新的帝國主義的戰爭。

第七點 共產主義的國際不能靜視著名的機會主義者——現在是由圖刺提(Turati)、考茨基(Kautsky)、喜爾斐定(Hilferding)、喜爾魁(Hilquit)、隆革(Longuet)、麥克唐納爾(MacDonald)、摩狄格良尼(Modigliani)等所代表——也有作爲第三國際中人的權利。這樣容許的結果將使第三國際極端與死滅了的第二國際相似。

第十七點 依這種關係，一切要隸於第三國際的黨得改定名稱。凡要隸於共產主義國際的各黨應具這名稱，即某某國的共產黨(第三國際的支部)。定名的問題并不只是一種形式上的，乃是極重要的一個政治問題。共產主義國際已對全世界的有產階級及一切黃色的社會民主黨宣戰。所以必需使每個平凡的活動者明瞭共產主義各黨與舊日正式的「社會民主主義」及「社會主義」的各黨間的區別；後者是

背叛了工人階級的旗幟。

(四) 二又二分之一的國際——一切根據這議決案而被摒出第三國際，或且不能加入其中，一方面又不願回頭到舊的第二國際的黨遂在喜爾斐定、包耳 (Otto Bauer) 及馬托夫 (Martow) 領導之下組織二又二分之一的國際 (2½ = Internationale)。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七日的不來梅宣言中，這新的國際係對着各國的社會主義者而發。他們與莫斯科國際相反，並不認無產階級的獨裁制為絕對惟一的策略，却要使政治的策略適應每一國的需要。宣言中說：

「無產階級奪到了政權，他如遇着有產階級危害無產階級的政權，或且在反抗他的時候，他將應用獨裁的手段。」

其次又說：

「獨裁制要採用何種體裁；這是關係各國現有的經濟的社會的及政治的狀況。如果無產階級應用民主政治的手段奪取權力，那麼遇着有產階級反抗的時候，便也得迫民治政治的政權使用獨裁制。但在決定的權力鬥爭的時期中民主政治被階級對立的力量炸壞了，那末獨裁制便得採用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組織的獨裁制。獨裁制的機關可以依各國的狀況；而為工人會議、兵士會議、農人會議、地方

自治團體或且其他的各該國特殊的階級組織。」

因此，承認無產階級所作民主政治的議會政治的行動是可能的，即會議制度只被認為一種可能的政體，并不像鮑爾塞維主義所說的那樣是唯一的組織體。

「猶之有產階級在各國境內會形成各種形式，無產階級的革命在各國境內也將形成各種形式，因為資本主義發展的階級在各國也不是同一的。」

這又二分之一的國際於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在維也納舉行一次大會。加入的尤其是德國獨立黨，法國社會主義黨及英國國際工黨。大會顯然申明還沒有創立國際黨，只是創立團結的各集團間的一個工作團體以預備未來的國際黨。他們要形成一中樞以對抗那些相信革命立刻勝利的人們，與對抗那些欲藉改革的政策以代社會主義的政策的人們。

由是，現在有三個國際黨，一個左的，一個右的，又一個中央的；因此第二國際所謂要成爲一切社會主義黨的集合點的意味與成見遂成爲不可能的了。雖然這樣，第二國際并不解散，却仍要繼續工作。他自一九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七日舉行大會於根夫。大會討論及國際聯盟并希望國際聯盟也獲得原料、食糧及信用的分配權，務使「世界重新建設并能夠把凡爾賽和約的損害加以消融起

來。」

衛布(Sidney Webb)把第二國際的原則總括爲幾條主旨。牠承認議會是立法的團體。至於經濟的問題却應在職業團體及社會主義團體中選出的經濟會議中徹底討論。各黨應確定社會主義化的原則。這國際的祕書處由不魯塞爾移到倫敦。最近大會應於一九二二年在不魯塞爾舉行。

結 論

我在本書第二版時曾殿以結論；在這結論中曾指明：雖然各國國際黨在作一切努力，却談不到國際的無產階級有任何一種團結的統一戰線。現在經過十一年，并且其中幾年發生過極大的經濟的、政治的以及社會的革命，然而這種統一性之存在比之從前還少得多；正因為在各國，例如在俄國，重大的政治的變動在要求以實際政策來解決內部的困難，由是其餘各國的社會主義黨撞着這問題，即到底他們是否也要走俄國所走的途徑。各國境內，各黨對於加入第三國際的這問題所取根本不同的態度已經造成一種根本的動機以促成新的分裂與新的黨之組織。各國境內社會主義各國的發展已經重復證實了那種見解，即：各隨各該國的國家特性，而社會主義的黨之形成便也必須不同。

基爾特社會主義是特別適合英國的狀況，猶之工團主義之特別適合拉丁各國的社會運動，與鮑爾

塞維主義之特別適合俄國。

世界大戰的事變與繼此而起的正統馬克斯主義之革命的運動引起極嚴酷的衝突。當直接在政治上活動的時候，便覺得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之未來的發展靠不住了；從前已經潛伏着的馬克斯主義之對立現在不免出現而且引起分裂了，即在戰前以一致團結見稱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亦不能免。依我們所見，德國革命是非常缺少積極的社會的思想；在社會的新形成時候，缺少着明瞭的、成熟的黨綱及目標，又缺少着那些即在極大的政治革命之中也會指示出社會改革途徑的天才領袖。

雖然規定有一切勇敢的社會主義化黨綱，然而經濟制度的基本結構依舊屹然不動。甚且覺得不但在德國，即在其他各國，尤其因為戰時經濟機關的經驗，愈其出現一種有利於私人經濟的劇烈的反動。為復興破壞了的經濟狀況計，尤其需要着強毅的人物與自由的直覺及企業的精神。最近幾年可視為利於工人階級的積極的功効的是：工人運動中所謂主人翁的立場已完全取消了。在保留個人主義的經濟狀況之下，可以預料未來的社會的改革之努力在大體將依舊徘徊於英國費邊社、德國修正派所預示的那些軌路之上。這就是一種經濟的政策，他漸漸見，但在愈其擴大的程度之下，予工人以對於雇主的一種較大的力量；無論是關於工人在企業經營內部的組織上的協同活動，以及關於工人在企業的

總收入上的共同享用。此外尚有別的，由於財政政策的理由，一大部分的企業利得將逐漸歸入公共團體。所謂混合經濟的形式，在保留企業家的自由直覺之下，將使企業的利得收入中一大部分歸為公有。這種過程將因高率的所得稅之必施而加速。

這些變遷必定將要實現，今若把牠們總括在令人誤會的簡語「社會主義化」之下，恐怕最近的將來只好站立在社會主義化的徽號之下。然而於此依然去社會主義的真正的最終的目的還是很遠；現在俄國方面對於這些目的之試行實現，也好像從前所施行同種類的嘗試那樣受了挫折了。